

董以山/著

文  
化  
大  
革  
命  
毛  
泽  
东  
与

(貳)

**CHAIRMAN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董以山 (Dong yi shan)

男，1944 年出生，文登人。中共党员，教授。山东大学政治系毕业。曾任中学教师、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87 年调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先后任伙食科长、经济系办公室主任、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校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校报主编。曾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山东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两课教师。先后在《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出版《邓小平理论学习热点问题探析》等专著 2 部。2014 年出版纪实文学《董千里记事》。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书中通过引述毛、刘、周、邓等领导人年谱中的大量记述，论证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为什么演变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演习”。论证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培养接班人的目标实现了。驳斥了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和“一场浩劫”的说法。论证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个带颠覆性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与  
文化大革命  
(二)

上海反到底战斗兵团

上海斗私批修出版社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董以山 著**

\*

斗私批修出版社

斗私批修出版社出版发行

2023年2月第四版（上海），2023年2月第一次  
印刷

印数1—200册

每册：5.0元



毛泽东



## 毛主席语录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力量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 出版说明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我们：“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过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被残酷的现实所打醒，他们自发地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为了适应广大工人阶级及革命青年学习十年文革历史的迫切需要，我们再版了这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本书作者尝试着用其他角度去看去写十年文革历史，也是一种辩证法运动化的实践，他尝试着弱化阶级立场的绝对范畴，这样更能偏向立场不存或者淡化时靠近没有立场影响的另一种主观的状况，单纯凭某种要素和发展趋势的点来判断容易陷入机械思考和形而上学，望读者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辩证地阅读、思考、学习。

上海斗私批修出版社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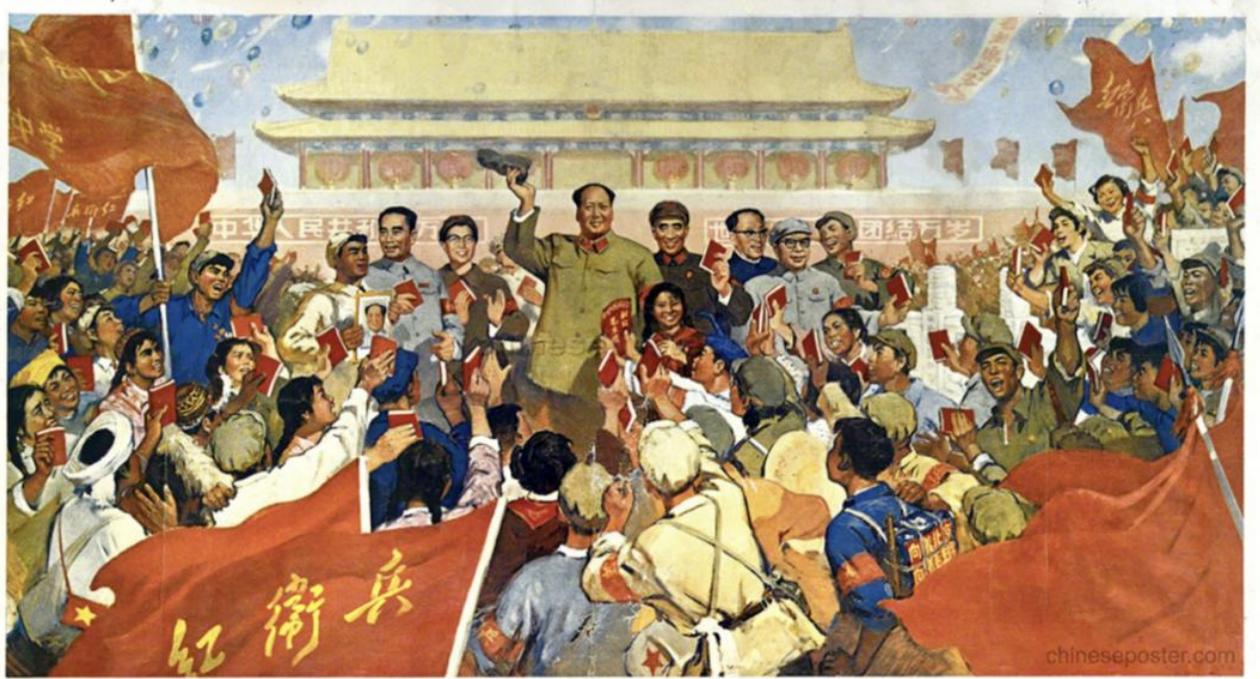






# 目 录

前言.....	(3)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7)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167)
第十八节 重点突破夺权.....	(291)
第十九节 造反派降温期.....	(493)
第二十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556)



最激动的一刻 / At the biggest moment / Le moment le plus heureux

# 前言

(1)

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传记文学，他曾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

什么是传记文学？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不过可以简明扼要地给传记文学这样一个定位：“传记文学是讲给人民大众听的、客观真实的历史故事。”

要求人民大众去一字一句攻读枯燥的专业历史论文，或所谓的“正史”，显然是不现实的。作为中国人，读过正史《三国志》的寥寥无几，读过《三国演义》的却不计其数。因为《三国志》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很差；而《三国演义》是写给大众的读物，首先注重就是趣味性和可读性，因此赢得了无数的读者。

不过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只能算是“文学”，并不能算是“传记文学”，因为它的真实性太差了，即使谈不上“肆意篡改历史”，说它与真实的历史相差太远，也毫不过分。《三国演义》的作者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旁观立场上，客观地描绘这段历史，而是完全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违背历史真实地拔高刘备和贬低曹操，这就违背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话题转到我们的正题：毛泽东和文革。现在中国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书，可以说多得数不清，这里且不讨论有关这方面的专业学术论文，专门讨论一下写给人民大众看的“通俗读物”。虽说这种读物的数量也不算少，但绝大部分并不让人满意，又一次印证了百年前胡适先生的话：“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

现在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书，主要有三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作者的立场性太强。很多作者不是站在书外的第三者立场，作为旁观者来讲述，而是作者自己跳到书里去，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说话。这样的书，要不然成为作者宣扬自己政治理念的宣传品，要不然惧怕政治压力，处处掣肘，不敢畅所欲言，达不到“传记文学”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是选材缺乏客观性。真实的历史人物，绝不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好人”或“坏人”，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令他光荣的事情，也有令他不光彩的事情。在描写历史人物的选材时，应该做到客观公正，既选他光荣的事情，也选他不光彩的事情，就像鲁迅所强调的那样，在写人物传记时必须顾及全人。鲁迅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自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2)

现在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书，在选材上的倾向性非常严重，要不然专挑毛泽东光荣的事情，把毛泽东神格化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现世神；要不然专挑毛泽东不光彩的事情，把毛泽东妖魔化为一个以整人为乐的现世魔。当然那些书中所说的毛泽东的光荣和不光彩，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但根据单方面的事实来给毛泽东“定性”，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岂不冤哉！”

第三大问题是缺少历史高度的分析。作者过于纠缠于一些琐碎的事件细节，缺少站在历史高度上的分析和洞见，就像谚语说的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必须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才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因为存在上述问题，我们感到有必要写一本全新概念的“传记文学”，为人

民大众讲解毛泽东和文革的故事。我们严格遵守传记文学的标准，力争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要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成为人民大众“能看懂”和“喜欢看”的读物。

第二， 要把自己定位于第三者的旁观立场，不成为书中人物的代言人，不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上说话。

第三， 要选材公平，既选择光荣的事情，也选择不光彩的事件。

第四， 要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当然这里所谓的“真实”，只能是相对的真实，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如果绝对的真实，把毛泽东的讲话一字不漏全篇照抄，那就成了历史档案，完全失去了可读性。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疑问：“你们有什么独家秘闻材料吗？你凭什么说你们写的故事是真实的呢？”我们的回答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一个个的历史细节，演绎推证出历史的真实。

这种逻辑推理的方法，被广泛地用于侦破案件。犯人一般是不会交待案情真相的，那么如果犯人自己不交待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案情的真相吗？非也！我们可以像福尔摩斯侦探案那样，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最终推证出案情的真相。

在这里，我们把文革和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案件来侦破或破解，归纳总结一个个分散的历史细节，从一个个似乎是毫不相干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出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最后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推证出这个历史案件的真相。

我们这里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形式，把全书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正文部分和点评部分。正文部分强调可读性和趣味性，完全独立成章；而点评部分

是对正文部分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的补充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评解,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没有兴趣的朋友,只看正文部分即可。

另外,我们还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历史事件进行一些评述,力求在给读者揭示历史真相的同时,还给读者带来一些哲学的感悟或感顿,让读者通过历史的真实,通过文学的美,去了解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去了解毛泽东的那个时代。

最后引用一句先哲的格言:读书不是要让你信仰书中的结论,而是要让你思考。

## 第十六节 拉开倒周序幕

(1)

毛泽东在 1970 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决定打倒刘少奇，是 1965 年初开始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了一年多，到 1966 年夏天，刘少奇就被罢了官，基本上被打倒了。可是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的斗争还在继续，前前后后一直“斗”了 10 年，这说明毛泽东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高手。这个高手是谁呢？他就是与毛泽东风雨同舟 40 年，共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周恩来。

1966 年秋，毛泽东正式拉开了与周恩来斗争的序幕，中间除了林彪事件的插曲之外，毛泽东在十年文革中，主要对手就是周恩来。

周秉德是周恩来亲弟弟周恩寿的女儿，她在 1949 年 12 岁住进中南海，到她结婚为止，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几乎像周恩来的亲生女儿一样。周秉德回忆说：【陈毅在文革初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心腹，陈毅能看出来毛泽东搞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本人就更能看出来了。当然，在文革的最初阶段，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打倒他，以为毛泽东的目标只是刘少奇。然而到了 1966 年 9 月底，周恩来猛然醒悟：原来自己也是毛泽东要打倒的目标。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1966 年 9 月底，江青已经开始要“整”总理，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召开大专学校红卫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张春桥主持，参会的有蒯大富等七、八个学生。座谈会上先是学生发言，他们除了骂刘、邓之外，矛头对着总理，说总理“和稀泥”，搞“折衷主义”。

学生发言后，张春桥表示回去报告。】

王力由于各种原因，在这里只能说江青要“整”周恩来。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示意，江青是不敢整到周恩来头上的。张春桥把这份《会议记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人传一份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会议记录》，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给他看这份批评他的《会议记录》，是要给他一个警告。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两个月，一直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搞文革，一有机会就对文革浇冷水降温，这让毛泽东对他非常不满。因此，这次毛泽东用这份《会议记录》来警告周恩来：如果你再抵制我的文革，我就要批判你了。

这时，周恩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向毛泽东妥协，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取消对周恩来进行批判；第二个选择是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样就要冒着被毛泽东批判的风险，甚至有被打倒的可能。

周恩来做出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呢？很可能是他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意图。这时周恩来恍然大悟地发现，毛泽东搞这场文革，绝不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自己也将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因为看破了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意识到，如果他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虽然暂时可以躲过被批判的危机，可是将来必然躲不过被打倒的危机，停止抵制就等于是给自己挖坟墓。

(2)

周恩来看清楚了，他现在唯一的生存之道，唯一避免被打倒的出路，就是继续抵制下去，只有顶住毛泽东的文革，才能保住自己。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也是为了保住他们这些老革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党”。从事后

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此举是高明的，他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了。

毛泽东传给周恩来这份《会议记录》后，就等着周恩来向他来检讨。按照以往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这份批评他的材料后，马上就会找毛泽东做自我检讨，以换取毛泽东的和解。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装傻，装得好像看不懂毛泽东的意思，没有对这份《会议记录》进行任何表态。

毛泽东本来不想现在就批判周恩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毛泽东的计策被周恩来看破了，所以毛泽东只好提前实施批判周恩来的计划。毛泽东搞批判的惯例，是先制造舆论，扣一个帽子，再来批判。上次，毛泽东抛出一个针对刘少奇的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次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又抛出一个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的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国庆讲话中，首先亮相的。毛泽东让林彪首先说出这个提法，是想向周恩来暗示，林彪是支持自己的。不过毛泽东也知道，如果直接跟林彪说批判周恩来，林彪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要“忽悠”一下林彪，让他无意中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

林彪虽然尊为党内第二位，但他与刘少奇不一样，不主动管事，极少参加会议，送交他批阅的中央文件，林彪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当然也不是林彪自己画圈，是秘书代为画圈。林彪只有在小范围的中央会议中，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像国庆讲话等公众会议上的“例行讲话”，林彪懒得自己起草讲话稿，都是请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给他起草讲话稿，到时候林彪照着稿子念就是了。所以1966年国庆节的林彪讲话，是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

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事先没给周恩来看，也没给林彪本人看，倒是给陶铸看

了。因为在国庆节前，毛泽东还是信任陶铸的，只是在国庆节后，陶铸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换头”照片之后，毛泽东才不信任陶铸了。陶铸看到林彪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陶铸固然政治嗅觉不够敏锐，当时这么明显的政治问题，陶铸当然还是看得出来，因为以前党内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个名词。既然有一条“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必然要有一批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那就意味着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又要兴起一场大的斗争。

### (3)

一个人对革命和斗争的态度，往往随着自己的地位而变化。一个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往往是欢迎斗争的，因为越斗自己越有机会；而一旦自己掌了权，态度马上就变了，就不欢迎斗争了，喜欢稳定了。因为有了斗争，自己的权力就会变得不稳。

陶铸是打倒刘少奇的得益者，一下子升到党内第四位的高位。这时，陶铸从保住自己地位的愿望出发，希望党内越稳定越好，特别不希望党内高层出现大的斗争。因此，陶铸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再发起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党内斗争，但陶铸也无力阻止毛泽东，他只能设法降低这场斗争的温度。

在1966年国庆节林彪快要讲话时，陶铸找毛泽东说：“‘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太重了，中国人最怕‘反革命’三个字。”

毛泽东听了说：“那就加个‘对’字，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林彪对这个例行公事的讲话稿并不在意，于是就按照稿子念，在讲话时照本宣科地讲了“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这句话。

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春桥又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概念不清，容易误解，文字也不通，表达不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恩来听了林彪的国庆讲话，马上意识到其中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讲话中说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句是冲着自己来的。如果是一般人，就会简单地认为，既然是林彪第一个讲出这句话，那就意味着这是林彪主动要向周恩来发难。

但周恩来还是很精明的，他并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他还要核实这件事，到底是林彪主动提出来的主意，还是毛泽东的主意。于是周恩来去找文革小组的王力和关锋等人，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含义和来历。王力和关锋解释了半天，他们没有说这是林彪提出来的，这让周恩来感到放心。因为如果林彪真的要与毛泽东联手起来对付自己的话，周恩来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周恩来还是非常谨慎的，他还要去找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核实。因为这关系到周恩来采用什么斗争方式，把林彪当成一个团结的对象，还是当成一个敌人的基本战略问题。因此周恩来必须特别慎重，完全不能出差错，他要当面向毛泽东把这件事问清楚。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

【周总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说他要去问毛主席。事后他告诉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主席用英文做了回答，说：“原来用 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

命路线)，后来改成 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 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总理以后就照着毛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

(4)

有人误以为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其实毛泽东也学英文好些年，与斯诺等美国人交谈时，也会蹦出几个英文词汇来。像 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这样简单的英文词汇，像毛泽东这样聪明的人，当然应该能够掌握的。

周恩来核实了这个提法的确是出自毛泽东之后，说“我懂了”。周恩来这句话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懂了”这句话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懂了”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已经拉开序幕了；第三个意思是“懂了”林彪没有主动提出和参与这件事。

毛泽东这里用了一个小计策，他自己不首先说批判周恩来的话，而是让林彪第一个公开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这可以造成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让周恩来误以为林彪已经与毛泽东联手起来批判他了，造成周恩来自信的崩溃，投降认输；第二个效果是挑起周恩来对林彪的误解和不满，进一步发展成他们两人的内斗，毛泽东就可以来一个“渔翁得利”。

毛泽东的计策固然高明，但遇到周恩来这样的高手，这个计策还是失败了，两个效果一个也没有达到。

1966年10月3日，也就是林彪讲话后的第三天，第十三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一篇社论，其中专门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

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高层都清楚，这里提到的所谓“折中主义”，明显指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最喜欢搞折中。

《红旗》杂志刊登这篇事关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论，按理说，应该事先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审阅，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却没有通知周恩来。而且在这一期《红旗》社论发表之后，还搞了一个敲锣打鼓的“庆祝”，以提醒人们这期社论的重要性。

据周恩来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而陈伯达却绕开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当天我见到周总理时，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

谁都知道，尽管陈伯达是《红旗》杂志的主编，但没有毛泽东的意思，陈伯达是不敢登这种文章的。周恩来表面上抱怨陈伯达，实际上是抱怨毛泽东。

周恩来对这篇《红旗》社论是耿耿于怀的，到1967年2月发生“二月逆流”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件旧事，当面责备陈伯达说：“1966年10月发表第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陈伯达不敢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敢顶撞周恩来，只好胡乱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5)

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因为这些人总是把“斗争”理解为权

力之争。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这些人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做了一些僭越的事情，引起毛泽东的疑心，以为刘少奇有野心要篡位，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打倒掉刘少奇。

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这些人也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林彪的军队势力在文革中大大膨胀，威胁到毛泽东，特别是 1970 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引起毛泽东怀疑林彪有篡位的野心，所以毛泽东又搞掉了林彪。

可是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这些人就难以用权力斗争来解释了。第一，找不出周恩来有什么僭越的事情，相反，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基本上是臣子对待皇帝的态度，找不出周恩来有篡位野心的证据和迹象。

第二，找不出周恩来与毛泽东争夺党权或军权的事情。周恩来从来没有当过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是排名第三，先是排在刘少奇之后，后来又排在林彪之后。只是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短暂地排名第二，毛泽东很快就提拔了王洪文做接班人。不管是毛泽东提拔刘少奇、林彪或王洪文，周恩来都没有跟他们争当过接班人。

因为无法用“权力之争”来解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于是这些人干脆就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没有斗争，说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彻底奴化，根本不敢有篡权的念头。甚至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助毛泽东整人，帮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帮凶”。又说周恩来挑拨离间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造成林彪的出逃，等等。

以上这些人的说法都缺乏合理性，经不起基本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毛泽东整人，那么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事实就无法解释；如果

说周恩来彻底奴化，不敢有篡权的念头，那么就无法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要挑拨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中，一直在调和或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找不出周恩来挑拨两人关系的证据。

据被划为“林彪死党”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九大之后，我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跟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我们听后都笑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最初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被打倒了，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瞭恰到好处。】

(6)

邱会作的话，说明周恩来不是在挑拨，而是在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作为“林彪死党”的邱会作在被打倒之后，才会感谢周恩来。

我们要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其实只要把思路转变一下，用路线斗争来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并不是他们两人为了争夺第一把手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他们两人因为个人私事的恩怨报复，而是一场典型的“路线斗争”。

如果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还有一些个人恩怨的因素在里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因素，纯粹是出于路线的考虑。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他面前，极尽臣子的本分，并无篡权的野心，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毛泽东在“私”的方面，对周恩来是满意的。除了早年的江西时代，周恩

来在毛泽东成为一把手之后，从没有在“私”的问题上，做过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情。然而在“公”的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很不满了。

同样，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也不是因为“私利”的因素来反对。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不是抱怨毛泽东没有让他当接班人，而是反对毛泽东搞的那一套路线。

因此，毛周之间的斗争，并非起因于个人私利的恩怨之争，纯粹是起因于他们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就是说，两人的斗争，都是为了实施自己心目中的“正确路线”，是一场站在“公”的立场上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思想分歧，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些。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我们在前面也做过不少评述，这里再介绍一下外国人的看法。我们认为，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写的《邓小平传》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写得比较深入，所以这里用较多篇幅引用几段。下面是《邓小平传》中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几段文字。

【毛泽东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在外貌上、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这也是毛泽东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7)

【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

物质差距。】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的老百姓。相反的，毛泽东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毛泽东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干部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毛泽东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从 1950 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这样做了，他同时也对他的同辈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毛泽东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他却发现，自己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将接替成为中共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理查德伊文思提出了四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下面按照这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毛泽东。

第一，毛泽东崇尚“平等”，他的理想是：每个人不仅在社会地位上平等，在思想心态上也要平等。因此毛泽东要打掉官员们“官架子”的傲慢，打掉知识分子们“学问架子”的孤高，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心态上与老百姓真正地平等。

第二，毛泽东崇尚“共产”，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也要坚守社会主义，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毛泽东崇尚“朴素”，他本人的生活是相当朴素的，这点是公认的。

第四，毛泽东崇尚“斗争”。当中国出现一些官员特权化，知识分子特殊化

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是想用“斗争”来彻底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反感那些安于现状，贪图享乐，而不愿继续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干部们。

(8)

我们也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刘少奇。

第一，刘少奇也提倡“平等”，但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达到崇尚的地步。毛泽东对小人物的态度，是十分平易近人的。而刘少奇的官架子，则相对比较大一些。据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山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回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破天荒地召开生日宴会，邀请陈永贵等劳动模范参加。那天陈永贵到达的时间比预定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带着他去拜访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陈永贵说：“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后来我们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在刘少奇面前，是一个连眼都不值得抬的小人物，可是后来毛泽东竟然提拔陈永贵这个小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可见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方面的观念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刘少奇对“共产”态度，虽说不是完全反对，但认为当前中国不适合搞共产。相反，刘少奇对资本主义是比较欣赏的，这点毛泽东与刘少奇观念差异最大。

第三，刘少奇也提倡“朴素”，但是在朴素这方面，刘少奇不如毛泽东，这点也是公认的。不过刘少奇也没有过分的奢侈。

第四，刘少奇不崇尚“斗争”，他认为应该严格党的纪律，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驯服工具论”，反对毛泽东提倡的下级可以对上级“造反”的斗争哲

学。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两人的思想差异都很大，因此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也不奇怪。

我们再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周恩来。

第一，周恩来也崇尚“平等”，周恩来对待小人物的态度，也非常平易近人，这点与毛泽东一致。

第二，周恩来对“共产”态度，基本是赞成的。对“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的东西，周恩来虽然没有坚决反对，但也没有赞成和支持。这点与毛泽东基本一致。

第三，周恩来也崇尚“朴素”，在朴素这方面，周恩来甚至还要超过毛泽东。因此，这点与毛泽东也是一致的。

第四，周恩来不崇尚“斗争”。周恩来崇尚“和谐主义”，尽可能避免斗争，提倡用相互妥协的方法来解决争端。这点周恩来与毛泽东非常不同。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的思想差异，除了在“斗争”方面，其他三个方面都基本一致。但就是在“斗争”这个问题上，两人的思想观念差异太大。每当毛泽东搞斗争，周恩来总是要出来搞“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

(9)

周恩来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马克思的斗争哲学，却持保留态度。周恩来更信奉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温和、文雅、谦恭、礼让，这些传统的儒教品德，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毛泽东是非常反对儒教的，可周恩来却是一个“当代大儒”，两人这方面的差异太大。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的儒教品德，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的缺点就是他身上的儒教品德，认为周恩来太缺乏斗争性，过于顾全情面，谦和有余，直言不足，中庸之道。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让周恩来领导中国，因为他不能与资本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尽管周恩来本人不赞成资本主义道路，但周恩来也阻止不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周恩来不符合毛泽东的接班人要求。

这次毛泽东搞的文革，是一场大革命，一场大斗争，而周恩来不仅不支持毛泽东搞斗争，相反却“和稀泥”，“泼冷水”，“搞折中”，处处阻挠毛泽东搞斗争，成为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阻力源和绊脚石。因此，毛泽东要想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要排除掉周恩来这个阻力源。这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央高层当中，只是他自己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自信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变色。可是毛泽东死后怎么办呢？毛泽东不甘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随着他的死去而死去，因此毛泽东要寻找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以保证在他死后，中国依然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周恩来比毛泽东年轻五岁，身体也很好，当时一般人都预测毛泽东会在周恩来之前去世，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周恩来会在他之前逝去。按照常理的预测，毛泽东去世后，周恩来还活着，那么肯定是周恩来接班。即使毛泽东找到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这个接班人也肯定竞争不过周恩来，无法接班。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打倒周恩来，才能保证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否则一旦毛泽东去世后，就谁也对付不了周恩来了。

应该说毛泽东打倒周恩来，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从私人感情上来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相当友好的，可是在思想路线上，两人的分歧太大。毛泽东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想保持红色中国不变色，就不得不打倒周恩来。

(10)

自从1966年9月底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开始以来，10月1日的国庆节，就成为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场路线斗争的第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毛泽东早在1966年8月5日，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宣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而毛泽东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司令”。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在发表之前，还特别给周恩来看过，所以周恩来应该很清楚，毛泽东用这张《大字报》宣布他与刘少奇的决裂。并且，毛泽东还明确向周恩来发出指示，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资格，这也就是变相停止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资格。

既然毛泽东已经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了，当然毛泽东不会愿意在公共场合与刘少奇一起出现，否则就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误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缓和，进而怀疑毛泽东到底是不是真的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可是，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又不可思议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身旁，这原来都是周恩来的安排。

周恩来在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的排列位置时，声称刘少奇名义上仍然是国家主席，所以不能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排名次序，把刘少奇排在第八位，而是要应该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于是国庆节那天，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让群众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在毛泽东看来，他明明已经向周恩来“交底”，声明他与刘少奇已经决裂了。可是周恩来偏偏要安排毛泽东这个“红司令”，与刘少奇这个“黑司令”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红卫兵，这简直就是对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一种讽刺。

因此，毛泽东很不满周恩来搞的国庆庆典安排，他要自己单独行动，向红卫兵和群众们显示，他与刘少奇等人不是一伙的。作为最早一批红卫兵领袖的杨小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66年10月1日，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城楼，直奔向金水桥。等周恩来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周恩来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又要脾气，单独去闯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龙潭”去了。

周恩来立即指示警卫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领着江青从后面赶来，在金水桥追上了毛泽东。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

(11)

我看见周恩来喘着大气，虔诚地上前去搀扶毛泽东，却被毛泽东的大手甩开，然后大步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毛泽东快走到我跟前时，突然转过头来，用手指着地下散落的几张红卫兵传单，对身后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由于欢呼声浪太大，我没能听清伟大统帅发出的号令，只见周总理立即俯下身去，亲自捡拾传单，然后把踩皱的那几张传单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我看了这一幕精彩的“主仆剧”。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楼上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下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杨小村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耍脾气”，“大手甩开周恩来”，不愿意在天安门城楼上，要单独去见红卫兵，要与红卫兵席地而坐，这些都表示毛泽东不愿意和刘少奇在一起。

另外，杨小村也提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主仆剧”。尽管周恩来在“公”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的路线，可是在“私”的立场上，周恩来仍然非常尊重毛泽东，总是表现得对毛泽东非常恭敬，有时甚至像是毛泽东的仆人一样。这样一来，有人要想找周恩来反毛泽东的把柄，也很难找到。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周恩来反对的是毛泽东要搞的文革，并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

以前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总是安排刘少奇也乘车参加检阅。这次国庆节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打破周恩来的计划，自己乘敞篷车去与群众见面。这次由毛泽东自己安排的车队中，政治局常委中的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没有了。毛泽东要用这个行动向群众显示，他的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之中，不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这四个人。

毛泽东搞文革，总是受到周恩来的种种阻挠和抵制。当然周恩来并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文革，他与刘少奇的做法不同。刘少奇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派出工作组，直接压制学生，这是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硬办法，而周恩来用的是软办法，他并没有反对或阻止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要做的事情是打

倒老干部;而周恩来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保皇派”，保皇派要做的事情是保护老干部。当然所谓“保皇派”，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每个群众组织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没有自称是“保皇派”的。

(12)

在1966年9月以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当地的领导干部，组织起一批自己可以操纵的工人和农民，围斗造反派学生红卫兵的事件。为此，毛泽东在9月7日，特别写了一个批语，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毛泽东的批语说：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周恩来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并没有真正落实下去。因为各个地方的领导人，肯定不甘心自己被打倒，必然要自保。既然组织工农来反对红卫兵太明显，他们就自己组织官办的红卫兵，用官办的红卫兵来抵制造反的红卫兵。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参加国庆典礼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但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

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毛泽东的这些话中，说到“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这就是指的周恩来。在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又当着周恩来的面，讲了一句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座的有总理和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我在场，林彪、康生、陶铸等都不在座，因为他们看完烟火后就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我们谈了一些话，他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这句话，既是对文革小组的人表示他的决心，更是对周恩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是铁了心要把文革搞到底的，哪怕是有被枪毙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为了排除一切阻力，把文革搞到底，这时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壮大自己的造反派红卫兵和群众，以此来抗衡周恩来的保皇派红卫兵和群众。

第二件事是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化。以前刘少奇犯错误这件事，只是限于中央高层，并没有向下传达，一般群众还不知道刘少奇犯错误了，更不知道刘少奇犯的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13)

这样就给了周恩来可乘之机，让周恩来有理由安排“黑司令”刘少奇与“红司令”毛泽东共同接见群众的。周恩来巧妙地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来削弱毛泽东的革命气势。只要刘少奇出现在天安门上，那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就是放空炮。

因此，毛泽东要想把刘少奇从天安门上赶下去，就必须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出来，传达下去。然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做出过一个决议，就是刘少

奇的问题不公开，仅限于中央，不向下面传达。这样一来，毛泽东如果要公开刘少奇的错误，就必须开一次中央会议，在中央会议上推翻上次会议的决定。

第三件事是在党内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现在党内高官们，大部分人对毛泽东的文革都表示“不理解”、“跟不上”，他们纷纷赞成周恩来对文革的阻挠和抵制。因此，毛泽东要展开对周恩来的斗争，就要设法把高官们从周恩来那边“拉过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在会上开展批判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高官们意识到跟着周恩来走是要犯错误的，是危险的，这样就能吓住一部分高官，吓得他们放弃周恩来而转向自己这一边。

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在国庆节三天后的10月4日，提出要召集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王力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主席提出要把各省市以及中央各部的主要负责人，找来开个会，就是中共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把毛主席的精神贯彻下去，在中央内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个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会。很明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不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五十天，而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两个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些同志，在中央主要是周总理、陶铸。】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针对他的，自然也就设法阻止这次会议。周恩来借口当时不少省市的领导，因为正在被群众批斗，一时间无法脱身，所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是否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改动，即按照通知进行。】

毛泽东当天就在周恩来的信上写下了批示，说：“照样开会，唯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于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10月9日召开。毛泽东原计划开七天会，到10月15日结束，可是会上的阻力很大，开得很不顺利，因此会议又延长了十几天，拖到10月28日才结束。

(14)

周恩来预计毛泽东将这次会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批判，也就是对他的周恩来路线进行批判，因此周恩来做好了应付的准备。周恩来的对策，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周恩来知道，现在众高官心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很多，一旦让大家“畅所欲言”，让大家把对毛泽东的不满说出来，这样就可以改变会议的方向。

周恩来在开会的当天，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提出三点提议：一、发言要谈观点、摆问题，二、不同的看法，都可以讲，要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人人都发言。

果然，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中，参会的高官们纷纷倒苦水，吐怨言，谈忧虑，会议变成了“诉苦大会”。高官们出于“惺惺惜惺惺”的心情，特别对一些高官被揪斗、“坐喷气式飞机(两手被拉向身后的低头认罪的姿势)”，戴高帽子游街的情况，表示出强烈的愤慨。甚者有人公然提出要对工作组的问题“重新估计”，企图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案。

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并没有亲自发言，而是让陈伯达做一个代表他本人思想的长篇讲话，然后观察众高官的动向。陈伯达的讲话，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文革的必要性和伟大性，试图对众高官“打通思想”，说服他们接受毛泽

东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点名批判刘少奇,为公开刘少奇的错误做舆论准备;第三部分是批判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说:【两条路线斗争,在十一中全会后还在继续。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采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有的领导人自己组织了红卫兵,或者操纵了群众组织。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还在受到压制,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但是陈伯达的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周恩来则借着在会上做自我检讨,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周恩来借着“自我检讨”的方式,巧妙地表示出自己对毛泽东的文革“很不理解”。既然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都很不理解,那么众高官对文革表示“不理解”,就更加理直气壮了。这样一来,这次会议的方向,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设想,没有成为批判周恩来的会议,反而成了批评毛泽东的会议了。

(15)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搬出林彪这个“救兵”,希望林彪来一个震动性的发言,彻底扭转会议的气氛。10月25日,林彪在会议召开后的17天,做了一次长篇发言。然而林彪的发言,却让毛泽东大大失望了。林彪的讲话,大部分篇幅都是长篇大论地论述“文革的意义”,提及实质性问题的篇幅很少。林彪说: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头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

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林彪这里说的“两头劲头很大”，一头是指毛泽东和坚决毛泽东站一边的人，另一头是指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林彪说的“中间”，是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一个要求，是期望林彪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猛烈的批判。可是林彪在讲话中，却矢口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更有甚者，林彪把周恩来等人对文革的抵制，轻描淡写为“中间有点劲头不足，有点顶牛”，这根本就谈不上批判，连批评都嫌太轻。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二个要求，是要他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点林彪虽说做到了，但有点勉强。林彪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林彪虽然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但只是说他们的路线与毛泽东的路线相反，并没有说他们的路线是反动路线。至于对刘少奇的批判，林彪完全引用了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没有用自己的话来批判刘少奇。谁都可以看出，林彪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很勉强的。

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的第三个要求，是期望林彪指出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并对他们进行严重的警告。可是林彪却说：【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林彪在这里，不仅没有批判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为他们开脱，说他们“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只是不自觉地犯了“认识错误”，这与毛泽东所说的路线错误，相差太远了。这次，林彪没有像过去那样，在毛泽东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进行“救驾”，让毛泽东完全失望了。

(16)

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毛泽东遇到周恩来委婉抵制，林彪也不肯帮忙，就在毛泽东左右为难的时候，没想到这时候刘少奇反而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

前面我们提到，毛泽东为了把文革搞到底，他需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公开批判刘少奇，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这有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需要树立一个革命的靶子。这么一场大革命，总得有一个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敌人。如果没有革命的靶子，大家找不到革命的目标，革命就会成为一场闹剧。

同时，这个革命的靶子必须是重量级的人物，如果把彭真这样的人作为革命的靶子，那就份量太轻了，还不够格做毛泽东的敌人。因此毛泽东曾说：“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而从这方面看，毛泽东把刘少奇树立成“革命的靶子”，也是看得起刘少奇，认为刘少奇还是“了不起”的，有资格做毛泽东的敌人。

打倒刘少奇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把文革搞到底。怎样处理革命的头号敌人，

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革命是否“搞到底”的标志。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清王朝，因此革命的头号敌人就是皇帝溥仪。按照革命党人的初衷，至少把清帝溥仪赶出故宫，废为庶人。可是革命党人在强大的阻力面前，退让妥协了，同意清帝继续住在故宫，继续享有“皇帝”的尊号，甚至国家还要继续给清帝提供巨额的生活费，这样一来，辛亥革命就成为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中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孙中山不得不发起“二次革命”，并且直到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他的革命目标也还没有成功。因此，孙中山在遗嘱中悲愤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次，毛泽东接受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教训，希望把这场文革“搞到底”，希望在他临死的时候，不会再发出“革命尚未成功”的悲愤。那么怎样处理刘少奇这个文革的“头号敌人”，就成为文革是否搞到底的一个标志。而文革的反对派，也拿刘少奇这个“头号敌人”来做文章。

当时刘少奇虽然被罢官了，但还没有被打倒，甚至还是政治局常委。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多数党内高官们看来，刘少奇即使犯了错误，也还不到被打倒的地步，反对毛泽东从重处分刘少奇。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给刘少奇的问题留了一个尾巴，就是刘少奇的错误不对外公开，对刘少奇的处分也按照党内机密处理。

然而，如果刘少奇的错误不对外公开，那么毛泽东就无法把刘少奇当作文革的靶子，而且周恩来等人还可以利用刘少奇的合法身份，让刘少奇公开露面，给文革泼冷水。因此，毛泽东必须要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刘少奇的处理结论，要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于众，为进一步彻底打倒刘少奇埋下伏笔。

可是毛泽东要想说服众高官们，改变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公开刘少奇的错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已经不管事了，没有继续犯新的错误，这样毛泽东就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加重对刘少奇的处分。就在毛泽东为难的时候，刘少奇帮了毛泽东的忙。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的态度还是很硬的，不承认自己有错，甚至顶撞毛泽东说“五不怕”。可是两个月之后，刘少奇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写了一个长篇检讨，把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对他的指责，全盘接受下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错误的性质，完全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刘少奇还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和处分，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给毛泽东送上《检讨书》时，还特别写了一封信，声称他自愿把自己错误公开出去。刘少奇在信中说：“以我为错误典型，把我拿出来批评，对党对人民有利，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我愿意这么做。”

为什么刘少奇自愿当文革的靶子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分析。不管怎么说，既然刘少奇本人愿意公开自己的错误，那么反对公开刘少奇错误的人，就无话可说了，这样就把毛泽东要办的一件棘手的事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所以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刘少奇的《检讨书》上批示说：“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毛泽东之所以说刘少奇的《检讨书》“后半段更好”，是因为刘少奇不仅承认他在文革初期五十天镇压学生的错误，还在《检讨书》的后半段，根据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的那样，承认了自己在1962年和1964年也犯了路线错误。刘少奇这个《检讨书》，成为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正确性的最好证

明。因为刘少奇本人都承认自己错了，这比毛泽东说刘少奇错了，更加有说服力。而且，刘少奇的《检讨书》中，不仅承认他犯了两次路线性的错误，并且还说明，这两次错误都是毛泽东亲自纠正的，这样一来，就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公开的检讨，这里摘录几段刘少奇的检讨讲话。刘少奇检讨说：

【同志们：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了一些错误的建议。例如，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了工作组，许多学校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这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18)

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刘少奇在检讨中，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大字报》的原话来批判自己，比如“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等。这样，就证明了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对刘少奇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这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当时的困难讲得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刘少奇的检讨，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批判自己在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是这样的：“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接着，刘少奇继续检讨说：【我在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之后，在1964年又犯了形式上‘左’，而实际上‘右’的错误。在这段时期中，我过分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后来又把她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在事实上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刘少奇进一步承认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话，批判自己在1964年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不过刘少奇的检讨，有把一部分责任推给陈云和王光美的嫌疑。刘少奇的检讨最后说：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我完全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

主席的接班人。我决心严格遵守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19)

刘少奇最后说“决心严格遵守毛主席的一切决定”，这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同时也用赞美林彪的话，向林彪示好。刘少奇还特别声明“不搞两面派”，也就是声明自己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保证言行一致。刘少奇的这个《检讨书》，事实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条件投降书”。

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不少高官因为受到群众的批判，对毛泽东撤工作组，放弃党的领导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委婉地为刘少奇和工作组辩护，毛泽东对这种不满言论，也不好处理。现在刘少奇站出来，自己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说毛泽东纠正了他的错误，并且自愿当文革的“靶子”。这就等于支持了毛泽东，等于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反驳了那些怀疑毛泽东的人。刘少奇的此举，在毛泽东为难的时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效果。

于是在刘少奇公开检讨后第二天的 10 月 24 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不少刘少奇的好话，毛泽东说：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刘少奇)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 1959 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刘少奇的好话，但那只是一时高兴说的话。不管刘少奇怎么表现，投降也好，顽抗也好，毛泽东都是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这个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为不把刘少奇彻底打倒，文革就很难搞彻底。这个既定方针，已经不可能改变了。

1966年11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书》，印发至县、团级，实现了毛泽东公开刘少奇错误的目标。此后，既然中央会议决定可以公开刘少奇的错误，那么对刘少奇的批判自然也就骤然升级了。1966年12月初，北京纷纷出现“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大幅标语，刘少奇终于变成了文革的头号靶子，成为革命的头号敌人。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本来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阻力还是很大的，可是刘少奇却声称他自愿当文革的靶子，主动为毛泽东排除打倒自己的阻力，简直就是自毁长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刘少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下面我们进行一下分析。

(20)

毛泽东打倒的四个主要的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除了刘少奇之外，都是比较“硬”的人，都没有向毛泽东投降，高岗自杀，彭德怀入狱，林彪出走。刘少奇刚开始也是很“硬”的，但没有像其他三个人硬到底，而是后来忽然又“投降”了。

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态度来看，有“前倨后恭”倾向，在1966年8月态度还是很硬的。正因为刘少奇的态度硬，所以毛泽东才写了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

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但是到了1966年9月中旬，刘少奇的态度，忽然“软”了下来，有人把这理解为刘少奇的“软弱”，这也不正确的，因为刘少奇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的“投降”，并不是因为“怕”毛泽东，也不是因为受到批判的压力太大，而是出于另外的考虑。

一些人看到红卫兵批斗刘少奇的照片，误以为刘少奇在被红卫兵批斗之后，不堪忍受，才向毛泽东检讨求饶的。造成这种误解，主要这些人把时间的前后顺序搞错了。刘少奇被批斗，是1967年以后的事，在1966年，刘少奇不仅没有批斗，而且照旧享受着政治局常委的待遇，照旧有资格上天安门，参加中央会议。在1966年9月刘少奇向毛泽东“投降”之前，可以说刘少奇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人身侮辱。因此刘少奇“投降”的动机，不是软弱，不是忍受不了批斗的凌辱。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罢了官，但他依然十分镇定，并没有被毛泽东的气势吓到，更没有显示出动摇或投降的样子。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斗争的对象是刘少奇，我总以为他会很紧张，但他竟同平时一样的！以我看到的他在全会上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胸怀宽阔，若无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计较；三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在全会开幕进场和闭幕进场，他也是坚持原则的。开幕时，刘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后面，闭幕式，他走在康生的后面。】

可见当时刘少奇还是很“硬”的，态度十分镇定从容，完全没有被吓得不知所措，仓惶投降的样子。1966年8月刘少奇倒台，到1966年9月中旬刘少奇“投降”的一个月时间里，刘少奇受到的压力，就是毛泽东安排的几次政治局非正式的“生活会”，在“生活会”上批评刘少奇。但那时众高官的态度只是应付

差事，除了陈伯达、谢富治少数人之外，包括林彪的批评，都是不痛不痒的。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陶铸却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许印在会议简报上，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

(21)

另据《贺龙传》记载：【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陶铸、贺龙等都不肯批刘少奇，刘少奇是受到大家同情的。因此，当时刘少奇的处境，压力并不太大，并没有到不“投降”就过不去的困境。那么促成刘少奇的“投降”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是来自于他对时局的分析。

刘少奇一直有一种“自信”，认为毛泽东离不开他。刘少奇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周恩来成为第二把手，毛泽东就要大权旁落了，当年毛泽东提拔刘少奇为第二把手，也是为了制约周恩来。如果毛泽东把刘少奇拿掉，那么谁来制约周恩来呢？林彪是制约不了周恩来的，一来林彪身体不好，二来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较好。从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掌握力度来看，刘少奇当第二把手，肯定比周恩来当第二把手要好。

刘少奇下台后，他冷眼旁观，果然如他预料的那样，林彪不管事，周恩来成了实际上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指示，遭到周恩来的种种抵制，而林彪持中立态度不肯帮忙，即使毛泽东最抱以希望的新提拔的陶铸，也是游走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不肯与周恩来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陷入没有“大将”的困境，虽说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倒是替毛泽东冲锋陷阵，这些人在党内的威信太低，势力太薄弱，担当不起“大将”的重任。

作为一个统帅，发起一场战役，却没有可用的大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毛泽东发起文革这场大战役之后，毛泽东期待成为大将的林彪和陶铸，都让他失望了，毛泽东陷入没有大将可用的地步。

刘少奇看到毛泽东的困境，也看到自己一个“复出”的机会。如果毛泽东重新启用刘少奇，让刘少奇复出，作为毛泽东搞文革的大将，替毛泽东冲锋陷阵，那么毛泽东搞文革，就会顺利多了。可是毛泽东已经拿掉刘少奇了，怎么让毛泽东回心转意呢？刘少奇想从一个“投降”的以退为进之策，向毛泽东彻底投降，彻底认错，戴罪立功，以换取毛泽东的回心转意。

直到这时，刘少奇还没有明白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真意，他仍然以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是针对他个人的，是因为他冒犯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就是要拿掉他刘少奇。如果毛泽东是出于这个动机，那么刘少奇洗心革面，向毛泽东彻底投降，对毛泽东俯首贴耳，那么毛泽东就还是可以重新启用刘少奇的。

(22)

因此，刘少奇就给毛泽东写下一个彻底投降的《检讨书》，承认毛泽东对自己的一切批判都是正确的，在众高官怀疑毛泽东的关键时刻，为毛泽东解围，来一个戴罪立功。同时，刘少奇声称愿意成为毛泽东的“革命靶子”，也就是愿意

牺牲自己来帮毛泽东搞文革，借此来向毛泽东“献忠心”。

但刘少奇的想法很快落空了，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并不是简单的与刘少奇的个人恩怨和权力之争，所以不管刘少奇投降还是顽抗，毛泽东都必须打倒他，为了完成文革这场大革命，这是一个所必需的步骤。

刘少奇公开检讨后，把他的《检讨书》下发至县团级干部，实际上全党都知道了，很快全国人民也知道了。刘少奇本来的要求是，把毛泽东对他《检讨书》的批语“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也随同《检讨书》一起发下去。为此，刘少奇曾给周恩来写信说：“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

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毛泽东同意了。可是在最后下发刘少奇《检讨书》的时候，又删掉了批语。刘少奇之所以同意下发他的《检讨书》，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批语。因为不管刘少奇自己骂自己多么厉害，只要有毛泽东的批语“写得很好”，那就是毛泽东还承认刘少奇是好同志，这样一来，《检讨书》反而成为刘少奇无罪的证据，并且为刘少奇以后的复出埋下伏笔。

可是没有毛泽东批语的刘少奇《检讨书》，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刘少奇的《认罪书》，成为刘少奇有罪的证据。因为刘少奇在《检讨书》中，自己承认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自己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一来，刘少奇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的名声就“臭了”，人们批判刘少奇，也不再有所顾忌了。

刘少奇发现发下去的《检讨书》并没有毛泽东的批语，才发现被毛泽东“忽悠”了。其实这次刘少奇也想“忽悠”毛泽东，却反过来被毛泽东“忽悠”了。

但直到此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要搞文革的目的仍没有明白，据王光美回忆，在这期间刘少奇对她说：“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此时刘少奇还以为毛泽东打倒他，是为了那个“国家主席”的职位，以为他辞去国家主席回家种地，毛泽东的目的就达到了，就可以结束文革了。其实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早就对江青等人透过风，据王光美回忆说，1966年12月底，江青亲自找刘少奇前妻的女儿刘涛谈话，王光美说：【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

此后，刘少奇终于明白了毛泽东一定要打倒他的，所以刘少奇也不再对毛泽东“软”了，又对毛泽东“硬”起来。

(23)

刘少奇在这次“投降书”之后写的《检讨书》，又“翻供”了，又不承认自己有错了。比如刘少奇1967年4月14日写的书面检查，这里摘录其中一些内容。刘少奇写道：【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1964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了与我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

道为什么。】

1967年8月7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说我的目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由此可见。后来刘少奇的《检讨书》，已经变成了《申辩书》的性质，刘少奇又“硬”起来，不再认错了。刘少奇试图用自己的“申辩”，来挽回前面的“认罪”，但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本来还有一些言论为刘少奇和工作组鸣不平，刘少奇的《检讨书》发下去之后，他自己都认罪了，那么替他鸣不平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刘少奇失去了最后一张防卫盾牌。

在刘少奇的《检讨书》公开之后，批判刘少奇就骤然升级了。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开始在刘少奇住的福祿居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批斗。1月12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强行闯进刘少奇住处，当面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忽然打电话找刘少奇面谈。

1967年1月13日晚，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单独谈话，这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谈话。关于这次最后的见面，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有比较详细的回忆，因为这是两位巨人的最后见面，所以我们这里全文摘录。刘振德回忆说：

【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主席叫我去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我同他开玩笑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可以随便进出，没有人挡，更何况是你呀。”

(24)

我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但少奇同志没有听懂，他提高声音对我说：“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懂。”

这时光美同志又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少奇同志说着就站了起来：“那好。”

徐业夫来后，先到了我们办公室。因为少奇同志搬到福禄居后，他还没来过。我问他：“为什么你坐华沙车来接？”

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

我领他到少奇同志办公室时，少奇同志已在门口等着。徐业夫说：“主席请你到他那里谈一谈，跟我一起坐车去吧。”

少奇同志顺手装上香烟和火柴就出来了，光美同志跟在少奇同志身后，用手捋捋少奇同志刚穿上的干净衣服，把他的上衣往下抻了抻，这样一直送少奇同志上了车。看得出，光美同志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少奇同志走后，光美同志问我：“为什么叫徐业夫来接？”

我说：“刚才徐业夫说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怕不安全。”

她又问说：“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都换车了？”

我说：“不知道。”我安慰她说：“不管坐什么车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大了解。”

她心中无数，说：“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当其他工作人员知道昨晚毛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时，都很关心，问我知道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也急切地想知道谈了些什么。我给光

美同志送抄来的大字报时，问她：“不知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谈了些什么？”

光美同志神情黯然地说：“少奇同志回来没有多说，只说他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到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特别是许多老干部，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二是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少奇同志还说，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毛主席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少奇同志告辞时，毛主席还送到门口，并要他保重身体。”】

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对毛刘的这次见面，也回忆说：【那天是晚上8点多钟，毛主席的秘书要来个普通的车，有少奇同志，主席秘书徐业夫和我，三个人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把少奇同志送进去，就在门口等着。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

(25)

王光美本人也回忆说：【1967年1月13日夜，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些人回忆大致差不多，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话的内容，应该是刘少奇向王光美转述的。怎样理解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最后见面呢？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性。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种可能性，是与老战友的诀别。毛泽东的性格虽说是翻脸不认人的，但也有讲情谊的一面。似乎毛泽东有一个惯例，对他要打倒的老战友，最后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之后两人就友情两断了，成为敌人了。1965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召见彭德怀，还特地请彭德怀吃了饭，喝了酒，从此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友情就一刀两断了。

这次毛泽东也可能出于同样的心态，刘少奇跟毛泽东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次毛泽东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最后跟他见一次面，最后叙一次情，从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友情也就一刀两断了。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见刘少奇，也是因为如果在对刘少奇批斗升级之后，毛泽东再接见刘少奇这个“黑司令”，在红卫兵那边就不好交代，甚至会让红卫兵发生误解，所以毛泽东必须在刘少奇的批斗升级之前，见刘少奇这个老朋友最后一面。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与老战友的诀别，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客客气气的，最后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还叮嘱他：“保重身体，好好学习”。】的这些事情，就比较好理解了。

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二种可能性，是胜利者的快感。或许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而且越来越受到批斗的威胁，刘少奇很可能会向自己求饶了。胜利者的最大快感之一，就是败军之将在自己面前俯首跪地求饶，毛泽东大概想享受一下这种胜利者的快感，看看刘少奇俯地求饶是一个什么样子。

两年前，刘少奇还是很傲慢的，在大会上当面不给毛泽东面子，气得毛泽东

拿出《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现在轮到刘少奇拿《宪法》替自己维权了。打倒蒋介石的斗争，才花了三年时间，而对刘少奇的这场斗争，毛泽东就花了两年时间，可见胜利来之不易，所以毛泽东要看看刘少奇这个败军之将的最后表演。

(26)

如果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那么毛泽东让刘少奇坐“华沙牌”小轿车去见他，就比较好理解了。这种轿车当时是厅局级的干部坐的，最低档的小轿车。而刘少奇一直都是坐顶级的大吉斯轿车，因此王光美对刘少奇屈尊坐华沙牌小轿车，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或许是看到刘少奇已经投降了，想用这个“轿车”，来进一步压刘少奇更加低头。

不管毛泽东见刘少奇，是出于老战友的诀别，还是出于胜利者的快感，刘少奇的态度，都让毛泽东感到意外。毛泽东本以为刘少奇已经彻底投降了，以为刘少奇即使不会跪地求饶，也会表示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可是刘少奇这次却没有“软”，不仅没有跪地求饶，甚至痛改前非和悔过自新都没有表示。相反，刘少奇“硬”了起来，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高姿态，对毛泽东说：“由我一人承担这次路线，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职，是对毛泽东无言的抗议，也是让毛泽东为难。据王光美回忆：【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周恩来已经明确告诉刘少奇，不要再提辞掉国家主席的职务，这样是“让组织为难”。可是刘少奇却明知故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向毛泽

东发难了。因此，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要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刘少奇本人也很清楚，他提出的这个要求，毛泽东本来就是无法当面回答的。于是毛泽东把话岔开，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毛泽东大概是因为事先也没有思想准备，随便说了几本书，这几本书并无特别的意义。

这次见面之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写过几封信，其中有“我已失去自由”等话，但刘少奇没有向毛泽东求饶过。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的“投降书”，是非常失算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众高官被群众批斗，党内反毛泽东的情绪很强。周恩来虽然也抵制毛泽东，但只是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没有公开地反对。如果这时刘少奇对毛泽东彻底“硬”下去，把自己树立为反毛泽东的旗帜，那么刘少奇就会赢得众高官明里暗里的支持，至少是人格上的敬佩，就像彭德怀那样。

可是，刘少奇突然向毛泽东“投降”，就失去了众高官对他的支持和信任。尽管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又“硬”了起来，但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刘少奇了，甚至认为他在搞投机。周恩来等人本来都是想支持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忽然反戈一击，不是站在周恩来这一边，而是站到毛泽东一边去了，这样周恩来这一派人，也对刘少奇摇头失望了，不再支持刘少奇了。刘少奇如果有周恩来一派人的支持，至少不会被那么快打倒，结局也很可能会好得多。刘少奇“投降书”，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者，这也是刘少奇悲剧的一个因素吧。

(27)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 1966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第一个议题是继续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撤销上次中央会议所做出的对刘少奇错误进行“保密”的决定，向全党公开刘少奇的错误。这个议题由于

刘少奇本人很“配合”，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个议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针对周恩来为首的保守派老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这个议题由于遭到大部分参会高官的抵制，进行得很不顺利。参会的高官们，不少人正遭受红卫兵猛烈的冲击，大多数人思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

毛泽东请来救兵林彪，但林彪却持中立态度，没有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将，只有陈伯达和谢富治等少数高官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劣势，而周恩来则占据了上风。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大会发言。这次毛泽东的发言比较低调，不但没有指责那些抵制文革的干部，反而对他们十分“宽容”。毛泽东的开场白说：【我讲几句，讲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的“两件事”，也就是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继续批刘少奇，也就是“一线、二线的问题”。毛泽东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这里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特别指出“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这是因为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保密。因此，毛泽东提出，应该让红卫兵知道中央的变化，也就是向红卫兵公开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讲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聂元梓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就是，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短，来势很猛，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这里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客气”，巧妙地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闯了一个祸”，没有坚称自己发动文革一定是正确的，这样客气的措辞，可以缓解一下高官们的对立情绪。毛泽东继续说：

(28)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个月，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虽然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在5月16日又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了。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毛泽东这里用抱怨的口气说，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呼吁，可是高官们就是“不注意”。不得已，他发动红卫兵来“冲”，高官们就“不注意也不行了”。毛泽东这里的言外之意是说：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就是不理睬我的话，所以我不才不得不发动红卫兵。我发动红卫兵是你们“逼”出来的，因此你们也不要埋怨我。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

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毛泽东这里用客气的话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这就是意味着，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要紧。但在中共历史上，犯路线错误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绝不是“改了就是了”。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这次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许多很多高官感到自己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就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对“路线错误”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就打消了那些有“路线错误”的高官的忧虑，使他们感到自己还是有出路的，因而不至于顽抗到底。

毛泽东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因为这次会上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毛泽东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所以说出这句言不由衷的话。在毛泽东的内心中，这些高官都是要打倒的，但现在时机还不到。

毛泽东又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我们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时谁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毛泽东这里再次对高官们的“思想不通”，表现出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这也是为了安抚缓和众高官的抵触情绪。但毛泽东最后又强调他胜利的信心，毛泽东说：【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人，还是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会

通的。】

(29)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相当被动的，他煽动起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不仅没有烧向周恩来，反而反过来烧向毛泽东自己这一方。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及时停止这次会议。据叶剑英透露，毛泽东在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说：【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一些人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周恩来在 10 月 26 日和 28 日发表大会讲话，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表态”。周恩来在讲话中，先对文革的意义大肆吹捧一番，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这个年代比斯大林的年代更伟大。大家要下定决心，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单单泛泛地吹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行。对于毛泽东的两个会议主题，周恩来必须表态。对第一个批刘少奇的主题，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调子，对刘少奇进行了点名批评，他说：

【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

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

周恩来批刘少奇的调子，比林彪批刘少奇的调子高了许多。林彪在这次会上批刘少奇的时候，只是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而周恩来的话，就严厉了许多，这反映出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不满。因为在关键时候，刘少奇并没有帮周恩来，而是去帮了毛泽东，因此，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比过去严厉了许多。

不过周恩来给刘少奇扣的政治帽子，并不是他发明的。前些天谢富治在会上批判刘少奇时，就说过：“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

虽然周恩来也批评和批判刘少奇，但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总体上还是“保”刘少奇的。这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保住刘少奇，就可以间接地保住周恩来自己。甚至到一年后的1967年五一节，周恩来还婉言地提出刘少奇上天安门的问题。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五一节，总理请示毛主席，说朱老总和陈云同志要上天安门，主席说：“当然要上。”总理又接着请示说：“刘、邓、陶是不是就不上了？”主席说：“就不上了。”

(30)

后来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责问说：“总理，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要让刘、邓、陶上天安门？”当时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会上总理遭到围攻。】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要对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表态。在批判刘少奇的主题上，周恩来点名批评了刘少奇，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对于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

东定下的调子讲，又要进行抵制，因此，周恩来使出了他的政治智慧，说：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因为周恩来想要抵制毛泽东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他在讲话中，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是改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这个拗口而冗长词句，来代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把“反动路线”转弯抹角地减轻为“错误路线”，这就是周恩来委婉抵制毛泽东的一种常用做法。

周恩来又说：【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要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周恩来试图在这里声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不是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把文革的打击力度大大降低了，深得高官们的支持。周恩来又说：

【我和红卫兵们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地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给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但是

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对各级领导宣布罢官，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周恩来这些话，名义上是对红卫兵说的，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说的，提出不要罢官，不要抄家，不要打人和体罚。这对于正处于被罢官和挨斗的危机中的高官们来说，真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更使他们打心眼里支持周恩来。

周恩来的这些话，深得高官们的人心，他们觉得周恩来是替自己说话的。因此，毛泽东要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也就批不下去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站了上风，赢得了大多数高官的支持。

(31)

最后，周恩来还不忘团结毛泽东那边的人。周恩来最擅长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把不同政见的人也团结过来。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周恩来就把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甚至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团结了过来，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大功，这方面周恩来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次，周恩来又使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把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团结过来。

毛泽东那边的人，一个是林彪为首的军队集团，另一个是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陈伯达只是一个挂名的组长，江青才是真正的组长。尽管这样，陈伯达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周恩来与陈伯达的私交较好，同时周恩来也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有不少矛盾，这就成为他把陈伯达团结过来的基础。

周恩来要团结林彪和陈伯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众人面前说他们的好话，吃了别人的饭嘴软，听了别人的好话耳朵软，因此周恩来要在这次大会上，在众

高官面前吹捧一番这两个人。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林彪同志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1960年写了《农村工作六十条》，1962年写了《财贸决定》，1963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1964年写了《工业问题》，1965年写了《二十三条》，1966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

周恩来的吹捧，不是空洞地说什么“英明”、“伟大”之类，而是很具体地说出对方值得吹捧的事迹，让对方感到周恩来真正研究过自己的东西，感到周恩来的诚意。以周恩来的身份，说林彪“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说陈伯达是“我党最杰出的理论家”，是非常有份量的赞誉。

周恩来看人还是比较准的，重点团结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个人，后来两人都被周恩来团结过去，因而毛泽东又要打倒这两个人。

最后，周恩来对自己的心境进行了一番自我表白，周恩来说：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每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红卫兵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但我下定决心，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一定知过必改，努力赶上。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在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自我表白”是成功的，一方面他说自己总是落后的，有“掉队之虞”，这是委婉地表示出他对文革的消极和抵制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表明他不会消极地退出这场战斗，而是将努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名言，也成为人们评价周恩来的名言。

(32)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毛泽东来说，又一次失败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做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工厂企业”。

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一旦生产受到影响，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初衷，本想把这场革命限制在机关学校等“文化部门”，不要影响到工厂企业的生产。是什么原因迫使毛泽东改变这个初衷，把文革延伸到了工厂企业呢？

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说要把文革“搞到底”，比如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那么，毛泽东所谓的“搞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关系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

中共建国之后，从夺权者变成了掌权者，与所有的掌权者一样，中共也想把自己的政权长久地维持下去，这样就必须考虑中共政权面临哪些威胁。一般来讲，一个政权的威胁有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外国的入侵，来自内部的威胁是国内的反叛。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大部分高官的意见有所不同。刘少奇为首的高

官们，认为中共的外部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周边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么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了。所以刘少奇提出的战略思想是：联苏抗美，跟苏联搞好关系，共同对抗美国。

“联苏抗美”的思想比较容易理解，在党内也有相当的势力，林彪也是赞成“联苏抗美”战略的，他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近，反对尼克松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毛泽东说“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的人，就是林彪。

相反，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联美抗苏”，这在当时是不好理解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跟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一起，那样还能搞社会主义吗？

对于“联美抗苏”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出发点来考虑的。

第一，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修”了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第二，中国如果跟着苏联走，那必然像苏联那样，也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与苏联分道扬镳。当时并不只是毛泽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也反对苏联的模式。还有日本共产党等非执政的共产党，也反对苏联模式。

第三，如果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加上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中国就要面临苏联军事干涉的危险。事实上，苏联曾出兵匈牙利、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军事干涉“不听话国家”的先例。进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所以当时毛泽东感到苏联军事干涉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中国在军事上单独对抗苏联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有必要借助另外一极的力量来对抗苏联，这就是美国。

第四，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和平演变，而不是军事入侵。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抗衡苏联，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入侵。

第五，虽说中国与美国接近，可以避免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威胁，却又要面临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来自美国的和平演变，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为了抗衡美国的和平演变，中国有必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美国和平演变的企图。

综合上述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构想是：在军事和外交上搞“联美抗苏”，消除苏联的军事威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政和思想上，搞文化大革命，消除内部“和平演变”的因素，保证中国的红色政权长久地持续下去。

(33)

很显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刘少奇的“联苏抗美”思想很容易理解，而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思想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然而，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联美抗苏”思想的，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周恩来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也出力很大。

周恩来的战略思想，或许与毛泽东不那么一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认为中国跟着苏联走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严重，中国跟苏联走，只能当苏联的卫星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中国不跟苏联走，又要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需要与美国搞好关系来抗衡苏联。

对于中共政权来自国内的威胁，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不一致。刘少奇认为，国内的威胁是来自那些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也就是黑五类。这些

人被剥夺了土地，没收了财产，对中共抱有深仇大恨。不仅这些“黑五类”本人，就是“黑五类”的子女，因为中共摧毁了他们过去一族的荣华富贵，因此对中共也怀有仇恨心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人黑五类“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还妄图复辟过去失去的天堂”，因此刘少奇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内，而是来自党外的黑五类的暴乱造反。

而毛泽东的想法不同，他认为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中共党外，而是来自中共党内。毛泽东认为黑五类已经完全打垮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造反暴乱了。毛泽东认为中共遇到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党内，是官员干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腐化堕落，使中共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被群众推翻。所以要使中共政权长久维持下去，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

毛泽东认为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靠中共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官相护的传统，所以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外部力量来帮助中共解决官员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问题。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群众来整治掉那些不合格的官员，保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

因此，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基于“抵制和平演变”和“保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毛泽东文革的对象，不是党外的黑五类，而是党内的走资派和腐化堕落分子。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概念，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基本上被揪出来，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基本上被清除掉，也就是一场党内大清洗。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概念，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一般的群众和红卫兵，都不太理解。

(34)

1966年8月到9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大接见，大串联，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红卫兵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可是毛泽

东的敌人在哪里呢？红卫兵们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敌人，理解为黑五类这些人，因为他们最容易识别的阶级敌人，于是就向黑五类大打出手。可是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就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纠偏”努力下，到了1966年10月以后，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终于扭转到对准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上。可是这时又出现了第二个难题，就是红卫兵只能打倒走资派，却不能夺权。这个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学生，既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工作经验，让他们去打倒一个省长可以，可是让他们去行使省长的职责，代替省长指挥全省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红卫兵对老干部们的冲击，就停留在“打而不倒”。经常是一个高官白天被红卫兵拉去戴上高帽子批斗，晚上高官回来，摘掉高帽子，继续指挥工作，发号施令。这样的“打倒”，就成为一场闹剧，并无实际意义。因此，毛泽东就想到，让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工人出来造反，实现真正的夺权。

毛泽东最初的文革设想，并没有想到启用工人。毛泽东本以为在文革中，党内会涌现出一批支持他的“革命干部”和“红色干部”，等到红卫兵打倒了走资派的老干部之后，就用这些“红色干部”来夺权。可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和10月，召开了两次全党高层大会，进行了各种思想工作，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批支持他的“红色干部”，这就让毛泽东的战略计划落空了。

这时毛泽东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安稳的选择，就是让文革继续限定在文化领域，但这样文革就无法“搞到底”，成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另一个是冒险的选择，不惜代价把文革搞到工厂企业，这样才有可能把文革搞到底。显然，毛泽东选择了后者。

在 10 月份的中央会议之后，毛泽东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决定启用工人出来造反和夺权，把工人作为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泽东曾经依靠农民，打倒了蒋介石，这次他要依靠工人，打倒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对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发出指示，要他们起草一个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小学生开始的，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

根据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个《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966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讨论《十二条》，结果了引发一场新的激烈斗争。

(35)

就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厂矿企业的时候，11 月 10 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工人造反，拦截火车，致使被称为“大动脉”京沪线中断 30 多小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中，有两个人崭露头角，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张春桥，另一个是王洪文。

王洪文 1935 年出生在长春一个贫苦家庭，1951 年报名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王洪文从军队复员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科副科长。1965 年上海国棉十七厂开始搞四清运动，王洪文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批判该厂领导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漠视工农群众。不久，王洪文遭到工厂领导的“报复”，说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有反党的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时，一个人救了王洪文，他就是张春桥。

恰好张春桥是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春桥认为王洪文的思想

活跃，敢想敢说，是难得的年轻人才。而且王洪文出身贫农，16岁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苗子。因此张春桥找该厂党委书记，力保王洪文，使王洪文无事过了关。同时，张春桥也与王洪文建立了相识关系。

前面说过，“四人帮”中的姚文元，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王洪文也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可见张春桥在发掘人才方面，还是较有眼力的。

文革开始之后，王洪文这样的活跃分子，当然不会错过机会，立即带头造反，他先造工厂党委领导的反，后来又造反上海纺织局派来的工作队的反，并组织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领导组织成立了上海17家工厂造反派的联合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向上海市委提出三项条件：

- 一、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 二、市长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成立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 三、上海市为“工总司”提供宣传工具。

可是上海市长曹荻秋根本不予理睬，并做出了“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答复，这使“工总司”的造反工人感到愤怒，有人提议：“上海市委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到北京向毛主席去告状！”

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众人的响应，几千名造反工人立即向火车站进发，这些人高举红旗，高唱着“造反有理”战歌，冲进上海车站。这时候，正好有一列准备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停靠在站台旁，造反工人一拥而上。但车上本来已经人满为患，只有一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了火车，其他人挤不上去了。

这时他们发现旁边一列开往郑州的 602 次列车，于是王洪文等两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该车，把该车也挤得满满的，再也挤不上去了。

很快，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发车驶离上海站，可是 602 次列车要等到晚上才发车。这些造反工人马上找到调度室，说他们要到北京去告状，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比火烧眉毛更加紧急，要求立即提前发车。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最后得到通知：602 列车改为 69 次特别快车，上午 7 点发车。

(36)

这趟列车在造反派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上海站，8 时 17 分到达安亭，安亭是上海嘉定县处于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列车到安亭站后，没有继续往北开，而是开进了一条岔道，前面是铁路的尽头，四周一片荒野，无法再前进了。这时造反工人才知道受骗了，原来上海市委指示铁路局，把列车开到这个荒郊岔道上，把这些造反工人全部截留在安亭。

造反工人们当然是群情激愤，这时有人打听到上海到北京 14 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从这里经过，于是造反工人们就去拦 14 次特快，他们高呼：“把 14 次特快拦下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造反工人跑到京沪线铁轨两侧，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命令经过的火车停下来，有人干脆横躺在铁轨上，用身体阻止火车通行。火车司机见前面铁路上全是人，只好来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来。造反工人嚷着要挤上车去北京告状，列车长却说，必须请示上级。列车长向上海铁路局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王洪文也在电话里喊叫，但上海铁路局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京沪线就被完全挡住中断了。

再说先前那趟满载造反工人的红卫兵列车，在驶离上海到达南京站后，也停了下来，不再前进了。这样，前往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就全部被拦截了下来。

京沪线被阻断的紧急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中央。周恩来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决定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名义，致电上海市委，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劝工人们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陈伯达又起草一份急电，发给拦截在安亭的造反工人。陈伯达给工人的急电说：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绝对不能因为一部份人的利益，因为一部份人的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在陈伯达发出急电的同时，文革小组决定派副组长张春桥亲自去上海处理这件事。据陈伯达回忆说：派张春桥去，是因为张春桥既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对上海比较熟悉。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因为事情紧急，陈伯达还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要求派军用飞机把张春桥紧急送去上海。

张春桥到了上海之后，擅自推翻了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代表政治局常委做出的决定，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张春桥的这大大胆行动，成为他政治上起飞的起点。

(37)

1966年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空军飞机抵达上海，然后立即直奔安亭。张春桥先与9名工人代表进行谈判，他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向工人代表们宣读以后，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完全代表了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你们必须按照伯达同志电报指示的精神，带领‘工总司’的所有的造反队员，立即从安亭撤回到上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上海去解决。”

王洪文是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个，他因为跟张春桥有过去的关系，所以坚决站在张春桥一边，说：“我们一切听中央首长的，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绝对拥护！”

但其他工人代表们并不信任张春桥，因为他们已经被上海市委“骗”了一次。张春桥费尽口舌，但9名代表中有，只有3人同意回上海，6人不同意，未达成协议。12日早7时，张春桥亲自到安亭车站现场，与截留在那里的两千多名造反工人对话。当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们，都淋在雨中，等待张春桥前来。

王洪文要给张春桥打伞，张春桥却推开王洪文的伞，表示与工人们平等。张春桥先说：“造反派的工人同志们，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

张春桥这句话，马上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张春桥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已经起来造反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春桥先把工人们吹捧一下，然后说：“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沪铁路交通线中

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同志们，我们工人阶级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的这些话，又激起工人们的一片骚动和反对，一些人高喊：“张春桥是跟上海市委勾结好的，他要把我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甚至还有人高喊：“张春桥靠边站！张春桥滚回去！”

张春桥面不改色，继续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百般劝说，但工人们还是情绪激昂，纷纷讨论，最后形成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王洪文为代表，他们主张应该听中央首长的话，立即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多数。

第二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潘国平为代表，他们提出五个条件，提出如果张春桥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回上海。这五个条件是：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二、承认他们去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造成铁路中断的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四、上海市长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今后对“工总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第三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耿金章为代表，坚决主张到北京去告状，并声称没有火车他们就步行去北京。

(38)

以潘国平为代表的第二个派别是多数派，张春桥为了争取多数，就口头上答应了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然而，潘国平认为张春桥口头上的答应是“空口无凭”，要张春桥在书面文件上签字。这时，张春桥也提出他的条件，说：“只要工人同志们先撤回上海，我明天在上海签字。”

经过一场辩论，多数工人同意回上海，条件是张春桥给他们的五项要求签字，于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带着这部分工人回到上海。但以耿金章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张春桥开的是空头支票，不能上他的当，于是他们开始步行北上，坚决到北京去请愿。

这样一来，一部分工人回上海了，一部分工人步行去北京了，安亭车站的工人全部撤走了，铁路交通也就恢复了。张春桥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劝说工人们停止拦截火车。现在工人们撤走了，火车也通车了，张春桥的任务应该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至于张春桥许诺的书面签字，他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本来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中央高层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张春桥。

至于还有一部分工人继续要去北京告状，张春桥也可以不管这件事，这是上海市委捅出来的篓子，张春桥不为此事负责。他只要让铁路通车，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北京了。

可是张春桥并没有回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还要兑现他的承诺：给“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书面签字。张春桥此举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他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根据中央不在工厂搞文革的精神，对王洪文等人组织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制定了“三不”方针，既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上海市长曹荻秋不理睬“工总司”，也是遵照这个方针。

周恩来召开的这次会议，张春桥本人也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对“三不”方针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都是同意的。因为拦截铁路会对国家经济造成极大的混乱，上海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旦中断运输，连吃饭生活都成问题，所以没有人敢支持拦截铁路的工人组织。

因此，如果张春桥按照承诺，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那么就违反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一个党员如果违反了党中央做出的决议，那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这个道理张春桥自然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张春桥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跟“工总司”签字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分析。

11月12日，在张春桥的说服动员下，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撤走了，铁路通车了。第二天的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会议，与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人，商议今后怎样处理“工总司”的问题。会议中，他们还打电话给中央的陶铸请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坚持两个底线：第一、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第二、不承认“工总司”到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的意思。因为张春桥知道，如果他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上海市委就不会允许他再去跟“工总司”接触了，所以张春桥必须“先斩后奏”。

(39)

13日下午，张春桥来到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的造反工人进行对话，他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希望的。我的个人意见是：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就可以存在下去。】

张春桥先阐明他的“个人意见”：工厂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人造反组织是合法的。张春桥的思想与毛泽东是比较一致的，他也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主张，认为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处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压制”，认为文革就是要阻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现在，张春桥在公众面前用“个人意见”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表示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这应该会引

起毛泽东的好感。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毛泽东得知张春桥的讲话后，对他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张春桥继续说：【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有人到北京去控诉，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现在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我同意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你们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也同意。】

张春桥以个人的名义，一下子全部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并且签了字。造反工人们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向张春桥同志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后来在讲话中，承认自己这次行动是未经上级批准的，他说：“我的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

张春桥这次完全是“先斩后奏”，在签了字之后，才给陈伯达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对陈伯达说：“我不能不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不然他们就不肯回上海，火车就不能通车。我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当时我被包围了。”

张春桥显然是撒谎，因为他的签字，是在工人从安亭撤走，火车通车之后签的，不存在“不签字火车就不能通”的问题。张春桥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让陈伯达十分为难。马上，上海方面打电话来抗议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得知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达成协议，非常气愤，陈丕显马上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

陈伯达的电话一般都是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替他接，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要王力替他做翻译。陈丕显急着要跟陈伯达本人说话，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

陈伯达接电话后，陈丕显质问说：“中央不是说不承认‘工总司’这样的工人造反组织，怎么现在突然又承认了？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

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只好安慰陈丕显说：“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既然已经签了字，就再研究怎么处理吧。”

(40)

陈丕显告诉陈伯达，他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要采取补救措施。”

这下陈伯达更为难了，他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于是赶紧先找江青商议。江青态度鲜明地支持张春桥，一来，张春桥是江青的人，江青自然要“保”张春桥；二来，江青也感觉到，毛泽东是希望工人组织起来造反的，张春桥这么做，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向的。于是江青说：“我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

张春桥已经知道毛泽东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了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次张春桥也“造反”了，他公然违抗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做出的决定，这就是造反，造周恩来的反。张春桥揣摩，毛泽东应该赞成和高兴他的造反，理由有如下三个：

第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前，就不停对地方高官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

么办?你们就造反。”可是至今为止，也还没有一个地方高官对上级造反的先例。大家都知道，对上级造反，就是拿自己政治生命的赌博。这些人好不容易爬到高官的职位，谁都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不肯冒险去造反。张春桥是第一个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来实践毛泽东的号召的，“对中央的修正主义造反”。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喜欢冒险，敢于造反的人，所以他从内心喜欢那种敢于造反的人。张春桥当时是副省级的高官，敢豁出去拿这么高的政治地位去造反，特别是敢造周恩来这棵大树的反，一般人没有这个勇气。所以张春桥的造反行为，深得毛泽东的“欢心”，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多次考虑培养张春桥做自己的接班人。

第二，毛泽东想要把文革推向工厂企业，也就是要号召工人起来造反。上海的“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造反组织，如果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把文革推向工厂的设想，就无法实现。因此，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准备把文革推向工厂的意向后，就判断毛泽东一定会支持“工总司”这样的造反组织。张春桥抢先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是为毛泽东立了头功。

第三，张春桥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把“工总司”的人心收买过来，“工总司”就成为张春桥可以指挥得动的工人造反组织，这可以成为今后毛泽东利用工人夺权的强有力工人造反组织。

第四，张春桥认为周恩来有意不向毛泽东请示。本来，闹出工人阻拦火车这么大的事情，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是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自己召开会议，代表中央做出“三不”决议，并让张春桥去执行。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开会做出的这个决议，并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所以他就“造反”了。

其实周恩来这么做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本来就想煽动工人起来造

反，安亭事件是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如果他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肯定是要支持造反派的。所以周恩来要背着毛泽东，先把造反派压下去。

(41)

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之后，第二天 11 月 14 日，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联席会议。毛泽东这次又带来一本《宪法》，他首先念了一段《宪法》关于公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力，批评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是违反宪法。会上陶铸指出张春桥违反组织纪律是“先斩后奏”，毛泽东为张春桥辩解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张春桥这次为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突破了过去中央不允许工厂成立造反组织的概念，而且还造就了全国第一支工人造反力量。张春桥也因为这次立功而飞黄腾达，成为毛泽东最为信任的人之一。

张春桥为了这件事，得宠了毛泽东，却得罪了周恩来，也得罪了党内一大批老干部。可以说张春桥赢得了毛泽东一人，失去了广大的高官，成为众矢之的。自古以来，得宠于皇帝一人，而得罪朝廷大臣的“宠臣”，结局都是非常危险的，张春桥的结局也是一样。

最后我们在交代一下“工总司”造反工人北上告状的另外两只队伍，一支队伍是从安亭出发，步行去北京告状的一千多人，另一支队伍是乘红卫兵火车，被截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11 月 12 日从安亭出发的步行北上队伍，11 月 16 日到达苏州。这时毛泽东赞成张春桥的事情已经传了出来，张春桥要求市长曹荻秋和他一起去苏州，把告状工人劝说回来。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思，曹荻秋不好再

反对张春桥，只好和他一起乘车去苏州。

他们 16 日晚赶到苏州后，马上与工人进行谈判，劝他们回上海闹革命。张春桥说，他已经在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了，可是这批工人的领袖耿金章却说：“张春桥是为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

于是耿金章拿出类似于上海“五项要求”的协议，张春桥签字后，耿金章要求曹荻秋也签字，但曹荻秋拒绝签字。耿金章对张春桥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张春桥转向曹荻秋施加压力，最后曹荻秋终于签了字，不过他说：“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和曹荻秋签字后，苏州的一千多工人返回上海，最后剩下那支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队伍。那些乘上红卫兵列车的一千多“工总司”造反工人，在南京后被截留下来后，他们干脆向南京市政府进发，到南京去造反。南京市政府早已接到华东局的电话通知，所以当造反工人到达市政府的时候，马上给他们安排吃住，好好招待。这些造反工人要求南京方面给他们派车，要北上告状，南京方面当然不会答应。

这些造反工人在南京住了几天，上海方面传来消息，“工总司”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于是南京的这批人也就不再坚持到北京去告状，于 11 月 17 日乘火车返回上海，安亭事件至此结束。

(42)

文革是一个多事之秋，在 1966 年 11 月 10 日到 11 月 17 日的上海安亭事件爆发时，北京那边也是一片沸腾。11 月 10 日到 11 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

地来京的 200 万红卫兵。11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第一批 150 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可是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前时，就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下来不走了。

毛泽东为引导红卫兵前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红卫兵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恩来则不断在大喇叭中高喊，引导大家前进。这次接见一直到下午 4 时才结束，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整整 6 个小时，实在累得够呛。第二天 11 月 11 日，周恩来改变接见方式，安排 50 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排列好，毛泽东乘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这样才比较轻松了一些。

11 月 13 日，中央军委在不通知中央文革小组，不通知毛泽东的情况下，“擅自”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所属军事院校学员的万人大会。军队老师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出席大会，他们批评军事院校学员的造反活动，劝学员们听从上级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林彪控制的军队系统，第一次公开向毛泽东的文革泼冷水。

对于军队高官来说，在文革的最初阶段，是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高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较低。中共建国以后，因为要搞国家建设，所以文化水平较高的文官受到重用，而文化水平较低的武官受到冷落。因此这些武官觉得不满意，认为自己在打天下时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到头来，地位还不如那些文官。

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毛泽东倚重军队，所以不少军队高官认为，这是武官“反击”文官的机会来了，把文官整下去，武官就可以出头了。据原解放军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

【1966年5月9日，总参谋长杨成武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看一个文件。我到之时，李天焕等好几个人早在他家里的一楼客厅闲谈，谈得很热闹。我刚坐下，杨成武就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

李天焕插话说：“刚才，杨总长说，反击战就是毛主席决定，要反击他们。毛主席要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

杨成武说：“前几天，我同康生乘专机去杭州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怎么把我也扩大进去了，我开始时也不知道。会上把罗瑞卿批了一通，大家群情激愤。毛主席在会上还做了重要指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

杨成武谈话至此，我也吹了杨成武几句，说：“杨总长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议事了。‘反击战’一词用到政治斗争上来，也合适，表达力很强。”】

(43)

这里他们说的“反击战”，就是武官对文官的反击。可是军队干部们没有高兴多久，就发现这场文革，绝对不是他们想象的武官对文官的反击战，不仅是文官，武官们也成为革命的对象。

林彪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是军队的掌门人。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刚开始也是误解的，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就是为了拿掉刘少奇。可是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文革；这时林彪又以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思想革命，也就是“破四旧”，当林彪帮毛泽东宣传“破四旧”之后，毛泽东还没有停止文革的迹象，反而是越搞越大。

这时林彪开始有想法了，毛泽东的文革，究竟是针对谁的呢？当然林彪想到了周恩来，难道毛泽东搞文革，还是为了打倒周恩来？不过已经有了刘少奇的前车之鉴，使林彪不得不想得更深入一层：如果自己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毛

泽东还不肯结束文革的话，那么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原政治局常委的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其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倒台了，朱德和陈云已经靠边站了，剩下有实权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三个人了。如果再打倒周恩来，那么剩下有实权的就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了。这样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如果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还有下一个目标的话，这个目标毫无疑问就是林彪了。

如果毛泽东打倒了周恩来，他真的会就此停手吗？林彪无法肯定。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毫无停手的迹象，林彪这时开始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这样一来，为了保住自己，林彪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文革泼冷水降温，让毛泽东停止这场打倒人的运动；第二件事是保住周恩来。只要周恩来在，林彪和周恩来联手起来，还可以与毛泽东抗衡一下。如果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就是“唇亡齿寒”，等于自毁长城。因此，林彪决不能干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傻事”。

另外，从现实利益上来讲，打倒周恩来，对林彪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超过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林彪打倒周恩来这个第三手，自己也还是第二把手，不会再升级了。因此，当毛泽东向林彪发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打倒周恩来时，林彪对毛泽东的信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就是不向周恩来开炮。

以前，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针对思想文艺界的事情，与军队无关。所以，林彪一直给军队下命令，希望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让地方自己去搞，军队作为旁观者就可以了。

(44)

林彪对文革的这种态度，毛泽东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毛泽东认为，军队干

部也是走资派的大本营，如果文革只在地方上搞，不触及军队，那么走资派就无法铲除。因此，毛泽东搞文革，是一定要延伸到军队系统的。

毛泽东把文革引入军队的方式，是从军队下属的军事院校开始。解放军下属的各种军事院校有 100 多所，学员 10 万余人。在文革刚开始的 1966 年 5、6 月份，全国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而军队院校在林彪的“不介入”方针下，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是不允许学员离开学校出去串联。

然而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在全国掀起一股狂热的造反大潮，军队院校的学员们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也要造反了。于是，一些军队院校的“积极分子”就涌到北京，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去告状，他们要求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也应该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在 9 月 15 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军队院校学员的意见，提到了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那里，说：“军队院校的学员想念毛主席。地方院校的学生能串联，军队院校的学员为什么不能串联？也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下令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在会上，大多数军官提出反对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开始时也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指出：“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

这样上纲上线之后，叶剑英感到压力很大，只好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可以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不过在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留在北

京，不能与地方的学生搞串联，更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把这次会议的结果上报给林彪，林彪同意了这个结果，于是在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到北京来串联，接受毛泽东的接见。《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马上就“动”了起来，军队学员的造反派诞生了。

这些造反派学员，根本不满足于串联与接见，他们与地方学校一样，搞起“四大”来。因为《紧急指示》有一句话：“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军队造反派的骤然崛起，不到一个月内，军队所属10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地全部垮台了。

(45)

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冲垮了本单位的领导班子后，余兴未尽，进一步冲出学校，到上级的军队机关去造反，这样一来，军队机关里也开始“乱”了。

不过野战部队没有乱，军委不允许野战部队搞“四大”。曾经发生内蒙古军区警卫营300余人，不经领导批准，集体跑到北京，要求搞“四大”，结果被中央军委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北京卫戍区动用了相当的兵力，把跑到北京的内蒙古军区警卫营全部捉拿，制止了野战部队搞“四大”。

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大批军事院校学员涌入北京，他们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第一个受到军队院校学员冲击的军事机关，就是国防部。林彪是国防部长，冲击国防部那就是不给林彪面子，可是造反的军队学员，似乎并不把国防部看在眼里。11月8日，一千多造反军队学员，要冲进国防部大楼，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警卫国防部的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地组起了人墙，但还是挡不住学

生往里冲。

面对这种局面，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向林彪提出建议：命令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要求警卫战士对造反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在这个“四不”的前提下，对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几个军队高官去现场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他们都是讲不了几句话，就被学员们高呼的口号声压了下去。最后，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造反学员们击碎了大门旁边警卫室的门窗玻璃，找来几条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头上，然后造反派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警卫战士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的“四不”规定的约束下，对造反派闯入国防部大院是无可奈何。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没有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万人大会，给造反的军队学员施加压力，“劝”他们停止在北京造反，听从上级的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军队高官第一次对毛泽东的文革进行公然的抵制。

(46)

1966年11月13日下午4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解放军所属各军事院校师生和文艺单位10万人的大型集会。体育场的会场内，张贴着数十条大幅标语，主要有：“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

席就打倒谁!”、“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等等。

大会一开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走进体育场，绕场一周，与大家见面。周恩来等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面走着，一面向参会者招手致意，会场爆发出暴风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接见以后，周恩来和陶铸声称要去参加另外一个重要会议，提前离开会场。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主持，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讲话。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肖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杨成武上将、杨勇上将，邱会作中将，吴法宪中将等，几乎在京的军队高级领导人都到场了，以表示这是一个极为隆重的大会。

周恩来出来与大家见面，是表示他对这次会议的支持；周恩来借故先走，不发表讲话，又是因为他不便在这种场合讲话。周恩来知道，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参加，更没有请示毛泽东。这么做也是必须的，因为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对文革泼冷水，劝那些到北京来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服从命令，离开北京，停止造反。如果请示了毛泽东，那就得邀请文革小组也来参加，一旦文革小组的成员来了，他们必然要进行火上浇油的煽动性讲话，使这次泼冷水的大会，反而变成一个浇汽油的大会。

因此，这次大会是不能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来，自然也就不能事先请示毛泽东了。这次大会是周恩来与林彪两个人策划的，他们两人是有权召开这种大会的，可以不请示毛泽东，这并不违反党规。不过，为了防止以后毛泽东怪罪下来，所以周恩来不能亲自讲话，这样在毛泽东那边回旋余地就比较大了。

周恩来常用的战略，是他要说的话，自己不亲自说，而是让别人来说。这样

一来，即使别人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触犯了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出来打圆场，不至于跟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还可以用他的职权来“保”替他说话的人。

周恩来走后，肖华宣布大会开始，乐队奏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全场人员同声高唱。然后，全体人员齐声念四段《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体人员念完《毛主席语录》之后，肖华首先说：“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

(47)

林彪与周恩来一样，他也不便在这种情况下讲话。林彪也用这样的战略，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让别人来说，这在毛泽东那边就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林彪让肖华转达他的问候，也是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肖华简单讲了几句话之后，请陈毅讲话。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同时，他也经常扮演周恩来的代言人，周恩来自己不方便讲的话，常常让陈毅来讲。陈毅讲错了话，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而周恩来是不能轻易检讨的。这并不表示周恩来的态度傲慢，而是他这样身份的人，一旦检讨了，就很可能意味着要下台。

陈毅在众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豪气飒爽地走上讲台。陈毅的讲话一向以大胆著称，这次讲话也非常大胆，成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讲话之一，也是他诸多黑话中的一篇。陈毅虽有讲话稿，但他基本上不看讲稿，而是脱稿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你们，我借此机会讲几句话，今天我讲话没有准备，可能讲

得不对。】

陈毅讲话的惯用手法，就是声称“没有准备”，这样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借口一时不注意说错了话，把问题搪塞过去。陈毅接着说：

【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破私立公”，破“私”字，破“我”字。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而是“公”字当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讲错了话，弄不好就要出麻烦，人家就要到外交部去揪我，大字报也会贴出来嘛！如果是出于“我”字当头，我今天就不来讲了。】

陈毅这个表明心态的开场白是高明的，先说自己是出于“公”心，这样即使是说错了，大家也可以原谅他。陈毅继续说：

【我的话讲起来不太好听，但我还是要讲。文化大革命千条万条，主要一条就是要搞路线斗争。你们搞路线斗争，我们完全赞同，要真正学会搞路线斗争，如果没学会，损失很大。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空口说白话，我过去犯过大错误，栽过大跟斗。】

【我今天向亲爱的同学们讲几句心里话，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损害了党的利益，直至今天思想上还有负担，一讲到这里就十分沉痛。】

陈毅这些话是非常“语重心长”的，他说：“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这是不经过自己亲身的经历，体会不到的经验教训。一旦开展路线斗争，那就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场斗争的胜负，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在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一个人很难认对方向，紧跟毛泽东，也不一定不犯错误，所以陈毅以他的亲身经验说：“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

了，有时就搞错了。”

(48)

陈毅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提醒造反的年轻人，不要轻易涉足“路线斗争”，这是一个高危的事业，一旦站错了队，认错了方向，那是要栽大跟头的。陈毅接着说：

【你们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你们会不会有百分之一错了呢？我当年犯错误，就是不懂得“百分之一”的道理，认为自己做得都对，结果犯了大错误。如果虚心一点，倾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犯大错误了。】

陈毅在这里对年轻人说了一个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一件罪过。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活了九十九个人，可是只要你一时失手误杀死一个人，那么你救活九十九个的功劳就一笔勾销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也是一样，立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犯一件错误，但谁又可以保证自己永不犯错呢？所以陈毅告诫年轻人，路线斗争是风险极大的，千万要慎重。

陈毅又说：【搞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只想提个头，可能讲得对，也可能讲得不对。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正是对自己充满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的热

血沸腾年代，很难理解陈毅这样过来人的“心里话”。

陈毅最后说：【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同志，但我有四十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讲到路线斗争，第一种是右，不斗争；第二种是左，斗争过火了；第三种是折衷，不左不右，和稀泥；第四种才是正确的斗争。这四种路线斗争我都有体会，我犯过许多错误，犯过右的错误，犯过左的错误，犯过折衷主义的错误，我也在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开展过正确的斗争。所以请同志们在做路线斗争时，好好读一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伟大指示，这样在你们搞路线斗争时，就会搞得更好。请同志们对我的讲话加以考虑，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陈毅泼冷水的方式，是现身说法，希望用自己犯过的错误，自己走过的弯路来提醒年轻人，希望他们搞斗争时，尽可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要轻易把斗争上升到路线斗争。一旦斗争过火了，就很可能犯“左”的错误，一旦犯了错误，你过去立的所有功劳就一笔勾销了。

(49)

陈毅讲话时，坐在台上的几十名老干部，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陈毅讲出了他们心里想讲而不敢讲出来的话。可是台下的年轻人们，却很不以为然的，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当场喊口号反对。只是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

然而后来无情的事实，证明了陈毅的话，当年那些带头造反的年轻人，后来多半都栽了大跟头。到那时他们再回味陈毅的这个讲话，才体会到其中的真意。

陈毅讲完话，贺龙讲话。贺龙比陈毅慎重得多，他只是照着讲话稿读，基本上都是套话空话，没有特别大胆的话。贺龙的慎重，是因为他从罗瑞卿事件之后，基本上就在军委中“靠边站”了，所以说话不得不慎重。贺龙的讲话中值得一提

的，是他推荐的几点倡议：“不介入和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不上街游行，不抄家。”

贺龙讲话之后，徐向前讲话。徐向前的讲话也比较慎重，也基本上是套话空话，只是强调军队有保卫国家的重任，所以军队不能乱，他说：【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周围有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它们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企图破坏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切切不可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强大的敌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敌人的突然袭击。如果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损失。】

最后叶剑英讲话，叶剑英的讲话虽然赶不上陈毅，但也比较大胆，他时而读讲话稿，时而脱稿演讲。叶剑英说：【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最大的幸福和光荣！今天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军委首长给大家讲了话，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刚才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我和同志们简短的讲几句。】

叶剑英先肯定上面三位元帅的讲话，他也泼冷水，说：【同志们的反抗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我们不但同情，而且支持。但也要注意，任何真理都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有些机关的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这就是错误。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

叶剑英批评一些人的做法“过火”，希望他们降温。叶剑英接着说：【以前有

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但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 Q 正传》里有一个就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哪有不许人家革命的呢？】

(50)

叶剑英特别强调，要允许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他继续说：【开会前集体朗诵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这是文化大革命创造的一种好风气，是革命的创举。你们这样做，对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是一个教育，弄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要带一本《语录》。但我要奉劝同志们一句：读毛主席的书很好，但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能像读《圣经》那样光是背诵，毫无用处。过去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不要重犯。要活学活用，这一点同学们要注意。】

叶剑英这里婉言批评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一种教条主义。当时叶剑英敢这么说，也是够大胆的。最后叶剑英说：【“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他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

大部分人高喊说：“不相信！”

叶剑英继续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

叶剑英又说：“李继才的第二个问题，‘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我告诉你们，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

这时台下响起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叶剑英接着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这时台下又响起高呼声：“把他揪出来!”

叶剑英说：“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继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台下学员们，大部分是支持四位老师讲话的，但少数人不支持。他们敏感地嗅出，这次大会与毛泽东的文革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有李继才提出疑问。这时，一部分学员在会场上起哄起来，他们乱喊乱叫，企图上台与老师们辩论。主持这次会议的萧华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宣布散会，随后护送老师们离开现场。

四位元帅的讲话传单，很快传播到全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文革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集体的、公开的对文革泼冷水。之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马上批判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他们马上接见了李继才等造反派，批判陈毅和叶剑英讲话的大标语，马上出现在北京街头。

(51)

就在军界老师抵制文革的同时，经济界的高官们也在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前面提到，毛泽东发现红卫兵年龄太小，没有社会经验，只能夺权，不能掌权，所以必须发动年龄较大，社会经验成熟的工人起来夺权和掌权。在1966年10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指示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份工厂企业搞文革的文件。

11月13日，陈伯达和王力起草好一份《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提交给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让他们进行讨论。因为当时文革小组还只负责文化界的事情，经济界的事情他们不能直接下发命令，还需要通过国务院的各个部委才行。陈伯达还要求，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内拿出讨论结果来。

国务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包含民政、外交，农业，工业，交通等诸多的部委。刘少奇在位的时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负责领导工业和交通系统。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1966年8月刘少奇下台之后，薄一波失去了保护他的后台，一些平日与薄一波有积怨的人，看到“整”薄一波的机会来了，于是纷纷检举揭发薄一波的各种问题，薄一波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为了躲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1966年9月2日，薄一波借口自己在家摔了一跤，受了伤，向周恩来请病假，希望休养一段时间。

薄一波是刘少奇安插在国务院里的大树，一直听命于刘少奇，所以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周恩来也乐得薄一波主动离任，于是就批准薄一波休假半年，去广州休养。薄一波走后，他以前主管的国务院工业交通系统，就交给经委副主任余秋里和建委主任谷牧主管。

为了满足陈伯达一个星期之内拿出结论的要求，周恩来决定在11月16日到20日召开一次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座谈会，对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进行讨论。《十二条》拿到座谈会上，马上就受到参会者的猛烈批评。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参会者批评《十二条》中的“允许工厂成立群众造反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文，认为这样将导致工交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正常秩序的彻底打

乱，国家经济有可能失去控制。于是，参会高官们对《十二条》进行了完全彻底的修改，把《十二条》变成《十五条》，增加了三条实质性的内容：一、工厂不能全厂停产闹革命，要分期分批搞文革；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搞文革；三、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用启发式的语气向参会的高官们说：“文革的形势，可以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52)

周恩来的讲话中，把文革比喻为“洪水”。人们对付洪水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堵”，修建堤坝把洪水堵住；第二种是“导”，修建渠道把洪水排泄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周恩来告诉大家，文革这场洪水，来势凶猛，堵是堵不住的，刘少奇试图用“堵”的办法，就完全失败了。因此，现在只用“导”的办法来抵制文革，周恩来启发众高官要学会“因势利导”，把设法把文革的这场洪水，“导”离毛泽东的预订轨道，从而使文革的目的落空。

当然，即使是用“因势利导”的抵制文革，也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周恩来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话，来激励众高官挺身而出，对文革进行大胆又“艺术”的抵制。

会后，国务院负责工交系统的谷牧，把会议的讨论结果整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十五条》。11月21日，谷牧把讨论结果《十五条》，按期提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很不高兴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

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

谷牧辩解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

但陈伯达不接受谷牧的辩解，显然不同意谷牧代表工交座谈会总结出的讨论结果。这样一来，谷牧只得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在预料之中的，他说：“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第二天，周恩来和陶铸再次听了谷牧等人的汇报。现在，陶铸已经基本上完全站在周恩来这一边了，他和周恩来一样，基本肯定了谷牧的意见，否定了陈伯达的意见。这天晚上，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一起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这次工交座谈会的讨论结果。

然而，这次周恩来等人向毛泽东当面汇报的情况，却没有比较正式的讲话内容传达出来。据当事者的回忆，对毛泽东的态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

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据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基本同意了《十五条》，并要谷牧带一个班子听取工人的意见，对《十五条》作进一步的修改。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第二种说法是，毛泽东完全否定了《十五条》。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会我参加了，毛主席不同意《十五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高兴，并不是对谷牧不满意。谷牧他们不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可以谅解的。而陶铸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以后，还是这么说，这不是顶着干

吗?毛主席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会后,毛主席把陈伯达和我留下,说:“你们重搞。”毛主席留下我和陈伯达另搞文件,没留下总理。】

(53)

王力因为各种原因,回忆录里不便直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所以只是说对陶铸不满。毛泽东的不满,是因为他在11月1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安亭事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赞成成立工人造反组织,而当时周恩来和陶铸也没有反对,赞成了毛泽东的意见。显然,周恩来和陶铸是基于毛泽东的威望,不好当面否认毛泽东的意见,内心中是反对的,于是就进行间接的抵制,在《十五条》又委婉地写入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条文。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和陶铸明明在11月14日已经知道了他的态度,可是在11月21日制定《十五条》时,仍然写入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条文,这不是跟毛泽东顶着干吗?因此毛泽东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为了反对《十五条》,指示王力和陈伯达,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条规定》,简称《十条》。

关于毛泽东对《十五条》的态度,当事者的回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且回忆者也不像是在故意说假话。首先谷牧应该没有假话,因为他是听到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之后,才继续修改《十五条》稿子,并上报到中央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如果有人告诉谷牧毛泽东反对《十五条》,他就不会继续修改和上报《十五条》了。

其次,王力应该也没有说假话。王力不仅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他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重新写了一个推翻《十五条》的新《十条》。如果毛泽东对《十

五条》基本满意，就没有必要再指示王力他们另搞一个文件了。

因此，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忆，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反对态度，不是表现得非常明显。于是周恩来和陶铸等人就“装糊涂”，把毛泽东的态度当成是基本同意了《十五条》，指示谷牧继续把《十五条》上报上去。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的结果，毛泽东指定林彪主持这次会议。这样一来，在林彪主持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一个是谷牧起草的《十五条》，它代表了周恩来的意见，另一个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起草的《十条》，它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

对同一件事，提出两份完全不同的议案，这在建国以后的中央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这就让主持会议的林彪面临一个难题，是支持毛泽东的议案，还是支持周恩来的议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逼着林彪表态：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他。

这次林彪的表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在工厂展开文革的关键。如果林彪支持毛泽东的议案，那么周恩来一个人就抵制不下去，只得让文革扩展到工厂，导致后来发生夺权风暴和天下大乱。如果林彪支持周恩来的议案，他们两人联手起来抵制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在工厂搞文革的计划，很可能就要夭折，这样后来文革中的夺权风暴也就不会发生了，以至于林彪本人后来的出逃，都有可能避免。

(54)

11月16日到20日的工交座谈会，是周恩来抵制毛泽东搞文革的一次大动作。文革中，每次周恩来发起对毛泽东的大动作抵制，都与林彪的动向有关。在

这次大抵制之前的 11 月 13 日，在林彪的支持下，军队老师们公然出来讲话，给文革泼冷水，这是林彪对毛泽东文革的公然抵制。在看到林彪的行动之后，周恩来也开始行动，与林彪的抵制相呼应。同样，在后来的 1967 年 1 月 20 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闹翻了。在此之后，周恩来在 1967 年 2 月份就发起一场“二月逆流”。

一些人把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的行动，分开来孤立地进行探讨，这样就难以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周恩来和林彪并不是生活在两个孤立的环境中，两人的关系是密切和微妙的。从历史上看，林彪是毛泽东的人，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林彪都出了大力，而在这次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林彪却没有为毛泽东冲锋陷阵，只是消极地尽可能中立。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从林彪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给他这个接班人的位置，有点勉强，并不是出于对林彪本人的特别欣赏。如果 1949 年毛泽东就让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肯定为毛泽东效死力。可是毛泽东迟迟到 1966 年才让林彪当接班人，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好林彪。

在 1949 年之前，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高岗和邓小平，可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个想要重用的人，并不是林彪，而是高岗。1953 年，高岗的地位超过了林彪，但不久毛泽东就对高岗失望了，高岗在 1954 年倒台。毛泽东在高岗倒台之后，想要重用的下一个人物，也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1956 年 9 月的八大上，本来地位在林彪之下的邓小平，跃升为政治局常委，而林彪仍只是普通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超过了林彪。只是后来毛泽东对邓小平又失望了，才于 1958 年 5 月，补选林彪为政治局常委。

建国后，毛泽东本意是让彭德怀管军队的，只是后来彭德怀被打倒，才想起来请林彪出来管军队；毛泽东本意是让刘少奇当接班人的，后来也是打倒了刘少奇，才想起来请林彪出来当接班人。

因此，从林彪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他并不是特别的欣赏，也没有特别的期待，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替补队员，而不是主力队员。当主力队员出了问题，才想起来让他这个替补队员上场。所以，林彪对毛泽东让他当接班人，并没有那么欣喜。

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他不得不猜想毛泽东的心思：这次毛泽东是真心让他接班？还是一时间没有合适的接班人人选，只是让他过渡一下？

(55)

林彪由于有长年当替补队员的经历，所以他不得不猜想，他这个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角色，今后毛泽东有了合适的接班人，他就得让位了。

可是按照当时中共的惯例，一个人职位是只能“上”，不能“下”。如果职位下降，必然是犯了错误，被撤职处分。根据这个惯例，将来毛泽东有了合适的接班人，就要让林彪“让位”，也就是要让林彪的职位下降。而要让林彪的职位下降，就不得不找林彪的一个错误，作为取消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借口。人不是神，谁都有错误，要想“挑错”，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样一来，林彪可以设想将来的某一天，党内发出通报：林彪犯错误了，他不适合再当接班人了，于是他就灰头土脸地下台。尽管毛泽东不至于用打倒刘少奇的方式来打倒林彪，只是让林彪靠边站，就像朱德那样，给林彪一个名誉职务，但这还是让林彪非常没有面子。中国人都是要“面子”的，职位上升，谁都很高兴，而职位下降，人们就会感到很没面子。特别是林彪这样自尊心很强的人，对

这种丢面子的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林彪本来是不愿意当接班人的，只是在毛泽东“先斩后奏”的情况下，不得已当上了接班人。林彪一旦当上了接班人，他就不得不为今后的出路着想。第一个出路，是真的接了班。林彪对这个出路抱的希望不大，因为林彪的身体比毛泽东差很多，死在毛泽东之前的可能性相当大；第二个出路，是在自己死之前，保住接班人的地位，体面地离开人世。林彪对第二个出路比较抱有希望。

从保住接班人位置的角度来看，林彪当然希望中国的政局变化越小越好，毛泽东的文革规模越小越好，所以这样一来，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就是怀着泼冷水的态度。

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要泼冷水，周恩来也要泼冷水，两个人就有了一致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两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同盟关系。当林彪给毛泽东泼冷水的时候，周恩来也给予呼应，作为特殊形式的支持。11月13日，林彪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给文革泼冷水；11月16日，周恩来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也给跟毛泽东顶着干，对文革泼冷水。11月29日，林彪再次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进一步泼冷水。周恩来亲自出席了这次大会，不过只是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之后即离开，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在11月29日的大会上，陈毅和叶剑英又讲了话。陈毅说：**【亲爱的同志们：林副主席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事院校是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院校差一些，不能把他们的一套搬到军事院校来，也不能把军事院校的一套搬到地方上去。地方院校有地方院校的搞法，军事院校有军事院校的搞法。】**

(56)

陈毅首先强调，军事院校因为是在林彪的领导下，所以问题比较小，而地方院校过去是在刘少奇的领导下，问题比较大。所以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搞文革的方式不一样。陈毅进一步说：【我年轻时代犯过两次错误，就是把路线斗争扩大化了，简单化了。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每个单位的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不要把有一般缺点错误的人，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斗，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陈毅批评了当时批斗扩大化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挨斗。陈毅特别提醒造反派注意，整人不要太“凶”。陈毅最后为自己的发言辩解道：

【我在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同志们作为解放军战士，作为革命同志，要能听直言。我11月13日的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也讲话说：【军队院校学生与地方院校学生不同，你们不是一般学生，所以不容许军队学生违反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军队光荣传统。把国防部当作敌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涮！肤浅的批评不行，要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

草，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这两次大会上陈毅和叶剑英的大胆言论，在军队院校造反派中引起一片哄然，一时间到处都是“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则公开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说老师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求陈毅和叶剑英作检讨。几天之后，中央文革决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同样召开一次十万人群众大会，点名要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师和军队负责人出席这次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批斗一下这些老师和军队负责人。

(57)

中央文革的办事员打电话给主持军委日常事务的叶剑英，催他们来参加大会。叶剑英把此事分别向林彪和周恩来做了汇报。据说林彪正好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这种事情向毛泽东汇报，还是周恩来出面比较好，因为周恩来不负责军队的事情，说话可以比较灵活。

据当时参与此事的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江青没有办法，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

当时，毛泽东还不愿意得罪林彪和军队老师们，毕竟文革才开始，需要林彪出力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不想在这件事上与林彪发生冲突。于是毛泽东就对林彪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毛泽东现在需要林彪办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支持他把文革延伸到工矿企业。

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把文革延伸到工矿企业的问题。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提出一份议案，就是陈伯达代表毛泽东起草的《十条》和谷牧代表周恩来起草的《十五条》，让林彪表态，这样林彪就非

常为难了。林彪毕竟和周恩来不一样，他尽管对毛泽东的文革泼冷水，可是要让他反对毛泽东，还是很难的。这次，林彪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择支持毛泽东，但他也没有批判周恩来，只是委婉地否决了周恩来的议案。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讲话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工交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这次《十条》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好的。】

林彪先肯定了毛泽东的《十条》，但他也没有批评周恩来的《十五条》，只是简单地说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林彪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没有一句提到《十五条》。林彪只是委婉地赞成了毛泽东，让周恩来感到，他这么做是出于不得已。林彪对毛泽东《十条》的赞成，也只有这几句，然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工交系统搞文革的“意义”，林彪说：

【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所以工交系统的文化革命，并不是比文教系统不重要，而是更重要，一定要把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进行到底。】

林彪这些话，都是大话空话，并没有实际的针对性。当然，林彪也不能全盘讲大话空话，总得批判一点具体的东西，于是林彪就把批判之火，引到刘少奇这只死老虎身上，大批刘少奇，暗保周恩来。

(58)

林彪说：【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

该肯定回答是有的。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他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搞一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关键的问题上，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这里举一些例子，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又如解放初期，中组部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并没有坏处。”又如 1954 年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半无产阶级的党，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自由，这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

【以后刘少奇还有许多错误，如《二十三条》出来以前，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不相信群众，派大量的工作组，以及这次文化革命期间犯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归纳起来，就是他们执行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是指向周恩来的，这里林彪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套到刘少奇头上，替周恩来解围。林彪继续说：

【刘、邓的一套，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彭真、薄一波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十年、二十年的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 响。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就从这一点看，我们工交企业不是没有东西可“革”，而是有很多东西可“革”，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

些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我们受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很深。】

林彪在这次会上大批刘少奇的另一个原因，是刘少奇本人也被通知来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本来这次工交座谈会，与刘少奇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林彪登高一呼，刘少奇成了被众人批判的靶子，大大减轻了对周恩来的压力。林彪除了批刘少奇之外，还特别提出批薄一波，因为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正好以前又是主管工交系统的，所以批薄一波正合适。

(59)

为了“感谢”林彪的好意，周恩来在会上也大批刘少奇和薄一波，周恩来说：

【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中宣部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搞彭真的黑线，联络部搞“三和一少”，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这里林彪插话说：“我还被薄一波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他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薄一波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薄一波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周恩来接着说：【薄一波说他与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

住是很密切的。】

康生插话说：【薄一波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也插话说：【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周恩来继续说：【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的影响之深之大。】

林彪和周恩来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刘少奇和薄一波身上，而文革小组的人不干了，他们要把斗争目标拉回到周恩来的《十五条》上。不过在林彪的压力下，他们只敢批具体整理《十五条》的谷牧，不敢提谷牧后面的周恩来。王力首先说：

【工交座谈会的这个《十五条》，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

张春桥批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

江青批谷牧说：【你的发言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

(60)

康生批的调子轻一点，比较不太具体地说：【一个国家的变修，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基础，还不在于文教部门。从挖资本主义根子来看，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更为重要。如果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

出修正主义不可。】

陈伯达责问谷牧说：【《十五条》没有同我们商量，在会上发这个，是搞突然袭击。】

这时周恩来为谷牧辩解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林彪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文革。】

林彪插话说：【我们也是同意的。】

林彪的插话，为周恩来解围，指出过去中央发过工厂农村不搞文革的文件，这是包括林彪在内的人都同意的。但不管怎么样，林彪这次没有支持周恩来的议案，而支持毛泽东的议案，当然这也在周恩来的预想之中。周恩来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试图在关键的时刻，林彪能够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样就可以避免文革之火烧到工矿企业。

现在林彪支持了毛泽东，那么文革之火肯定要烧到工矿企业了，这时，周恩来就不能再“顶”了，而是要采取“导”的策略。于是，周恩来改变了立场，也表态支持在工矿企业搞文革，他准备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再设法抵制和泼冷水。因此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也进行了支持工矿企业搞文革的发言，周恩来说：

【这次工交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行不行呢？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成公有制了，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所

以文革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和平演变，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周恩来先从理论上表态支持工矿企业搞文革，然后又安慰干部们说：【谷牧的《十五条》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思想的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有什么了不起？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

周恩来隐晦地告诉高官们说：这次我们得退让一下。退让的最坏结果，也就是罢官，不必担心生命危险，只要活着，以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61)

林彪支持周恩来说：【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

周恩来又启发性地说：【正如林总说的，这场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林彪插话说：【革命洪流的“洪”字，应改为红色的“红”。】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周恩来告诫高官们说，对文革这场洪流，“挡”不是上策，要自己也跳入到

这场洪流中去，这样才能引导这场潮流的方向，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对于众高官担心工厂搞文革，影响到生产的问题，林彪说：【因为工交系统是搞生产的，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关系如何摆法？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摆法？你们忧虑抓革命会误生产。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的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搞出生产成果来，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用物质刺激等也可以促生产，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仅仅落实在生产上。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生产受一点损失，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是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也支持林彪的说法，他说：【在一个时期，生产上肯定会受一点影响的，不要紧，不要在这个问题面前，前怕狼，后怕虎。极而言之，影响生产也就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

最后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从五月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要求大家做彻底的革命派。我帮助林总担负这个责任，每天都诚惶诚恐的心情，一方面要摸出一些经验，一方面要有革命的火热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总学习，有时请教伯达同志。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除了吹捧林彪之外，还不忘记吹捧一下陈伯达，因为陈伯达也是可以争取的人物。

(62)

1966年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在工矿企业搞文革的《十条》，毛泽东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他没有实现对周恩

来以及周恩来派的打击。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本想把批判《十五条》的材料，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可是遭到包括林彪在内的多数高官的反对，最后周恩来决定：批判《十五条》之事不扩大传达范围。而且，提出《十五条》的谷牧，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判，更没有受到批斗，他被周恩来安排到外地去搞调研，“避风”去了。

这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说：“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置身事外的口气评论这件事，完全没有谈到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没有自我批评之类的话。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做自我批评，一旦承认自己有错，就会被别人揪住不放。由于林彪的态度暧昧，毛泽东只能默认了这个结果。

12月15日，林彪再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文革小组起草的把文革延伸到农村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

不过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第一个原因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思想保守，对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文

化革命，不感兴趣；第二个原因是农村的家族关系很浓厚，一个村子里面的人，世世代代都是乡亲，让他们相互之间搞批斗，很难搞起来。因为文革与土改不一样，土改可以分到土地，是可以得到物质利益的，而文革的批斗，自己并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农民比较注重实惠，批斗了半天，自己并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不愿意去干。

这种情况，倒也符合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才具有革命性，农民是缺乏革命性的，只是在“分田地”这样的物质利益诱惑下，他们才会出来革命，一旦分到田地，他们就不愿再继续革命了。毛泽东在农村发动文革的失败，似乎也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观点。

(63)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我们在前面提到，两年前的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的那一天，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生日寿宴，邀请了刘少奇等数十名高官赴宴。两年后，毛泽东再次破天荒地在生日请客吃饭。

这次生日寿宴和上次虽说只间隔两年，可是中国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次被邀请的高官中的一大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罗瑞卿、彭真、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宋任穷、胡耀邦等人，都已经被打倒或者被批斗。剩下少数没有被打倒的林彪、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也没有被列入毛泽东这次生日寿宴的名单。毛泽东这次邀请的人，只有中央文革小组中几个他最为信任的人：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连康生都没有邀请，而江青成为毛泽东生日寿宴的女主人。

参加这次毛泽东生日寿宴的王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

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背景，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

我们认为王力的这个评述是很有道理的，从他披露的毛泽东在这次寿宴上的讲话来看，的确反映了不少毛泽东内心世界的表白。王力回忆说：【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

毛泽东以前住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而在1966年8月，毛泽东却突然搬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966年上半年，毛主席几乎不在北京，中央办公厅趁毛主席离京外出巡视考察期间，将主席在中南海的丰泽园菊香书屋进行了一次维修，当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毛主席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葺未经他同意。一气之下，老人家于1966年8月搬到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去工作和生活，卧室、办公室就在游泳池里的小传达室。在这里，毛主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10年。】

毛泽东搬离菊香书屋，除了未经他同意修缮房屋之外，另外一个因素应该是担心菊香书屋在修缮过程中，被人悄悄地安装了窃听器。因为毛泽东以前的专列上，曾被安装过窃听器。在文革这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特别小心谨慎，所以他很快搬离了菊香书屋，住进游泳池旁边的休息室。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居然会住到游泳池的休息室里面去，所以这里也就不可能被预先安装窃听器。

1966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这天，在他游泳池的新住所，邀请了他最信任的几名文革小组成员。关于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寿宴上的讲话，王力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下面就摘录一些王力回忆的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这里讲了文革的起源。毛泽东说明：文革的起源，其实从建国时期就开始了，从那时是开始了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路线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反对毛泽东的路线，是要保存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试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接着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

毛泽东这里指出“走资派”能够蒙蔽群众，能够得到信任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借助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信，使得群众对他们有所信任。进而他们借助共产党的威信，把自己变成正确和正义的化身，把反对他们与反党等同起来。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说什么，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

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毛泽东这里指出“走资派”控制群众的手段，是他们推行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盲从主义”。文革中毛泽东发动学生，进而发动工人和农民对共产党“造反”，根本的思想就是“反对盲从”。所谓盲从，这是有一种迷信，认为“官职的大小，代表真理的大小，也代表正确的程度”。官职越大的人，真理掌握就越多，当大官与小官的意见不一致时，官大的意见一定比官小的意见更加正确，所以要盲目听从大官的指示。

(65)

毛泽东号召群众不要盲从上级领导，当上级领导不正确的时候，下级可以对上级进行“造反”。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不盲从和造反的典型。1927年，上级领导给毛泽东的指示，是让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去攻打大城市，可以毛泽东认为上级领导的指示不正确，所以他对上级领导“造反”了，违背领导的指示，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独创自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的大胆造反，共产党很可能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

毛泽东认为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盲从”的造反精神。今天，他希望新一代的红卫兵把他当年的“不盲从”造反精神继承下去，对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大胆造反”，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到底。所以，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把“不盲从”的造反精神，“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毛泽东继续说：【苏联复辟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

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这里指出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空想，而是很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现实。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启了“变修”的先例。因为，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必须注意到苏联的经验教训。苏联的教训是“问题出在党内”，因此，这次文革就要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防止苏联的教训重演。

毛泽东继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是在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要清除这些影响，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这里毛泽东指出这次文革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而且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毛泽东特别点明“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是在斗”，这就是明显地点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这些人都反对毛泽东在党内发起一场针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毛泽东又说：【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

毛泽东这里指出周恩来对抗他的战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周恩来也发动群众反对造反派，双方都没有动用军队，而是用“群众”作为武器来进行斗争，这就是所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能够发动群众，周恩来也能发动群众，后来，文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的斗争。

(66)

王力回忆说：【毛主席这次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有记得听他说过。】

毛泽东之所以会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因为他经过这几个月的斗争，已经看到周恩来派的势力相当大，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进行一场“全国全面”的斗争，才有可能打倒周恩来。

王力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毛主席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泽东这次讲话，点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文革的起源，毛泽东指出。文革来自于党内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场斗争从建国时拉开序幕了。

第二个问题是走资派为什么能够得到一部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是因为他们借助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信，他们已经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化身。因此对走资派的开炮，也就变成了对共产党开炮，这样就让一部分支持共产党的群众，难于理解和支持。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打破群众对这些党员高官的迷信和盲从，发动群众对他们造反。

第四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苏联已经发生了的现实。

第五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文革的斗争对象，是“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的资

产阶级代理人”，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

第六个问题是毛泽东指出周恩来这批人对抗他的手段，也是发动群众，就是所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一来，这场文革就变成了毛泽东派的“群众”，与周恩来派的“群众”的两派群众斗争。

毛泽东讲的以上六个问题，是理解毛泽东思路的基本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方式方法来搞文革，都可以从上述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寻找答案。

最后王力回忆说：【毛主席过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我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我对给我开车的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1982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

王力这时才恍然大悟，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当然周恩来比王力在更早的时间，就悟出了毛泽东的心思。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看破了毛泽东心思，对毛泽东的各种手段都有了事先的预防和准备，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就很难像对刘少奇的斗争那样的顺利。

(67)

文革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战役，一场是党外群众与党组织的斗争。刘少奇的工作组是党组织的代表，而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党外群众的代表。很显然，党外群众在人数上大大多于党组织，党外群众之所以怕党组织，是因为党组

织的背后有专政工具，也就是警察和军队。

由于军队在毛泽东的完全控制下，对警察有控制力的罗瑞卿在文革前被打倒，所以刘少奇的工作组成了真正的纸老虎，一捅就破。在人数绝对多数的造反派面前，工作组毫无还手之力，这样毛泽东就轻易地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战役后，发现过去对付刘少奇的方法不灵了。因为毛泽东发动群众，周恩来同样也发动群众，周恩来发动群众的手段也不低于毛泽东，这样一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战役，就成为一场群众与群众的斗争。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周恩来也支持红卫兵；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周恩来也支持造反派，结果就出现毛泽东派的红卫兵与周恩来派的红卫兵，毛泽东派的造反派与周恩来派的造反派。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派的红卫兵”，并不是真正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红卫兵，只是比较听毛泽东的话的红卫兵；同样“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也不是真正在周恩来领导之下的红卫兵，也只是比较听周恩来的话的红卫兵。红卫兵组织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例如在 1966 年 10 月的时候，北京大学的 3000 多名学生当中，自行成立了 92 个大小不等的独立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派系非常复杂，没有人能够完全驾驭和控制他们，经常出现毛泽东派的红卫兵变成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也经常出现周恩来派的红卫兵变成毛泽东派的红卫兵，甚至出现谁的话也不听的独立派红卫兵。

前面我们说到，第一批红卫兵是从北京中学里的高干子弟中间诞生的，他们最初完全是拥护毛泽东的。他们之所以拥护毛泽东，是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搞文革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改革高考的招生制度，可以使他们比较轻易地进入大学。可是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高干子弟的父母多半被打倒或批斗，这时他们的立场

也转变了，不再支持毛泽东，转而支持周恩来，成为周恩来派的红卫兵。

因此，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而毛泽东派的红卫兵以平民子弟为主。周恩来派的红卫兵的行动特点，第一就是“保”刘少奇，而且非常明显。这里举一个清华大学的例子。

1966年7月底工作组被正式撤销之后，清华大学成立了本科生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领导人是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等人，这是典型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另一个本科生红卫兵组织是蒯大富为首“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是典型的平民子弟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参加接见红卫兵的中央领导人排名。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惊讶地发现，从建国以来一直在领导人名单中排名第二位的刘少奇，一下子变成第八位，这样所有的老百姓都明白，刘少奇犯错误了，所以地位下降了。但刘少奇具体犯了什么错误，老百姓还不知道，于是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流传，同时也出现了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

(68)

在清华大学，从8月19日到8月23日的一个星期，出现了不少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比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王光美拉下马》，《刘少奇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等。当有人把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清华大学张贴之后，马上出现《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

虽说攻击刘少奇是主流，但那时的红卫兵是自发和无法控制的，同时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和江青的大字报，比如《周总理8月22日讲话是个大阴谋》《致江青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甚至还出现攻击毛泽东本

人的大字报。在一份名为《炮轰》的大字报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一直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但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却说，毛主席六月份不在北京，不知道这件事情，责任完全由在北京的中央常委来负。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运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的。】

这张大字报所说的“某些同志应该负责”，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应该负责。据说，主写这张大字报的是建材工业部部长赖际发的女儿赖锐锐。当然，攻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字报是很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于是在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主的十二个学校的高干子弟派红卫兵，发起一场撕大字报的联合行动，一下子撕掉了清华大学校园中所有的大字报。

据当时高干子弟派红卫兵的卜大华回忆说：【8月24号那天下午，清华大学打电话叫我去开会，当时来了一大屋子人，主持会的是贺鹏飞，他说：“大家都看到了，清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把党内的问题完全捅出来，把党内的秘密完全泄露出来。”那天王任重的秘书也在，他说：“这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行动，如果这个事情不制止，将来有一天，将不再内外有别了。”】

【大家讨论，有人建议当天晚上采取行动，一是把这类的大字报都销毁，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有人建议以破四旧的名义，把清华的二校门砸掉，借此机会销毁那些大字报等，因为大字报主要都贴在二校门的墙上。当天晚上整个行动算作一次破四旧，也就是说，一个有很明确政治目的的行动，却使用了一个破四旧的名义。】

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下午 3: 00, 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 清华大学派汽车去接他们。】

【下午 4: 00, 十二校红卫兵在清华附中召开誓师会, 贺鹏飞讲话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 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只许左派造反, 不许右派翻天!”】

【下午 4: 50, 十二校红卫兵跑步进入清华大学, 严密封锁大礼堂前大字报区, 广播《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 限令大字报的作者在 24 小时内撕去大字报, 否则后果严重。】

(69)

【下午 5: 10, 清华广播台多次广播十二校红卫兵的《安民告示》：“我十二校红卫兵大军, 今天下午五点开进清华大学。我们是忠于毛主席的队伍, 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校煽革命之风, 点革命之火。我军的矛头直指混蛋, 浩浩荡荡, 顺之者存, 逆之者亡。”】

【下午 6: 00, 贺鹏飞等指挥推倒了清华大学的二校门, 这是清华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 它一直是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晚上 7: 00, 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 贴上“只许左派造反, 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 红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

【晚上 7: 15, 十二校红卫兵开始撤退, 8: 00, 红卫兵在西操场集合, 开庆祝大会。】

【晚上 9: 00, 十二校红卫兵撤离学校, 校内贴出大量《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 《就是要红色恐怖》, 《就是只许左派造反, 不许右派翻天》等大标语。】

【晚上 10: 00 到深夜, “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到黑帮分子和黑

五类分子家抄家、拷打，强迫中层以上干部，拆卸搬运被推倒的清华二校门的砖石，稍有缓慢即遭毒打。

另据清华大学平民子弟派红卫兵的蒯大富回忆说：【他们这支队伍是高干子弟，就是所谓的老兵派，是最早的红卫兵。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腰里系着一个皮带，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格打勿论，是真打啊！打死了很多人。他们高人一等啊，他们是高级干部的孩子。】

【在我们清华大学，8月24日之后整个校园都空了，整个大字报都没有了，全撕了，撕得光光的。就是前几天贴的那些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揭露的也非常浅，就是揭露个修养啊，在哪个地方的讲话和毛主席的意思不对什么的，当时都是很肤浅的。8月24日之后，至少恐怖了有一个星期都不止，就没有人敢贴大字报了。】

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到9月，因为高干派红卫兵组织得比较好，而平民派红卫兵的组织还很松散，所以高干派红卫兵明显占上风，但他们的好景不长。这主要是因为，高干派红卫兵对加入他们组织的人，对家庭出身有很高的标准，比如父母要十三级以上的干部，这就使得高干派红卫兵的人数大受限制。相反，平民派红卫兵没有家庭出身的限制，什么人也可以加入进来，所以平民派红卫兵组织急剧壮大。比如到1966年10月，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平民派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已经发展到数千人，清华大学的高干派红卫兵已经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在此情况下，高干派红卫兵感到自己在人数上大大不如平民派红卫兵，有必要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来显示力量，于是他们成立起一个称之为“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组织。联动成立时，印发了《成立纲领》，写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70)

联动《纲领》中，特别说明“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再是正确思想了。

联动《纲领》中写道：【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一、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坚决贯彻；二、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动《纲领》提到的“二个主席”，指的是毛泽东和林彪，他们公然说要粉碎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要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也就是毛泽东派的红卫兵。

联动《纲领》中写道：【组织路线：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干部子弟组成；第三阶段吸收全国的工农兵。】

联动在《纲领》中，公然宣布自己是一个高干子弟的政治组织，要到第三阶段，才开始吸收普通平民的“工农兵”加入进来。

联动的《纲领》中最后写道：【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一定

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

联动《纲领》中，把文革说成是“白色恐怖”，并且在最后，没有按照当时的惯例写“毛主席万岁”，只是写“中国共产党万岁!”。联动的《纲领》，显然是完全彻底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以及文革。

“联动”成立之后，就开始积极活动。比如 1966 年 11 月 15 日，出现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矛头直指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11 月 21 日，出现大字报《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12 月 2 日，出现《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等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12 月 6 日，出现《彻底批判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12 月 8 日，出现大字报《陈伯达同志的总结是大毒草》;12 月 9 日，出现大字报《中央文革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 月 10 日的群众大会上，有人喊出：“刘少奇万岁!”、“踢开中央文革!”等口号;12 月 11 日，出现大字报《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12 月 12 日出现大字报《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12 月 14 日，出现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等等。

12 月 26 日，联动还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大会，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会上他们高喊口号：“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活着干，死了算!”，等等。

(71)

“联动”最大的行动，是所谓“六冲公安部”。他们组织数百人，从 1966 年 12 月到 1967 年 1 月，六次冲公安部，试图营救他们被捕的同伴。“联动”

成员冲入公安部后，打砸公安部的设备，在墙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还高呼口号：“高干子弟要掌权”、“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以及背后的毛泽东。

为了对付“联动”的大胆行动，中央文革则发动自己的群众来对付他们，中央文革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到1966年12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已经发展到几千人的规模，在人数上大大压倒了“联动”。

为了对抗“联动”保刘少奇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12月复辟黑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彻底把刘少奇“搞臭”，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单独约见蒯大富，指示蒯大富在社会上公开搞“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据蒯大富回忆说：

【12月18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来电话，他说：“你是蒯大富吗？”

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中南海西门去，那地方有人要见你。”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首长要接见了，于是我就叫了一辆车到中南海西门去了。在中南海西门的时候，被一个卫兵挡住了，不让进。我正在和那个卫兵交涉呢，从中南海里面开出一辆小轿车，张春桥穿着军大衣，他看见我站在门口，就朝我招手，说：“让他进来。”

那卫兵一看是首长答应了，就让我进去了。张春桥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把我带到旁边的值班室。值班室有两间，外面一间，里面还有一间，他就进到里面一间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里面有暖气，还有沙发。张春桥坐到单人沙发上，我坐在他对面沙发上。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张春桥单独谈话，其他一个人都没有。

我就问张春桥：“首长对群众运动有什么指示，我们现在怎么办？”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彻底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我立刻明白了，所谓“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那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听张春桥说这段话，当时我心里热血沸腾，等于是特别机密大臣来交给一个御林军最光荣、最高尚的任务，这本身的那种信任不是一般的信任啊。所以我特得意，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72)

蒯大富后来说：【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 1991 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还没细想过。当时就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

1966 年 12 月 25 日，在蒯大富的发起下，清华大学的造反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发起了号称“12.25”大行动。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记载这次行动说：

【1966 年 12 月 25 日，五千余名“井冈山兵团”战士，怀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刻骨仇恨，怀着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顶着刺入肌骨的冷风，步行到城里，分别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和菜市口等地进行了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

他们把“打倒刘少奇”、“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不向毛主席投降，就让他灭亡”、“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击 12 月复辟黑风”等巨幅标语，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贴在大街两侧商店的橱窗上，把深刻地揭露刘少奇二十余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大字报，张贴在大街小巷。广播车不停地向群众宣传刘少奇的罪恶活动，宏亮有力的声音在大风中回旋，合成一股巨流，“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声音响彻了天安门广场，震撼北京城！】

蒯大富本人也回忆说：【清华当时组织了 5000 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12 月在北京刮起了复辟黑风，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 12 月复辟黑风！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当时我们是第一个搞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街头活动，提出打倒刘少奇，他是国家主席啊，这影响是很大的。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北京城了。江青特别高兴，12 月 30 日她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73)

江青走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

来接见我们。”】

蒯大富干的第二件影响较大的事，是动用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刘少奇，刘涛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连刘少奇的女儿都出来揭发刘少奇，这在一般人看来，就证明了刘少奇的确有问题，其影响是非常大的。据蒯大富回忆说：

【12月27日，我找刘涛做工作时，她就老哭。刘涛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啊？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定了刘少奇是全国最大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反革命，你是共产党员，要跟着毛主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要站在党的一边、人民的一边，和我们一起同刘少奇作斗争。”

刘涛还是哭，她说：“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爸爸拥护毛主席，可能犯错误了，但肯定不是反革命。”

我说：“你说这个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天天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

刘涛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最后刘涛的表态说：“我坚决站到你们这边来，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在第二天28日，立刻就安排了刘涛做大会检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一连讲了4个小时，我们全录了音，录音之后就拿到天安门、西单、王府井去广播。我们当时动用的是广播车，大喇叭一遍遍地广播国家主席刘少奇女儿刘涛的检查，太震撼太刺激了！爆炸了！天安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等繁华的地段，万众停立，翘首细听。

刘涛揭发的影响太大了，在王府井大街，我看到的那个场面，到现在都难以

忘怀。如果有摄像机把那个场面摄下来，那绝对壮观。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而且还特别安静。别说车，就是人，一个个都走不动，大家都停在那不动，听刘涛的检查。广播车只要到了哪儿，人们就把那整条街围得水泄不通，只是听，没人说话，就听刘涛的检查。】

蒯大富后来说：【你想，假如说现在，突然在北京大街上广播国家主席子女揭发父母的讲话，那得多少人听啊。刘少奇地位多高啊，国家主席！刘涛当时的那个检查，对刘少奇是重大的打击，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一直到死都没有宽恕她。】

(74)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发展亲近自己的红卫兵势力。毛泽东具有“领袖”的天然优势，又掌握各种宣传机器，在培植自己的红卫兵势力方面，当然比周恩来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周恩来则采用“只要功夫到，铁棒磨成针”的笨办法，大量地亲自接见各种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在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高峰期，周恩来平均每个月接见100次以上红卫兵或者群众组织代表，工作量非常大，非常辛苦。

周恩来的办法虽然“笨”，效果却很好。因为几乎有一定规模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都要亲自接见，这样不管这个组织的政治倾向如何，首先赢得他们在感情上的亲近和好感。所以不管什么红卫兵组织，一提到周恩来，都认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周恩来都有很大的好感。包括蒯大富率领的“三司”这样的中央文革直接支持的嫡系组织，对周恩来也很有好感。让蒯大富他们去高喊“打倒刘少奇”，没有什么问题；让蒯大富他们去高喊“打倒周恩来”，肯定在感情上就通不过。

这样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卫兵方面，就形成了“势均力敌”之势。这时候处于中立旁观者的林彪，以及林彪控制下的军队，就成为影响局势走向重要因素。

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最初是“不介入”，但在文革之火烧入军队之后，林彪也不得不“介入”了，他首先是自保，给军队中的文革灭火和泼冷水。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其中第十六条是：“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地方上的文革，都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进行，而军队的文革，则不必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而是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这样军队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个“第十六条”是林彪从毛泽东那里争取来的，那时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来打倒刘少奇，只好暂时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在这个背景下，军队中就成立了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相应的组织，即“全军文革小组”。这个“全军文革小组”名义上也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但同时又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也就是接受双重领导。林彪任命他的“秀才”，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只是一个中将，在军队中元帅、大将、上将众多的情况下，任命一个中将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来显示出林彪对军队文革不重视，二来林彪用地位较低的人担任这个职位，自己比较好控制。另外，刘志坚曾经是参加1966年2月江青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的主要人物，与江青有一定的交情。

这样一来，全军文革小组就成为中央文革在军队的窗口，全军文革小组一方面要接受来自中央文革发动造反的指示，另一方面又要接受来自中央军委抵制造反的指示，受到夹板气，两边不讨好。刘志坚领导下的全军文革小组，根据中央

军委的指示，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试图对军队搞文革做出限制，如《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部队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这些文件转送到中央文革，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理由扣下不发。

(75)

后来军队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刘志坚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全军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过5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陈伯达当面指责刘志坚说：“你刘志坚的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全军文革小组又接受中央军委的指示，违背中央文革的意愿，主持召开了两次十万人规模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会上陈毅和叶剑英等老师发言，给文革大泼冷水。事后，中央文革找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刘志坚“算账”，要陈毅和叶剑英公开检讨。刘志坚无奈，两边游走说服，最后总算说服叶剑英在一个比较小型的军队师生代表会上做检讨，检讨稿也是刘志坚替叶剑英写的。

1966年12月31日，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一个两千多人的军队师生代表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做检讨，他说：【11月13日和29日两次接见来京军队院校革命师生的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思想，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的作用，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

开的检讨。】

这次会议是中央文革安排的，参会的都是对老师们不满意的军队造反派学员，他们听到叶剑英这样敷衍了事的检讨，当然不满意，很快哄闹起来。一些学员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宣布散会，保护叶剑英从后台走了。

1967年1月3日，北京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判陈毅大会。叶剑英急召刘志坚，要他出面做工作，不许批斗陈毅。周恩来也给刘志坚打电话，希望刘志坚出面，对造反学生们讲几句话，劝他们不要开批判陈毅大会。

刘志坚不得不服从命令，他在1月3日与造反学生谈了一晚上，未能说服学生。于是，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这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刘志坚说服不了学生，只好做自我批评，说：“我有点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

这时康生打断刘志坚的话，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

康生开了头炮，江青接着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去年开了个《部队文艺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76)

康生、江青等人这么一说，全场马上喊起一片“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接见

会成了批斗会，很快“打倒刘志坚”的标语就贴遍北京城。第二天的1月5日，刘志坚到国防部接见造反学生，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被红卫兵揪住，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晚，刘志坚就被关押，失去人身自由。1月19日，中央文革又组织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之后一直被关押，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复出。

刘志坚被打倒，是由于他既没有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也没有坚决站在林彪一边，而是试图两边讨好，结果却把两边的人都得罪了。中央文革提出打倒刘志坚时，中央军委这边也不“保”刘志坚，江青提出要“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林彪也赞同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并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但是谁来接替刘志坚的职务呢。据吴法宪回忆说：【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使得全军文革一下子瘫痪了。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在军队里就没有了办事机构。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师来担任。”江青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还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接受，答复她说：“好，行。”但林彪不能肯定江青说的一定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林彪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议去办，他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还宣布，任命江青为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关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这次新成立的军委文革小组，直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不像以前那样接受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更重要的是，组长徐向前是元帅，他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在历史上与林彪就不是一个派系，而且在级别上也不输给林彪，不必唯唯诺诺地服从林彪的指示。这样一来，新的军委文革小组，就成了毛泽东在军内搞文革的利器，军队文革似乎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不过林彪也不是省油的灯，只在一个多月之后，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就被林彪搞得“瘫痪了”，毛泽东利用徐向前插手军队的事情，并没有成功。

(77)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之后，文革之火在中央军委的下属机构中大烧起来。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央军委的体制。

解放军的领导核心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有七人：林彪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中央军委的下属机构有：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大军区(十一大军区，全是陆军)，各兵种(空军、海军、第二炮兵、铁道兵、工程兵)。

由于军队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毛泽东不易直接出面，让江青出面比较合适，

这样即使出了什么差错，可以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使毛泽东自己比较大的回旋之地。从搞文革的角度来看，各大军区和各兵种是直接带兵的，不能轻易触动；总参谋部是直接指挥作战部队的，也不易轻易触动。相对重要性较低的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所以在毛泽东的部署中，军队文革应该从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因此，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之后，首先要搞的冲击对象，就是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这里先说总后勤部的情况，总政治部的情况放在后面叙述。

关于总后勤部的情况，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有比较详细回忆，我们这里用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的回忆录。在1967年12月以后，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邱会作躲到了中央军委在北京西山的指挥所“养病”。邱会作说：

【徐向前上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一方面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方面也很动心计，他提议江青任全军文革顾问。在徐向前上任文革组长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军队搞“文化大革命”的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

军队里的造反派，对徐向前的三条方针如获至宝，热烈地拥护这三条方针，并且提出：“在徐帅指挥下，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间，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各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在京的首长，会议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主持。

会议开始时，徐向前讲话，他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徐向前讲话中特别提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是胆小鬼，大家对徐向前的讲话气愤极了！

这次会议很特别的是，没有人讲话，大家只是喝茶、上厕所。在冷场很久之后，陈老总用调侃的语言说了两句话：“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你也同我们害一样的病吧？现在你的病好了。”

聂老总说：“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他们两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还是一个讲话的也没有。

叶帅只说了一句话：“今天的会到此结束。”他说完这句话，起身就走了。

那天的会开得空前的短，大约只有一小时。会议的冷场情况，是对徐向前最好的讽刺。】

(78)

【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后，即向江青汇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军队的造反派没有发挥作用。新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建议，调几个造反派来帮助军队机关搞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立即批准了，不到两、三天，各路的造反派都到了北京。

各路造反派到了北京之后，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欢迎各造反派头目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说：“我们执行江青同志的指示，请大家来帮助机关搞文化大革命。现在革命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不怕乱的路线，一条是怕乱的路线。一个‘不’字之差，就代表了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执行毛主席‘不怕乱’的路线，由大乱到大治，文化大革命也就搞好了。”

造反派把徐向前的讲话，快要捧到天上去了。会后，造反派通宵游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徐帅致敬！”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城。新全军文革小组就成了江青在军队中不折不扣的最得力代理人。】

【1967年1月16日，毛主席、林总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扩大会议。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总参作战部的值班参谋来向江青报告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有个叫钱信莎(女)的学员，要求同江青同志通话。”

我听到值班参谋的话之后，心里很纳闷，为什么钱信莎能够直接给江青打电话，钱信莎又敢同江青打电话？其中的奥妙，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江青接完电话，回来后对着徐向前说：“你们全军文革小组建议，要调造反派来北京帮助军委机关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建议很好。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红色造反纵队)’，要求尽快到北京来，春桥要钱信莎直接向我请示报告。”

徐向前立即表态：“感谢江青同志关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又说了一句：“老将怕小将是没有理由的。”

“红纵”为什么来北京，至此情况就算清楚了。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是全军文革小组培养起来的造反主力军之一，自然是必定来京的。“红纵”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的旗子，进入北京总后勤部大院。在队伍的前面有十几个标语牌，其中写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打倒邱会作、解放全总后”等等。

“红纵”到处煽动游说：“中央文革认定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副主席把邱会作一脚踢开了”，“毛主席、周总理再也不保邱会作了”等等。这些谣言，既狂妄又恶毒。“红纵”在总后机关把大字报贴满了各个角落，抓了数十名各级领导干部关在办公楼里，凡是不同意“红纵”观点的干部都被抓起来批斗。

在“红纵”到达的当天晚上，新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李曼村向“红纵”交代任务时，说：“总后的问题，就是邱会作的问题，你们只要解决了邱会作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79)

可见调“红纵”来北京，并非“帮助”总后勤部搞文化大革命，而是来打倒我的。1月19日，“红纵”发表了很长的造反宣言，其中心内容是：“我们要不然就是打倒邱会作，要不然就是被邱会作镇压。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

【1967年1月19日下午5时，我在西山接到了徐向前亲自打来的电话，我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徐向前对我的身体情况连一个字都没有问，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还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适的。总后系统的革命群众对你的意见很大，你应该立即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关于你的问题，江青同志都认为你的问题不简单，你是顽固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你立即下山，回总后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和你谈话，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你下命令，你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回总后去！”

我一听也就起火了，只回答了一句：“坚决执行命令。”既然徐向前是对我下命令，我也没有说话的余地了。我接了电话之后，立即向秘书说：“晚饭后，回总后！”

晚饭后我即步行下山，去军事科学院叶帅的家中辞行。我原以为叶帅已经知道我要回去，便对他说：“我这就回去了，看叶帅还有什么指示？”

叶帅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回总后去。”

叶帅说：“‘红纵’在总后闹得很厉害，你现在不要回去，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我说：“不行呀叶帅，徐向前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我下了命令，我只有坚决执行命令。我不怕造反派！”

叶帅说：“啊？有这回事吗？我根本不知道！”

我把徐向前命令的全部内容说了一遍。此时，从来不说脏话的叶帅，脱口而出一句：“他妈的！”他皱了一下眉头，并叹了一口气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过了一会儿，叶帅打电话回来向我说：“你说的情况属实，现在就这样办吧。其中的微妙，你是会想得到的。你回去之后的事，就由我来管了，我叫傅崇碧做具体的布置。”

接着叶帅把我的秘书、警卫员和司机等叫到他家里来，叶帅对他们说：“邱部长回机关去领导文化革命，你们随他回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还有我们几个人对邱部长是心中有数，如果造反派搞到你们头上，你们要站稳立场。”

同叶帅分别的时候，我紧紧握着叶帅的手说：“我什么都不怕，请叶帅放心！要是我被‘红纵’打死了，也算革命到底了。不过，徐向前给我下命令的实质问题，并非命令我个人，是发出了一个信号。林总、叶帅叫各大军区的领导到来北京‘躲反’，而徐帅做的相反，是把大家往虎口里赶。我看军队要乱了，请叶副主席要十分注意自己的处境。”

叶帅心情沉重，一句话没有说，只是眼眶湿润地站在门口，看着我走去。】

(80)

【在回总后的途中，我向秘书吕玉润、警卫员蒋平安、司机张自贵说：“你们回去，要做好遭殃的准备。运动来了，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有缺点错误你们可以揭发，没有关系。”我的话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到了五棵松的时候，总后战勤处长鲁智在那里等候，拦阻我不要回去。我向

鲁智说：“不要紧，我要回去。我要让徐向前看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兵是啥样子！我不能给他们丢人，更不能做胆小鬼。”

鲁智劝我说：“部长，不是胆不胆小的问题，你回去有生命危险。”

我说：“我就要看看徐向前究竟能把我怎么样？不要怕，走！”

鲁智还说：“你现在不能回去，徐帅的命令一传开，机关大乱了，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很多都被‘红纵’抓起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的部下都被抓起来了，我更要回去。刀山火海，我去闯一下嘛！”

正当这时，叶帅的秘书带着卫戍区的几个干部战士，赶到五棵松堵住我，说：“叶帅还是请邱部长马上回西山，全军文革也要听中央军委的，请邱部长不要意气用事。”

我很冷静地说：“请转告叶帅，我谢谢他。我不是感情用事，我是顾全大局，已经牵涉到元帅们的关系了，我必须顾全大局。”那时的情景，真是含泪而别。】

【到了总后勤部大院之后，我看到礼堂门口到处都是戴着袖章的造反派，这时我干脆下了车，走路回家。机关的干部看见我回来了，并徒步往家走，都大吃一惊。到了我家附近，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手持棍棒“恭候”我，并跟着进了我家中。我刚坐下，造反派就说：“现在请你去和我们一起搞文化大革命。”

“红纵”预备好一辆大卡车，把我拉到卫生部办公室三楼关了起来。大约是19日晚上9时，即把我关起来之后不到一小时，“红纵”的高音喇叭就广播他们的战报，内容是：“在徐向前副主席的命令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邱会作被捉拿归案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总后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我关起来之后，第二天下午起，就让我观看“红纵”和总后机关的造反派，押着干部戴高帽子游街，边敲锣边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这样做，既是在糟蹋干部，也是在做给我看的。

1月21日晚上，“红纵”押我去工人体育馆观看了一次批斗大会。那次主要是批斗刘震、刘志坚、廖汉生、成钧等人。刘志坚自己“左”了一番，现在也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我亲眼看到了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造反派对革命干部的残酷真是空前未有的。批斗大会由“红纵”的副手汪志杰主持，在批斗开始时，他指着我说：“邱会作你老实一点，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81)

1月23日下午在总后礼堂，24日上午在总后机关大操场上，“红纵”分别对我搞了各达四小时的残酷批斗。1月23日的批斗大会开始之前，把我从卫生部办公楼押进会场。会场没有搞什么布置，只是在舞台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大会”。会议将要开始时，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镗忠，带着两三个工作人员来到会场，坐在人群之中观看批斗。

批斗大会开始时，“红纵”主要头目钱信莎，在台上大喊一声：“把邱会作押上台来！”

顿时，两个凶手要拉我上台去，我挣脱了他们的挟持，毫无畏惧地走上台去。此时，台下的人鸦雀无声，都在睁大眼睛看我的行动。

我上台之后，钱信莎走到我跟前，一手把我的领章、帽徽扒掉，同时一个高大个子的人，用劲搯了我一个耳光，当时我只觉得头上“嗡”的一声，就不省人事了。他们用一杯水泼在我的脸上，我醒来之后，爬不起来，还是那个打我的大

个子，把我像提东西一样地提起来。我站起来之后，感到头晕、半边胸部疼痛，口腔也很痛，嘴里往外流血。此时，全场还是鸦雀无声，恐怖气氛笼罩着会场。

钱信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声宣布：“批斗开始！”

几个刽子手凶狠狠地来到我的面前，他们是来执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

第一大刑法：向毛主席请罪。这个刑法要两腿并拢，两手垂直下伸，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一块 20 多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疼得难以忍受。这还不算，刽子手还要把铁丝左右拉动，每三、五分钟拉一次，铁丝嵌到肉里鲜血直流。开始拉铁丝的时候，疼得难忍，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第二大刑法：向造反派认罪。这个刑法要双脚跪下，两个人将我双手反拧，头低下，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大铁牌子，下端还不准挨地，因为铁牌子挨地重量就轻了。在难以忍受时铁牌子自动落到地上，他们就会把我的头发向后一揪，牌子也就离地了。

第三大刑法：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这个刑法要六个人协同动作，四个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来，前面站一个人揪着我的头发，后面一个人推着屁股，揪头发的人叫出口令：“放！”六个人协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抛，整个人猛地悬空落在地上。这个刑法不容易做好，他们为了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批斗之前曾经领着打手练习过多次。

其他的刑法还有：第四大刑法：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第五大刑法：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六大刑法：打倒反革命分子；第七大刑法：造反派万岁；第八大刑法：向革命群众请罪。

(82)

这次武斗，从开始到结束在四小时以上。“红纵”对我执行每种刑法之后，

刽子手们都要对着我喊三句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在对我搞了三次“喷气式”之后，我就昏厥过去了。

他们把我拖到后台，我醒来后，他们叫来事先在后台值班的 301 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宛，给我做检查，黄宛摸了我的脉搏和听了我的心脏。我当时眼睛直盯住黄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面对残酷的批斗，你只要说声‘有问题’，我也得救了。我毕竟是你的部长呀，你们这些专家是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要到 301 医院来的。”

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黄宛竟说了两个字：“无妨”。这样，我又被拉上台，继续向我进行武斗，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后，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动了。“红纵”的三、四个人，把我抬上一个三轮板车，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三楼。】

【1 月 24 日上午在总后大操场的批斗，基本上同昨天下午在礼堂上是一样的。刽子手给我剃了一个阴阳头，这一刑法，除了丑化人之外，没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管我的人用上海话互通情报，我能听懂一些。一个人从门外气冲冲地进来说：“李部长批评我们只是打人，不注意扩大政治影响。今天连夜要把广场上的舞台加大，要斗得像个样子。”从他们的话里，可以知道一场更凶残的批斗明天就要来了。

本来，我对生死根本就无所谓了。但 24 日下午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思绪万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现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牺牲品。我要争取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同他们斗争到底!”

为了活着，当即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求救;二是争

取晚上回家一趟，设法搞点防身的用品。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

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

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袜子里的脚板底下，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玉胜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我妻子胡敏那里。】

(83)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为“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宿舍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他知道我和杨成武关系很好，但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接电话后，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成武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

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

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

会再打。”

黄永胜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会作往死里斗。”

黄永胜说：“徐帅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我亲自到叶帅那里去。”

黄永胜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接通了林彪办公室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到了林彪办公室。

叶帅很快到毛家湾向林彪报告，林彪大为震怒，立即说：“备车，我要去接邱会作!”

叶帅和叶群一听就急了，好生相劝。叶群马上接通了总理的电话，总理甚为着急，说：“我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开完就误事了，我让伯达同志立即赶到毛家湾。”

周总理在大会堂就立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我是保邱会作的。”总理心里就更有底了。】

【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总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

陈伯达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

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叶群正在途中，叶帅派去救我的卫戍区战士，早就赶到了总后机关侦察情况，准备抢人。

这时，为了应对更大的批斗，我要求回家去一趟，擦擦有血迹的身子。晚上警卫员扶我回到家里，令我惨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样子，全家的东西被抢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占了。小女儿京京被老战友接走了，全家只剩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由老炊事员带着躲在灶房里。

我看到家里这种情况，更加鼓起了我的斗争勇气，我决心争取活下去。为此，我用旧棉裤做了两个厚的护膝，还增穿了棉衣，这是为了保护心脏和膝盖骨所采取的措施。我临走时，两个小儿子从灶房里跑出来，叫我爸爸，造反派挡住不让我们父子相见，我也只有忍心走了。

(84)

我回到卫生部三楼之后，尽量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动，争取睡好，以应付明天的苦难。在我睡得尚好的时候，有人用急促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并说：“快起来，有急事。”

我问：“到哪里去？现在就去批斗场吗？”

来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来接你了。”

当我听到毛主席、林总派人来接我这句话时，十分惊喜。我当时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是卫戍区两个战士把我由三楼背下去的。当时，在一边扶着我下楼的战士，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奉叶副主席的命令，在这里几天了，是在这里保护你的。”我只有向他们点头致谢。

我上了汽车之后，把我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叶群已经在那里等候。叶群向我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抢救你的。现在，我完成了光荣的任务！”

叶群又说：“这是杨成武总参谋长暂时住的地方，你现在就在这里休息。你

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已有安排。”我只有点头致谢，心里感激的话，一句也说不出。

25日上午，杨成武夫妇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杨成武在楼下就喊我的名字“老邱呀！老邱呀！”，我身子动不了，躺在床上也激动地喊：“老杨呀，我在这里。”

他们上楼后，杨成武扑到我的面前，抱着我边哭边说：“老邱呀，我们来晚了，你受了大罪。”

我向杨成武指着我的伤，并指着我被剃的阴阳头，杨成武气愤地说：“一群暴徒，一群暴徒！”

他们为我流下了满腔的热泪，向我表示了真实的感情，我是永远感激的，永远不会忘记的！】

【晚上，叶帅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的车还没有到，叶帅、聂帅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从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地骂造反派：“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26日下午，刘伯承元帅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

27日，叶帅亲自叫来军事科学院门诊部主任、医生、护士给我治病，并亲自主持对我的治疗方案。以后，叶帅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来看我一次，有时来几次。我被打的伤，是在叶帅的关心之下，得到及时治疗的。更为可贵的是，叶帅每天都会向我传达中央的一些时政消息，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叶帅救了我一命，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的!】

(85)

我们上面用比较大篇幅引用邱会作的回忆，第一个目的是它比较客观和详细地讲述了造反派暴力批斗老干部的过程，这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革中所谓的“批斗”是怎么回事。第二个目的是它从侧面讲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围绕军队搞文革的一次斗争。现在主流的文革研究，都“忽略”了这次重要的斗争，因此有必要多费些笔墨说明一下。

需要说明的是，邱会作遇到批斗的暴力程度，比一般老干部厉害许多。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军队造反派在使用暴力方面，比一般的老百姓造反派要“厉害”，毕竟军队本身就是暴力机关；第二个原因是邱会作不肯认罪，也就是不肯投降。如果邱会作投降认罪的话，他遭受的暴力虐待就会少得多。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像以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住，叛变投降就不会遭受酷刑，而不肯投降的话，那就免不了皮肉之苦了。

造反派批斗邱会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对邱会作搞暴力虐待，而是要让他“认罪”，承认造反派对他的指控都是事实，承认他自己执行了反革命资产阶级路线。只要邱会作自己认了罪，就等于是承认造反派的造反行动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在军队中造反的必要性。

所以，造反派要用一切手段逼邱会作“认罪”，作为他们造反正当性的证明。可邱会作就是不肯认罪，因此遭到造反派的暴力威逼，逼他认罪。如果邱会作认罪投降了，对于毛泽东在军队搞文革是一个大的胜利，可以乘胜追击，把军队的文革进一步扩大化。因此，林彪等人要积极营救邱会作，不能让毛泽东在邱会作

身上打开缺口。

邱会作是林彪最为信任的心腹之一，当林彪得知邱会作被批斗有生命危险时，二话不说，马上要亲自去解救邱会作，甚至不怕因此事而惹怒毛泽东。只是在叶剑英和叶群的相劝之下，才退了一步，请周恩来出面去处理这件事。

在这方面，林彪的做法与刘少奇大不相同，敢于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部下，所以他的部下也拼死拥戴他。而刘少奇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心腹彭真，而是试图牺牲彭真来缓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同样彭真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心腹吴晗、邓拓等人，甚至还丢卒保车，试图抛出部下来保住自己，这似乎是刘少奇白区系统共产党的普遍做法。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是想牺牲别人来保住自己，各自打小算盘，结果谁也保不住。

打倒邱会作，应该是江青得到毛泽东的授意，通过新全军文革小组的徐向前来实施的。可是当1月24日，周恩来就邱会作被暴力批斗的事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却说了相反的话：“我是保邱会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搞清这件事，我们需要回顾一下1967年1月1日以来发生的事情。

(86)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社论是根据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的讲话精神写的，其中心思想是“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既然毛泽东下决心搞一场“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军队当然不能例外，并且，军队将是文化大革命最难攻克的堡垒。

在打倒刘少奇阶段，毛泽东有军队老将们的支持，所以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毛泽东也很清楚，军队中如果不搞文革，还是让现在这一批有走资本主义倾向的

老将军们掌权的话，这场意在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毛泽东必须把文革之火，烧到军队之中，打倒军队里的走资派老干部，换上一批无产阶级新人。

但对掌握枪杆子的人进行夺权，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一步一步来。毛泽东的第一步，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元帅为组长，江青为顾问，并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军队的宣传喉舌《解放军报》。这个新全军文革小组，是林彪控制不了的，成为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的利器。

虽说林彪没有参加毛泽东在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但毛泽东在这次家宴上的讲话内容，还是很快传到林彪那里。林彪明白毛泽东要在军队里来一个大动作，而现在军队里的高官主要是林彪派系的人马，对军队高官进行大换血，就等于是把林彪的人马换掉，也就等于是把林彪架空了，因此林彪肯定是不满和反对在军队搞文革的，他要设法抵制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军队里面来。

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

林彪说的“全面内战”，就是用军人的话解释毛泽东说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可是林彪要对这场“全面内战”加以限制，提出“不该打的地方不要乱冲”。什么是“不该打的地方”，显然就是军队的高层。

林彪又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刘志坚把几个老师推向前

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师是好同志，是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对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

刘志坚本来是林彪的秀才，可是刘志坚却没有坚决跟定林彪，而是游走在林彪和江青之间，试图两边讨好。因此，江青提出打倒刘志坚时，林彪也同意，并且把 1966 年 11 月间两次召开十万人大会对文革泼冷水的事情，推到刘志坚身上，为几位老师辩护。因为老师们是坚决站在林彪这一边，与江青斗争的。

(8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支持林彪，贺龙就是例外，徐向前是另一个例外。贺龙的资格老于林彪，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是三支独立的红军，因此当时毛泽东、贺龙和张国焘三人的地位相当。而那时林彪只是毛泽东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长，地位比贺龙低多了，而当时徐向前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大将，地位与林彪相当。

后来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力量大减，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共的主力军。1938 年张国焘出逃之后，留下的徐向前等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贺龙在抗战前期，还是八路军 120 师师长，但不久也被架空了军权，贺龙的军队交给彭德怀指挥，在解放战争期间贺龙基本上无事可做。只是到了 1949 年底，毛泽东看到林彪和彭德怀的军权太大了，才急忙让贺龙出来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平衡一下军队中的权力分布。

从贺龙的角度来看，论资格他本该在林彪和彭德怀之上，可是解放后长期以来，他都是在林彪和彭德怀之下，这就让他感到不服气。贺龙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老字辈还是服气的，在抗美援朝之前，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贺龙还比

较服气，等到抗美援朝之后，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贺龙就不服气了，与彭德怀产生不少矛盾。因此在 1959 年打倒彭德怀时，贺龙很积极，他也是感到出了一口气。彭德怀之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时，贺龙当然还是不服气，与林彪发生不少矛盾，甚至积怨。

虽说贺龙对毛泽东是服气的，但他对毛泽东让他屈居于林彪之下，却是不满意的。这时，贺龙也就自然地接近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出让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样贺龙也就无形中成为刘少奇一派的了。等到 1966 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贺龙自然也就靠边站了。

毛泽东提出要在军队里搞文革，林彪知道硬顶是顶不住的，他也学周恩来的策略，采用顺势引导的方法，把文革的洪水引导到其他地方去。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就是就把军队文革的洪水，引到贺龙这只死老虎身上。因此，林彪在 1 月 8 日的军委常委会上，展开了对贺龙的攻击，林彪说：

【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88)

林彪批贺龙有两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贺龙对林彪不服气，因此林彪也对贺龙不满，两人之间有怨气；第二个含义是更重要的，就是林彪试图把军队文革之

火，引到贺龙身上去，这样可以保住林彪自己这一派的人。

1967年1月10日，新任主管《解放军报》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起草了一份《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的建议》，其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这是首次提出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这里，林彪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想把“揪军内一小撮”，化解在贺龙身上，把贺龙作为“军内一小撮”的代表人物。

但是，毛泽东不会被林彪这么轻易“忽悠”过去，他并不感兴趣打贺龙这只死老虎。1966年1月13日，发生了震动全军的《解放军报》夺权事件。解放军报任记者肖力，其实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贴出一张炮打《解放军报》党委的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掀起了一场《解放军报》夺权的风暴。

李讷是三个月前的1966年10月下旬，才到《解放军报》工作的。据当时的《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回忆说：【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江青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

1966年10月下旬，正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的时候。这时，林彪已明显表现出来不太配合毛泽东搞文革，因此，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需要在林彪那里

安插一个楔子，安放一个定时炸弹，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引爆，于是毛泽东就把自己的女儿安插到了林彪那里。为了搞文革，毛泽东来了一个全家总动员，能出动的都出动了。

肖力刚到《解放军报》时，还做了一些保密，《解放军报》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不过在她写大字报后，肖力很快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她对众人说：

“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我有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对我‘炮打’、‘火烧’都可以。”

肖力公开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她并没有警卫员，也没有专车接送，而是每天自己骑自行车来报社上班。如果有什么仇恨毛泽东的人，把她作为人质绑架，那就是一件重大事件了。不过一般人们大概也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是讲原则的，绝不会答应用女儿进行什么交换，所以绑架毛泽东的女儿意义也就不大了，这样就形成另外一种安全的保证。

(89)

肖力为什么要公开自己的身份呢？因为她不公开身份，她的大字报就会被当作一般的大字报被忽视掉，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高潮时期，毛泽东的女儿当然也成为被崇拜的对象。《解放军报》的人，在不知道肖力身份之前，对她的炮打《解放军报》党委的大字报，还持怀疑态度，等到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马上一边倒地支持肖力，支持她造反，跟着她造反，炮打《解放军报》党委。

为了表达对肖力的崇敬，《解放军报》内的毛泽东像两侧，挂上了“向肖力同志学习”和“向肖力同志致敬”的红色条幅，在开会时尊称“敬爱的肖力同志”、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肖力同志”等，后来又发展到“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肖力同志周围”、“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等，肖力在《解放军报》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把女儿安排在《解放军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肖力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起爆呢？从肖力的大字报中可以看出明显的端倪，她在大字报上说：【几个月来，《解放军报》没有一篇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和文章，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几个月来，《解放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也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肖力本人肯定没有这么高的水平写这样的大字报，据说这张大字报是肖力与江青商量写的，当然少不了毛泽东在后面的指点。肖力在大字报中，首先批评《解放军报》不积极宣传文化大革命，甚至把毛泽东以前批判刘少奇的话“冷冷清清”也用上了。这是毛泽东借女儿的嘴，对林彪不积极搞文革表示强烈不满。

肖力的大字报又说：【在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指导全军工作的《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却依然调子很低。1月11日全军文革小组重新改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军报为此发的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却是一篇空洞无物毫无热情的官样文章，《社论》只字不提军队内部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不讲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样的时候写出这样的社论，是《解放军报》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解放军报》的耻辱！】

肖力具体地指出，《解放军报》对毛泽东提出的“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

没有响应，对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也没有欢迎和支持。《解放军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首先是主管军队林彪的责任。不过肖力没有把矛头指向林彪，而是指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以此来间接地提醒和警告林彪。

(90)

肖力在大字报中说：【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军报》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解放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肖力这样说，一方面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避免直接触及林彪；另一方面，打倒胡痴，正好可以实现《解放军报》的夺权。

肖力的大字报出笼之后，林彪一时间沉默，没有表态。但直接主管《解放军报》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得不表态，他没有表示出积极的支持，只是平淡地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对胡痴‘烧一烧之后还要保’；二是报社要稳定，不能乱；三是抓革命促生产，报纸要办好；四是经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

萧华的四点建议，显然与毛泽东的意向相反，特别是“保胡痴”、“报社不能乱”、“新领导要经过总政治部和军委审批”等，都是保老干部，压制群众造反的举措，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后来这也成为萧华被打倒的罪名之一。

肖力在《解放军报》组成一个名叫“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组织，对《解放军报》党委造反和夺权，她仗着红色公主的身份，很快成为《解放军报》的群

众领袖，并成为《解放军报》的实际决策人。

夺《解放军报》的权，对林彪也是的重大打击。因为长期以来《解放军报》一直是林彪和军队的喉舌，现在《解放军报》被夺了权，这让林彪感到非常不爽，但他也没办法。林彪在沉默了三天之后，终于做出了表态，他于1月17日给《解放军报》写信说：【同志们：解放军报社由肖力等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以胡痴为首小集团的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林彪首先肯定了肖力的造反，说自己完全支持，并肯定“乱”不要紧，对胡痴也不保了，同意对他批判。林彪在信中又说：【《解放军报》的社论和评论，责成总政萧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林彪，1967年1月17日】

林彪指出《解放军报》的重要文章由萧华和关锋负责，并要求外面的人不要到《解放军报》来揪人批斗，这算是林彪的底线。林彪虽然勉强写了这封表态支持的信，但他心里对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后来爆发出来，和江青吵了一架。

(91)

林彪把这封信先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林彪这封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毛泽东虽然这么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表态，也只能算是勉强满意。第一，林彪对肖力造反表示支持；第二，林彪同意毛泽东不怕“乱”的观点；第三，林彪同

意打倒胡痴，改组《解放军》报党委，这些算是林彪对毛泽东的重大让步。但林彪仍然要保萧华，也没有进一步表现出对文革的热情，这是毛泽东不满意的。因此毛泽东还要进一步对林彪采取动作。

前面说过，毛泽东搞军队文革，是准备从军事程度较低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为了打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陈伯达先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放话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这么一说，总政治部机关大楼里马上贴满了打倒萧华的大字报，作为打倒萧华的先声。

在1月1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陈伯达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师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开北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跟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

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这里陈伯达说的“斗争你的大会”，是指中央文革在1967年1月19日晚准备的一次批斗的萧华10万人大会。江青问萧华说：“今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萧华沉默不语。

吴法宪回忆说：【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想干什么？”】

(92)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师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背后都议论纷纷。】

由于萧华当天没有去批斗他的大会，造反派就到萧华家去揪人，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造反派没有揪到萧华，就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的1月20日，在京西宾馆继续举行军委碰头会。据《叶剑英传》记载：

【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失踪，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

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

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徐向前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也大声地说：“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右手掌骨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

不少文章说叶剑英是对江青发怒而拍裂掌骨，其实叶剑英是发怒的对象不是江青，而是徐向前。

1月21日，叶剑英把这些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大怒，和江青大吵了一场。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

【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下午3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

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质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

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93)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回答说：“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了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时，叶群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叶群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

叶群没有办法，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94)

很多人认为林彪这次跟江青发脾气，只不过是单纯的一时压抑不住心中的火气爆发。其实不然，这是林彪故意唱的一场戏，一场与毛泽东抗争的戏。我们先从下面的时间表，看看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的几场冲突。

第一场冲突：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元旦社论，毛泽东吹响“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号角，对此林彪没有响应，《解放军报》反应冷冷清清。这场冲突是毛泽东进攻，林彪防御，双方打个平手。

第二场冲突：1967年1月4日，江青等人打倒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林彪接受这个事实。这场冲突中毛泽东进一步，林彪退一步。在同一天，江青宣布打倒陶铸。在林彪看来，陶铸原本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打倒陶铸属于毛泽东派系的内斗，林彪对此持旁观态度。

第三场冲突：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军队搞文革的方针是批贺龙，试图把军队文革之火转到贺龙身上。对此毛泽东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公开表示，林彪前进了一小步。

第四场冲突：1967年1月11日，江青提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徐向前元帅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任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接受这个事实。从此林彪失去对全军文革小组的控制，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五场冲突：1967年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泛泛地赞扬一番新全军文革小组，可是在关键的地方，却说军队搞文革要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行，完全没有说军队文革要在新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下进行。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是不属于林彪领导的，《解放军报》这么说，就等于是委婉地不承认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权。这次林彪前进一小步，毛泽东马上要予以反击。

第六场冲突：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肖力)在《解放军报》写大字报夺权，夺取了《解放军报》的领导权。林彪对这次夺权暂时没有表态。直到1月17日，林彪才公开表态，承认《解放军报》夺权的事实，从此林彪失去了《解放军报》这个喉舌。这次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七次冲突：1967年1月19日，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公开批判总政治部

主任萧华，甚至说“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且准备召开 10 万人大会批斗萧华。同一天，徐向前给正在西山躲避揪斗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下命令，命令他回去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萧华和邱会作，其实就是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夺权的先声。

第八次冲突：1967 年 1 月 20 日上午，萧华逃到叶剑英家躲过批斗，江青和徐向前骂萧华是胆小鬼，叶剑英拍桌子“震怒”，暂时制止了批斗萧华。

第九次冲突：1967 年 1 月 20 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自己家来，大发脾气，迫使江青道歉，并承认“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江青这么说，就等于承认萧华无罪，可以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而萧华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也就等于毛泽东对总政治部夺权的计划流产了。这次林彪前进大一步，毛泽东后退一大步。

(95)

林彪这一步也是险棋。常言道：打狗还要看主人。林彪这样毫不客气地跟江青吵架，表面上是不给江青面子，实际上是不给毛泽东面子，这一招得罪毛泽东甚多。林彪这次豁出去得罪毛泽东，也要保住萧华，与其说林彪要保住萧华，不如说林彪要保住总政治部。

在毛泽东的进攻下，林彪接连后退，先失去全军文革小组，又失去《解放军报》，如果这次再失去总政治部的话，那么林彪还要接连败退，很快就会失去对整个军队的控制力。

因此，总政治部是林彪一定要坚守的，不能再后退了。怎么守住总政治部呢？林彪使出一个高招，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反威胁”。一般境况下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威胁，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下级对上级也可以进行“反威胁”，下级对上级

最有效的“反威胁”手段就是“辞职”。

在不少情况下，某个重要部下的辞职，会对上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上级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被迫对部下做出某种让步，以换取部下的不辞职。因此，上级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每个重要职位都预备一个替补队员，一旦这个重要职务的部下辞职或发生意外，他马上可以让替补队员上场，避免全局受到重大损失。

林彪的情况也是这样。林彪掌管军队的职位非常重要，毛泽东当然会预备一个接替林彪的人。那么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替补队员是谁呢？

军队中威望最高的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967年的时候，朱德和刘伯承早就靠边站了，罗荣桓去世了，彭德怀打倒了，而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人的资历和军功都不太充足，镇不住全军。

去掉上述六人，剩下有可能取代林彪的人，只有贺龙、陈毅和徐向前三人。而陈毅与周恩来的关系太近，毛泽东肯定不能用，所以剩下可用的只有贺龙和徐向前两人。

徐向前的资历与林彪差不多，但军功有些不足，在军中的威望也不如林彪；贺龙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在南昌起义时，贺龙是总指挥，而林彪只是起义部队中的一个连长。贺龙在军中的威望不亚于林彪，所以贺龙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对打倒贺龙是十分慎重的。尽管贺龙一度与刘少奇走得很近，但毕竟贺龙还是有实力取代林彪的，所以毛泽东想留着贺龙，作为取代林彪的预备队员。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林彪对打倒贺龙非常积极，只要把贺龙打倒，毛泽

东就没有可以取代林彪的人了，林彪的地位也就坐稳了。因此，当林彪准备开足马力在军队中批贺龙的时候，毛泽东却对贺龙表态说：“一批二保”，毛泽东还要保贺龙。

(96)

1967年1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同时发起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同一天，他却把贺龙藏了起来，怕林彪也组织自己的造反派去揪斗贺龙。1月19日这天，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现在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被秘密送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修养，之后，造反派多次要揪斗贺龙，但都找不到人。从1966年9月贺龙跟刘少奇一起“靠边站”，到1967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贺龙除了受到干扰以外，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和揪斗，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提出批斗贺龙。这在当时是非常例外的，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要保留贺龙作为林彪的替补队员的想法。

一直到1967年8月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才决定打倒贺龙，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谈。不过毛泽东即使打倒贺龙，他也像对待邓小平那样，把贺龙冷藏起来备用。贺龙一直到死，生活待遇还是可以的，贺龙夫人薛明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比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待遇好多了。文革中只有邓小平和贺龙两个人真正受到“一批二保”的待遇，被打倒而又被保护。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对未来的政治布局中，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替补队员，贺龙是林彪的替补队员。如果贺龙不是因为病逝，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就会启用贺龙复出来代替林彪。

林彪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保留贺龙的用意，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打倒贺龙，让自

已成为无人可以取代之人。林彪敢于跟毛泽东“发脾气”的原因，还在于他借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宣传的东风，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也捎带了进去。当时报刊上同时对毛泽东和林彪进行吹捧，甚至到处喊“谁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毛泽东自己都很难反对林彪了，因为谁反对林彪谁就是反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敢于用“辞职不干”，来“反威胁”毛泽东，声称如果打倒萧华，他就辞职不干了。毛泽东的个性极强，很反感别人用什么手段来威胁自己，林彪此举可以说是让毛泽东非常不爽。但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还是不得不接受林彪的反威胁，同意停止打倒萧华，暂时放弃在林彪的军队系统中搞文革的计划。

第十次冲突：1967年1月21日，林彪乘胜追击，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商议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据吴法宪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个人到会，其他人没有来。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97)

【关锋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

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

之后，参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做出认真深刻的检讨。

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锋打断了，关锋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锋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徐向前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

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

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锋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

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

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小组就让它名存实亡吧。”】

(98)

这次会议上，林彪取得重大胜利，军队干部们基本上站在林彪一边，对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深表不满，纷纷抗争。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退让，默认了这个事实。

第十一次冲突：1967年1月24日，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被暴力批斗，向林彪求救。林彪最初想自己直接出手救邱会作，被叶群和叶剑英劝阻后，转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因为在林彪的抗争下，已暂时放弃了军队搞文革的计划，只好做个顺水人情“保邱会作”。这次毛泽东又后退一小步。

第十二次冲突：1967年1月25日，林彪在不与徐向前商量的情况下，派军队将邱会作“救出”，这样就大大打击了徐向前的威信。据邱会作回忆说：【1967年1月25日凌晨我被接走，对造反派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1月25日晚，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礼堂一楼会议室，接见了总后勤部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造反派头头钱信莎问：“徐帅，你不是支持批斗邱会作吗？为什么又要保邱会作了？”

徐向前不说话。

钱信莎问：“请你说一下，保邱会作的理由是什么？”

徐向前说：“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钱信莎说：“我们要求徐帅再次下命令，把邱会作交回给我们继续批斗。”

徐向前说：“你们不是有‘四大’的权力吗？要批判谁都是可以的。至于我再次下命令，就没有人执行啰。”

徐向前不久借故身体不舒服，就宣布接见结束了。】

徐向前命令邱会作接受群众的批判，林彪却无视徐向前的命令，把邱会作抢回来，并让邱会作继续担任总后勤部长，这等于是宣布徐向前的命令作废，宣布军队里还是林彪说了算。徐向前在萧华问题和邱会作问题上，被搞得灰头土脸，两边不讨好，江青对他不满意，连造反派也不信任他了。此后，徐向前领教了林彪的厉害，再也不积极出头搞文革了。徐向前消极下来之后，全军文革小组群龙无首，也就瘫痪了。林彪借着萧华和邱会作之事，杀伤了徐向前在军队中的威信，搞瘫了全军文革小组，可谓是一次比较大的胜利，毛泽东则做出了比较大让步和退却。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轻易做出让步的人，就在林彪召开军委会议批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一天，1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做出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这里是与林彪交换条件，用暗语对林彪说：“我不在你的军队里搞文革了，但是作为交换，你要派人支持我的‘左派群众’”。

那时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正打得不分胜负，而林彪却作壁上观，号称“不介入”。因此毛泽东督促林彪出来介入文革，督促军队出来支持

他的左派群众，共同打击周恩来的群众。林彪对毛泽东的交换条件的反应，我们以后再谈。【本节完】

## 第十七节 全国全面夺权

(1)

毛泽东在 1966 年的文革，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总体来说，他是不满意的。特别是毛泽东拉开了打倒周恩来的序幕，可是进展却非常有限，基本上算是失败之作。因此，毛泽东决定改变 1966 年以来的战略，发起一个极为大胆和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全国全面夺权”。毛泽东在 1966 年 12 月 26 日的生日寿宴上，站起来举杯对参加这次文革小组成员说：“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

196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元旦社论》反映了毛泽东的“大决战”战略思想，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气魄说：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文革出现新局面，工人起来了。”在 1966 年的一年里，学生(基本算是知识分子)是文革的主力军，而 1967 年出现了新局面，就是工人起来了，工人将取代学生成为文革的主力军。

第二个要点是“向党内走资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 1964 年的“四清运动”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概念，也就是从 1964 年，毛泽东就开始向“走资派”开展攻击，但这个攻击是一步一步层层深入的，也就是过去

毛泽东喜欢用“剥笋”战术，一层一层地从下往上剥，打倒刘少奇就是用这种剥笋战术。但是剥笋战术太费时间，毛泽东要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用剥笋战术来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毛泽东下了决心，要在1967年来一个全面开花，来一场全国大总攻，来一次全面大决战，一次性地把老干部们全打倒，彻底解决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句话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全国全面夺权”。第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第二是“全面”夺权，意思就是在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同时展开夺权。以前文化领域是刘少奇掌管的，现在文化领域的大权已经夺了过来，由毛泽东直属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掌管文化领域，所以文化领域的夺权已经完成，毛泽东下面要进行的是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夺权。掌管经济领域的是周恩来，掌管军事领域的是林彪，那么毛泽东的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的夺权，最后就要落到周恩来和林彪头上，因此这两个人奋起抵抗毛泽东的夺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关于毛泽东在军队领域搞夺权以及林彪的抵制，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叙述，下面主要讲毛泽东在经济领域搞夺权的情况。

(2)

在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央会议发出了1967年搞文革的《四点指示》：

**【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二、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三、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四、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毛泽东的《四点指示》，第一个指示是“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个指示是指出四个夺权的重点地区：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这四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工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毛泽东把夺权的重点放在这四个地方。

毛泽东的第三个指示，是指出造反派要团结多数。因为毛泽东煽动造反派起来造反之后，而各地官员为了保护自己，也组织起自己的群众组织，即所谓“保皇派”来保护自己。很多地方保皇派的人数要多于造反派的人数，因此毛泽东说造反派要团结多数，人数要超过保皇派一倍以上，这样才能保证夺权成功。

毛泽东的第四个指示，是说“上海很有希望”。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上海的情况。

前面说过，上海王洪文等组织领导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通过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革命组织”。之后，“工总司”多次“炮打”上海市委，宣称上海市委是“黑帮”，要对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揪斗。因为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已经明确支持“工总司”，所以上海市委不敢用行政权力来对付“工总司”，为此，上海市委就设法成立一个自己控制下的群众组织来保护自己。1966年11月23日，上海成立群众组织“赤卫队”，这是保护上海市委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此后，上海就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造反派的“工总司”，保皇派的“赤卫队”。“工总司”的支持者是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而“赤卫队”的支持者是上海市长曹荻秋为代表的中共上海市委。“赤卫队”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

“近卫军”，因为有上海市委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各种便利条件，很快“赤卫队”发展到 80 万人，有超过“工总司”的势头。

1967 年 1 月 4 日，上海《文汇报》发生夺权事件，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工总司”派大量工人去支持《文汇报》夺权；1967 年 1 月 5 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发生造反派接管报社的夺权事件，“工总司”又派工人去支持，而“赤卫队”也派出万余工人去反对《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他们高喊口号：“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这个口号清晰地表露出“赤卫队”的保皇性质。因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刊登的都是干巴巴的党八股文，一般的工人，怎么可能喜欢看这种报纸，又怎么会要求“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显然这个口号来自上海市委在背后的指使。

### (3)

“赤卫队”和“工总司”先是展开文斗，“赤卫队”公开打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并公开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因为张春桥是“工总司”的后台；而“工总司”则打出“赤卫队是保皇派，是曹荻秋的工具”，要公开揪斗曹荻秋。

“赤卫队”虽然想保曹荻秋，但他们却不便公开打出保曹荻秋的旗号。因为那时的社会舆论主流是造反有理，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反对造反，谁也不敢反对批斗当权派。于是“赤卫队”就来一个“反客为主”之计，他们也抢着去揪斗曹荻秋，但“赤卫队”对曹荻秋的揪斗是假的，是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他们是在保护曹荻秋。“赤卫队”试图抢到对曹荻秋进行批斗的主动权，这样就可以阻止“工总司”对曹荻秋进行真的批斗，私下里可以保护曹荻秋。

“工总司”也看破了“赤卫队”的反客为主之计，于是工总司在12月14日，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席会议，作出一个决议：“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批准，曹荻秋和各级领导一律不准检查，也不准将检查材料交给任何人。”工总司的这个决议，也是试图掌握住批斗上海市委的主动权，防止赤卫队用“反客为主”来保护上海市委。

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签字接受赤卫队提出的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个大会是假戏真做，让一般人以为“赤卫队”也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而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更是给予了“赤卫队”合法性。

“工总司”当然不能让“赤卫队”反客为主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于是在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也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曹荻秋揪到会场，迫使曹荻秋当众宣布他与赤卫队签字的八项要求作废，并且被迫宣布不再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这样一来，“赤卫队”就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反攻。他们也知道曹荻秋是在“工总司”的逼迫下，不得已宣布赤卫队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赤卫队”也要用逼迫的方法，演一场逼迫曹荻秋的“戏”，让曹荻秋再次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

1月28日晚，“赤卫队”派出两万多人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书记处，声称要找曹荻秋“算账”，要曹荻秋重新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

对此，“工总司”也不能坐视不睬。据说在北京的张春桥听到赤卫队包围上海市委书记处的时候，给上海的王洪文发出指示，让他赶紧派人去与“赤卫队”争夺上海造反的主动权。于是王洪文率领十余万“工总司”的工人，向康平路进发，路上又传来小道消息：“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

张春桥是“工总司”的精神领袖，张春桥的家被冲砸，引起“工总司”人们的义愤，于是十余万“工总司”向两万多“赤卫队”大打出手，造成了康平路流血事件。这是发生于上海，也是发生于全国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赤卫队”寡不敌众，很快投降了，“赤卫队”本身也很快彻底垮台了。

保皇派的群众组织“赤卫队”彻底垮台后，上海成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这就为后来上海的“夺权”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4)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1月6日，“工总司”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的《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长，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群众自行宣布不承认中央指派的上海市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就是所谓自下而上的“夺权”，它与以前红卫兵“造反”的性质截然不同。“造反”只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炮打”，贴大字报、揪斗、围攻，但这些领导干部还是掌权的，经常是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之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发号施令，继续领导工作。而“夺权”则是群众直接罢免领导干部的官职，夺取领导干部手中的领导权。

1月4日的大会之后，上海市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幕后指挥下，1月8日上海造反派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接管了上海市的经济领导权；同时造反派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市公安局，还成立了“造反组织联络站”来取代上海市委。这样一来，上海整个实际权力就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控制的造反派手中，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被造反派夺取实权的地方。

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上海夺权的呢?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开会,但没有叫周恩来、康生以及代表林彪的叶群。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解放日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内部造反很好。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首先,毛泽东赞扬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夺权后,不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登载文章,而是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登载红卫兵的文章。毛泽东赞扬这种做法,认为红卫兵“自由办报”好。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自由办报”时间很短,等到王洪文等造反派掌握上海的实权之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成为造反派的喉舌报纸,不再是“自由办报”的报纸。

毛泽东又说:【《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也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5)

《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全名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这是“工总司”的工人与红卫兵共同起草的文章。该文主要说:“我们呼吁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呼吁在各地串联的上海工人，立即回上海，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工人搞文革最担心的就是：工人一旦搞起文革来，就会放弃生产，造成社会的巨大混乱。现在，上海的工人组织自觉地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主动提出在搞好文革的时候，不停止和中断生产，这样文革就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所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大为赞赏，让《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另外，毛泽东看到造反工人接管上海市委的权力之后，并没有出现重大混乱，也使他的信心大增，认为离开那些官僚干部，工人也是可以掌好权的，所以说“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王力回忆说：【1月8日晚毛主席召集陈伯达、江青等人开会，我晚到了一会儿。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宣布他的决定：中央各部要改组，首先从中宣部开始，改为宣传组。中宣部部长陶铸已经打倒了，现在中宣部改为中央宣传组，以王力为组长，代替陶铸的工作。我说：我不行，我只能当陈伯达的秘书。主席不高兴，说：“定了”。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

毛泽东在不通知周恩来、林彪的情况下，宣布改组“中宣部”为“宣传组”，第一是因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这两个人；第二是因为改组中宣部，并没有触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管辖范围，所以不必与他们商议。

1967年《元旦社论》刊登后，引起人们极大的震动，大家纷纷猜测“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明白，毛泽东又要来一个大动作了。这时候周恩来已经看破毛泽东的这句话谜底是“全面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得不暗暗叫苦。

1967年，对周恩来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周恩来多次对人说：“文革要让我少活10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伯曾经说过文革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

周恩来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周恩来从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造反以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毛泽东要“全面夺权”，周恩来就不得不进行“全面抵抗”。这种“全面抵抗”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首先要消耗自己的身体。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周恩来为了抵制文革，不得不豁出去自己少活10年，这就叫“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 (6)

为什么周恩来说“少活10年”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掌握着宣传工具的优势，他可以通过党的报纸杂志发出自己的声音，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自己的指示；而周恩来却没有报纸杂志，周恩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用最“笨”的办法，直接与红卫兵和造反派会谈，直接向他们传达自己的声音。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极多，为了会见这么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不睡觉，甚至70多个小时连续工作，七、八小时不吃饭也是常事。这样超高强度的工作，对人的身体健康损伤很大，所以周恩来说文革让他少活了10年。

周恩来夜以继日工作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很多部下被打倒了，这样很多事情就转到周恩来这里来处理。如果周恩来说自己忙不过来，要放一部分权出去，正好符合毛泽东夺权的意愿。所以，周恩来不愿把大权交出去，竭尽全力要保持掌权。可是自己掌权过多，就不得不以损害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所以周恩来为了

不让毛泽东的夺权成功，拼耗自己的健康少活 10 年。

1967 年 2 月 2 日，周恩来在长期工作后，突然感到身体异常，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应该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周恩来当即吩咐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并且自己依然带病工作。因为周恩来一旦宣布生病住院，正好成为别人夺他的权的借口。

不过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为他的健康担忧，次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大字报》说：【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这些人都是竭力支持周恩来的。周恩来则在《大字报》上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但事实上周恩来无法休息，只得拼着身体撑下去。

当然，毛泽东搞文革也损害了他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文革让毛泽东也少活了 5 年左右。因此，毛泽东搞文革也是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如果没有文革，刘少奇肯定会活得长些，没有文革林彪不会外逃，也肯定会活得长些。因此，文革中的四大风云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都因为文革而少活了 N 年，这就是革命的代价吧。

(7)

1967 年 1 月 6 日上海夺权之后，马上在全国引发起一场夺权的“一月风暴”。1 月 14 日，山西省夺权，1 月 22 日，山东省夺权，1 月 22 日，广东省夺权，1 月 25 日，贵州省夺权，1 月 26 日，江苏省夺权，1 月 31 日，黑龙江省夺权。

表面上看，似乎形势大好，事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来进行，但如果看一下这些夺权的实质，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仔细探究一下，就可以把夺权分为四种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江苏模式和黑龙江模式。

上海模式是毛泽东派系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不但夺了政治权，业务权也一起夺了下来，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最理想的。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承认上海的夺权，批准上海成立以张春桥为主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替上海市委管理上海。

广东模式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不严格的说，也可以说是周恩来派系的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广东省夺权后，保守派组织只是夺权政治权，不夺业务权，各种业务的领导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的人手里，群众组织只是成立一个监督小组，只有对业务的监督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手中。

因此，广东模式其实是一种“保护性夺权”，保守派抢先夺权，这样阻止了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动“让权”，把各种“官印”主动交给前来夺权的群众组织，避免了一场夺权的混乱。毛泽东当然看破了广东模式的夺权实质，他的对策就是对广东的夺权“不予承认”。尽管广东在1967年1月22日就夺了权，毛泽东迟迟不予承认，一直到一年后的1968年2月12日，才承认黄永胜(解放军上将)为主任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江苏模式是既不是毛泽东派，也不是周恩来派的，第三势力的独立群众组织夺了权。因为一般的书籍文章对江苏夺权的情况介绍不多，这里稍微多说明一下。

江苏夺权的核心人物是文凤来，男，南京大学政治系年轻教师。文革初期刘少奇统治的50天里，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文凤来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于是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文凤来就跑到北京去告状。当时

康生在北京正在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物色革命群众反对工作组的典型，最后康生选中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来北京告状的南京大学的文凤来。

当时正赶上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文凤来被康生安排登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很大的篇幅报导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其中还特别提到文凤来说：“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登上了天安门。”

(8)

这样一来，文凤来一下成为造反英雄。文凤来从北京凯旋归来后，迅速组织起南京大学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后来文凤来成为江苏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的头头。而江苏省委也组织一个保皇派群众组织“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与造反派抗衡。

1966 年 12 月 21 日，“红总”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书记们参加，这个要求遭到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拒绝后，数千名造反派列队前往省委前示威，而省委方面则动员了大批“赤卫队”赶到省委，与造反派形成对峙。之后，“红总”与“赤卫队”不断发生冲突。

1967 年 1 月 3 日，“红总”与“赤卫队”之间终于爆发大规模武斗，结果武斗持续了三天，造成三百多人受伤，不过好在没有人在这次武斗中死亡。这次武斗中，“红总”大获全胜，“赤卫队”被彻底打垮。这样一来，江苏省委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 月 6 日，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支持“红总”，要求江苏省委坚决制止“赤卫队”的肆无忌惮暴行，并威胁江苏省委说：“如果你们袖手旁观或者幕后操纵，一切后果都由你们负责。”

江苏省委上面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下面又受到造反派的压力，最后不

得不“投降”了，与“红总”签订了《九项问题协议》。《协议》把“赤卫队”说成是武斗事件的挑起者，同意解散赤卫队，并且承诺武斗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省、市委负全部责任。

江苏省委“投降”后，造反派势力日益扩大。1月10日，造反派先对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进行了夺权，1月26日，进而对江苏省委进行夺权。文凤来的“红总”为首的32人组成夺权委员会，他们把旧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叫到一个大会议室，把省委以及各厅局的大印都拿出来放在大会议室的桌上，这个时候文凤来代表造反派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江苏省的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派所有！这些公章全部作废！”

1月28日，“红总”控制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下设“生产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试图学习上海的造反经验，全面接管江苏省的权力。

但是，江苏1月26日的夺权，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承认，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68年，中央才批准江苏省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主任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这是为什么呢？

(9)

原来，南京的“红总”，并不是听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是完全独立的造反派。他们认为，除了江苏省委之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要打倒，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夺权。“红总”喊出：“打倒许世友！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等激烈口号，受到冲击的许世友，躲到大别山的疗养院，于是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本来1月3日的时候，中央文革还是支持“红总”的，

可是当“红总”执意要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中央文革就不支持他们了，因为许世友是毛泽东一定要“保”的几个心腹将领之一。

另外，1月26日夺权的当天，周恩来就打来电话，含蓄地劝阻说：“中央不会对这次夺权给与支持，希望‘红总’方面不要在报纸上宣布夺权的消息。”但“红总”开会讨论周恩来的意见时，文风来说：“权已被我们夺过来了，准备明天见报，就不通过中央了，大家看看有甚么意见？”参加会议的众人高呼：“同意！”，鼓掌通过了这个决定。

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之前，周恩来再次打来电话，希望“红总”在大会上只宣布夺权，不要谈成立组织，并说：“我们准备邀请你们所有左派的代表人物，来北京商谈有关新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然而“红总”再次不听周恩来的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自行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以及“生产委员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等，这就使得周恩来也无法控制他们。

“红总”既不听毛泽东的话，也不停周恩来的话，于是在一个多月后的3月5日，中央宣布江苏实施“军管”，这样一来，江苏造反派的“夺权”就完全失败了。

最后介绍一下黑龙江模式，即所谓的“三结合夺权”。黑龙江的造反派组织，黑龙江省委内部的“左派”，以及驻扎黑龙江的军队，三方面共同协商，形成一个“三结合小组”，共同夺取权力。用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毛泽东代表造反派，周恩来代表省委，林彪代表军方。那么，“三结合夺权”就是代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三个人分享权力。

在上述四种夺权模式中，毛泽东理想中的是上海模式，不愿意看到的是广州

模式和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不太理想，但也可以接受。周恩来则希望看到广州模式，不愿看到上海模式，也不愿看到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周恩来也能接受。

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但他也不是号召随心所欲地乱造反，毛泽东对造反有四点基本的要求：第一，造反派不仅夺取了政治的虚权，同时也夺到了业务的实权，是真正的夺权；第二，造反派能够听从中央文革的指挥，是毛泽东可以控制的群众组织；第三，造反派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击败其他群众组织的反夺权，保持掌权地位；第四，造反派掌权后，能够“抓生产”，保持城市的物质生活基本稳定，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保持安定。

(10)

广东模式的夺权，只是夺取政治的虚权，放弃业务的实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还是掌握在旧政府班子手中，无法实现彻底打倒旧政府的目的。因此，毛泽东不支持广东模式的夺权。而江苏模式的夺权，造反派不听毛泽东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也不支持。只是在上海的夺权中，王洪文领导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真正达到了毛泽东对夺权的四点要求。

第一，王洪文率领的造反派同时夺到了政治权和业务权；第二，王洪文听从毛泽东的指挥；第三，上海的其他造反派向王洪文发起“反夺权”时，都被王洪文的造反派击溃了，王洪文对其他造反派保持绝对的优势；第四，也是最难得的，是王洪文他们在夺权之后，并没有只搞革命，放弃生产，而是努力抓生产，保持了上海的正常生产。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时代，上海的生产是搞得最好的，的确实现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想。

因为上海的造反派实现了毛泽东“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愿望，这些主要是王洪文的功劳，所以后来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接班，也是出于这个理由。

在上海模式中，造反派不仅夺了权，而且生产也搞得好，这样一般上海市民对造反派就比较支持，造反派也比较得人心。如果中国各地的夺权都能实现上海的模式，那么毛泽东理想中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文革也就搞成了。

但是事情偏偏不让毛泽东如愿，在各省市夺权中，除了山西省、山东省和贵州省的夺权，比较接近于上海模式以外，其他各省远远达不到上海模式的标准。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各个地方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各个派之间相互争夺权力，最后发展到大打出手，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天下大乱”变成“天下更乱”，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完全失败了，成为一场夺权混战。

当然在 1967 年 1 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上海的成功夺权使他信心大增，在这个月接二连三地发出“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1 月 12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在这个贺电中，“中央文革小组”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成为新一极的权力中心。

本来，国务院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现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也就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江青，与周恩来和林彪有了平级的地位。这个贺电原本是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只是在贺电发出前，毛泽东亲自指示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据当时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

(11)

【1 月 10 日毛主席批示，要文革小组代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致上海各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这件事后来我问毛主席，我说：“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并列，合

适吗?文革小组是政治局的参谋秘书机构,怎么成了权力机构?”毛主席笑而不答,说:“就是要这样好。”】

1月16日,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时毛泽东还沉浸在上海夺权成功的兴奋之中,他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1月上旬发展到一百万人,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左派力量小时,夺过去的权很快又被夺走。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有人压不了造反就破坏生产,然后归罪于革命。生产要由群众自己来搞,不要走资派指手画脚,以生产压革命。有人企图撒手不管,他们不管,工人自己管,一定比他们管得更好。要由工人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责任担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自己掌握。】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是一篇毛泽东夺权思想的核心文章,文章总结上海经验说:【把上海的经验集中一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政治、经济、文教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的斗争。】

这篇文章,明确点明了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文革的中心任务是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第二、夺权的方式是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文教大权。关于毛泽东的夺权思想,起草这篇评论员文章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

【这篇评论员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和“财

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关于党权，毛主席说：就是要夺他们的党权，他们欺骗、蒙蔽、压制党员干部，使党员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拿手的就是用纪律压人，谁不听他们就是反党，就是违背纪律。这个纪律成为他们的束缚干部党员的紧箍咒。】

【关于政权，毛主席说：掌握在走资派手里的部分政权也要夺，因为他不是镇压反革命，而是镇压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触犯了个别人的利益，革命革到他们头上，要革命的人被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成了规律。他们可以随便开除、监禁、戴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保卫自己的乌纱帽、地位和利益。】

(12)

【关于财权，毛主席说：财权也要夺，中心是反对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采取经济收买手段，适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引导人们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这种经济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把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全面夺权，周恩来和林彪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林彪的策略是：保住军队这个阵地，其他的不管。据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我们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

周恩来的策略，则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顺势引导”，不是阻挡毛泽东的夺权，而是把夺权引导到周恩来希望的方向上去。在周恩来看来，广东模式是一个

不错的例子，因为广东模式不是党权、政权、财权一起夺的全面夺权，而只夺地方党委的党权，对政权和财权不夺权，只是进行监督，这样就可以把毛泽东发起的轰轰烈烈夺权运动，化解为白干一场的无用功。

周恩来号召各地的造反派的夺权，效仿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但周恩来没有自己的宣传工具，所以他只能直接向造反派们宣讲自己的主张。1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条件不成熟的单位，暂时不能夺权。夺权，一般是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斥，要保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的畅通。否则，你们就会走向反面。】

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对当权派要区别对待，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

周恩来的这些关于夺权的话，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夺权精神的。尽管周恩来不能直接用宣传工具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周恩来靠着不辞辛苦的各处游说，居然使他的主张得到了相当的认可，使毛泽东的上海模式推广不开，而周恩来的广东模式倒是颇有市场。到后来，大部分省份的夺权都采用了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这除了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造反组织一般都是松散的群众组合，难以有效地管理好业务工作。上海的造反派之所以能管好业务，一来是上海的工人素质较高，二来也是王洪文的确有些水平。

(13)

为了更好地理解夺权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当时中共的权力分布。第一层权

力的领导人，是政治局常委。虽说当时政治局常委有七人，后来又增补为十一人，但真正有权势是三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少奇下台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这第一个层权力的三个人，不但地位最高，而且待遇也不一样，特别突出的是有专机和专列。特别是专列，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因为专列开出来，其他火车都要为它让路，整个铁路系统就打乱了，因此专列的数量只能非常有限。

第二层权力的领导人，是掌握实权的领导人，他们分布在党、政府、军队三个方面。

党务系统中的第二层权力部门是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是总书记，下面有书记12人：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康生、陆定一、罗瑞卿、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其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三人在1966年初就被打倒，后来邓小平在1966年8月也靠边站了，由陶铸接任书记处常务书记。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后，中央书记处名存实亡，由中央文革小组接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政府系统中具有第二层权力的领导人是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有副总理15人：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

不过林彪的情况有些特殊。文革前，林彪在政府中的任职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地位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下。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把手，党内的地位在周恩来之上了，可是在政府系统中，林彪并没有接替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他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就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党系统中，林彪排名在周恩来之上；在政府系统中，林彪又排名在周恩来之下，显然是

“名不正，言不顺”。林彪只有当国家主席，才能在政府系统中排名在周恩来之上，才能“名正言顺”。所以，后来林彪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跟毛泽东发生了重大争执。

1967年1月的时候，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被打倒了，陈云、邓小平、贺龙、乌兰夫靠边站了，只是剩下6位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谢富治。其中陈毅主管外事口，李富春主管工交口，李先念主管财政口，谭震林主管农林口，聂荣臻主管科学口，谢富治主管政法口。从行政区域划分，陈毅主管西北各省，李富春主管东北各省，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谭震林主管华东各省，聂荣臻主管西南各省，谢富治主管华北各省。【待续】

(14)

政府系统中的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国务院下属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他们由上述6位副总理主管。比如谭震林主管农林口，农业部、林业部等与农林有关部委的部长，由谭震林主管，同时华东各省的省长，也由谭震林主管。

军队系统中第二层权力领导人，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各大军区司令，空军、海军司令。

我们在分析了中共的权力分配体系之后，可以明白毛泽东要夺权的具体目标，就是夺权“党、政、军”的前三层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只要把这些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夺到手，毛泽东想要搞的“夺权风暴”就胜利成功了。

在党务方面的夺权，因为以前是刘少奇主管党务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之后，党务部门的权力基本上被毛泽东夺了过来，所以毛泽东发起这次“夺权风暴”的目标，是夺取政府和军队的各

实权部门的领导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就是打倒仍然管事的6个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在军队方面夺权，就是打倒军委秘书长，以及“三总部”的领导人，各大军区的司令。但并不是上述所有的人都要打倒，比如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是毛泽东派的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打倒他们。

在军队方面的夺权，毛泽东最初是从军事重要程度相对最小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但这也遭到林彪的强烈抵制，甚至与江青大吵一场，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停止军队方面的夺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主要是夺取国务院下属各个部(外交部、财政部等)的领导权，以及地方各省的领导权，重点是打倒除了谢富治之外的五位副总理。在政府方面夺权的第一步，是由红卫兵和造反派先揪斗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为打倒他们做好舆论准备。

周恩来因为对各个省鞭长莫及，他首先能保护的，是在北京的国务院各个部位的部长。周恩来把各部的部长，接到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暂住，让他们在这里“写检讨”，其实是保护他们。这样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不到要揪斗的当权派，于是就要到中南海里去揪人。

(15)

1967年1月初，已经有四、五千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在中南海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刷写大标语，要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并且在中南海外设置了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边缘处，离外面的马路只有一墙之隔，墙外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吵得周恩来难于正常休息和工作。有人劝周恩来暂时离开中南海，住到人民大会堂去，那时毛泽东已经住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却说：

“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周恩来知道，只要他一搬出中南海，红卫兵和造反派很快就会冲进来抓人，这时他必须留在这里，保护和保卫在这里避难的老战友。

包围中南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有些人开始突破警卫线，甚至翻墙入院，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月8日深夜，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农大的一批造反学生已经冲进了中南海西门，要抓谭震林。谭震林住在中南海西门内几十米的地方，学生们是知情的，如果把谭震林揪走，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总理中止了会议，乘车到中南海西门，总理跳下汽车，先是让学生们退出中南海。但学生们乱吵乱闹，根本不听，只是拼命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当时天气冷极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已冻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给总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说服学生，由他们选出代表到屋子里谈判，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达成协议，学生们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请谭震林到会。总理就这样把学生们都引到了人民大会堂，谭震林也去了。总理和谭震林坐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大会，实际上是陪着谭震林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才给中南海解了围，保住了谭震林同志。】

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夺权风暴之后，就在1967年1月的一个月里，接连发生了四起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

红彦死亡;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亡;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亡。

(16)

从1966年8月红卫兵造反以来,已经发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但是在1967年以前的死者,一般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或者作家老舍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部省级的“红色”高官的死亡还没有发生过。所以,在1967年以前,高官们尽管对毛泽东的文革表示“不理解”,但还没有出现强烈的抵制。

可是1967年1月四名部省级高官的非正常死亡,使老干部们感到现在他们遇到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当官“罢官”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生死”问题。这样一来,老干部们对文革的态度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也是1967年2月发生高官们集体抵制文革的“二月逆流”事件的思想背景。

人一旦遇到生死问题,先要求救。中共党内的三棵大树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求救吧,正是毛泽东要打倒他们的,所以向毛泽东求救是不行的;向林彪求救吧,林彪是除了保护军队干部之外,对地方干部的死活一概不管,用林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

毛泽东和林彪不管,剩下就只有向周恩来求救了。后来,人们把周恩来形容为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参天大树”,这个形容的确很到位。周恩来在文革中所作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抢救老干部,因此很多老干部事后对周恩来都抱有感激涕零的心情。

为什么周恩来要救老干部呢?这与周恩来和毛泽东对“党”的看法分歧有关。对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周恩来在原则也是同意的。周恩来也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有

必要采取某些措施来防止中国“变修”，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老干部已经完全烂了。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办法是，用暴风骤雨的革命方式，彻底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才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而周恩来认为，老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是个别干部烂了。因此，周恩来提出的“反修防修”办法是，用和风细雨的批评教育方式，或者用过去的整风方式，就能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要打倒老干部，而按照周恩来的思路要保护老干部，这就是他们两人在文革中的最基本冲突。

在 1966 年 10 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习惯了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被别人指着鼻子骂，就坐不住了。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毛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17)

周恩来在这里说明了他对文革这场革命的解释，他认为搞文革主要是对高官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而不是对高官进行罢官。因此周恩来说，文革不是“革”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革”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到 1967 年 1 月之后，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现在夺权的苗头，不仅是威胁到高官们的政治生命，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肉体生命，周恩来觉得自己不能不管了。1 月 22 日张霖之被造反派打死之后，周恩来自责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那时老干部们把周恩来当作保护他们的参天大树，所以周恩来感到没有保护好张霖之，是自己的失职。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接见造反派大会上提到张霖之的死，他说：【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被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啊！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

周恩来这些话，一半是对造反派说的，另一半也是对毛泽东说的，因为周恩来知道他的所有公开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的那里。周恩来说的“可以把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提出的质问和抗议，非常强烈的质问和抗议。

虽说毛泽东要打倒老干部，但他的本意只是在政治上打倒，并非在肉体上消灭这些老干部。毛泽东的设想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老干部们进行非暴力的批斗，然后夺权。被夺权后的老干部们“靠边站”，保证一定的生活待遇，比如工资不变等等，这样可以使老干部们的反抗降为最小。因为毛泽东也明白，如果要革别人的命，别人就会拼命，狗急了还要跳墙，人一旦拼命反抗起来，那反抗的阻力就大了。

毛泽东是反对打死人的，因为这样对文革不但没有利，反而是有害的，后来文革最被人们诟病的事情，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人。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打死人的事件，可是他也控制不住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旦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了人，造成既成事实，毛泽东就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得罪老干部越来越多，只有“硬着头皮顶住”。

中国的古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搞文革最初的成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在文革中的失败，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

东的故事，又验证了这句古话所反映的哲理。

(18)

1967年2月中旬发生的高层干部集体抵抗文革的“二月逆流”，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谈到“二月逆流”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引发这场“逆流”的背景。这里先回顾一下1967年1月以来发生的大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联合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吹响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号角，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从此开始，真正的天下大乱也是从此开始。

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同一天，陈伯达和江青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因为陶铸是当时中央排名第四位大人物，所以打倒陶铸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动。其实陶铸并不是在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就靠边站了。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群众中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发生在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在1966年12月中央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毛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在1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判陶铸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追认了陈伯达和江青在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可是到2月10日，毛泽东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政治局会

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就公开宣布打倒陶铸。毛泽东说陈伯达：

【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毛泽东又说江青：【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评，成为直接引发“二月逆流”的导火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详细说明。

(19)

1月6日，上海夺权成功，这是文革中唯一符合毛泽东意愿的夺权样板。

1月11日，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1月13日，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这次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同一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解放军报》报社贴出大字报，夺了《解放军报》的权。也是在同一天，中央发布了《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是上海夺权之后，毛泽东匆匆要求中央紧急发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因为毛泽东知道，一旦“夺权”这个口子放开了，什么人都可以起来夺权。如果左派也可以夺权，右派也可以夺权，甚至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也可以起来夺权，那么就真的天下大乱了。所以，毛泽东要对“夺权”加一些限制，鼓励左派夺权，制止右派夺权。但这样的限制又不能太多，太多了群众就会被束缚住，不敢起来夺权了。因此，《公安六条》是一个对“夺权”进行最低限度限制的文件，一方面它试图保障造反的群众不受公安机关的镇压，另一方又试图利用公安机关帮助左派夺权。

《公安六条》有两条是关键，第一个关键是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有人说这一条是毛泽东专门为了保护自己制定的条款，这是完全误解毛泽东了。如果毛泽东真的害怕有人攻击他，那么他就不会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了。其实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条款，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另有所图。

以前中共发出的公安机关文件中，都有禁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谁要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是反革命，公安机关就要予以镇压。可是在《公安六条》中，破天荒地删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是无罪的，仅仅除了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言论之外，什么言论都无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条款，是因为他号召的“夺权”，就是向各地的党委夺权。而向党委夺权，这是赤裸裸的“反党”行为。如果反党有罪的话，那么向党委夺权，就是有罪了，谁还敢向党委夺权呢？“反社会主义”更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很容易给人扣上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帽子。1957年反右的时候，右派们被扣的帽子就是因为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不是因为反毛泽东的言论。

(20)

这次毛泽东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防止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用“反动言论”的大帽子来压制群众。现在毛泽东把“反动言论”压缩到最小范围，只要不攻击泽东和林彪的言论，都不是反动言论。《公安六条》的第二条，其实是限制了公安机关的抓人理由，鼓励造反群众敢于说话，敢于夺权。

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条把他和林彪并列起来，反林彪就是反革命，使得形成林彪的尾大不掉之势，连毛泽东本人想要反对林彪也很困难了。

《公安六条》的第二个关键是第三条：【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

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办。】

这个条款的本意，毛泽东是希望保证造反派，也就是“左派”能够夺到权，同时制止保守派也来夺权。《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保护左派群众组织，对袭击左派的右派组织，要依法“查办”。可是这个条款的模糊程度很大，谁是左派？左派的定义是什么？谁也无法具体说清楚。这样很多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不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定义为右派组织，顺理成章地利用《公安六条》对这些群众组织“依法查办”。

这样一来，就使毛泽东本意想要保护的左派造反组织，反而被镇压；而毛泽东想要镇压的右派保守组织，反而被保护，这就使《公安六条》走向了毛泽东所希望的反面。事实上，《公安六条》更多地被保守派当作打击造反派的工具，所以《公安六条》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大败笔。

1月16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

周恩来说：【夺权有五种形式。当权派的干部：第一种是黑帮，第二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四种是有严重错误，第五种是有个别一般性的错误，第五种人数较多。】

周恩来这么细致地把当权派分为五种，是试图把毛泽东的夺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把大部分干部划分为“一般性的错误”，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倒他们的口实。因为周恩来的划分很有道理，毛泽东当时也找不出理由反驳，只好同意了周恩来的说法。

(21)

不过很快毛泽东发现周恩来的干部五种划分，实际上成为保护老干部的口实，

成为夺权的障碍，于是毛泽东在1月27日发出指示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属于这两种的干部，能不能夺权？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了权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权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打破了周恩来用区别干部性质来减缓夺权的企图，使夺权运动进一步加剧。

1月19日，叶剑英等人大闹京西宾馆，军队老干部们抵制在军队里夺权。

1月20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毛泽东不得不暂停在军队中搞夺权。

1月21日，毛泽东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的批示，是要求林彪主持的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不能再持中立态度“不介入”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其实是逼林彪站出来“支持左派”，也就是“支左”，支持他搞文革。

1月23日，林彪接受毛泽东的“支左”要求，发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支左决定》主要有四条：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防空洞。】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发出军队“支左”的决定。但林彪却在发出这

个命令之后，就又不管了。谁是“革命左派”，谁是“反对左派的反革命组织”，林彪一概不做具体的指示。林彪的撒手不管，就使支左的军队干部们，只好自己去判断谁是“革命左派”。军队干部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意支持乱冲乱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倾向于比较温和的保守派群众组织。这样一来，支左干部们就根据自己的判断，保守的群众组织划分为“革命左派”，支持起保守派来。

毛泽东希望军队出来“支左”的本意，是希望军队出面支持“造反的左派”，而事实上大部分军队干部没有“支左”，反而支持了“保守的右派”，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他在半年后的1967年8月，不得不叹息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

毛泽东为了配套这场全国全面的夺权运动，发出了两个大动作《公安六条》和《支左决定》。但这两个动作，都走向了毛泽东预想的反面，不但没有起到帮助夺权的作用，反而起了阻碍夺权的作用，这可以说又是毛泽东的两个大败笔。

“二月逆流”就是老干部们看到毛泽东的这两个大败笔之后，发起的一次抵制文革的高潮。

(22)

自从毛泽东1935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党内斗争、党外战争、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革命，但每次革命都是革别人的命。可是到了1967年2月，毛泽东身不由己地感到，这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立志掀起一场大革命，不惜与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也要阻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奋斗了一年，经过很多挫折，终于在1966年8月打倒了刘少奇，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文革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可是毛泽东也明白，文革的决战还没有开始，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等

于决战的胜利，1967年1月，毛泽东终于发起了文革的决战，向几乎所有的当权派老干部进行夺权。

这场文革决战，在第一个月势头还比较好，特别是上海的夺权，搞得很成功。但当决战进入第二个月，也就是1967年2月的时候，毛泽东发起的夺权战役的进攻势头，骤然减缓下来，毛泽东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第一个原因是红卫兵与造反派，并没有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听话，只是一味地乱冲乱打，使夺权战役变成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毛泽东越来越失去对这场战役的控制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周恩来采用的“顺势引导”战术很难对付。毛泽东发起一股革命洪流要淹没周恩来的地盘，周恩来并没有筑一道堤坝来挡住毛泽东的洪水，而是巧妙地修一条渠，把毛泽东的洪水回灌到毛泽东自己的地盘里去，搞得毛泽东非常棘手。毛泽东发起的革命洪流，却反过来淹了自己的地，自己发起的革命，却反过来革到自己头上，这是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遇到如此被动的境地。

第三个原因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完全靠听汇报，掌握不到第一手的真实情况。在建国以前，毛泽东一直是自己在第一线亲自指挥，了解第一手的真实情况，掌握时局的最新动向，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建国以后，毛泽东一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二来也是有点骄傲起来，他不再亲临一线亲自指挥了，而在二线听别人的汇报，间接地指挥。

文革以后，毛泽东的主要情报来自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但江青等人为了夸大自己的功绩，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把文革的形势说得很好，从而导致毛泽东做出很多不符合形势发展的错误决定。相反，周恩来始终在第一线亲自指挥，

能够及时了解真正的时局发展形势，所以周恩来做出的错误决定较少。高手相争，往往是犯错误少的一方取胜。毛泽东的很多误判，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糊涂，而是被错误的情报引入歧途。

最让毛泽东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军队的背离。毛泽东在1935年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不胜原因的背后，是军队始终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59年打倒彭德怀的时候，1966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军队都绝对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对于毛泽东来说，军队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到非常关键的时刻，是不会轻易动用的。毛泽东在过去的多次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没有动用过军队。

(23)

可是到了1967年，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了。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毛泽东首次动用军队来介入政治斗争。毛泽东本以为军队依旧是绝对站在他这一边，以为军队这张王牌打出去，马上就会扭转局面。

可是结果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派出去“支左”的干部，大部分人并没有怀着保卫毛泽东的忠诚，去支持毛泽东的左派造反派，反而去支持毛泽东对立面的右派保守派。毛泽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这也就是说，军内支持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毛泽东在军内的支持率，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只有四分之一的支持率，这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水平。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失败的问题，做出最坏的打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等

人时，做了一次朋友式的谈话，毛泽东比较详细地讲了一些自己的心事和心情。毛泽东喜欢跟外国人谈自己的心事，是因为在七亿中国人当中，毛泽东已经没有朋友了，中国人全都是毛泽东的部下。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泽东开口就是指示，他自己也不敢随便讲话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把外国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来谈谈心事。

毛泽东在2月3日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对理解毛泽东的心事十分重要，这里多摘录一些。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见。

毛泽东先说：【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

这里毛泽东承认中国的天下大乱，是自己没有搞好。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自嘲说自己“不大行”。

毛泽东接着说：【去年五月我就讲，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谈到“失败”问题，他不仅预感到文革有可能失败，而且还把失败优先考虑，让自己不要轻敌。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自己很有可能失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即使是在井冈山那么艰险的环境，毛泽东还写了《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可是这次，毛泽东第一次失去了必胜的信心。

(24)

毛泽东又说：【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吗？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讲，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什么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毛泽东谦虚地说，自己也是人，自己也会犯错误，这同时也是对林彪吹捧他“天才论”和“一句顶一万句”的否定。

毛泽东继续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我保留一个 Teacher(教员)，我就是个小学教员嘛，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 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

毛泽东这里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评，特别指出“不高兴”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这其实是对林彪间接地表示不满。毛泽东知道，他这次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他就是想让林彪知道，他对林彪不满意。的确，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支持率降到这么低，与林彪没有全力支持他，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转个话题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1962 年 1 月，我们召开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

专政的。”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他搞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以前也多次说过，他认为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专政”，这是搞文革的必要性。毛泽东同时认为，只有用文革这种方式，才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毛泽东试图发动群众来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观点是精英政治，认为平头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参政的。

卡博吹捧毛泽东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吹捧，说：【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巨大的胜利，但现在还不能断定。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个。】

卡博和巴卢库说：【不搞斗争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说：【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两个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

(25)

毛泽东这里说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中国人的性格是爱斗争，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不相信选举，这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思想根源，说明他为什么要用文革的方式，而不是用选举的方式来揭发中国的黑暗面。

毛泽东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嘛，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毛泽东这段话，先说“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结果，1967年2月到4月的这三个月，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到失败的话题，说他已经做好了被打败的准备，并认为打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他被打败，将来也会有人接过来继续战斗的。

毛泽东这次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多次谈到失败的话题，有一些悲观的气氛。但这种悲观，相反是表示毛泽东的一种决心。一个人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会成功，他去做这件事没什么稀奇；可是一个人在知道这件事自己很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坚决去做这件事，这就叫“豁出去了”，不成功便成仁。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多次谈到失败，也是表示自己豁出去了，即使是失败，也要把文革搞下去。

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是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毛泽东这段话，说明他搞革命依靠的力量，不是什么有声望的大人物，而是

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也就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依靠群众是毛泽东一贯主张，他从来不相信什么大人物，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主要依靠对象，都是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他认为小人物终究会战胜大人物。

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并不低于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做事过于谨慎，有点像诸葛亮的性格，不敢轻易“豁出去”，这样一来，周恩来在毛泽东豁出去的时候，往往就会退让，这也是周恩来被人们说“软弱”的原因。毛泽东当然深知周恩来的性格，他这次对外国朋友讲话的时候，周恩来也在场，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时也是讲给周恩来听的，他要告诉周恩来：“我已经豁出了”，这就在心理上给周恩来一个压力。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就在他这次讲话之后的两个星期，就出现党内高官集体反对毛泽东的“二月逆流”。按照一般的情况，如果党内的高官联合起来反对领导人，那么领导人是非下台不可的。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遭到党内高官的集体反对而被迫下台的。因此，“二月逆流”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严峻考验。

(26)

中共是一个按照苏联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模式，也叫领袖独裁制，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领导人有独裁一切的大权；第二是领导人终身任职，但不能世袭；第三是继任领导人由政治局推选产生，而不是由前任领导人指定。苏共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七位领导人，都没有指定过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基本上继承了苏共体制，但在继任领导人方面做出了修改，毛泽东指定自己的继任接班人，这点与苏共不一样。

苏共除了上述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例外规定，就是政治局有罢免最高领

导人的权力。如果政治局的多数赞成罢免最高领导人，就可以罢免在任的领导人，重新推举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被罢免的。

中共也沿用了苏共的例外规定，政治局会议可以罢免最高领导人。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陈独秀，1935年“遵义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博古(秦邦宪)，都是沿用这个例外规定。毛泽东本人也是这个例外规定的受益者，他在罢免了博古之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另外，1980年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被迫辞职，也属于这个例外规定。

这个罢免领导人的例外规定，对苏共或中共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遭到罢免。因此中共领导人要想坐住一把手的位置，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政治局中的支持占据多数，(二)军方的支持。这两个必要条件一旦失去，领导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毛泽东几十年来稳坐中共一把手，也是因为他始终掌握着这两个必要条件。可是到1967年2月，毛泽东失去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他在政治局里的支持已成为少数，在军队中的支持也成为少数，按照常理来说，毛泽东的一把手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因此毛泽东遭遇到高官们集体反对他的“二月逆流”，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稍微处理不好，就要向赫鲁晓夫那样被罢免下台了。

1967年2月，各方面的形势对毛泽东都不太有利，他遇到四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来自林彪军队系统的抵制；第二个危机是来自周恩来政府系统的抵制，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打击，第四个危机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出现内讧。

毛泽东遇到的第一个危机是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抵制。毛泽东要求军队出来“支左”，林彪也提出一个“反要求”：现在军队太乱，必须稳定军队。1967年1月26日，林彪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口述起草了一个文件《军委八条》。据

徐向前回忆说,《军委八条》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林彪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27)

《军委八条》的主要内容是:(一)坚决支持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不准抓人,不准抄家,不准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三)军队系统的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出去串联,已经串联的要迅速回来;(四)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委八条》中的内容,除了第一条,其他都是阻止在军队里搞文革的,如果真的按照《军委八条》认真实施下去,军队中的文革就要偃旗息鼓了。因此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后,林彪高兴地喊出“万万岁!”。当然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赞成林彪搞的《军委八条》。但为了让林彪和军队出来“支左”,毛泽东不得已做出暂时的让步。

尽管毛泽东在《军委八条》上做出了让步,军队高官们还是不太满意。1967年2月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叶剑英说:【《军委八条》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他们把“不成立战斗队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队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

为了进一步稳定军队,叶剑英和聂荣臻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七项规定》。《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军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二)军事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三)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革命战斗队组织。

2月10日,毛泽东同意了《七项规定》,叶剑英高兴地说:“本来《军委八

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一个《七条规定》，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毛泽东遇到的第二个危机是周恩来为首政府高官的抵制。周恩来的抵制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行动上的抵制，第二方面是理论上的抵制。1967年2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自2月8日起停止大串联(包括步行大串联)，来北京的红卫兵的食宿不再免费，学生一律回学校搞革命。当时的火车票和住宿费，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很昂贵的，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到北京来串联，一来是因为免费乘车，二来是因为免费吃住。现在国务院停止了免费乘车和免费吃住，大串联活动也就自然偃旗息鼓了。

大串联活动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北京与各地方之间迅速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现在有了互联网和手机，某处发生的事情，马上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传遍全国。而当时中国的通讯还不发达，互联网手机之类的东西当然是没有的，电报和长途电话都非常昂贵，一般人用不起，邮递信件很慢，而且文字资料缺乏生动感。当时最快和最生动地传递信息的办法，就是直接靠人员进行串联。

(28)

串联的第一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把各地搞文革的真实情况传达到北京，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了解掌握各地文革的真实情况的重要渠道。因为地方政府上报的文件材料，往往会隐瞒很多真实的情况。串联的第二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之后，在各地讲述北京搞文革的最新形势和动向，刺激和推动各地的文革发展。停止了串联，对文革来说，显然是失去了一个利器。

周恩来在行动上抵制文革的同时，还在理论上巧妙地反驳或有意误导毛泽东的文革理论。1967年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夺权斗争》，它是一篇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写的非常重要的文章，阐述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核心观点。该文说：【党内走资派盘踞的一些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不能采用改良主义，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

毛泽东这里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刘少奇盘踞的文化部门，如中宣部、文化部等早就被打倒的了，所以这里说的“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显然是指周恩来盘踞的政府部门；

第二，对这些被走资派盘踞单位的处理，“不能改良，必须彻底打倒。”也就是说，这些单位的机构和领导人，不存在改组余地，必须彻底打倒；

第三，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当时“敌我矛盾”是非常重的话，一旦定性为“敌我矛盾”，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毛泽东把文革的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这就是说，他号召人们把当权派的老干部们当成敌人来对待。

周恩来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只能在接见各种群众组织时，巧妙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比如周恩来说：【夺权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里没有说，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要在脑子里夺“私”字的权。】

周恩来把毛泽东要搞的夺权，解释为“对自己思想中‘私’字进行夺权”，这显然有意误导毛泽东的夺权理论。

周恩来又说：【现在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

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

(29)

毛泽东提出要把走资派盘踞的部门“彻底打碎”，周恩来却指出“彻底打碎”式的夺权是“发生了偏差”。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夺权理论，他指出造反派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不能夺。周恩来的夺权理论其实不是夺权，而只是一种改良，否定了毛泽东“彻底打碎”的观点。

周恩来出于敏感的身份，不能说太过火的话，而叶剑英则把周恩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接说了出来。2月6日，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但在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被他们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者其它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几乎是明着跟毛泽东唱反调，他说“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完全不同”，这里的“某些人”，指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红旗》社论中亮出自己的观点：“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叶剑英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观点，这等于就是否认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意义。因为叶剑英的这些话，代表了一大批军队干部的想法，毛泽东批叶剑英的话，就要得罪一大批军队干部。现在毛泽东处于危机四起的时候，还不能直接触动军队，所以他对叶剑英的讲话没有做出反应。

周恩来看到林彪迫使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之后，受到鼓舞，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旨在抵制文革的建议。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提议说：【今后每星期一、三、五，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今后每星期二、四、六，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主，副总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讨论党政业务问题。】

当时中央有两套班子，一个是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负责文革的问题；另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负责一般党政业务。现在周恩来提出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用一半的时间搞文革，另一半的时间帮助国务院搞党政业务，这样就大幅度地分散了文革小组搞文革的精力。毛泽东要全力以赴搞文革，周恩来却要把搞文革的时间减少一半，对文革大泼冷水。2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建议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毛泽东对周恩来没有退让，把这个建议顶了回去。

(30)

1967年2月毛泽东遭遇的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的打击。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军队干部会听从他的指示，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但这次军队干部并没有听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相反地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因为在前一段的造反风暴中，各大军区和部门都遭到激进造反派的冲击，连国防部都遭到了冲击，所以军队高官自然不喜欢激进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喜欢温和听话的保守派群众组织。

由于林彪为首的中央军委并没有向各军区下达“谁是左派”的指示，而是让

各军区自己去判定哪个群众组织是左派。各军区领导就趁着这个机会，把保守派说成是“左派”，借着“支左”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支持保守派。同时，他们把造反派打成右派反革命组织，借着《军委八条》中“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的条款，直接抓造反派的头头，大大打击了造反派。

以四川为例，成都的群众组织分为两派：造反派称“工人造反兵团”，保守派称“产业军”。成都军区支持“产业军”，不承认“工人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就激怒了“工人造反兵团”，他们到成都军区去抗议示威，然后发展到冲击成都军区。于是成都军区的“支左”领导小组，根据《军委八条》的精神，派出军队直接镇压“工人造反兵团”，抓了上万人，不过很快就释放了。“工人造反兵团”受到镇压不服气，向北京告状，于是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指示》，作出了与成都军区相反的结论，承认“工人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承认“产业军”是革命群众组织。

尽管中央文革代表毛泽东的声音，但成都军区并不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照样支持“产业军”，这样就使成都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更加激烈。后来发生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基本情况也是一样，中央文革支持武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而湖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中央文革和毛泽东都要求湖北省军区改变立场，转而支持造反“工人总部”，但湖北省军区不但不服从毛泽东命令，甚至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抓了起来，造成轰动一时的“七二零”事件。

1967年2月毛泽东遇到的第四个危机，是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文革小组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是陈伯达派，有王力、关峰、戚本禹，他们原先都是毛泽东的秘书；第二派是江青派，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江青自己从上海发展起

来的人;第三派是陶铸派,成员是王任重。康生相对独立,没有加入任何派系。

(31)

在1966年7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想重用陶铸,让陶铸任文革小组顾问,并让陶铸的亲信王任重担任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自持自己在党内地位高于陈伯达和江青,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傲慢,而且还试图亲自领导文革小组,这使得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都一致反对陶铸派,想把陶铸派排挤出文革小组,从而形成了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

毛泽东对陶铸失望以后,批评了陶铸,让陶铸靠边站了,但还没有打倒陶铸。江青和陈伯达都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没有打倒陶铸,只是把陶铸冷藏起来,这就说不定哪天又会启用陶铸。被毛泽东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启用的干部也为数不少。因此,江青和陈伯达把陶铸视为威胁到他们掌控文革小组的隐患,所以他们想尽早除掉这个隐患。

1967年1月4日,在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突然公开宣布打倒陶铸。这样一来就把“打倒陶铸”的生米煮成熟饭,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打倒陶铸。陈伯达在讲话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他是文化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

江青插话说:【他独断专行!】

陈伯达接着说:【陶铸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自从陶铸接管了新华社,他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

听到这里群众大笑。陈伯达继续说：【陶铸这么凑，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硬凑在一起，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性质？】

群众说：【反党！】

陈伯达接着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群众觉悟得很快，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马上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数千红卫兵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很快北京街头出现大量传单、大字报、大标语，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一次讲话，就使“打倒陶铸”变成了既成事实。

(32)

1966年5月的中央会议上，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旧文革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革小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将由康生出任组长，因为康生不但有比较强的领导能力，而且原来就是旧文革小组的成员。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陈伯达当了组长，康生只是顾问。

虽说陈伯达在党内的资格也算比较老的，他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时候，与康生是同学。不过陈伯达的从政能力，大大不如康生，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一直低于康生，只是在196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才首次排名在康生之前。

当时人们给陈伯达的绰号是“老夫子”，意思是说他做事“迂腐”，书生气太重，不太懂政治权术。陈伯达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从政能力不行，基本上是一个书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当文革小组的组长。

据陈伯达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周总理和我谈过几次，要我当新

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就是文革五人小组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我推辞几次，最后总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总理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我又向毛泽东提出：“我是个书生，当不了组长。”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我没有办法，只好当了。】

让一个不太懂政治权术的书生陈伯达当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毛泽东也知道陈伯达的行政领导能力不行，但毛泽东的寓意是让江青来主管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资历太低，直接让江青当组长肯定不行，所以毛泽东专门安排陈伯达这么一个不称职的组长，于是副组长的江青就可以掌握实权了。如果让康生当组长的话，江青肯定是对付不了康生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当组长。

既然毛泽东让陈伯达当了组长，就不能再让康生当副组长或组员。尽管目前陈伯达在党内的排名高于康生，但过去陈伯达长期以来都是接受康生领导的，现在如果反过来让康生接受陈伯达的领导，这样就太让康生没面子了，所以毛泽东就安排康生当文革小组的顾问。因为顾问是不属于组长领导之下的，这样既使康生在文革小组中继续工作，又保全了康生的面子。

可是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虽然陈伯达是组长，当顾问的康生他是领导不了的，江青这个副组长他更领导不了，江青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陈伯达在重大的事情上，都要听江青的。陈伯达也自嘲说：“我只是个刘盆子。”所谓刘盆子，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军，让一个据说是刘邦后裔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

陈伯达已经有江青和康生两个“婆婆”了，后来又来了一个顾问陶铸，又是

陈伯达领导不了的。原本毛泽东给陈伯达的党内排名是第四位，陈伯达主动去找毛泽东推辞，于是毛泽东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陈伯达原以为毛泽东会把康生提到自己之前，这样陈伯达还是服气的，但没想到毛泽东把陶铸一下子提拔得这么高，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这样陈伯达就有些不服气了。

(33)

康生当顾问，他对陈伯达还算比较尊重，可是陶铸来了之后，对陈伯达就没有那么尊重了。陶铸长期在地方上当第一把手，不免养成“霸气”的习惯，他认为自己在文革小组中的地位最高，就趾高气昂地发号施令起来。陶铸不客气地对江青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由此可见，陶铸把江青都不看在眼里，就更不把陈伯达看在眼里了。陈伯达对陶铸不服气，陶铸又对陈伯达态度傲慢，于是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陈伯达是从内心里高兴的。

毛泽东让江青主管非常重要的文革小组，是有深谋远虑的。第一，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她的利益和毛泽东的利益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刘少奇那样的“野心”；第二，可以让江青说一些毛泽东自己不便直接说的话，说对了是毛泽东的，说错了是江青的，这样毛泽东做事就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三，江青的身份是主席夫人，其他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对江青总得让三分，这就使江青做事起来比较容易一些，换个别人就没有江青这样的优势。

江青主管文革小组之后，毛泽东对江青的表现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但也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江青擅自打倒陶铸，就让毛泽东很不满。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之后，毛泽东虽说不满，但他也没有批评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在1月8日的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了陶铸，算是对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的追认吧。可是到了2月10日，毛泽东却又反过来，用严厉的口气批评

了陈伯达和江青，这是为什么呢？

这并不是毛泽东出尔反尔，而是因为客观形势变了。在 1967 年 1 月的时候，军队高官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倾向还不明显，可是到了 1967 年 2 月，军队高官就出现了强烈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倾向。在文革小组当中，除了陶铸之外，其他人没有在军队中任职过，在军队中完全没有影响力。而陶铸在延安时代就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又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这时候毛泽东让陶铸“戴罪立功”，让陶铸去对付军方的老师们，这比陈伯达这样在军中毫无威信和影响的文人，效果要好得多。可是陶铸已经被江青和陈伯达提前打倒了，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使毛泽东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所以毛泽东自然大为生气。

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2 月 10 日，主席又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主席然后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34)

毛泽东这次对陈伯达的批评，应该说过火了。陈伯达内心里尽管也高兴看到陶铸被打倒，但打倒陶铸这种重大的事情，他毕竟不敢做主，陈伯达的那些讲话是江青让他讲的。陈伯达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江青背着毛泽东“假传圣旨”，他还

以为江青说的就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才跳出来充当打倒陶铸的先锋。

等到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陈伯达才明白“打倒陶铸”原来是江青的“假传圣旨”，上了江青的当。但是这种事情，他又不好当着毛泽东的面来揭发江青，只好忍了下来。然而江青在这个时候，不但不为陈伯达辩解，反而把责任全都推到陈伯达身上，于是就让陈伯达大为恼怒，他在会后声称：“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自杀。”

这件事毛泽东也被江青“蒙蔽”了，他也不知道陈伯达的“打倒陶铸”讲话，是因为听信了江青的假传圣旨。再加上江青私下里向毛泽东讲了不少陈伯达的“坏话”，使毛泽东误以为陈伯达是出于对陶铸的嫉妒和排挤的“私心”，主动擅自“打倒陶铸”，从而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因此让毛泽东大为恼火。当然，毛泽东这样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按照常理，推测陈伯达有这种“私心”的动机，也是合情合理的。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江青骗了，所以吵吵嚷嚷地声称要自杀。其实陈伯达并非真的想要自杀，如果真想自杀的话，就不会对别人说了。陈伯达是想通过“自杀”这件事，让毛泽东注意到他是被冤枉的。

据王力回忆说：【陈伯达先是单独对我说他要自杀，我说：“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

陈伯达说：“打倒陶铸会上的发言，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

陈伯达说：“我那时没有办法，不讲不行。”

我说：“你要向总理把事情谈清楚。”

陈伯达打电话，要到总理那里去谈，总理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

总理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话后，他才不自杀了。】

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很会团结人的，他看到这是一个团结陈伯达的好机会，于是亲自屈尊，主动到陈伯达那里去听他谈话，让陈伯达大为感动。陈伯达回忆说：【我很感谢总理的关心，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后来陈伯达又找康生和关锋谈了他要自杀之事，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

关锋劝告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这才憋住了气。】

(35)

由此可见，王力、关锋、康生等人，都知道陈伯达是被江青冤枉了，但也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他们这些人都不愿意为了陈伯达，而去得罪江青。

这就像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分为二”那样，凡事有优点，就同时会有缺点。毛泽东重用江青，有不少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这里就表现出毛泽东任用江青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没有人敢说江青的坏话，这样毛泽东对江青的情况就缺乏正确客观的了解，使他容易被江青所“蒙蔽”，更使他因为江青犯了不少错误。这次毛泽东错误地冤枉批评了陈伯达，也是因为江青而犯的一次错误。

毛泽东希望文革小组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组织，最不希望看到文革小组中间出现相互争权夺利的内讧。陈伯达和江青不向毛泽东请示，擅自打倒陶铸，被毛泽东认为是相互争权夺利的内讧，所以他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要把

这个作为一个警告，希望他们下次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毛泽东的性格是：批评一个人，是对这个人还有希望，对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因为他对陈伯达还有希望，希望陈伯达今后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

但毛泽东自己不知道，他这次是冤枉了陈伯达。陈伯达本来是不想当文革小组组长的，是毛泽东硬要让他当的，所以毛泽东说陈伯达“投机”，让陈伯达感到非常冤枉，这就使陈伯达对毛泽东的忠心，无形中消退了很多。同样，毛泽东的这个批评，又造成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相互不满，文革小组更加不团结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内讧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本想消除文革小组中的内讧，可结果反而加大了文革小组中的内讧，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陈伯达大肆宣扬了一阵“自杀”，希望毛泽东能注意到和了解到他的冤枉。可是因为没有人敢得罪江青，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陈伯达的冤情，所以毛泽东也没有做出任何安抚陈伯达的事情。这样一来，陈伯达对毛泽东就离心离德了。在毛泽东批评陈伯达6天之后的2月16日的“二月逆流”会议上，陈伯达没有发言，没有支持毛泽东，这是陈伯达第一次没有支持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主席在2月10日的常委会上，最后说：“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主席还讲：“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虽然主席说不准谈，但是办不到。叶剑英就跟老师们讲了，李富春就跟副总理们讲了，这样“二月逆流”的火就点起来了。】

王力之所以说“二月逆流”的火是毛泽东点起来的，是因为毛泽东以前从来没有批评过文革小组，更没有批评过江青。毛泽东的这次批评，让众多高官们产

生一种感觉，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已经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們要趁热打铁，一齐行动起来，把彻底熄灭毛泽东的文革之火。因此，在毛泽东批评江青和陈伯达的六天之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36)

不少人把文革中发生的“二月逆流”，认为是1967年2月16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其实“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事件，还包括“大闹怀仁堂”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还有不少人以为，“大闹怀仁堂”是一些老干部一时冲动爆发的偶然事件，不是有预谋的行动。其实不然，“大闹怀仁堂”应该说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是“大闹怀仁堂”头号干将，他在“大闹怀仁堂”之后被批斗，靠边站了，不过在林彪事件后复出，1975年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3年逝世。谭震林本人后来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那时，我只能同陈毅、李先念等几位老战友，凑在李富春家里进行议论。我与李富春等老同志在议论中得出结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要把党搞乱，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乱，要在乱中夺权。我们担心，这伙人先搞刘少奇，再搞下去，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

【在1967年初，所谓“二月逆流”之前，我对李富春、李先念说：“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多年了，现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我这个话，后来索性说给毛泽东本人听了。】

谭震林这里说出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我们担心，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都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他们担心文革要搞到周恩来头上，所以他們要跳出来，力保周恩来。

这些人发起“二月逆流”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在谭震林这些人看来，只要周恩来在位，他们就不要紧，一旦周恩来倒台了，他们这些周恩来派系的人，也要跟着完蛋。刘少奇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刘少奇倒台后，他手下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都被打倒进了监狱。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这些人也要豁出去力保周恩来。

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的意义非常重要，它联系到中国文化的底蕴。

汉语中有个字“谏”，字典上的意思是“规劝君主，使其改正错误”，这个字的含义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大臣是不能反对皇帝本人的，但可以反对皇帝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大臣发觉皇帝正在做错事的时候，可以给皇帝提意见，督促他改正错误，这就是所谓的“进谏”。进谏是一种“善意的反对”，它只是反对皇帝做的事情，并不反对皇帝这个人，更不是要赶皇帝下台。与“进谏”相反的是“逆反”，也就是“恶意的反对”，它是反对皇帝这个人，要赶皇帝下台。

(37)

如果皇帝不听大臣的“进谏”，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答案是：不怕冒犯皇帝，不怕杀头，继续冒死给皇帝进谏，这就是中国传统中非常被称赞的“忠臣”形象。前面谈到的《海瑞罢官》中的明朝大臣海瑞，就是一个冒死进谏的忠臣的典型。海瑞虽然不留情面地给皇帝提意见，甚至骂皇帝，但他还是忠于皇帝的，并不想让皇帝下台，在皇帝死的时候，他还悲痛地死去活来，几天不吃饭。

如果大臣继续冒死进谏，皇帝还是不听，还是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这

时中国传统文化就无解了，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在外国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总统犯了错误，议会会有权提出议案“弹劾”总统，直接罢免总统，换新的总统。外国人反对总统，就是要让总统下台，他们不会搞“既要忠于总统本人，又要反对总统做的事”这种复杂的政治行动。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袖，他当然也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搞文革，但这些人“反对”的动机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善意的反对”，也就是只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善意反对”就是古人说的“进谏”；另一种是“恶意的反对”，也就是不仅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同时也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恶意的反对”就是古人说的“逆反”。

毛泽东认为林彪反对他搞文革，是进谏式的“善意的反对”，因此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高兴，但还可以容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反对他搞文革，是逆反式的“恶意的反对”，他就不能容忍刘少奇了。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反对他搞文革，有一半是善意，一半是恶意，以善意为主。

因此，毛泽东在遇到部下反对他时，总要先思考：这个反对是进谏式的善意反对？还是逆反式的恶意反对？毛泽东处理这两种“反对”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一些人强烈顶撞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继续得到毛泽东的重用，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进谏；相反一些人只是少许说了一点不赞成的话，马上就被毛泽东疏远甚至打倒，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恶意的逆反。不过很多情况下，很难判定一个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毛泽东本人也经常有判断错误的情况。

我们转回来说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

这句话已经不是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而是说“不跟”毛泽东这个人了，也就是公然宣布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因此毛泽东认为谭震林是“恶意的反对”，他原谅了陈毅等人，但始终没有原谅谭震林。后来谭震林之所以能够复出，全是周恩来的作用。

(38)

《谭震林传》中这样记载：【1967年2月10日，谭震林从李富春那里听到，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不过毛泽东又规定，对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谭震林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一起商议，一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言行，并不代表毛泽东，许多事情是这伙人背着毛泽东干的，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

陈毅对谭震林说：“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

谭震林说：“该我放炮了，非把他们轰倒不可。”】

由《谭震林传》的记述可见，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李富春，违反毛泽东“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的指示，不仅告诉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还与他们大谈特谈这件事。他们从江青擅自“打倒陶铸”这件事推论：江青做的一些事，毛泽东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趁着毛泽东对江青发怒的机会，先把江青打倒。只要打倒了江青，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左右手，这是浇灭毛泽东文革之火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后来谭震林等人的放炮，主要是冲着江青去的，他们要趁热打铁，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候，打倒江青，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让谭震林出来说话，谭震林也答应出来“放炮”。陈毅为什么说谭震林“没有包袱”呢？因为那时陈毅、李先念等人都遭到批斗，

而谭震林在不久前遭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谭震林作为副总理，负责农林口。在 1967 年 1 月的夺权风暴中，他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负责的农林口文革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看到谭震林的信后，在 1 月 30 日给林彪和周恩来批示说：

【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泽东在 1 月 30 日的批示中说了赞扬谭震林的话，表示对谭震林信任，因此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由被毛泽东信任的谭震林出来说江青的“坏话”，容易被毛泽东接受。

《谭震林传》还说：【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说过许多出格的话，他说：“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那几个秀才乱搞，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应该找林彪同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们的赞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从《谭震林传》可以看出，在 2 月 16 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谭震林等人进行过一番商议，他们是准备好了去“放炮”的，并不是偶然的一时发怒。

(39)

1967 年 2 月 14 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这次会上老师们“小闹怀仁堂”，这是两天后“大闹怀仁堂”的前奏。这次会江青没有去，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会议。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

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陈伯达的话就像点燃了一枚炸弹，老师们劈头盖脸地向陈伯达开炮起来。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聂荣臻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徐向前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还要不要军队啦？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在1967年1月还是支持中央文革的。但在邱会作事件上，徐向前冒着得罪军队干部的风险，为中央文革小组出力，可是却落得一个两头不讨好，特别是江青也对徐向前不满，甚至向林彪提出要撤换徐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位，被林彪顶住了。这样一来，到1967年2月，徐向前就完全站到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上去了。

还有一份不能核实真伪的资料，对这次会议有更详细的描述，这里摘录如下：

【1967年2月14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师 and 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风暴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是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

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这些人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虽说上述这份资料的真伪还不能判断，但2月14日的怀仁堂会议，无疑是一次斗争非常激烈的会议，是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预演。2月16日发生“大闹怀仁堂”，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40)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余秋里，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碰头会的惯例是参会人围坐于一个长条形的会议桌，桌子首端是主持人的席位，桌子两侧是参会人的席位。参会人按照党内排名的顺序，坐在长条桌的两侧，职位越高的人离主持人越近，职位越低的人离主持人越远。这天周恩来是主持人，坐在主持人的席位上，在周恩来右手边，依次是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的席位，这个顺序就是党内的排名顺序；在周恩来左手边，依次是谢富治、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个顺序也是党内的排名顺序。

陈伯达的座位，本来在周恩来右手边的第一个座位，可是陈伯达刚刚受到毛

泽东的批判，不敢再坐这个首席位置，于是就在后边桌角的座位上坐下。按照惯例，犯了错误的干部，开会时就不能再坐在原来地位的位置上，要坐到后面去，听候处分结果。比如刘少奇以前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坐在首位的，犯了错误之后，刘少奇就只能坐在后面桌角的座位上，这也是对犯了错误干部的一种间接处分。

周恩来看到陈伯达坐到后面的桌角，就叫他回来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因为开会时的座位位置，同时也代表着在党内的位置。周恩来让陈伯达坐回到原位，就等于是肯定了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没有变化。前面说过，周恩来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要把陈伯达团结过来，因此对陈伯达表现出很友善的态度。

这次会上，周恩来派系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在这次会上“放炮”。这个“放炮”，有“一明一暗”两个目标。“暗的目标”，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让毛泽东知道，如果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的话，他们这些人就要造反了；“明的目标”，是要打倒江青。他们从“打倒陶铸”事件中看到，江青做的一些事情，是背着毛泽东做的，毛泽东对江青也开始不满意了。所以他们试图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机，趁热打铁，猛攻江青，顺势把江青打倒。

今天的谭震林更是斗志昂扬，做好第一个带头“放炮”的准备。谭震林“放炮”的对象，本来是对着江青的，可是不巧，江青今天推脱身体不好，没有来参会，所以谭震林只得把“放炮”的对象，对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

谭震林也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他今天不对陈伯达开炮，要团结陈伯达。在会前，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助手不令人满意”。谭震林说的“陈伯达的助手”，就是指江青。

(41)

张春桥一到，谭震林就气势汹汹地质问他：“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

显同志没来?”

谭震林之所以提到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是因为当时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都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把一批省市的主要领导人接到北京来加以保护，但有些省市的领导人受当地造反派的阻挠，未能按期来到北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就被上海的造反派扣押住，无法来北京。而张春桥是上海造反派的幕后指挥人，所以谭震林用陈丕显未能来北京之事，向张春桥发难。

面对谭震林的发难，张春桥只得说：“陈丕显来不了啦。”

谭震林进一步紧逼说：“怎么来不了呢?”

张春桥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群众不答应啊。”因为张春桥扣住陈丕显，违反了中央的指示，所以他要用“群众不答应”这个借口。

谭震林继续发难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解释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听了张春桥的解释，谭震林气愤地讥讽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多年后，谭震林回忆他与张春桥的唇枪舌战时，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搥他两个耳光。”

张春桥被谭震林这么讽刺，当然很生气。但张春桥的涵养还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失态跟谭震林吵起来，而是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见张春桥没有被激怒，自己更加生气起来，指着张春桥质问说：“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压住气，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谭震林愈发生气了，用命令的口气对张春桥说：“你们要保陈丕显。”

张春桥还是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被张春桥激怒了，怒吼起来，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见谭震林怒吼起来，就沉默下来，不说话了。谭震林见张春桥不说话了，指着他吼问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依然沉住气，还是不说话。谭震林又转一个话题，发起进攻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42)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司令，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谭震林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司令说成是“反革命”，这就是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性。

张春桥知道谭震林把蒯大富说成是“反革命”，是想激自己跳出来为蒯大富辩护，可是张春桥按捺住自己，还是一言不发。

谭震林本想把张春桥激怒起来，来一个面对面的斗争。可是张春桥硬是不说话，谭震林一个巴掌拍不响，斗争不起来，只得一个人继续唱独角戏，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依旧不说话，不过他转眼看着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希望陈伯达站出来说几句话。如果是在以前，陈伯达听到这种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话，早就跳出来跟谭震林辩论了。可是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感到冤枉，对毛泽东的忠诚大减。因此这次陈伯达保持沉默，任凭谭震林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文革，他都不说话。

如果说张春桥这些人是刚刚进入中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这里水的深浅。而康生在中央几十年，早知周恩来是不好惹的，他见周恩来这派的人，一个个蠢蠢欲动的样子，也感到有些胆怯，心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惹他们最好。因此，康生也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是副组长，康生是顾问，而王力和姚文元只是文革小组的组员。他俩看到文革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顾问都不说话，当然也就不敢说话了。

谭震林见文革小组这边没人说话，就放出更厉害的话来，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谭震林说的“捕鱼问题”，指的是他在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指示渔船停产闹革命，被文革小组指责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里谭震林特别点出了江青的名字，他要把事情闹大。

江青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虽说谭震林点了江青的名字，但文革小组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替江青辩护。相反，倒是不是文革小组的副总理谢富治，替江青辩解说：“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本来就要炮轰江青，现在有人和他辩论，谭震林把炮轰江青的调子提得更高了，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这么说，谢富治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辩论又成了谭震林一个人的独角戏。谭震林说到了气头上，又没有人跟他辩论，有气无处发，一气之下说出了非常出格的话。他说：“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那么早入党；二不该活到65岁，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

(43)

谭震林说不干就不干，猛地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文件，穿上衣服，拔腿就走。谭震林一边走，一边对着张春桥等人，用示威的语气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的这番话，让全场惊呆了。自从毛泽东当权以来，还没有一个高官敢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跟毛主席干了。”谭震林这个“放炮”，超过预期的界限，让周恩来也为难了。于是周恩来猛地一拍桌子，对正在往外走的谭震林，大喝一声说：“回来！”

陈毅也说：“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听了周恩来和陈毅的话，谭震林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的任务是在会场上斗争，而不是甩手不干了。于是谭震林急忙转身回来，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里也不走。”

谢富治看到气氛越来越不对，试图打个圆场，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

谭震林不理谢富治的打圆场，反而把他的话挡了回去，拍案而起说：“我不

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陈毅见谭震林有点失态，讲话太过火了，太出格了，现在不能让谭震林继续讲了。所以陈毅急忙出来说话，把火力引到自己这边，掩护一下谭震林，于是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

陈毅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就把“文化大革命”的话题，转到“延安整风”上，他说：“这次运动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我看不仅这次运动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有人还背着包袱。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吗？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

陈毅也是出名爱“放炮”的人，他本想自己讲几句，阻止谭震林继续讲出格的话，但没想到他讲的话更出格，讲到了历史问题，讲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虽说已经是历史问题了，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比文革更加说不得。周恩来见陈毅不仅说到了敏感的延安整风，甚至还说到自己，太出格了。于是周恩来赶紧插话，试图挡住陈毅的话题，说：“我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我从来没有意见。”

可陈毅却是性情中人，一说起来就按捺不住，他不顾周恩来的阻挡，继续说：“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了？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有人说陈毅说这是在影射林彪，这个说法牵强附会。从上下文来看，陈毅始终说的是刘少奇，而且更是在影射毛泽东，并没有说林彪的意思。当时陈毅和林

彪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必要反林彪。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是他们要争取的对象，谭震林事后还给林彪写信，拉拢林彪，所以当时陈毅是不可能反林彪的。

(44)

周恩来见陈毅影射到毛泽东了，急忙打断他的话，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李先念见陈毅讲话愈发出格，也赶紧插话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联动’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李先念说的“联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因为反对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初，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公安机关取缔了“联动”，“联动”的主要成员都被逮捕入狱。

这时叶剑英也插话支持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现在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徐向前见大家这种群情激愤的样子，也出来拍着桌子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革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把军队搞乱了。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谭震林看到众人都出来说话了，愈发受到鼓舞，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赞同地说：“我也哭过几次。”

谢富治再次试图打圆场，插话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革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接着李先念又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李先念这里说的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是指1966年10月2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红旗》十三期社论中，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有疑问，亲自问毛泽东，毛泽东用英文进行了回答，这件事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周恩来见李先念提到十三期《红旗》社论，就问康生说：“发表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陈伯达也说：“我也没看。”

康生和陈伯达说“没有看”，这都是假话，他们两人不但看了，而且还作了修改，标题就是陈伯达改的。这两个人今天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愿站出来说话，所以就推说不知道，这样就不会卷入辩论了。

这时周恩来见该放的炮放得差不多，该讲的话也都讲了，夜长梦多，就想赶紧收场，时间也已到晚上七点了，于是周恩来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

周恩来宣布散会，这样载入史册的“大闹怀仁堂”，就这么结束了。

(45)

如果说刘少奇的四大嫡系是“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安子文”，他们与刘少奇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林彪的四大嫡系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那么周恩来的四大嫡系就是“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刘少奇的嫡系是来自他早期领导的“北方局”，林彪的嫡系是来自他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而周恩来的嫡系则是来自他领导的新四军。陈毅是新四军的军长，谭震林和李先念是新四军的师长，李富春虽说不是来自新四军，但他在1920年代与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学，据说两人在法国时，还住在一间屋子里。

因此，周恩来的四个嫡系人物发起的一场“大闹怀仁堂”，对于熟知高层派系的高官们来说，马上就明白这件事的幕后人物是周恩来，或者说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策划者。以周恩来的身份，当然他是不会直接参与策划“大闹怀仁堂”的，因为这样做太露骨，也太愚蠢，泄露出去就会成为“分裂党”的罪证。所以周恩来只是做一些指点和暗示，具体的策划由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个人进行。

如果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一直是毛泽东进攻，周恩来防守，那么这次“大闹怀仁堂”，就是周恩来发起的一次反击。周恩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起反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闹怀仁堂”前的背景。

1967年元旦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文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月23日，毛泽东在与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总反击。今年二月至四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在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眉目。】

在稍后的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他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至四月的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

毛泽东说“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过去搞的文革就属于旧阶段了。在文革的旧阶段中，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这些人被打倒了，对刘少奇派的夺权已经完成了。因此，毛泽东所谓“新阶段的夺权”，显然是针对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人，都感到极大的压力。

(46)

特别是毛泽东说“今年二月至四月是关键时期，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这句话意味着毛泽东要在1967年2月到4月，搞一个决定胜负的大动作。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派系的人就不得不思考，估计毛泽东在1967年2月到4月，要发起一次决定胜负的大决战。什么是“大决战”呢？大决战就是毛泽东亲自出马的战斗。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前一个阶段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1965年11月的批判《海瑞罢官》，又1966年2月的批判《二月提纲》，1966年5月的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毛泽东都没有亲自出马与刘少奇直接对决。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才亲自出马，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刘少奇发起最后的决战，一举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之所以最后要亲自出马，是因为刘少奇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党内第二把手，又是国家主席，人们根本不敢碰刘少奇。必须毛泽东亲自出马，亲自带头吹响打倒刘少奇的号角，大家才敢出来批判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决战，刘少奇是打不倒的。同样，周恩来建国以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威信极高，

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肯定是打不倒的。

现在，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各种前哨战和外围战都已经打响了，但最后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大决战，还没有打响。因此，周恩来等人猜想，毛泽东可能会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这场大决战。这场大决战的形式，大概类似于打倒刘少奇的决战，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写一张大字报，或者亲自发表一个什么讲话，宣布与周恩来决裂，号召人们打倒周恩来。

不管毛泽东“大决战”的方式如何，一旦毛泽东的“大决战”打响了，也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决裂，两者只能留下一个，打倒一个，不可能再并存了。这就像在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还可以并存，一旦写了《炮打司令部》，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两人就不能再并存了，必须打倒其中的一个。

如果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大决战，亲自写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周恩来怎么办呢？周恩来的第一个出路，是束手待毙，等待毛泽东把自己打倒，周恩来当然不是束手待毙之人；周恩来的第二个出路，是奋起反击，反过来把毛泽东打倒。但这个难度太大，几乎不太可能。这时，周恩来就想到还有第三个出路，这就是在毛泽东发起大决战之前，让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只要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不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那么周恩来与毛泽东就还可以共存下去。

(47)

周恩来选择的这个第三条出路，是一个极为高明之策。尽管毛泽东手中的箭，始终对准着周恩来，但只要毛泽东的箭还没有射出来，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一旦毛泽东手中的箭射出来了，一切就无法挽回了。因此，周恩来必须要在毛泽

东发起亲自出马的大决战之前，设法让毛泽东放弃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发起这场大决战的时间。

怎样才能让毛泽东放弃或者推迟大决战呢？第一种战术是找一个“说客”，对毛泽东阐述种种厉害关系，说服毛泽东放弃大决战。中国古代有很多著名的“职业说客”，近代的说客也很多，周恩来本人也是非常优秀的说客，比如1936年的“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周恩来的说服工作功不可没。尽管周恩来自己是非常优秀的说客，可是在这件事上，周恩来本人却不能直接与毛泽东谈，周恩来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充当说客，所以用“说客”的战术是不行的。

第二种战术是显示自己的力量，让毛泽东知道周恩来不是好啃的骨头，让毛泽东知道这场大决战不是那么容易打赢的，从而使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发起大决战的念头；或者让毛泽东感到时机还不成熟，推迟发起大决战的时间。显然，目前周恩来唯一的可行之计，就是这个“显示力量”的战术。

要实施这个“显示力量”的战术，周恩来亲自出面是不好的。彭德怀与刘少奇在会上与毛泽东当面争辩和争吵，效果非常不好，这都是前车之鉴，周恩来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他不会与毛泽东直接碰撞。因此，周恩来要让他的部下出面，展示一下周恩来派系的力量和决心，这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毛泽东号称要在1967年2月至4月“决胜负”，周恩来他们有一种紧迫感，所以赶紧搞一场显示力量的“大闹怀仁堂”。“大闹怀仁堂”的目的，是周恩来借用他的几个嫡系人物的嘴，告诉毛泽东他想要说的话，更是展示他们这些人的力量和决心。“大闹怀仁堂”是一次示威，它要让毛泽东知难而退，赶在毛泽东发起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之前，让毛泽东放弃大决战的念头。

通过“大闹怀仁堂”，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什么呢？

第一，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号召群众向党夺权的做法。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不要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第二，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整老干部的做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

(48)

第三，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老干部集团和整个党。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第四，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小组，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第五，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这个搞法是从《红旗》社论提出‘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开始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周恩来做出让步，毛泽东在2月27日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今后斗争矛头应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坚持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之后，报刊上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了，这是后话。

第六，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发起一场大决战，试图把他和他们的战友们都“打光”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将与毛泽东战斗到底，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的目的是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

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总而言之，因为周恩来自己不便直接向毛泽东发出警告，于是他就借部下的嘴，用示威的口吻告诫毛泽东说：“请你放弃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否则我们会跟你拼命的。”

在 1966 年 10 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文革小组的成员说出他搞文革的决心。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不怕死，周恩来也要告诉毛泽东，他不怕死。这次周恩来借着别人的嘴，向毛泽东宣告说：“我们这些人一定要阻止你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毛泽东要把文革搞到底，周恩来要阻止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要让文革半途而废，这就成为“二月逆流”以后文革发展的主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虽说“二月逆流”没有流血，但它却是一次决定文革前途命运的看不见硝烟的决定性战役，它让毛泽东推迟了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号角的大决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一再推迟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直到 1976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毛泽东也没有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只要毛泽东不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就打不倒;而周恩来不打倒，文革就不能搞到底，事实也是如此。

(49)

1967 年 2 月 16 日的“大闹怀仁堂”，只是“二月逆流”的一个高潮，周恩来等人发起的“二月逆流”并没有就此结束。2 月 16 日晚上 9 时，也就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两个小时之后，陈毅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并发表长篇讲话。

因为周恩来派系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们只能直接用嘴对群众宣讲他们的主张，所以陈毅也利用一切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向群众宣扬他们的主张和观点。

陈毅说：【目前一些青少年斗争方式很‘左’，许多老干部被斗得很苦，深受其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使这批青少年养成一种过‘左’的作风，他们上台二十年后，就可能搞修正主义，我对此十分担心。】

陈毅这里批评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很‘左’，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这既是对红卫兵的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陈毅的这个批评非常到位，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因为后人批评毛泽东发起红卫兵的运动，主要都是集中在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太‘左’，过分使用暴力，在肉体上伤害了很多人。

还有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纵容”红卫兵使用暴力，这个是冤枉毛泽东了，毛泽东的本意并不赞成暴力批斗的方式。毛泽东尽管要打倒老干部，但毛泽东设想的打倒，只是政治上的打倒，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老干部。因为老干部的人数太多了，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万。如果试图从肉体上消灭这几十万人，他们必然会拼死抵抗，会引发内战或内乱，这就使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无法实现。

毛泽东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一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就‘靠边站’，但给饭吃。”

毛泽东的这些话，体现了他处理老干部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政治上靠边站，经济上待遇基本不变。让老干部们感到即使是丢了官，生活上也还有出路，因而不至于拼死抵抗。老干部感到有出路，他们抵抗的阻力就会比较小，毛泽东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红卫兵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必然会引起老干部集团的拼死抵抗，反而使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跟难实现了。因此，毛泽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不会赞成暴力批斗老干部。不过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也没有严厉制止红卫兵暴力批斗的过火行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毛泽东有一种看法，他认为一个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出现‘左’的倾向，是难于避免的。毛泽东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50)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他们刚刚搞革命的时候，斗争方式也很‘左’，不比现在的红卫兵小将逊色。可是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左倾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左倾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如果在井冈山运动之初，就禁止烧杀的话，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会被扼杀，那么这场大革命早就熄灭了。

因此，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没有严厉禁止红卫兵的左倾斗争方式，是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扼杀群众的造反积极性。毛泽东希望现在的红卫兵小将，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左倾的危害性，自觉改正左倾错误，自发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然而，红卫兵却始终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左倾的错误，自发改正使用暴力的错误。这样发展到1968年，毛泽东就不得不严厉禁止武斗了。

1968年下半年以后，武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同时文化大革命之火也就此熄灭下去。

我们的话题再转回到2月16日陈毅接见群众组织的讲话。陈毅说：【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与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闹矛盾，继而发展到在巴基斯坦使馆造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上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章文晋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你们还年轻，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么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你们掌了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用实际例子来说明造反的负面效果，让年轻人多思考造反的后果，给造反泼冷水。陈毅继续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陈毅这些话，是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踩着别人往上爬，这指的是江青擅自“打倒陶铸”的事情。陈毅还说“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这里不仅是批评江青，也是间接地批评毛泽东了。

陈毅的话越说越激烈，他说：【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六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用他特有的说话方式，反对毛泽东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做法，这也是对文革本身提出的严厉质疑和批评，公开表明他对文革的反对态度。

(51)

陈毅说话往往是越来越出格，他又说：【对毛主席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不要以为你们对毛主席认识就那么清楚，我对毛主席认识比你们清楚。过去我也几次反对过毛主席，但后来比来比去，还是毛主席对，所以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你们永远拥护毛主席？这是靠不住的。】

陈毅这里公然挑战毛泽东的威信，大言不讳地声称自己过去曾经“几次反对过毛泽东”。当时文革的气氛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可是陈毅反对过毛主席，不但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反而还当了这么大的官，由此可见，反对一下毛主席也是不要紧的。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威信在无形中就减弱了一些。

陈毅甚至公然说“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这简直是对毛泽东示威了。因为陈毅知道，他的这些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所以陈毅借着这个机会向毛泽东示威说：“如果你要打倒周恩来和我们这些人的话，我是不会逆来顺受的，我是要造反的。”

陈毅后面说的“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这句话是很有哲理性的。不少人在文革时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在文革后又积极地反对毛泽东，可见永远拥护是靠不住的。

陈毅不仅批评毛泽东，更进一步批评文革，他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也治不好!】

陈毅说“文革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治不好”，这里简直就是全面否定文革了。

陈毅最后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陈毅这些话，表明自己不怕丢官，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话，陈毅一半是说给在场的听众，另一半是说给毛泽东听的。陈毅向毛泽东示威，希望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他发起打倒周恩来大决战的念头。

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三个小时，2月16日晚10时，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2月17日凌晨2时，周恩来又与李先念一起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惊人行动，指示警卫人员把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场逮捕。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的大会上直接逮捕人，这在当时造成很大的震动，一时遏制了造反派的气焰。

在说周恩来逮捕杜向光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背景情况。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财政部的造反派也起来夺权，不仅夺了财政部的政治权，解散了党委，还夺了财政部的业务权。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也是造反派的幕后指挥者。

当时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他把财政部夺权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之后，周恩来做出三点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业务工作由副部长杜向光请示李先念;(三)周恩来准备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

(52)

2月7日，李先念把周恩来的指示向杜向光传达时，遭到杜向光的抵制。文

革资料《李先念副总理同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谈话纪要》中，记载了这次李先念与杜向光的对话，下面摘录一部分。

【杜向光：“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语录 233 页。”

李先念：……(沉默)

杜向光：“昨天总理的指示是：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但我个人意见是：根据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夺的，是夺得对的。我坚决拥护造反派夺权，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我不理解总理指示，我不同意这种作法。”

李先念：“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因为大部分党委不能工作了，所以革命造反派从对人民负责的角度出发，采取这样夺业务权的行动，这是对的。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党委的这些人？群众对此是有意见的，我也不理解。造反派和我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见，李副总理应当到财政部的群众中间去。我不理解总理的指示，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李先念：“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是中央的决定，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我们夺了业务权，又交出来，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支持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问题。业务权和领导权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要交出来？不能理解。”

李先念：“你说要独立思考，不盲目执行，不对！你应该坚决执行，不应当怀疑！如果你是真正的左派，要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现在责成你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把业务抓起来。”

杜向光：“总理指示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那么过去我们夺业务权，夺得对不对？”

李先念：“过去我们支持过造反派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央已有指示，情况变了，应当按总理的指示办事。”

杜向光：“你的意见首先应该跟革命造反司令部谈。”

李先念：“请你把我的意见传达给革命造反司令部。”

杜向光：“我认为夺权是夺得对，我不理解，难以执行。革命造反派对李副总理有很大的意见。”

李先念：“革命造反派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但请你坚决贯彻执行总理的指示，向造反司令部传达。”

杜向光：“业务权的交权问题，在我不理解之前，总理未接见之前，难以执行。我保留意见。”】

杜向光也是老干部，1937年入党，196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也有不少老干部，加入到造反派中，这是最让周恩来头疼的人物。因为年轻学生或一般工人干部，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对中共高层的内幕也不清楚，所以比较好对付。而杜向光这样副部长级的老干部，既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又熟知中央高层的内幕，是很难对付的人物。

从上面这段对话来看，杜向光是铁杆的造反派，坚决拒绝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铁了心要造周恩来的反。因此，周恩来必须妥善处理好杜向光这个反对他的急先锋，如果处理不好，周恩来就会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这样离倒台就不远了。

(53)

周恩来在2月16日要接见财贸口的造反派，如果杜向光也参加这次接见的

话，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他肯定会在这次接见中向周恩来发难，甚至通过他了解到的高层内幕，当场揭发周恩来的一些问题，让周恩来下不了台，大大打击周恩来的威信。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威信对于周恩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绝对要维护一个不容侵犯的威严，绝不容许杜向光破坏他的威信。

如果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他肯定会向周恩来发难的，所以最好就是不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会。因此，在接见会之前，周恩来通过他的联络员，告诉杜向光不要来参加这次会议。可是杜向光也看穿了周恩来的意图，非要来参加这次接见会。于是周恩来在进会场以前，再次让他的秘书找到已经进入会场的杜向光，请他立即离开会场，可是被杜向光拒绝，他非要参加这次接见不可。一些支持杜向光的造反派也说：如果不让杜向光参加的话，他们就要集体退出抗议。

这样一来，周恩来只能亲自处理这件事了。周恩来走上讲台，一开始先说：“今天，我请财贸口的造反派同志谈话，没请副部长、司局长。因此，财政部杜向光同志，请你站起来！虽然你参加了造反派，但我不同意你是造反派的代表，你是个副部长。请你走出去！”

众人高喊：“走！出去！”参加这次接见会的群众代表中，有反对周恩来的人，也有支持周恩来的人，这时候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就成为周恩来的啦啦队。

杜向光根本不理睬周恩来的话，照样坐在那里不动。

周恩来提高声音说：“难道党中央的命令，你都不能接受吗？”

众人高喊：“滚出去！”

杜向光还是不理睬周恩来的话，依旧不动。

周恩来进一步提高声音说：“走！走！难道你不听最高指示啊？”

众人高喊：“走！总理的命令！”

杜向光依然不动，他完全不听周恩来的命令。如果杜向光不听命令，周恩来又拿他没办法，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要大跌，周恩来说话的分量就要大减，这也是杜向光想要达到的目的。周恩来也明白杜向光的用意，知道自己今天如果对付不了杜向光的话，那就离倒台不远了。

于是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行动，说：“我奉毛主席是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吗？红卫兵，执行命令！”

众人对杜向光高喊：“走！滚！”

虽说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对杜向光高喊口号，但杜向光还是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不走。最后周恩来对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也就是 8341 部队的战士，下命令说：“解放军，逮捕起来！”

杜向光万万没想到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今天会变得这么凶，竟然会下令当场逮捕他。在解放军战士面前，杜向光不敢再反抗了，只得乖乖被战士押出会场，关押起来。杜向光被逮捕后，支持周恩来的群众长时间鼓掌，而反对周恩来的造反派，本来说好了与杜向光“共进退”，但他们看到杜向光被解放军逮捕，感到心惊胆虚，也就不敢退场抗议了，于是会场上的气氛安定了下来。

(54)

周恩来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指挥得了 8341 部队。8341 部队是保护中央首长的特殊部队，直属中央警卫局领导。中央警卫局下属的“中央警卫团”，是直接负责保卫中南海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是汪东兴，中央警卫团的团长是张耀祠，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的心腹人物；而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是杨德中，中央警卫团的政委也是杨德中，杨德中是周恩来的心腹人物。因此，周恩来是可以指挥得动 8341 部队的。

周恩来这个强硬的一手，镇住了造反派的气焰，也保住了他自己的威信。周恩来对鼓掌的众人说：【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同志们：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杜向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混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相的同志起来反党，要夺取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

众人高喊：【打倒保皇派！】

周恩来很巧妙地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这个也解释为“阶级斗争”，让群众感到他这么做并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思想。

周恩来接着说：【我支持你们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我跟先念同志是站在一起的嘛！杜向光的问题你们听清楚了，他这样说话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像不像一个副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杜向光抵抗我的命令嘛，他说：‘总理的命令我怀疑，不能执行。’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他这样对待党中央，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杜向光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又请他，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

众人高喊：【谁对抗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

周恩来说：【杜向光没有今天的表演，揭发他还得费些事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我这一手。你们以为靠一个杜向光，就能夺走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你们看，杜向光是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上当啦！财政大权能让你们夺吗？你们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同志们：你们这样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我劝你们好好觉醒过来。】

众人高喊：【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

周恩来这里再次解释为什么抓杜向光的理由，并告诉造反派们，他们被杜向光骗了，财政大权是不能夺的，夺这个权的后果非常严重。

周恩来继续说：【毛主席从遵义会议以后，领导全党三十几年，我们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嘛，是清清楚楚的嘛。我们也犯过错误，要允许我们改正嘛。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老干部统统打倒，统统靠边站，这样你们就能接班哪？你们稍为冷静地想一想，政府这样的大事，你们不可能承担。把大权统统交给你们，我们不管了，我们都靠边站了，去休息去，那怎么对得住人民、对得住党、对得起毛主席呀！我们如果看到你们这样做，不出来纠正，那我们要犯罪的呀！】

周恩来明确指出：老干部是不能统统打倒的，造反派也是不能接管政府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显然与毛泽东提倡的“全国全面夺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55)

周恩来又说：【毛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飞机，不能这样斗。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老干部，你们感觉不到，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啊。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

李先念插话说：【老实讲，我就流了泪。】

周恩来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这是不应当的，为什么非要斗臭不可呢？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老干部，让你们为所欲为，行吗？】

李先念插话说：【有人说要把我打成黑帮。姚依林同志在中南海休息，你们还下了通缉令，让他出去接受批判。】

周恩来生气地说：【到底是中央做主？还是你们做主？你们能下这样的通缉令？让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是我要他在中南海休息。姚依林已经检查多次，

身体几乎倒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我下的命令保护姚依林，你这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就是向党通缉了。你们简直太过分了!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

周恩来告诉造反派们，他们用敌对的方式对待老干部，是因为他们对老干部没有感情，感觉不到。而周恩来与老干部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感情很深，绝不会看着不管，他要保护自己的老战友。

周恩来同时也敢作敢当，声明让姚依林休息是他的命令，对姚依林的通缉就是对他的通缉，并进一步声称，对周恩来的通缉，就是对党的通缉，暗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党，反中央，这样就镇住了造反派的气势。

周恩来最后说：【财政部的党委要恢复，每个部的党委都要恢复，你们不能推翻党委，哪有党组织可以由群众解散的?你们对业务只能监督，不能领导，责任业务的还是部长、司长。我劝你们回去好好开个会，痛切地检讨检讨，整一下风，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你们已经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你们这样做的结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你们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们不提醒的话，你们会滑下去的，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犯了错误。你们要好好地冷静一下头脑，我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

周恩来的这些话，完全是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上海夺权就是一个典型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例子。而周恩来号召恢复党委，不准推翻党委，夺权也只能夺政治权，不能夺业务权。周恩来的这些说法，都是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宣传的造反精神，完全相反的论调。

在“二月逆流”以前，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讲话和做法，还比较温和，比较

顾及毛泽东的面子。现在他们都豁出去了，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群众中公开宣扬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周恩来甚至直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这些都是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用这些示威，来打消毛泽东发起“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发起“大决战”。

(56)

在中共高官中，敢于当面挑战毛泽东威信的人是彭德怀，敢于当面挑战周恩来威信的人是杜向光。周恩来在党内的资格极老，威信极高，他和毛泽东一样，身上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威严感，让人在他面前肃然起敬，不敢冒犯。除了江青敢当面对周恩来耍任性发脾气之外，别的高官在周恩来面前都是毕恭毕敬，可以说杜向光是建国后第一个敢挑战周恩来个人威信的高官。杜向光被逮捕后，就停职反省，后来被下放到地方，再也没有回到中央，一直到死也没有给他平反。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大官如果处置不了冒犯他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他有民主思想的表现，而是认为这是他无能的表现。在彭德怀与毛泽东骂娘的时候，如果毛泽东处置不了彭德怀，彭德怀在冒犯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照旧当官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无能，今后毛泽东在中央里的威信，不能说荡然无存，也可以说一落千丈。同样，在杜向光拒不接受周恩来命令的时候，如果周恩来处置不了杜向光，那么周恩来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也是一落千丈。大家会认为周恩来无能，说话没人听。

中国政治的特点，自古以来就是等级森严，下级对上级绝不可以“犯上”，政治大腕人物的龙须更是触碰不得的。一般来说，“犯上”都要受到严厉惩处，毛泽东要严惩冒犯他的人，周恩来也要严惩冒犯他的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体制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2月17日，在周恩来、陈毅等人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大闹怀仁堂”的干将谭震林，则在干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一封信。不少人把谭震林写信这件事，说成是“给林彪写信”，这种说法不太确切。因为谭震林信的信头是“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显然，这封信不是写给林彪个人的“私人信件”，而是写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公开信”。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误解，是因为谭震林首先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看完之后，又把信转交给毛泽东。后来以讹传讹，误传为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林彪为了揭发谭震林，于是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

澄清这件事是有必要的，因为“私信”和“公开信”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果是私信，林彪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显然是披露别人隐私的不道德行为，并且由此得出林彪要陷害谭震林的结论。然而，谭震林并不是给林彪写私信，而是一封给毛泽东以及政治局委员的公开信。因此，林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必须把信转交给毛泽东，不存在揭发别人隐私的道德问题。

其实，谭震林这封信主要是写给毛泽东看的，第一收信人明明白白就是毛泽东。只有从这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看的角度，才能理解清楚谭震林的写信动机。

谭震林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指捕鱼事件)，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指大闹怀仁堂)。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57)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

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脱口而出”。陶铸、刘志坚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谭震林。2月17日。】

谭震林写这封信，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向毛泽东进一步示威，这是“大闹怀仁堂”的延续；第二个目的是纠正“大闹怀仁堂”中出现的一些“失言”；第三个目的是探测林彪的态度。

第一个目的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第二个目的，是因为谭震林和陈

毅在“大闹怀仁堂”时，一时兴起说话走火，说了一些“失言”的话，需要纠正一下。第一个“走火”的话，是谭震林说“不跟毛主席了”。当时很多老干部出于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尽管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却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所以，提出反对毛泽东搞的文革运动，绝大部分老干部都支持，而提出反对毛泽东这个人，相当多的老干部就会不支持。

因此，周恩来希望把这次“大闹怀仁堂”的对象，只是定位于毛泽东搞的文革运动，而不是毛泽东本人，这样才能得到绝大部分老干部的支持。而谭震林说“不跟毛主席”，很容易让别人误解，“大闹怀仁堂”的对象是反对毛泽东本人，这样就会失去很多老干部的支持。因此，谭震林需要再写一封公开信，纠正一下关于“不跟毛主席”的失言，以获得最大多数老干部的支持。

(58)

“大闹怀仁堂”中第二个“走火”的话，是陈毅提到延安整风的话题。陈毅之所以提到延安整风，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时，刘少奇派是整人的，周恩来派是挨整的，林彪既没有挨整，也没有整人。现在刘少奇派被打倒了，这就说明他们过去在延安“整”周恩来派，也是错误的，所以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这些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了嘛。”

然而，周恩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反对毛泽东搞的文革，而不是翻历史的旧账。延安整风本身就非常敏感，现在重提这个话题，不仅无助于解决“反文革”的当务之急，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周恩来当场就试图阻止陈毅说延安整风的话题，但陈毅却已经说了出来，所以事后必须补救一下，这也是需要谭震林写信纠正的“失言”。

谭震林的这封信，可以说写得“滴水不漏”，既简短，又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还没有破绽。这封信有可能是经过周恩来指点或修改的，否则谭震林这种性格的人，写出这样滴水不漏的信，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说谭震林的信写得“滴水不漏”呢？因为这封短短的信，紧扣“反文革”这个当务之急的主题，既向毛泽东示了威，又没有说过分的话或跑题的话，用词也恰到好处。

谭震林在信的开头说：【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谭震林首先声明，他之所以“大闹怀仁堂”和写这封信，是因为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忍无可忍”一语双关，它一方面告诉毛泽东，他们已经到了忍耐的底线，再逼他们就要造反了；另一方面又告诉林彪这些忠于毛泽东的人，他们这么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被逼无奈，请林彪等人原谅他们反毛泽东搞文革的行动。

谭震林接着写道：【江青和文革小组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谭震林这里想要告诉毛泽东的是：“你搞什么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我们都不管，但不能搞到我们这些老干部头上。现在革命搞到我们老干部头上了，很多人身体搞垮，妻离子散，这样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谭震林提示毛泽东应该尽快结束打倒老干部的运动，尽快给老干部们平反。

要给老干部们平反，就必须有人为这场打倒老干部的运动负责。让毛泽东为此负责，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谭震林就在这封信里，给毛泽东找了一个替罪羊，这就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谭震林声称：江青等人恶毒地整老干部，都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此毛泽东不必为此负责。后来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指控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基本上就是按照谭震林这封信里讲的思路。谭震林早在 1967 年就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概念，可见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59)

谭震林信里讲的迫害老干部的事情，林彪也很有同感。林彪不久前也跟江青大吵一场，他也很不喜欢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林彪也愿意让江青等人承担迫害老干部的责任。

谭震林又写道：【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谭震林站在维护毛泽东威信的立场上来骂江青，既骂了江青，又声称是为了毛泽东而骂江青的，真是骂得非常巧妙。就是让林彪等人看了，也会感到骂得痛快。

谭震林下面写道：【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怀疑江青他们的执政能力，这个是击中了要害。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执政能力都很差，全是靠毛泽东在支撑他们，一旦失去了毛泽东，江青这伙人就会马上垮台，事实上也是如此。谭震林向毛泽东指出江青和文革小组的这个致命弱点，希望毛泽东不要再重用他们了，他们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

谭震林再写道：【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谭震林在这里表态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斗争到底。谭震林特别指出他的“斗争目的”，是“不允许他们蛮干”。所谓他们，明里是指江青等人，实际上也是指毛泽东，指毛泽东搞文革是蛮干，他们要坚决阻止毛泽东的这场蛮干。这就是说，谭震林的“斗争目的”，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只是反对毛泽东的蛮干。

谭震林的这些话，主要为了弥补他在“大闹怀仁堂”时的失言。因为林彪等人尽管反对毛泽东搞文革，但他们还是忠于毛泽东这个人的，所以谭震林在这里声明：他只是要阻止毛泽东的蛮干，并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样就使林彪等人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谭震林的激烈行动。同时，谭震林的信中，完全不提延安整风的事情，这样就纠正了陈毅的“失言”。

谭震林在信中最后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这句话有些奇怪，因为到目前为此，这场运动还没有整到周恩来头上，周恩来并没有做过什么检讨，更没有挨过什么批斗，所以目前还不存在什么“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的问题，整周恩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谭震林是借着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对毛泽东把话挑明：“我们不会再等了，我们不会等到你开始整周恩来之后，才开始反击，那样就太晚了。如果你毛泽东不放弃整周恩来的计划，我们马上就会开始造反。我们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毛泽东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要整周

恩来，打倒周恩来的话，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60)

由上可见，谭震林的这封信写得非常恰到好处。第一是向毛泽东示威：请毛泽东好好考虑一下打倒周恩来的严重后果；第二又给毛泽东指出一条出路：只要你给老干部们平反，我们会依旧拥戴你，迫害老干部的责任可以让江青等人承担；第三，又告诉林彪等忠于毛泽东的人，谭震林他们是被迫无奈才这样做，他们只是要阻止毛泽东的蛮干，而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林彪等人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支持。

上面提到，谭震林写这封信的第三个目的，是探测林彪的态度。因为在这场反击毛泽东的大战中，林彪的角色至关重要。周恩来他们必须事先搞清楚林彪的态度，也就是林彪“是敌是友”的问题，才能据此来制定出相应的斗争对策。

怎样才能知道林彪的态度呢？直接去向林彪问，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需要借用一件事情，间接地判明林彪的态度。而谭震林的这封信，正好可以用来判明林彪的态度。因此，谭震林把这封信首先送到林彪那里，要看看林彪的反应。可以预测，林彪看了谭震林这封信之后，不外乎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林彪立即找谭震林谈话，林彪可以对谭震林说：“你的这封信里，这些话不该说，那些话说的不好，不能这样交给主席，需要重新修改。”或者林彪对谭震林说：“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给毛主席写信呢？这封信不行，你拿回去销毁吧。”

如果是林彪找谭震林谈话，不管他说什么，都是站在谭震林的立场上，替谭震林考虑，那么林彪就是朋友了，是可以团结过来的。所以，周恩来等人最希望能够看到林彪的这种反应。

林彪看到谭震林信后的第二种反应，是不找谭震林谈话，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如果林彪是这种反应，就说明林彪持中立态度，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只要林彪持中立态度，周恩来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林彪看到谭震林信后的第三种反应，是不找谭震林谈话，而是立即向毛泽东汇报，狠批谭震林的信，并与毛泽东共同制定对策。如果林彪是这种反应，就说明林彪是敌人了，周恩来等人的危机程度就比较大。不过从林彪以往的表现来看，林彪做出这种反应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谭震林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的态度马上就测试出来了。林彪既没有找谭震林谈话，也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而是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并写了一个简单批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反应表明，林彪的态度基本上是中立的，只是稍稍偏向毛泽东一点，因为林彪毕竟对谭震林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批评。

(61)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张春桥，组员王力和姚文元。出了这么大的事，文革小组中地位最高的陈伯达和康生，在会议散会后，居然丝毫不提要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这两个人在散会之后，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谢富治虽然在会上“和稀泥”，替文革小组说了一些辩解的话，但他也没有提出要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也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最后留下三个人：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

这时姚文元对王力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

姚文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陈伯达和康生的“立场不稳”，不仅在会上没有斗争，而且会后也不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所以姚文元怕王力的立场也不稳，要他站稳立场。

关于陈伯达和康生为什么会这样，前面我们已有解释，这里不再赘述。谢富治不是文革小组的人，他在会上进行了一些不坚定的“斗争”，但在会后，立场也不坚定，不准备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因为谢富治知道，今天这件事，谁去向毛泽东汇报，谁就会彻底得罪周恩来。谢富治从1959年就进入中央，任公安部长和副总理，对周恩来这棵大树的份量深有体会，所以 he 不想得罪周恩来，不向毛泽东汇报。

这样一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重任，就落到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才进入中央，他们就像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得罪周恩来的厉害，于是三个人一起乘车到钓鱼台张春桥的住处，商议对策。张春桥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我们要把情况凑一凑。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

他们三人凭着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很快凑出一份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那时候张春桥的地位还不高，没有资格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于是张春桥就带着王力和姚文元，一起去住在钓鱼台的江青那里，向江青报告。

江青那天是“托病”在家休息，她听了张春桥的汇报，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严峻的“路线斗争”，她说：“这是一场新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件事要马上报告主席，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江青的便条送过去之后，毛泽东的秘书很快传来通知，让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去见毛泽东。

从江青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江青还是颇有政治头脑的，她对每个人在会上表现的评价也是很到位的，而且决定马上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会议晚上7时结束，江青等人晚上10时就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还准备好来一份详细的会议记录，可见江青处理此事是非常迅速的。

(62)

据参加这次接见的王力回忆说：【晚10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他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注意到，张春桥汇报前边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张春桥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针对以后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给他看，有意见。”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毛泽东听到张春桥的报告，马上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之所以“光是笑”，是因为他不想在部下面前露出紧张的神色，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可是张春桥说到陈毅的发言，毛泽东发现问题比他想象的要重大得多，心中的紧张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所以就笑不出来了。

如果高官们只是讲对文革的不满，那么毛泽东还可以认为，这些高官是只反对他搞文革，并不反对他这个人。而陈毅提到对延安整风也不满，那就不仅是否定现在的毛泽东，连过去的毛泽东都要否定，那就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也就笑不出来了。

王力回忆说：【这次汇报的时间不长，大约谈了两个小时，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

当时，毛泽东不可能顾得上发脾气，也没有必要发脾气，他的当务之急是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对策。现在毛泽东不能轻举妄动，他要进一步观察高官们的动向，弄清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毛泽东听完张春桥等人的汇报，已经是2月17日凌晨了。2月17日这天，毛泽东什么行动也没有，他在认真地思考。在毛泽东看来，高官们这是一次集体的“逼宫”。而“逼宫”的目的，不外乎两种：第一种目的是“谏”，他们逼毛泽东停止文革，但不逼毛泽东下台。只要毛泽东停止文革，高官们还会继续拥戴他，不会触动他的领导人地位；第二种目的是“反”，他们不仅逼毛泽东停止文革，也要逼毛泽东下台。这样一来，不管毛泽东是否停止文革，高官们都要逼他下台的。

如果“逼宫”的目的是“谏”，毛泽东还可以做出一些妥协让步，特别是在搞文革方面做出一些妥协让步，换取高官们继续拥戴他；如果“逼宫”的目的是“反”，那么毛泽东就没有必要在搞文革上做出什么妥协让步了。因为不管毛泽东是否停止文革，他们都要逼毛泽东下台，既然如此，毛泽东也就豁出去了，来个鱼死网破，把文革搞到底。

单单从“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还不能确定高官们“逼宫”的目的，是“谏”还是“反”。但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这次没有参与“大闹怀仁堂”的林彪，他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于是毛泽东就派他最为信任的江青，去打探林彪的态度。

(63)

据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2月18日，江青要同我一起去报告林彪。她自

己先到林彪家，叫我在京西宾馆等着，然后又接我和她同车去到林彪那里，见了林彪，江青和叶群在座，叫我汇报，叶群记录。林彪只是听，没讲多少话，一句话是骂徐向前，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说“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汇报完了，江青叫叶群派车把我送走，她一个人留下来。】

根据王力的回忆，江青一个人先到林彪家里，两人做了一次不让外人知道的密谈。然后江青叫王力面见林彪，亲自汇报情况。因为江青并不是“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为了向林彪证实“大闹怀仁堂”的真实性，她特别叫了王力这个“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亲口向林彪汇报情况。

像林彪这样地位的人，虽然坐在家里不出门，但各种消息是很灵通的，特别是“大闹怀仁堂”这么重大的事情，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而且，谭震林在2月17日写的那封“公开信”，这时也送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对“大闹怀仁堂”的情况基本上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对王力的当面汇报，并没有感到惊讶或意外，只是淡淡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骂徐向前：“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第二句是替陈伯达说话：“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

林彪骂徐向前，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骂徐向前说的反对文革的话。可是叶剑英也说了反对文革的话，为什么林彪不骂叶剑英呢？这显然因为叶剑英是支持林彪的，而徐向前是毛泽东插到军队决策层的一个楔子，他是与林彪唱反调的。尽管后来徐向前改变了立场，但林彪依然不喜欢他，借着这个机会骂徐向前一下，想拔掉徐向前这个楔子。

陈伯达在“大闹怀仁堂”时，基本上没有讲话，所以林彪说“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这其实是针对毛泽东前几天对陈伯达和江青两人的批评。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高手低”，但林彪却没有附和毛泽东批陈伯达

的说法，而是认为陈伯达被冤枉了，替陈伯达说话。林彪替陈伯达说话，这也是后来陈伯达投靠到林彪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周恩来这一派对陈伯达也采取争取团结的姿态。尽管毛泽东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两个人，而“大闹怀仁堂”会议上，大家一致攻击江青，却没有一个人批评陈伯达。谭震林的公开信中，也是只骂江青，不提陈伯达。

从王力回忆的情况来看，林彪对“大闹怀仁堂”的态度是冷淡和中立的，没有大骂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反毛言论，更没有表示要坚决捍卫毛泽东。林彪的这个态度，与他在谭震林的信上写的批语，也是一致的。

(64)

王力向林彪汇报完之后，江青先把王力支走，她自己留下了，与林彪进行第二次密谈。这天，江青与林彪至少密谈了两次，密谈的内容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这次密谈中，林彪把谭震林的那封信和他写的批语，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

江青和林彪在2月18日的白天密谈之后，2月18日晚上，毛泽东开始行动了。据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叶群告诉我，2月18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

【毛泽东说：“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

【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老干部，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毛泽东为什么会说叶群这样的话？我们下面进行分析。

(65)

在2月18日，毛泽东搞清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林彪的态度。这一天，江

青与林彪至少密谈了两次，尽管我们不知道密谈的内容，但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大概是江青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希望林彪站出来坚决拥护毛泽东，但遭到林彪的婉言拒绝。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谭震林的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将给自己带来一场灾难：林彪对这封信表态不是，不表态也不是。林彪把谭震林的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林彪，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

林彪给谭震林信的批语是：【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当然不满林彪这种不痛不痒的中立态度，于是毛泽东把林彪的批件退回给林彪，以表示自己的不满。毛泽东在退给林彪的批件上写：【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见毛泽东把他的批件退了回来，当然也非常生气。尽管林彪表示中立，但还是稍稍偏向毛泽东的。于是林彪一时生气，就把毛泽东退回来的批件撕碎了。

在看到林彪对谭震林信的批示之前，毛泽东就担心林彪会持中立态度，所以他没有叫林彪过来亲自谈话，而是叫江青在他与林彪之间进行沟通。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脾气，林彪尽管不像彭德怀，但也有军人的火爆脾气，不是周恩来那种可以忍气和宽让的人。而毛泽东本人也是火爆脾气，如果毛泽东亲自与林彪面谈，两人话不投机的话，说不定就会争吵起来，甚至闹翻了。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是绝对不能与林彪闹翻的，所以这次毛泽东不直接跟林彪谈，而是让江青充当他和林彪之间的缓冲器。

毛泽东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二件事，是高官们“大闹怀仁堂”的意图。谭

震林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看到谭震林在公开信里，明确声明他们的“逼宫”的目的，只是“谏”，只是要求毛泽东停止文革，而不是要毛泽东下台，这个信息对于毛泽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谭震林写的那封补救“大闹怀仁堂”会上失言的公开信，是非常必要的，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毛泽东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三件事，是周恩来的态度。按照惯例，周恩来每次主持中央碰头会之后，都要写一个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或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会议之后，毛泽东等到2月18日，也没有看到周恩来送过来的书面汇报，周恩来也没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这就暗示，周恩来是支持“大闹怀仁堂”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是这次事件的后台。

(66)

据原建委主任谷牧回忆说：【这一次总理没有去汇报，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跟我讲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了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他又不敢说支持啊。】

2月18日毛泽东搞清了这三件事：第一，周恩来是这次“大闹”的后台；第二，林彪对这次“大闹”持中立态度。第三，高官们“大闹”的意图，是“谏”而不是“反”，他们提出四个要求：(一)不得向周恩来动手；(二)停止批斗老干部，特别是暴力揪斗老干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四)停止夺权，停止文革。

毛泽东搞清了这三件事之后，就要做出对策了。毛泽东的对策可以有三种：强硬对策、妥协对策、半强硬半妥协对策。“强硬对策”就是不管周恩来派系的“大闹”，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一项也不接受，按照原计划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对周恩来的决战；“妥协对策”是全盘接受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四项要求，

停止夺权，停止文革，双方全面和解；“半强硬半妥协对策”，是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要求的一部分，与周恩来派暂时和解。

毛泽东采取“强硬对策”的胜算并不大。毛泽东这边的人，除了林彪之外，文革小组的人都是书生，写文章，摇旗呐喊还可以，真正进行战斗是不行的。没有林彪和军队的支持，毛泽东一个人，率领几个书生，要想击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毛泽东还有一个极大的软肋，就是此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里的支持率，已经变成绝对少数，随时有可能被罢免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中央政治局罢免共产党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已有先例。

1964年10月14日，苏共政治局罢免了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位置。当时苏共发出的正式公报是这样写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0月14日举行全体会议，全会满足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5日，也就是赫鲁晓夫被罢免后的半个多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11月7日举行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和红场阅兵式。11月7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装作喝醉酒的样子，对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用我们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两国共产党就能和好了。】

(67)

周恩来立即对此进行了严重抗议，退出了招待会。周恩来回国时，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所有党政军的领导人，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周恩来，这是建国以来周恩来出访归来后，所受到的最为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迎接

仪式中，拍下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四巨头在一起的最著名“全家福”照片。

现在，毛泽东也面临赫鲁晓夫的危机。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立的十一人的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被打倒，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系的，朱德和陈云虽说被架空没有实权，但在关键时刻仍有表决权，他们两人肯定会支持周恩来的。本来是毛泽东派系的陈伯达和康生，他们两人在“大闹怀仁堂”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因此这两个人已经靠不住了，林彪的态度也是中立，只剩毛泽东自己一人。

这样一来，假如这时候周恩来提出一个“罢免毛泽东”的议案，提交政治局常委投票表决的话，周恩来、李富春、朱德、陈云四票赞成，陈伯达、康生和林彪三票弃权，毛泽东自己一票反对，那么周恩来的议案将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假如这样，中共中央就会发出一个公报：【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67年某月某日举行全体会议，全会满足毛泽东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停止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林彪同志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当时林彪也被列入个人崇拜的对象，也被神化了，已经是人们心目中的钦定接班人。毛泽东身体不好，由林彪来接班，人们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林彪虽说还是忠于毛泽东的，但让林彪当真正的国家第一把手，林彪也未必会拒绝，毕竟天下第一人的这个位置的诱惑力太强烈了。

当然，周恩来这一手的风险也是极大的，毛泽东还有一批保卫他的红卫兵，还有一些忠于毛泽东的将军，很可能起兵造反，这样中国就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和内战。所以，周恩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并不会来这一手。

如果毛泽东采取“妥协对策”，从个人安危的角度来看，倒是最为安全稳妥

的。毛泽东全盘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条件，停止夺权，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让江青和文革小组承担批斗老干部的责任，重新启用老干部，与老干部全面和解，大家重归于好，老干部们重新拥戴毛泽东，这样天下重新太平，毛泽东的地位也重新稳定下来。

但毛泽东这个人，偏偏不是贪图安逸的那种人，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挑战者。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地以为文革一定会成功，他知道文革有失败的风险，而且风险很大。1980年代，陈伯达出狱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陈伯达说：“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的。”

(68)

记者吃惊地问：“是吗？难道你预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吗？”

陈伯达说：“不但是我，连毛主席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只不过他是极力地预防而已。”

毛泽东知道文革有失败的可能，知道自己有被赶下台的可能，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把文革搞下去，不过他也要极力预防文革的失败。此时，毛泽东采取“强硬对策”的风险过大，所以他就采取了“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要求中的一部分，换取双方的暂时和解。

周恩来派系提的四项要求是：(一)不得向周恩来动手；(二)停止批斗老干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四)停止夺权，停止文革。

在这四项要求里，第一项“不得向周恩来动手”是根本，毛泽东必须接受，于是毛泽东暂停了发起打倒周恩来的决战。

第二项的“停止批斗老干部”，毛泽东接受一半，“批”老干部还是要继续，而“斗”老干部要停止，特别是暴力批斗要停止。“二月逆流”以后，暴力批斗

老干部大为减少，特别是老干部被造反派打死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少再发生了。

第三项的“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毛泽东绝不能接受，否则就是自毁长城。

第四项的“停止夺权和停止文革”，毛泽东也接受一半。此后毛泽东不再强调造反派单独夺权，而是强调“三结合夺权”。所谓“三结合夺权”，是造反派占三分之一的权力，老干部占三分之一的权力，军队占三分之一的权力。这样的夺权，显然是非常不彻底的，但此时毛泽东也只能这样妥协了。

毛泽东决定好这个“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之后，他就开始行动了。首先，毛泽东要把林彪拉上自己的战车，因为没有林彪这面大旗，镇不住周恩来派系的人。可是林彪持中立态度，这件事与林彪商量的话，林彪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毛泽东再次来个“先斩后奏”，先造成既成事实，让林彪不同意也不行。这就像1966年8月一样，毛泽东事先不跟林彪商量，就把林彪定为接班人。

当然毛泽东的“先斩后奏”，不便跟林彪本人直接说，于是毛泽东就叫来林彪夫人叶群。毛泽东一开始就摆出怒气冲冲的姿态，用不容商议的口气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听毛泽东突然这么说，当然是莫名其妙，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

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

(69)

毛泽东这里说出他的怒气冲冲理由：“陈毅、谭震林这些人不听我的话，不

跟我走了。”毛泽东指望叶群对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反毛泽东言行，表示出愤慨或者震惊。可是在叶群来见毛泽东之前，林彪肯定已经向她面授机宜，坚决不能表态支持打倒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因此，叶群在听到毛泽东说“陈毅、谭震林这些人不跟我走了”的话时，既没有表示愤慨，也没有表示震惊。

毛泽东见叶群没有表态，只得继续说：【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这里毛泽东亮出了底牌，用不容商议的口气说：第一，他决心把文革搞到底，第二，他要带林彪和叶群重上井冈山，重组解放军。

这么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下子落到叶群这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女人身上，使叶群不知所措，乱了方寸，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毛泽东的话，只好说：【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他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

叶群这么说，虽然没有表示她和林彪愿意跟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可是这句话的意思，也间接地表示他们坚决跟毛泽东站在一起，毛泽东要的就是叶群这句话。

叶群这么说了，自己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又语无伦次地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然后叶群就哭了起来。在关键时刻，女人还有一个男人所没有的武器“哭”，这时候叶群就把女人特有的武器拿出来，哭了起来。

叶群一哭，毛泽东知道继续和她说，已经不会再有效果了，于是就用安慰的口气对叶群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让叶群把他的的话转告给林彪，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一定会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

毛泽东当然不能让谈话就这么结束，他还要争取叶群这个人。毛泽东知道，叶群对林彪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他要给叶群一些好处，给叶群一些甜头，拉叶群靠拢到自己这一边。叶群靠拢过来，她就会影响到林彪也靠拢过来。于是毛泽东故意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叶群按照林彪的吩咐，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

毛泽东于是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今后的中央常委会和中央碰头会，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

叶群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得到这种参加中央常委会和中央碰头会的殊荣，她当然是非常高兴的，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以后，叶群就以林彪的名义，出席各种高层会议。这个极大的殊荣，是毛泽东给她的，叶群当然要感谢毛泽东。叶群对毛泽东的好感，从而也会影响到林彪，这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效果。

(70)

2月18日晚，也就是毛泽东和叶群谈话之后，毛泽东开始要跟周恩来面对面地“对决”了。虽说毛泽东已经预定好“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但在面子上，毛泽东一定要占上风，一定要赢一个气势，赢一个面子。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这个人并不在乎这种面子的，周恩来也愿意给毛泽东面子，所以毛泽东这里就不客气了。

2月18日晚，正确地说是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一次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为党主席，毛泽东有随时召开常委会的特权。毛泽东这次要解决“大闹怀仁堂”问题，所以叫来的都是参加“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十四个人全都叫来，他只叫了

其中的七个人过来开会。

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十四个人中，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格来参加会议；谢富治虽然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只是候补委员，但他在“大闹怀仁堂”时的表现较好，所以毛泽东出于对谢富治的表扬，特别叫他来参加会议；陈伯达虽说是常委，但因为毛泽东不久前才批评了陈伯达，这次叫他来不合适，所以就没有叫陈伯达；康生在“大闹怀仁堂”时的态度中立，毛泽东叫康生来是要争取团结他；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时没有说过分激烈的话，所以毛泽东叫他们两人来；在陈毅和谭震林说了过分的话，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上骂这两个人，所以不叫他们两人来比较好，因为当面骂这两个人，太不给他们面子了；徐向前虽说也没说太过分的话，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转变立场不满，也准备在这次会上骂徐向前，所以不叫徐向前来也是给他一个面子。

这次会当然是少不了周恩来的，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叶群。尽管叶群并没有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但她是代表林彪来参会，算是给毛泽东助威吧。毛泽东没有叫林彪来，因为他知道即使叫林彪来，林彪也会称病推托的。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摆出一副震怒的样子，说：【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文革小组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毛泽东在这里大发脾气，虽说他没有点名发脾气的对象，但参会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这次发脾气，针对的是周恩来。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个特点：他对某个人发脾气，就是对这个人抱有希望，对没希望的人，他就不发脾气了。

(71)

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彭德怀，对彭德怀客客气气的，还请彭德怀吃饭，这就是对彭德怀不抱希望了；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刘少奇，也对刘少奇客客气气的，还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请他保重身体，这也是对刘少奇不抱希望了。如果这次毛泽东请周恩来过来，客客气气地跟周恩来谈一次话，还把周恩来亲自送到门口，那就是说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周恩来，这是最后一次与周恩来告别了。相反，如果毛泽东对周恩来大发脾气，那就是说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抱有希望，还不准备跟周恩来摊牌。因此，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大发脾气，反而安心下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暂时不会发动打倒周恩来的决战了。

毛泽东也清楚，周恩来熟知他的性格，他发脾气暗示着什么，周恩来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发脾气的第一个主题，是文革小组。周恩来派系在“大闹怀仁堂”的会上，以及在谭震林的信中，都用集中火力批判江青和文革小组，要求“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这个条件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因此毛泽东要为文革小组辩护，并开诚布公地亮出自己的底牌，说：“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毛泽东用这个态度，把话说死了，表明他在文革小组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然后，毛泽东针对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停止夺权，停止文革”要求，亮出自己的态度。毛泽东说：【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毛泽东先指责周恩来等人，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出“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都是同意的，怎么现在又反对了？其实，周恩来等人反对的不是文革，

而是反对夺权。毛泽东搞什么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破四旧，周恩来等人可以不管，但是一旦搞到了“夺权”，周恩来他们就要管了。

毛泽东也明白，周恩来等人主要反对的是夺权，对夺权之外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因此毛泽东这里不提夺权，没有坚持说要把“全国全面夺权”搞到底，只是说要把文革搞到底。这里毛泽东也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一半，夺权可以暂时停止，但文革绝不能停止。所以毛泽东不提夺权，只是用坚定的口吻说：“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然后，毛泽东针对谭震林在会上说的“不跟毛主席了”，进行了反击，他说：  
【谭震林说他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谭震林可以退出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谭震林该不该活到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

(72)

毛泽东这里摆出无所畏惧的姿态，表示：“你们不跟我，我也不怕，大不了重上井冈山，重新革命”。这时毛泽东又特别对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这里特别提到林彪，是要用林彪这面大旗来“震”一下周恩来派系的人，声明林彪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其实林彪并没有表示要跟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这是毛泽东自作主张，把林彪拉进来。

要是在以往，毛泽东一旦说出“重上井冈山”这样的气话，周恩来总会出来

说几句打圆场的话，平息一下毛泽东的愤怒。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意思好像是说：“你重上井冈山我们也不怕，别拿这个来吓唬我们。”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出来打圆场，自己不好下台，愈发愤怒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大脾气，怒吼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们来搞！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你们把陈伯达逮捕，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据参会的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然而毛泽东这些话虽然脾气很大，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只是一些气急了乱讲的气话。

周恩来见毛泽东气成这样，知道自己必须出来打圆场了，否则毛泽东是下不了台的。于是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地自我检讨说：【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见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了，气也就消了大半，但还有一些余怒，说：【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毛泽东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的话，虽然“狠”，但并不“伤人”。前些天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这是很伤人的话。所

以毛泽东对陈毅、谭震林等，还是手下留情的，不伤他们的面子。

(73)

毛泽东见该说的话都说了，再说下去，说不定自己一时性起，会说出什么伤人的话，于是决定收场，说：【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完毛泽东一甩手，拂袖而去，退场走了。

毛泽东此时甩手而去，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大家都会很尴尬。毛泽东最后几句话是认真的，表明他准备把这个问题在党内讨论解决，也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用“重上井冈山”的武力方式来解决。毛泽东其实也是声明，他上面讲的那些“重上井冈山”的话，只是气话而已，不能当真的。

毛泽东这次用发脾气的办法，巧妙地回答了周恩来派系提出的要求，又保住了自己的威严和面子。对于周恩来派系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得对周恩来动手”，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毛泽东对周恩来发脾气，这就意味着他对周恩来抱有希望，不会打倒周恩来。其次，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开会讨论解决”，这也是表示不会打倒周恩来。因为政治局中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周恩来的，依靠政治局绝对不可能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不怕毛泽东通过政治局处理这件事，就怕毛泽东不通过政治局处理这件事。打倒陶铸，就是没有通过政治局讨论，江青和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一个宣布，就把陶铸打倒了。周恩来担心的也是毛泽东用打倒陶铸的方式来打倒他。既然毛泽东说通过政治局来处理这件事，那么就意味着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不会对周恩来动手了。

“大闹怀仁堂”的底线是“不得对周恩来动手”，既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底

线，那么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其他事情是可以让步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的要求决不让步，这点周恩来就要让步了；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停止夺权，停止文革”的要求，让步了一半，这点周恩来派系也可以接受；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停止批斗老干部”的要求，用另外一种形式做了回答，这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社论《正确对待干部》，该文指出不能一概否定老干部，不能暴力批斗老干部。对此，主笔这篇文章的王力回忆说：【总理看了《社论》很高兴，他主持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是他亲自读的。陈老总在会上特别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办，大家就没意见了。”】

周恩来派系发起的“大闹怀仁堂”是成功的，它迫使毛泽东暂时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对老干部的夺权和批斗也大为降温，扭转了文革的方向。这次冲突能够和平解决，是因为双方都做出了较大的让步，毛泽东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周恩来也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周恩来作出的让步。

(74)

2月18日晚毛泽东大发脾气的会议上，周恩来说：“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周恩来说的这几句话，虽然是为了平息毛泽东的愤怒和缓和会议的紧张气氛，但这几句话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周恩来承认了自己有错，并且承认陈毅、谭震林等人有错，应该检查和检讨。于是毛泽东就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三人进行批评，这样周恩来也没法抵

制，因为他自己也承认陈毅等人有错，既然有错，那就必须检讨，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说周恩来太软弱，老是对毛泽东认错，唾面自干，其实不然。在毛泽东大发脾气的时候，在毛泽东扬言要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周恩来如果一言不发，不认错，那就逼得毛泽东非要重上井冈山不可，结果就是全面内战。为了避免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全面内战，周恩来只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况且这次毛泽东也做出了重大让步，周恩来这里做出让步，并不算吃亏。

周恩来也知道，陈毅、谭震林等人心中不服，对检讨想不通，所以周恩来告诫他们说：“该检查就检查，要讲斗争艺术，这样做并不是怕谁，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据周恩来秘书童小鹏回忆说：【总理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师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批评，由周恩来主持，参加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和文革小组成员。政治局委员中，除了谢富治，心里都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赞成和同情，所以只是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走个过场。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师和副总理，到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

【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

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75)

其他老师和副总理都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的，文革小组火力全开地展开了批判。康生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谢富治说：“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江青又指责周恩来“动摇”，说周恩来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周恩来则委婉地反驳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敏锐的，有些迟钝。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

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

很快，文革小组又把“二月逆流”事件泄露到社会上，引起造反派的义愤，在全国掀起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3月14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二月逆流”，炮轰、火烧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两帮凶”。所谓“三老”是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老干部，“四帅”是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四位元帅，“两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本来周恩来以为让陈毅等人“请假检讨”一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了不起的事，被红卫兵贴一些大字报，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还有一个后手，反手把周恩来打了一个跟头。

当时有政治局委员22人，其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被打倒；朱德、陈云、董必武、刘伯承无实权，有实权的就是“三老四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七个人。现在，有实权的“三老四帅”出了问题，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也就无法正常召开了。

于是毛泽东提出：鉴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无法正常召开，就让中央文革小组暂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知道，所谓的暂时，很容易就变成永久。但周恩来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反对，只得接受下来。而且，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四项要求做出了重大让步，在这里周恩来也得让步。

(76)

周恩来的让步是很大的，因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是仅次于毛泽东党中央主席的第二大权力。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毛泽东本想让林彪主持，但林彪以身体原因，把这个第二大权力让给了周恩来。现在，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被夺走，对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此后，一个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不过在这时，林彪向周恩来伸出了援手。因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种体制改革的大事，毛泽东不得不征求林彪的意见。据原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向毛泽东建议：“中央文革碰头会”，不要搞中央文革小组的清一色，要有老同志和军队的同志参加，要由总理来主持。】

陈伯达也回忆说：【我后来才知道是林彪向毛主席提出的，林彪对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毛主席很不客气地批评江青说：“文革小组不能对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这就是后来总理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原因。】

毛泽东也知道，现在全部夺掉周恩来的权，反对的阻力太大，况且林彪也不支持。因此，毛泽东就让周恩来主持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虽说名义上周恩来还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用“剥笋”的方式，剥掉了周恩来的支持者。让周恩来一个人孤掌难鸣。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十二个人，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再加上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这样一来，“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恩来派系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真可谓孤掌难鸣。

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但周恩来也非同小可，居然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也能撑了下去。周恩来的生存策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这四个新加入进来的人，除了谢富治之外，其他三个算是中立态度，而文革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江青和江青派系的张春桥、

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还是有可能团结过来的，至少要争取到他们的同情。

戚本禹原本是陈伯达派系的，后来投靠到江青那边去了。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说有十二个人，但真正能拍板只是两个人：周恩来和江青。周恩来出于人数上的劣势，不得不摆出低姿态，对江青唯唯诺诺，尽可能不与江青发生正面冲突，否则江青仗着人数优势对周恩来进行围攻，周恩来将非常被动。一些人因此说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是没有骨气，其实周恩来这种低姿态也是一种策略，它从反面衬托出江青的傲慢和霸道，使人们对她反感，使周恩来得到同情。

(77)

据吴法宪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当时没有什么人替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

【一天晚上，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

江青这种霸道地发脾气，周恩来反而是不怕的，因为江青这是在自毁长城，人心尽失。江青以嘲笑的口气对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也得来开我们这个碰头会，因为你那个碰头会已经不起作用了。”面对江青咄咄逼人的姿态，周恩来是以柔克刚，反而用讨好的口气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周恩来知道，办事权是根本，不管什么指示，必须要有人具体执行下去，只要掌握这个执行权，就是掌握了实权。因此，周恩来可以把制定战略的大权让给

江青，但自己一定要掌握住“执行权”这个实权。

另外，周恩来很快看出，江青根本没有制定战略的组织能力，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足惧。虽说江青也有点自知之明，承认自己的组织才能不如周恩来，但江青不是“不如”，而是根本不能相比。所以。周恩来就干脆让江青出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完全搞不懂应该如何主持会议，搞得一团糟。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文革碰头会，就是大家哇啦哇啦说一通，既无议程，又无结果。总理只是他有什么事，到这里通过一下，另外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办，他去办而已。】

江青这个人的性格是一有权就翘尾巴，说话蛮横，态度霸道，不但不会团结大多数，反而得罪了大多数。周恩来看出江青这个缺点，有意让江青来主持工作。江青不出来主持工作，得罪的人还少一些，她越出来主持工作，得罪的人就越多，反而是帮了周恩来的忙。尽管周恩来被江青夺去一部分权力，可是江青因此而得罪了很多人，周恩来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跟毛泽东又打了一个平手。

周恩来最困难的时间是1967年3月，因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被夺走，他只剩下国务院的一些权力。不过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江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本主持不下去，很多事情不得不交到周恩来这里处理，这样周恩来实际上又掌握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

江青也知道周恩来善于团结大多数的厉害，她曾当面斥责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小组分庭抗礼，把文革小组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要拆散中央文革小组。”但江青说归说，她在团结人的方面，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

(78)

到1967年4月，周恩来基本上占上风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除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都越来越反感江青的横行霸道

做派，明里暗里支持周恩来的人越来越多，周恩来居然反败为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里站住脚了。

周恩来站住了脚，说话也就硬气起来，4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把“二月逆流”的说法改为“二月的乱子”，大大减轻了这件事的性质。周恩来说：【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所以，在批判‘二月的乱子’时也联系到我。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此事主观上是拥护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

毛泽东也看出江青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他这一掌打了周恩来一个跟头，没想到周恩来又站起来了。周恩来站起来了，周恩来派系的人也活跃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对周恩来派系做出让步，对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进行一些安抚，防止他们再搞一次什么“逆流”。

4月26日，毛泽东让陈毅、谭震林和徐向前，重新参加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算是他们三人的“请假检讨”结束了；4月29日，毛泽东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恩来和参与“二月逆流”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开了一个团结会。据李先念的秘书蒋冠庄回忆说：【毛主席在比较了解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

1967年5月1日的“五一节”，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参与“二月逆流”的高官，都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中央领导人在重大活动上露面，就是表示没事；不露面，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这次参加“二月逆流”的高官们全体露面，不仅是表示他们都没事，而且也是表示“二月逆流”本

身不算什么问题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师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师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师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

## 第十八节 重点突破夺权

(1)

“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不再提“全面全国夺权”了，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不再提“1967年2月到4月是决胜负的时期”了，整个文革运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顿。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在1967年1月1日发起的“全面全国夺权”，已经失败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一场“全面全国夺权”运动呢？这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认为，他之所以要发动文革，是起源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一部分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另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这里讲得很清楚，从中共建国之初，党内就出现了关于新中国“何去何从”的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应该直接搞社会主义；第二条是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必须先搞一段资本主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在毛泽东的强势领导下，党内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占据上风，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开始复苏起来，并且势力越来越大。

到文革前夕，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已经大大超过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势力，出现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堕落了，变修了。毛泽东说：【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毛泽东认为，这些变修的党员干部，把自己手中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权。毛泽东说：【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 (2)

如何处理变修的党员干部？怎样阻止党员干部变修呢？毛泽东用过思想教育，整党，甚至撤职的办法，但都没有效果。毛泽东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总结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党内从建国开始就有一条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二)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越来越大；(三)走资本主义路线势力的越来越大，客观上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困难，主观上的原因是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腐败堕落了；(四)怎样扭转党内走资本主义路

线势力越来越大的局面呢?毛泽东先用教育整党的办法，结果不行;又用“四清”的办法，结果还是不行;所有的办法都用了，最后只好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毛泽东说：【我多次提出这个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我们这批人一死，资本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靠他个人的威信支撑着。一旦毛泽东去世，中国马上就会走上资本主义路线的发展道路，所以毛泽东要趁他还活着的时候，把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打垮，至少也要大大削弱这股势力。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垮和削弱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

怎样打垮和削弱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呢?这就是“夺权”，夺取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走社会主义路线势力的手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最初的夺权设想，是先区分出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然后有针对性地夺权。后来发现，区分谁是走资派，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所以毛泽东干脆不分了，只要是当权派，一律夺权。毛泽东说：“不管谁的权，先夺过来再说。”

这样一来，造反派就对当权派一律夺权。不管是军队的当权派，还是地方的当权派，都要夺他们的权。这种对当权派的一律夺权，必然引起当权派的集体抗争。“二月逆流”就是以周恩来为首当权派的集体抵制，也得到林彪军队派系当

权派的支持，造成毛泽东在党内孤家寡人的孤立局面，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暂时把局势稳定住。

(3)

不少人从“常识论”的观点来看，认为毛泽东搞“全面全国夺权”，他一个人领导几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再加上一批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就要对全国的当权派进行夺权，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异想天开。因此有不少说毛泽东很愚蠢，完全是胡来。

但毛泽东这样的人，从来不用“常识论”来思考问题。当年毛泽东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上井冈山，要战胜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要夺权全中国的政权。按照“常识论”，毛泽东上井冈山无疑是非常愚蠢的，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毛泽东硬是把“常识论”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这时候没有人敢说毛泽东愚蠢了，这个就叫奇迹。所谓奇迹，就是用“常识论”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讨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不应用“常识论”来进行评论。

毛泽东发起“全面全国夺权”，也是他相信奇迹，但这次奇迹没有发生，这场“全面全国夺权”运动无情地失败了。虽然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智慧，讲出很多头头是道的道理，什么毛泽东骄傲自满起来，什么毛泽东变老糊涂了，等等之类，但这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毛泽东从来不是按照常规或常识来出牌的人。

如果遇到高官们集体抵制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就会停止文革，那就不是毛泽东了。毛泽东是不会认输的，他还要继续战斗，要把文革“搞到底”。当然，毛泽东也要反思他的战略，现在这种“全面全国夺权”的打击面太大，而周恩来派系为代表的老干部们又意外地团结，自己的力量不够发起和支撑一场“全面全国夺权”。于是毛泽东改变战略，从“全面全国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毛

泽东的这个思路，与解放战争时蒋介石的思路一样。

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对毛泽东控制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但由于战线太长、太大，蒋介石的人力物力支撑不起，所以失败了。于是蒋介石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延安，试图先在一点上取得突破，再带动全局的胜利。现在，毛泽东也采用蒋介石的战略，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毛泽东的思路是，对其他地方暂缓夺权，特别是对军队的夺权要停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先夺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权，这就是周恩来控制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外交部长是陈毅，财政部长是李先念，只要夺下“外交部”和“财政部”的权，那么支持周恩来的势力就会大为动摇，然后再乘胜追击，一举夺取周恩来的权。

毛泽东的“重点突破夺权”战略，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调整期，大约三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积蓄一下力量，为决战做准备；第二步是决战期，毛泽东大致把决战期定为1967年7月到8月之间，在决战期对周恩来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发起重点猛攻，一举夺下这两个部门的权力。

#### (4)

在当前的调整期，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调整和改善他与党内高官们的关系，扭转自己过于孤立的处境。

在“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中，毛泽东夺权的范围太大，不是周恩来派系的干部也要夺权，这样就引发全党性的普遍抵制，不仅造成毛泽东的极度孤立，也造成毛泽东与老干部们的关系极度紧张。现在，毛泽东要改善与老干部们的关系，特别是搞好与军队老干部们的关系，把党内大多数老干部团结过来，这样才能在

对周恩来的重点进攻战役中，保证自己不会陷入党内孤立的境地。

本来，毛泽东搞文革的理念，是要拿掉整个老干部集团，换上一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人。现在毛泽东要团结党内大多数老干部，是有违他搞文革的初衷的。可是，在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把理想暂时搁置一边，先拿掉周恩来集团再说。

为了团结老干部，毛泽东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停止暴力批斗，这样大部分老干部的日子比较好过了，自然也就改善了毛泽东与他们的关系；第二件事是停止全面夺权，不再触及大部分老干部的权益，这是让他们不再反对毛泽东的关键；第三件事是从姿态上安抚老干部，毛泽东在1967年4月底，和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开“团结会”，让他们上天安门，也是为了改善关系，一方面安抚他们不再闹事，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和瓦解周恩来派系的效果。

毛泽东做的第四件事，是释放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联动”的成员。在1967年初全面夺权开始时，因为“联动”极端反对中央文革，被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根据《公安六条》的精神，谢富治主管的公安警察出动，将一百多名“联动”的主要成员逮捕入狱。这些高干子弟入狱，必然引起他们父母对毛泽东的不满甚至怨恨。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上，李先念特别提出“联动”不是反革命组织，不仅是为“联动”鸣冤叫屈，也是煽动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

毛泽东4月22日亲自下令，释放全部“联动”的成员。当然仅仅释放“联动”成员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明白，这是毛泽东主动释放他们，而不是周恩来争取来的释放，要把这个“释放之恩”记在毛泽东的账上。因此，在“联动”成员释放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接见他们。

江青讲话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我是有点不好，就是接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接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你们了。主席说要立刻释放你们。】

众人顿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些人激动得哭了。

江青接着说：【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可以回家去。】

众人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5)

江青继续说：【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搞“联动”的话，可以把“联动”的牌子挂出去，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如果不搞“联动”，可以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我不知道我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得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要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江青说这些话，是要试图让“联动”感谢自己和毛泽东的宽大处理之恩，试图把“联动”团结到毛泽东这边来。

在当前的调整期，毛泽东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保护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热情”。在全面全国夺权的日子，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积极向当权的老干部们夺权。可是一旦暂停全面全国夺权，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没有了目标，就会造成他们的革命热情消退和涣散。

因此，毛泽东需要给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一个新的斗争目标，让他们的革命热情有地方发泄，保证他们到1967年7、8月间，仍有足够的革命热情。因为在这时毛泽东要对周恩来发起总攻，此时造反派们保持足够的造反热情，是非常重

要的。

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新斗争目标，最为合适的就是刘少奇这只死老虎。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的问题重新推出来，让刘少奇成为斗争的靶子，让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他们的革命热情，暂时转移到斗争刘少奇身上。然而，刘少奇在文革前五十天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已经揭批的差不多了，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提出来作为新的揭批靶子。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毛泽东改了三遍，直指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书。毛泽东说：【刘少奇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当然，只批刘少奇一个人，靶子还不够大，于是毛泽东把批判面扩大到整个刘少奇集团的高官。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该文件指出：【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刘、邓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作为毛泽东的过渡调整战略，在二月逆流之后，“全国全面夺权”暂停了，转而出现在一个揭批刘少奇和揪叛徒的新浪潮。

(6)

1967年3月到6月，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从“全国全面夺权”到“重点

突破夺权”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内，毛泽东除了发起批判刘少奇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之外，没有其他大的行动，这段时间的文革，相对不是那么激烈。当然，这段时间也发生了一些大事，我们做一些简要介绍。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文化大革命从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海瑞罢官》，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1967年一月风暴的夺权，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资产阶级的权。】

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吹响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标志性文章。毛泽东说：从1967年4月开始，文革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思想上夺资产阶级的权”。毛泽东这么一说，很多人就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实质性的夺权已经过去，以后就是在思想上搞文革了。这种所谓的“思想夺权”，当权的老干部们当然是不怕的，他们纷纷额手相庆，以为文革到此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真正的文革还在后面呢。

从建国开始，北京在“五一”和“十一”这两大节日，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游行和联欢，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打破惯例，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红卫兵成了主角，使老干部们黯然失色。而1967年的“五一节”，毛泽东又回到惯例，不再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是清一色的老干部，他们又成了主角。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老干部们说：【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广场上是小将。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今天除了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

毛泽东让除了刘、邓、陶之外的老干部，统统上天安门，表示出他对高官们的示好与和解。毛泽东又说：【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师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师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谭震林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还不是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吗？】

这时徐向前插话说：【我身体不好，请萧华代替我工作。】毛泽东说：【还是你搞吧。】

对于毛泽东抛出的橄榄枝，周恩来也做出了回应。5月5日，周恩来给“大闹怀仁堂”的五个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周恩来的信是这么写的：

(7)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为了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

如果周恩来真的要告诫这些人，完全可以用找他们谈话的形式，这样可以当面把话讲得更清楚透彻，完全没必要写信。周恩来写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上述五个人，实际上是写给毛泽东看的。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我提醒这五个人注意，不要以为毛泽东让步了，就可以翘尾巴了。我告诫他们不要再次发起什么‘逆流’，请毛泽东放心。”

4月1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吹响了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

批判”的号角。该文虽然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但谁都知道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该文在最后给刘少奇下了一个定义：【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7年4月起，各种报刊大量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人民日报》就有几十篇之多。这次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从政治上、思想上、历史上把刘少奇彻底批臭。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300个“黑帮”陪斗。这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大会，可谓盛况空前，史无前例。

刘少奇的“罪行”，除了“镇压学生运动”、“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洋奴哲学”等过去已经揭发出来的以外，又新揭发出来一个“叛徒”的问题，主要是发生于1936年8月的薄一波等61人自首出狱的“叛徒集团”问题。

1935年9月，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人一起走完长征，来到陕北。1935年11月，刘少奇授命主持中共北方局，他化名“胡服”，秘密潜入天津，开展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当时北方局的干部极为不足，刘少奇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想出一个“奇招”：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发表“反共启事”的自首手续出狱，然后再来为党工作。刘少奇把这个想法上报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说：“登反共启事出狱，虽然有些不好的影响，但这样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只要搞好革命，那点影响是可以弥补的。”

张闻天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张闻天后来说：“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1936年8月，狱中的薄一波等党员，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在自首书上

签名按手印，并发表“反共启事”。该启事写道：【(薄一波等)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个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以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8)

不过，当时也有人反对刘少奇的这种做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中间，有刘格平和张良云两个党员，坚决拒绝发表“反共启事”，他们声称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发表任何叛党启事。因此刘格平和张良云一直坐牢到1944年才出狱，比薄一波等多坐了8年牢。解放后，刘格平因为当年违背了刘少奇的指示，在刘少奇当权的年代，一直未被重用。直到刘少奇倒台，刘格平这位当年反对刘少奇的人，才扶摇直上，成为山西省第一把手。

按照中共的纪律，一旦党员发表“反共启事”，那就意味着叛党，那就是叛徒。允许狱中的党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然后再回到党内工作，中共的历史上仅此一次，可见刘少奇做的这件事，是非常离经叛道的。后来，一些人把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解释成因为“日军即将占领华北，为减少这批干部的牺牲。”事实上，日军占领华北是一年以后的事，刘少奇不应该事先预知一年后的事，况且刘格平等人在日军沦陷之后，也没有被枪毙，因此减少牺牲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为了减少牺牲，就可以暂时叛党的话，那么谁都可以为了避免牺牲，发表一个“反共启事”出狱，那岂不是没有了原则。这件事也反映出刘少奇的性格，认为一件事情只要有好处就可以干，不太讲原则。从这点看，

刘少奇认为私有制可以发展经济，就可以放弃共产党搞公有制的原则，也不为怪。

在 1936 年的时候，毛泽东只负责领导红区的军队，不管白区的事务，因此毛泽东说他当时不知道刘少奇干的这件事，也是可能的。1967 年 3 月 16 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等自首叛变材料》，声称刘少奇背着毛泽东让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并把薄一波等的出狱性质重新定为“自首叛变”，这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不过把薄一波等人重新定为“自首叛变”，周恩来最初是反对的。尽管周恩来对这件事并无责任，但他认为这件事是张闻天当政时的党中央批准的，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责任。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不过最后周恩来还是同意毛泽东批发《薄一波等自首叛变材料》，因为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把文革的“大夺权”，转向到对刘少奇集团的“大批判”，这就让周恩来派系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压力大为减轻，也就不再反对了。

#### (9)

在这一段调整过渡期，还发生了文革中首次大规模流血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1967 年 1 月 12 日，青海省造反派响应夺权号召，夺了《青海日报》的权。1 月 23 日《军委八条》发布以后，中央号召军队积极“支左”，青海省军区负责人赵永夫认为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不是左派，所以宣布对《青海日报》实行军管。但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拒不接受军管，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冲突。2 月 23 日，赵永夫下令军队用武力强行占领《青海日报》，遭到造反派的抵抗后，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 169 人，伤 100 多人。

因为《军委八条》中有“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的条文，这对

于军队来说，就是可以动武的尚方宝剑，赵永夫据此下令军队强行占领《青海日报》。当天，赵永夫电话向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汇报，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剑英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毛泽东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从毛泽东的内心来说，他对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当然是反对的，但毛泽东当时却没有表态。因为前几天才发生了高官们集体“逼宫”的“大闹怀仁堂”，毛泽东不想在此时批评军方，恶化他与军方关系，所以毛泽东就没有表态。

毛泽东不表态，就被认为是支持或默许，于是赵永夫成为军队中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3月8日，叶剑英让赵永夫来北京参加“军级干部会议”，安排赵永夫在会上多次讲话，介绍“反击右派组织”和“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赵永夫一时间大出风头。

这样一来，毛泽东认为再不表态不行了，因为如果军队把这种开枪镇压正当化的话，造反派就无法生存了。于是3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批示说：【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毛泽东的语气虽然轻，但态度是坚决的。林彪深知毛泽东常用这样客气的气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因此他马上也表态，支持重审青海事件。

其实林彪也不赞成军队对造反派动武，因为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已经表现出与老干部们和解的意思，不再对军队进行夺权了。从林彪的立场来看，既然毛泽东不再对军队夺权，那么军队也就不再干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军队抓捕毛泽东的造反派头头，甚至动武镇压造反派，这就是重新挑起军队与毛泽东的冲突，这是林彪不愿意看到的。

林彪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军队不能随便抓人，查清了的确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要少抓。一般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林彪同意毛泽东重新处理青海事件，3月24日对赵永夫实行“隔离审查”处理，叶剑英和徐向前也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

青海事件发生于2月23日，而中央直到3月24日才对青海事件作出结论，这是中共高层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10)

在文革的调整过渡期，军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第一个重要事件是林彪主持发布《军委十条》。

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表示出与老干部们和解的意思，特别是对军队，毛泽东表示出不再在军队里搞文革的意向。这就使林彪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也想与毛泽东和解，修复一下两人在“二月逆流”中一度紧张的关系。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在地方上搞文革，他不管，只要不在军队中搞文革就行。现在毛泽东已经准备停止在军队中搞文革了，那么军队也就不该再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然而，军队的高官们却还在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特别是1967年1月28日，旨在抵制文革的《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高官们出现一个抵制文革的高潮，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二月逆流”之后仍在进行。

因此，林彪认为有必要向军队发出一个指示，让军队高官停止干预地方上搞文革，改善军队以及林彪本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在2月23日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下令向造反派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后，林彪更感到有必要发出一个文件，限

制军队抵制文革的过火行动，这就是林彪发出《军委十条》的基本背景。

1967年4月2日，林彪找黄永胜谈话，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场。据张云生回忆说：

【林彪问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答：“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应当怎么办？”

黄永胜答：“我看就是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军委八条》。”

林彪说：“只靠八条解决不了问题了，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于是林彪口授了《军委十条》，由张云生记录整理。】

《军委十条》的基本精神与《军委八条》相反，《军委八条》是鼓励军队高官抵制文革的文件，而《军委十条》是限制军队高官抵制文革的文件。《军委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4月4日，毛泽东对《军委十条》批示说：“林彪同志：此件很好。”毛泽东当然很乐意看到林彪所代表的军队高官们，不再抵制他搞文革。

(11)

在文革的调整过渡期，军队方面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五一三事件。”

按照林彪的意思，军队本来是不介入文革的。可是毛泽东发出让军队介入文革，让军队“支左”的号召后，军队不得已介入了文革。但军队介入文革，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去支持左派的造反派，反而去支持右派的保皇派。特别是《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大肆镇压造反派，大量抓捕造反派头头，使造反派遭受重大打击，造反的气焰也被压下去不少。

这次，与《军委八条》相反的《军委十条》发出后，军队又不介入文革了，他们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全部释放，不再管文革的事了。这样一来，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掀起一场造反浪潮。对于地方上的造反派重新造反，林彪不管；可是军队中的造反派，也开始又重新造反了，这样一来，林彪对军队中的造反派就不能不管了。

这次军队造反派的造反，并没有得到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支持，但他们也没有反对军队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里的造反派，就等于是在失去上面支持的情况下，孤立地进行造反，其下场显然是不容乐观的。

当时，军队文艺团体的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军队现任领导的保皇派，被称为“老三军”；另一派是对军队现任领导进行造反的造反派，被称为“新三军”。当然，保皇派不会自称自己是“保皇派”，而是自称自己为“革命派”，与造反派有所区别。

1967年5月初，“老三军”准备以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为由，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占领北京的文艺阵地。而“新三军”则坚决反对“老三军”的演出，声称首都的文艺舞台决不能让“保皇派”占领，他们公然声明：如果“老三军”举行演出的话，他们就要冲击会场，强行阻止演出。

“老三军”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申请演出，但萧华怕因为演出而引起双方武斗，就没有同意演出。“老三军”对此当然很不满，他们要设法取得比萧华更上级别的支持。据邱作会回忆说：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是老三军保皇派的)，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在京部队文工团想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对刘素媛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12)

这件事叶群报告了林总，林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下就抓住了机会，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

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媛等人，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保皇派’，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毛泽东已经暂时放弃在军队里搞文革，所以对军队的事情就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刘素媛问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她去跟叶群谈，自己不管。林彪看到毛泽东的态度，知道这次毛泽东让他自由处理这件事。这件事怎么处理呢。林彪反复想：“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最后他认为，毛泽东现在是要军队的，不会因为造反派得罪军队，所以林彪开始大胆地打击军队中

的造反派。

有了林彪的同意，“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5月13日晚于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开始不久，军队的“新三军”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乘几十辆汽车来，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往里冲，两派发生了武斗，剧场变成了战场。

听说“老三军”和“新三军”发生了武斗，北京城里的军事机关，马上出动人员去支援“老三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海军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与造反派进行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中央文革小组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被制止下来。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武斗被制止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5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老三军”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不满。会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13)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等造反派。5月15日上午，林彪让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新三军”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因为毛泽东已经不插手军队的事了，中央文革小组当然也不好反对，只好站

到林彪一边。前面提到，这次军队造反派的造反，并没有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但造反派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中央高层的风云已经变了，他们以为中央文革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造反，所以就采取这次大胆的行动。当中央文革表示支持“老三军”后，造反派的“新三军”就崩溃了。

此后，林彪乘胜追击。5月23日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日，“老三军”演出队在天安门前搭起临时舞台，进行长时间的演出。这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6月9日，“老三军”又更上一层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这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前来观看演出，给保皇派的“老三军”撑腰。

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邱会作也回忆说：【从“五一三事件”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军队机关的造反派受到严重的打击，纷纷瓦解。造反派除了少数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活动以外，公开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从1967年5月“五一三”开始，到1971年“九一三”，在这将近四年半的时间里，军队极大多数都是稳定的。军队的稳定，是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副主席的功劳。】

邱会作把军队的稳定归功于林彪，显然有失偏颇。军队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毛泽东改变了文革的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暂时不在军队里搞文革了，这才是军队稳定的关键。

(14)

在文革调整期发生的另外一件重大事件，是“首都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事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但敢公开声称打倒周恩来的群众组织非常少，而“首都五一六兵团”就是极少数公开反对周恩来的群众组织中，最大最著名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革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为正式发动文革的标志。不过当时《五一六通知》是作为党的内部文件发至县团级，并没有对群众公开发表。一年之后的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想到公开《五一六通知》，于是《人民日报》在1967年5月17日全文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社论，其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作为批判刘少奇的资料，给批判刘少奇升温，并没有借此批判周恩来的意思。起草这篇社论的王力也说：【主席当时认为要集中开展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大批判，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质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还是集中批刘少奇。那时我的理解，主席决不是对着总理的。】

谁也没想到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会引发出一场攻击周恩来的事件，后来又引发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后来又引发出涉及数百万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特别是陶铸公开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之外，谁都可以怀疑。”于是怀疑周恩来的红卫兵，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这并不是上面有人煽动，完全是自发的结果。毛泽东虽说

有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但绝不能时机不成熟的时候，随便抛出这个炸弹，因此这次“五一六兵团”的“炮打周恩来”事件，与毛泽东并无直接关系。

怀疑周恩来的代表人物，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的父亲张世军是林业部副部长，他也算是典型的高干子弟。张建旗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恩来司令部。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灭火器的作用。周恩来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张建旗还说：【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引起很多人的猜想，这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是文革运动的风向标，每当《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人们就会纷纷猜测，下一次是要打倒谁了。

特别是这次《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这就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还要来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针对刘少奇的，那么新的文化大革命是针对谁的呢？不少人自然就联想到了周恩来，误以为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就是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15)

因此，怀疑周恩来的人，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时机到了，纷纷成立起反对周恩来的组织。这些组织都自称是“五一六红卫兵团”，意思是打倒周恩来，保卫毛泽东的兵团。比如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大五一六兵团”，北京钢铁学院的“钢院

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北外五一六兵团”等，其中，以张建旗为首的“钢院五一六兵团”最为著名，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此后，各种“五一六兵团”的活动频繁起来，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比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一行，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此后，“五一六”成为反对周恩来的代名词。

6月14日，这些“五一六兵团”组成一个联合体，号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6月30日，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作出的决议说：【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的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五一六兵团”发起对周恩来的攻击之后，同时也出现一批支持和保卫周恩来的红卫兵组织。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支持周恩来红卫兵组织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

支持周恩来的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特地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一些红卫兵组织还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目前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表态。

随着“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多的攻击，社会上也出现一股强烈的保卫周恩来的势力，甚至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也成为保卫周恩来的一员。

(16)

5月27日，王海容和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我们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5月29日，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我们前面说过，毛泽东虽然准备打倒周恩来，但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不能提前发起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当前“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的攻击，反而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所以毛泽东不同意“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过，毛泽东对“五一六兵团”采取的措施，也是很轻微的，只不过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

在毛泽东表态之后，中央文革立即表态支持周恩来。陈伯达说：【周总理是

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中央文革表态之后，“五一六兵团”的活动一度有所收敛，但在7月20日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又立即活跃起来。“五一六兵团”以后的事情在“七二零”事件之后再述。

在文革调整期，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是所谓“伍豪脱党启事”。

5月18日，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交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江西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恩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周恩来在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批示道：“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封“黑材料”的态度是暧昧的，只是把周恩来的信转给文革小组的成员看，并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说“存”。这个“存”字，就等于给周恩来塞进一枚定时炸弹，虽然现在没有爆炸，但将来随时可能爆炸。八年后的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关于他“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颤抖着的右手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17)

到1967年7月，毛泽东认为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准备发起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在发起这场战役之前，毛泽东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离开北京。这个理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发起这么大的一场战役，毛泽东如果在北京的话，说不定会遇到什么不测之事，所以远离北京是最稳妥的方案。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也一直是在外地坐镇，直到刘少奇已经成为瓮中之鳖时，毛泽东才回到北京，给刘少奇最后的一击。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林彪、周恩来、杨成武等人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文革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文革计划是：第一年1966年开张，第二年1967年看眉目，第三年1968年收尾。在1967年初，毛泽东原来说文革要在1967年2月到4月“看眉目”，可是1967年2月遇到了“二月逆流”，这个文革的眉目没有看出来。因此，毛泽东把“看眉目”的时期，推迟到1967年下半年，也就是要在1967年下半年发起决战。

毛泽东在会上，又提出他要到武汉去看看，并准备在武汉畅游长江。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然后借畅游长江的东风，一举打倒了刘少奇。这次毛泽东又想畅游长江，或许也是想借畅游长江的东风，一举打倒周恩来。当然，

毛泽东去武汉，更重要的不是畅游长江，而是准备亲自去当地解决棘手的武汉两派武斗问题。

参会者一听毛泽东要去武汉，都一致反对。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泽东坚持要去，说：“都说乱，到底乱到什么程度？我要自己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嘛。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参会的人见毛泽东这么说，只好同意他去。

这时，周恩来立即表示，他先去一趟武汉，给毛泽东探探武汉的安全情况，并给毛泽东安排住处。参会的人听周恩来这么说，都纷纷说好，毛泽东也不便反对周恩来的这个好意，就让周恩来先去武汉“安排住处”。

以前毛泽东外出，从来不需要周恩来给他“安排住处”。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天下大乱，所以周恩来自告奋勇先去武汉给毛泽东“安排住处”，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还让人感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不过，周恩来先去武汉，除了给毛泽东安排住处之外，他要想看看武汉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毛泽东提出要离开北京去外地，并说声称文革要在1967年下半年“看眉目”，所以周恩来预感到毛泽东这次去武汉，不是单单去游泳，而是很可能要在武汉搞起一个大动作。因此，周恩来要先去武汉看看情况，以防毛泽东在武汉搞起大动作的时候，他能够根据武汉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

7月13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乘专机来到武汉，安排毛泽东下榻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毛泽东的老住处了，他先后29次下榻于此，是毛泽东除北京中南海之外，居住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

周恩来查看东湖宾馆，做出了三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撤换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另一派是造反派。周恩来把负责毛泽东梅岭一号的服务员都换成造反派的工作人员。

第二项措施是不让武汉军区部队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第三项措施是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去机场迎接毛泽东，而是让陈再道也临时入住东湖宾馆，在宾馆等候毛泽东。

据当时也去了武汉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王力没有说明为什么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从事后来看，这三项措施是诱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因素之一，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解决武汉两派武斗的问题呢？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武汉两派的情况。

当时武汉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两大派。武汉的保皇派是号称有 120 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反对打倒湖北省委，拥护武汉军区，因此这个组织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且武汉军区的很多干部和战士，都直接加入了“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武汉军区支持下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造反派，是称为“三钢”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以及称为“三新”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三钢”和“三新”尽管人数上比“百万雄师”少，但他们的立场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不仅要夺湖北省委的权，还要夺武汉军区的权，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在 1967 年 1 月底发布《军委八条》后，武汉军区对执行《军委八条》很坚

决，对造反派下手很快，解散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一大批造反派的头头。

到 1967 年 4 月《军委十条》颁布后，特别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这样武汉军区只得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都释放了，于是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组织起来，对保皇派来一个大反攻。因为很多造反派头头都被武汉军区抓捕过，所以他们非常痛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街上到处写有“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军委十条》出笼后，军队不便直接干涉造反派了，于是军队高官们就发动保皇派群众组织来对抗造反派。这样一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冲突越来越升级，从 1967 年 6 月开始，武汉的两派演变为大规模武斗。仅仅在 1967 年 6 月间，两派武斗就打死数十人。为此，中央文革紧急致电武汉军区，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中央文革的精神，当然是支持武汉的造反派，他们认为武斗的责任，是保皇派“百万雄师”挑起的，要求武汉军区制止“百万雄师”武斗。其实，武斗并非保皇派“百万雄师”单方面的责任，中央文革把武斗的责任强加于“百万雄师”，必然引起“百万雄师”极度不满，这是后来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19)

另外，“百万雄师”本来就是武汉军区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他们当然不会制止自己的组织。陈伯达给陈再道打电话，要求他设法制止武汉的武斗，陈再道反问说：“陈伯达呀，你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住武斗吗？”

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不但没有制止武斗，反而像火上浇油，武斗愈发激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准备亲赴武汉，制止那里的武斗。毛泽东认为，以他的威望亲自“御驾亲征”，武汉的武斗立即可以平息下去。

毛泽东的专列于7月14日凌晨离开北京前往武汉，路上他同杨成武等谈话，讲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军委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后，受压的组织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

毛泽东这里表明他的立场：第一，军队介入文革后，因为“情况不熟悉”，犯了错误。毛泽东所谓的“错误”，就是军队支持保皇派；第二，《军委八条》后，军队抓了很多人，取缔了很多造反派组织，压制了造反派；第三，《军委十条》后，被压制的造反派又恢复起来，来了个“反复”。毛泽东称赞这种造反派恢复起来的“反复”好，希望看到造反派压倒保皇派。

毛泽东要平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而平息武斗无非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保皇派打垮造反派，这就像军队中的保皇派“老三军”，打垮了造反派“新三军”，于是军队中的武斗就平息了；第二种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就像上海的一月夺权，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样武斗也就平息了；第三种是彻底取缔所有群众组织，一切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这样武斗当然就平息了。

毛泽东希望看到是第二种办法的平息武斗，也就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如果用第一种办法平息武斗，那么毛泽东搞文革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因此，毛泽东平息武斗的基本精神，就是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毛泽东在武汉的所作所为，都要围绕着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个基本点来理解。

然而，群众组织并不在党的领导下，要想让群众组织听从自己的号令，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难题，毛泽东也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会见了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毛泽东请李宗仁坐，李宗仁不肯，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上首？】

毛泽东说：【你年长，你应该坐上首。】

两人坐下后，毛泽东指着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说：【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看来这把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但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群众是真的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李宗仁觉得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的确，对于群众组织来说，毛泽东过去的那一套领导党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因此，毛泽东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他必须发明一套新的领导群众组织的办法。如果毛泽东能处理好领导群众组织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基本成功了；相反，毛泽东如果处理不好领导群众组织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很危险了。这次毛泽东亲临武汉，亲自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这是毛泽东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新的考验。

(20)

发生于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因为相当具有戏剧性，广为被人们关注。但关于“七二零”事件，有相当多的版本，对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也有很大出入，所以必须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资料，首先是亲身参与“七二零”事件的一些人的回忆，比如陈再道、王力、杨成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对此事有回忆。其中陈再道和王力两个人，是“七二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但他们两人的回忆，出入相差较大，需要认真分析。此外还有文革当时的揭发批判材料，参与

“七二零”造反派的回忆等，也是重要的参考材料。

首先梳理一下“七二零”事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和立场，第一个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陈再道的资格相当老，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进入红四方面军的序列，成为红四方面军骨干将领之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张国焘，主要将领是徐向前，陈再道是徐向前的部下。1935年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作战，结果全军覆没。幸运的是，陈再道的部队没有加入西征作战，免遭灭顶之灾。

1938年张国焘离开延安出走之后，红四方面军残部的将领们受到肃整，不过也有一批红四方面军投到毛泽东门下，重新受到重用，比较著名是许世友和陈再道。在抗战中，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陈再道成为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的主将之一；建国后，授上将军衔，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在军队中，非常讲究来自哪支部队的“出身”，根据出身分出不少“山头”。这种观念也很好理解，就如我们遇到与自己同一个中学、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人，就会有格外的亲切感和好感，

从历史上看，陈再道与徐向前和邓小平有很深的历史关系，而与林彪并无关联，所以陈再道不是林彪派系的人马。文革前，陈再道在“大比武”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是站在林彪一边，而是支持罗瑞卿，因此林彪是不喜欢陈再道的。同样，陈再道与周恩来也没有历史联系，也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

那么陈再道为什么能担当武汉军区司令员这么重要的职位呢？理由是毛泽东支持他。毛泽东对军队中林彪的势力过大，也是所有防范的。毛泽东特别重用一些许世友、陈再道这样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以平衡林彪的势力。陈再道不是周

恩来派系的人，不是林彪派系的人，而是毛泽东派系的人，理清这个概念，对理解武汉“七二零”事件来说，是很重要的。

(21)

有人也许奇怪：既然陈再道是毛泽东派系的人，他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呢？发生于文革之后的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陈再道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原因。

文革后的陈再道复出，1978年，陈再道下令拆掉一所幼儿园，花费几十万元外汇，给自己建造一座全部现代化设备的楼房。为此，诗人叶文福写了一篇当时具有震动性的叙事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中写道：

【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

我说什么？我怎么说？你是受人尊敬的前辈，我是后之来者。

……

牛金星的悲剧，决不会重演，因为人民决不会沉默！

但愿我的诗句，也化作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你的耳朵，冲进你的心灵窝。

在这新长征的路上，且听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道大喝一声：“将军，你不能这样做！”】

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1978年在《诗刊》上发表之后，一些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一时的街谈巷议。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反腐倡廉的概念，叶文福的这首诗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在战争年代，陈再道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战，为的并非共产主义的

理想，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当新中国建国后，陈再道这样的人认为胜利了，大家就应该分享胜利果实，应该各自建设自己的安乐窝了。可是鉴于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们想盖楼而不敢盖，一旦毛泽东去世，没人敢约束这些老军头了，他们马上把“艰苦奋斗”丢在一边。

毛泽东搞文革，不仅不让他们盖楼，又进一步约束他们，给他们降工资，削减他们的各种特权，所以陈再道这些人就对毛泽东不满。陈再道这样的人，不是对毛泽东本人不满，而是对文革这种“反修防修”的运动不满。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分歧，是一种无法调和的思想深处的分歧。在这种思想分歧的促使下，陈再道抵制毛泽东的文革，也就不以为奇了。

“七二零”事件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王力。王力也算是老干部，不过比陈再道的资历差多了。王力 1939 年入党，先是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做文秘工作。1958 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

(22)

王力比陈伯达小 17 岁，成为陈伯达手下的一员文将。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此后，王力又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 1964 年起，毛泽东让王力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6 年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陈伯达是组长，王力是组员。在文革中，王力多次为毛泽东主笔写大块头理论文章，是王力红极一时的时期。

王力这次为什么到武汉来，参与了“七二零”事件呢？据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

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而王力的回忆，则与陈再道的说法大相径庭。王力说：【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

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主要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

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应变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大段列出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因为搞清王力为什么去武汉，对于破解“七二零”事件之谜，是第一个重要的要点。

(23)

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概要是：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保皇派“百万雄师”和

造反派“三钢三新”，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向群众公开发表支持“三钢三新”的偏向性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冲入东湖宾馆将王力抓走。抓王力的行动惊动了同时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他以为陈再道起兵造反了，急忙乘飞机离开了武汉。

不少人探讨武汉“七二零”事件，把主要精力放在王力怎样被抓，毛泽东怎样仓惶离开武汉等戏剧性的情节，而忽视这个事件内在的政治斗争。我们前面用较大的篇幅，引用了“七二零”事件中两个当事人陈再道和王力的不同说法。特别是王力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驳陈再道的说法，于是很多人就想当然地以为，既然王力反驳陈再道的说法，那么王力的说法就是真的了。

其实不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七二零”事件，就会发现，陈再道的说法倒是比较接近真相，而王力的说法反而是不真实的。不少研究者被王力的说法误导，从而对“七二零”事件得出错误的解释。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王力的说法进行一些澄清。

王力写的《王力反思录》，是研究文革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不少王力的回忆。王力在谈到别人的事的时候，是比较客观的，可信性较高；可是谈到他自己的事的时候，可信性就比较差了，他总想设法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王力这本回忆录中，关于他自己的内容，一定要小心求证。陈再道的回忆，在谈到他自己的事情时，也有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的倾向，这方面也需要小心求证。

研究“七二零”事件第一个需要搞清的问题是：王力为什么会去武汉？搞清王力去武汉的目的，对理解“七二零”事件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把事情理顺一下。六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云南、四川、

贵州，这些地方因为两派武斗闹得很厉害，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那里的武斗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派谢富治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谢富治当过云南省第一书记，云南的部队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在云南有各上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这个身份，王力走到哪里，他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声音。种老关系，容易解决那里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派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我们推测，毛泽东是看

谢富治和王力在云南办完事后，他们又按计划来到成都。7月13日晚，周恩来打电话给在成都的谢富治，要他到武汉去接受紧急任务。周恩来为什么突然叫谢富治去武汉呢？这点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一致的，都说让谢富治去武汉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既然谢富治去武汉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那么王力这么一个书生，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的。

(24)

因此，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

按照陈再道的说法，周恩来本来没有让王力去武汉，而王力跟在北京的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打了电话之后，硬要和谢富治一起去武汉。

而王力在回忆录中，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

王力没有直接说周恩来是否让他去武汉，但根据前后文来推测，应该是周恩

来本来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所以才有谢富治提出让王力去武汉。如果最初周恩来就让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的话，谢富治就没有必要再向周恩来提出让王力和他一起去武汉了。王力在这里想撇清自己，做了一些说明，结果是越描越黑，反而露出了马脚。

毛泽东去武汉是绝密行动，谢富治必须为毛泽东保密。谢富治带王力去武汉，已经是多余了，他再提出“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这些红卫兵去了武汉，岂不是要给毛泽东泄密吗？从常理来说，谢富治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他带一批红卫兵去，不但无助于保卫毛泽东，反而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累赘，所以谢富治不太可能主动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

退一步说，即使是谢富治真的向周恩来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他总得说出一个为什么要带他们一起去的理由吧？王力却丝毫不提谢富治为什么要带他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这就是在忽悠人了。因此，王力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真实的。谢富治早在 1972 年去世，所以王力可以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死无对证。

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王力也承认他跟关锋打过电话，王力说：【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王力这里的解释，有很多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按照王力的说法，既然谢富治已经向周恩来提出王力一起去武汉，周恩来也同意了。按照常理，王力就应该执行命令，不应该又提出什么“不想去”，难道谢富治和周恩来做出的命令，王力还可以讨价还价吗？

更为离奇的是，如果王力真的不想去武汉，他要请示的人，应该是自己的上

级，陈伯达或者周恩来，而不是关锋。因为关锋的地位，比王力还要低一些，王力打电话问关锋：“我能不能不去？”就等于是他向自己的下级请示：“我能不能不去？”这不是可笑的事吗？因此，王力说的他与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完全不符合逻辑，应该是谎言。

王力承认他与关锋打过电话，又用谎言来搪塞他们电话里说的内容，所以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可以说是讲道理的，所谓“话糙理不糙”。那么王力和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25)

我们再看后面事情的发展，陈再道说：【但王力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王力的说法则与陈再道相反，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

陈再道说，周恩来对王力等人有一个指示，就是他们到了武汉之后，不得公开露面。王力没有直接提到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但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这就是间接地承认周恩来有这么一个指示，谢富治违反了周恩来的指示，所以才“闯祸”。这里王力又把责任推到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看大字报。

但王力的这个说法还是破绽百出，因为王力来武汉之前，他们谁都知道周恩来的指示，不得公开露面。出去看大字报这件事，完全是违反周恩来不得公开露面的指示。就算谢富治是“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非要去看大字报，那么王力完全可以不跟谢富治去看大字报，可以让谢富治一个人去看大字报，自己留在

宾馆不露面。为什么谢富治“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王力也“非要”跟着违反呢？

再者，即使是出去看大字报，完全可以稍微化妆一下，戴个墨镜什么的，人们就认不出来了。本来谢富治和王力都是知名度较低的人，那时又没有电视，报纸上也极少登谢富治和王力的照片，即使是他们不化妆，武汉的人能把他们认出来的可能性也极低。前面我们提到蒯大富的回忆，蒯大富说谢富治和他坐在对面，他也不知道面前这位就是谢副总理，是谢富治自我介绍了，蒯大富才知道。还有，那时看大字报是人山人海，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大字报上，谁会注意到人海中有王力这个几个人呢？

因此，王力说他们的“被人发现”，应该是谎言，而陈再道说王力他们“有意公开身份”，应该是正确的。

王力又说：【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

王力等人“被发现”之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他们，木已成舟。周恩来不让王力露面也不行了，所以周恩来被迫“临机应变”，允许王力等人公开露面。

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都没敢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他们都不敢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陈再道说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王力“硬要去”，王力哪有胆量和资本跟周恩来叫板，“硬要去”呢？其实这也是陈再道暗示，是毛泽东让王力去的，所以周恩来不好反对。

接下来，王力等人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也应该是毛

泽东的指示，否则王力应该没有胆量随便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但王力也不敢说，这是毛泽东让他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于是就涂乱搪塞，说什么“谢富治硬要去”、“他们被发现了”，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26)

王力在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回忆中，说了不少谎言，但我们也要理解王力，他也不是故意要撒谎。因为“七二零”事件与毛泽东牵扯很深，王力不敢说他的行动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不敢说毛泽东的责任，于是就只好用胡乱撒谎的方式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根据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透露出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场攻防战。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毛泽东让王力去；周恩来不让王力公开身份，毛泽东让王力公开身份。周恩来和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攻防战呢？这起因于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策略。

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思路，基本上上海模式。上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总司”被上海市委打成非法组织，而保皇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这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支持“工总司”的声明，这一下子大大鼓舞了“工总司”，大大打击了“赤卫队”，形势立即发生逆转，“工总司”很快壮大起来，打垮了“赤卫队”，之后又进一步打垮了“赤卫队”的后台上海市委。

上海模式经验的第一条，就是一定要首先取得群众组织之间斗争的胜利，造反派群众组织要打垮保皇派群众组织，这是彻底打垮上海市委的保证。如果上海的“工总司”没有彻底打垮“赤卫队”，那么彻底打垮上海市委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上海“工总司”为什么能打垮“赤卫队”呢？这里中央文革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总司”，等于认定“工总司”是中央的钦定组织，大大提高了“工总司”的身价和声望，使“工总司”迅速壮大起来，这是“工总司”打垮了“赤卫队”的重要因素。

现在，武汉的情况也与上海类似，保皇派“百万雄师”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造反派“三钢三新”受到武汉军区的压制。因此，毛泽东希望王力像张春桥那样，在武汉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声明，给“三钢三新”一个中央钦定组织的地位，大大提高“三钢三新”的身价和声望，使“三钢三新”迅速壮大起来，从而打垮保皇派“百万雄师”，最终打垮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

周恩来也意识到毛泽东试图用上海模式来解决武汉问题。因此周恩来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阻止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去武汉，但毛泽东要让王力去，周恩来阻止不了。于是周恩来就以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为由，给王力下了一个限制令，不许他公开露面，这样王力就不能公开出来支持造反派了。这时王力跟关锋打了电话，在北京的关锋向王力透露了毛泽东的意思，让王力公开露面，公开支持造反派，这应该就是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内容了。王力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才敢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

7月18日，王力按照上海模式，在武汉向群众公开发表讲话，声称他和中央文革是支持“三钢三新”的，并称“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然而，上海经验在武汉却没有成功，王力的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引发了“七二零”事件。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继续介绍。

(27)

武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毛泽东的想法，

是撇开党组织，依靠群众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而周恩来的想法，则是依靠党组织，依靠党领导下的军队来解决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个分歧，早在1966年11月的上海“安亭事件”中，就凸显出来了。在“安亭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派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去上海解决问题。

张春桥到上海之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张春桥一系列的指示，其核心是“依靠党组织”解决问题。然而张春桥意识到，这个“党中央”做出的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相同。张春桥揣摩出，毛泽东的想法，是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于是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违背“党中央指示”，不但没有依靠党组织，反而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这次张春桥成功了，他完全撇开上海市委，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依靠造反派解决了问题，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有人也许奇怪，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给张春桥指示，而要张春桥去揣摩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在党中央会议上，作出“撇开党组织”的指示。因为党中央是党组织的最高代表，“撇开党组织”解决问题，就是不要党中央了。因此毛泽东无法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作出不要党中央的指示，所以就只能靠张春桥自己去揣摩毛泽东的想法了。

实际上，“毛主席”和“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离开了党组织，他还是“毛主席”；而“党中央”离开了党组织，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毛泽东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而“党中央”必须拥有下层的党组织。如果下层的党组织都被踢开了，那么“党中央”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严格地说，也可以把文革理解为“毛主席”与“党中央”之间的斗争。

以周恩来的智慧，当然看破了毛泽东试图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群众来解

决武汉问题，试图把武汉变成第二个上海。对于毛泽东发起的攻势，周恩来的对抗措施，第一个是试图阻止文革小组的人与造反派接触，所以周恩来下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人不要露面。但毛泽东下了一个相反的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上街去看看大字报，听听群众的意见。王力在回忆录中不敢直接点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只好胡乱把责任推到已去世的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去看大字报。倒是原空军司令吴法宪，直接把毛泽东说了出来。

吴法宪说：【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7月15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武汉解决问题。】

(28)

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详细报道了7月14日谢富治、王力等人是怎样被“认出来”的。该报道写道：【7月14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和其它同志不顾旅途的疲劳，这天晚上十点钟，就来到被“百万雄师”多次围攻的武昌中心区红色根据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

这里说明一下当时武汉地区的武斗形势。在武汉三镇的武昌、汉阳和汉口，武昌地区是几个主要大学的所在地，由造反派控制，被造反派自称为“解放区”；汉阳地区的造反派全部被赶走，由清一色的保皇派“百万雄师”控制，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地区“百万雄师”的势力比较大，但造反派也有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等几个“红色据点”，被造反派称为“游击区”。

谢富治、王力等人首先来到造反派的据点湖北大学，这本身就是表示对造反派的一种无形的声援。下面我们继续应用当年红卫兵报纸的报道：

【守卫湖大校门的革命小将樊斌，看见一行十多个陌生人来到学校，立即热情地迎接他们。这时，王力同志拍着樊斌头上戴着的钢盔问：“你们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

樊斌回答说：“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

王力同志又指着小将手中的武器，笑着问：“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呢？”

另一个革命小将插进来说：“自卫，我们这样搞是被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

谢副总理听后，问：“你们为什么叫它‘百匪’？”

湖大的革命小将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他们比土匪还坏，硬是够得上喊‘百匪’。”

接着，王力同志指着湖大校门旁几处大的断壁缺口问：“这是怎么搞的？”

革命小将气愤地说：“6月30日，陈大麻子纵使‘百匪’围攻我校，大刀砍、长矛戳，机枪扫，连装甲车都使上了。这墙，就是‘百匪’的装甲车冲垮的。”

这时校门口围满了人，把这一行十余人团团围住，向他们讲述在陈再道之流的操纵和扶植下，“百匪”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

守门的革命小将樊斌，一直注视着那身材高大的身影，亲切微笑的面孔，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猛然，他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十月，他和战友们一起到首都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在北京政协礼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同志接见全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见到过这位同志。想到这里，樊斌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喊道：“啊！他是王力同志！王力同志来了！”

又有一位革命小将，这时发现那位神采焕发年纪稍长的同志，大声喊道：“呵呀！谢富治副总理也来了！”

顿时，人群欢腾，掌声雷动，那股高兴喜悦的劲儿，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一夜，真是一个不眠之夜。湖大的革命小将们精神抖擞，通宵苦战，写大字报，印传单，张贴标语，要把毛主席派来亲人的喜讯，告诉给战友们。】

(29)

从当年红卫兵报纸报道的情况来看，王力等人并没有遵守周恩来“不露面”的指示悄悄地看大字报，而是大张旗鼓地主动与造反派攀谈讲话，故意让人把他们认出来的。然而，王力等人7月14日的这次露面，又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武斗。

7月15日，受到极大鼓舞的造反派“三钢三新”，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扛着“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巨幅标语，大喇叭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昂的歌曲，在武汉举行盛大游行。而保守派的“百万雄师”则大为恼怒，因为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居然不告诉他们，单单与“三钢三新”见面，这显然是在压制他们。于是“百万雄师”出动大批人员，向“三钢三新”的游行队伍大打出手，暴发大规模武斗，致使一人死亡，多人重伤，轻伤不计其数。

当晚，谢富治、王力等人又来到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另一个据点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与学生群众谈话，完全不理睬保皇派“百万雄师”，这样的做法更加激怒了“百万雄师”。

这天谢富治和王力俨然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发表讲话，谢富治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也非常健康。】

众人立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谢富治继续说：【同志们，毛主席非常关

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最信任革命小将。这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们来的，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你们要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当小学生，小学生还没有当，所以，我们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的问好，对你们的关怀，带给你们了。】

众人又爆发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

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在华中工学院讲话之后，仍然不理睬“百万雄师”，又来到武汉钢铁公司，这是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三钢”的基地。王力发表讲话说：【我们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毛主席、林副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顺利前进。】

从7月14日到16日，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连续访问了多个“三钢三新”的据点，直到7月16日晚，谢富治和王力等人才到“百万雄师”设于3506厂(军工厂)的联络总站。

(30)

“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等人的迟迟来访，反应十分冷淡。“百万雄师”的俞文斌回忆说：【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代表团反映情况的，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

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我们回去，我们同意，但希望‘中

央代表团’召集两派组织谈谈，由中央派人监督，两派一起回去”。

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百万雄师负责人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个群众组织都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我们！”

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一)立即停止武斗；(二)停止煽动性的宣传；(三)撤除所有的工事……”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但谢富治不说话。王力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的观点来。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由此可见，武汉“七二零”事件，与王力等人明显偏向性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某种意义上，“七二零”事件可以说是王力等人煽动起来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谢富治和王力虽然自称“中央代表团”，但他们这个“中央代表团”，却未经中央的批准，是“自封”的。

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的7月13日，召开了林彪、周恩来等人参加的常委会议，这次会上只是作出派谢富治到武汉去保卫毛泽东安全的决定，并没有人让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去解决武汉问题。

对此，王力在回忆录也明白地说：【7月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等人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7月13日中央会议的精神。总理说：“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

至于王力到武汉来的任务，王力也明确地说：【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

既然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向武汉派出“中央代表团”，也没有让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武汉问题，那么为什么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自封“中央代表团”，到处演讲，发表指示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

(31)

毛泽东7月14日晚乘专列来到武汉，入住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也就是东湖宾馆。东湖宾馆有几个主要建筑群：梅岭一号、梅岭二号、百花一号、百花二号、南山甲所、南山乙所。毛泽东住梅岭一号，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卫士住梅岭二号，周恩来住百花一号，谢富治、王力以及与他们同来的几名红卫兵住百花二号。另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也入住东湖宾馆，住在南山乙所。附图是东湖宾馆的布局图，从图上可以看出，王力住的百花二号，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的途经距离差不多有1公里。因此后来“百万雄师”冲入百花二号抓王力，并不至于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是绝密行动，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知道。毛泽东在入住东湖宾馆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15日，找谢富治和王力谈话。据王力回忆说：【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没叫总理。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等人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王力这段回忆是“话里有话”，一些话他不便直说，只好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王力说毛泽东一早单独与谢富治和他谈话，没叫周恩来，直到后来才叫周恩来过来。王力说“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这句话十分

蹊跷。周恩来在 14 日晚上亲自去车站接毛泽东到宾馆，到 15 日早上，毛泽东就忘记了周恩来也在武汉，这是不太可能的事。王力说这些话，大概是想给毛泽东不叫周恩来过来这件事，找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编得太随便了。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过来之后，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那么毛泽东准备怎么解决武汉问题呢？这天早上毛泽东与谢富治和王力的单独谈话，应该是向他们“交底”，告诉他们毛泽东解决武汉的策略。尽管王力没有透露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撇开武汉党委和武汉军区，依靠群众组织解决问题。毛泽东给谢富治和王力的任务是“点火”，在造反派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明确中央文革的立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反对保皇派“百万雄师”。进而发动“三钢三新”大胆起来造反，打垮“百万雄师”。

其实早在 6 月 26 日，中央文革就给武汉军区发电报，明确了中央文革支持“三钢三新”和反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但发给武汉军区的电报，被军区扣了下来，并没有传达到群众中去，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还不知道中央文革的态度。这次谢富治和王力当众表明中央文革的态度和立场，就可以使造反派倍受鼓舞，而使保皇派感到胆寒。

(32)

毛泽东之所以要“坐镇”武汉，是因为如果毛泽东本人不来，只派谢富治和王力来武汉，那么陈再道肯定不把谢富治和王力放在眼里。陈再道在武汉也是小霸主，很容易控制谢富治王力的行动，使他们无法与造反派接触，武汉这把“火”根本无法点起来。因此，只有毛泽东亲自到武汉坐镇，陈再道才不敢干涉谢富治和王力的行动，他们才能顺利地“点火”。

事实上，从7月15日到7月19日，谢富治和王力每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各处会见造反派，煽风点火，他们两人的点火任务还是完成得不错的。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策略本来是不错的，如果在其他地方，保皇派就会被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吓住，不敢再反抗了，于是保皇派自行瓦解，造反派全面胜利。一旦造反派全面胜利，一统天下，不仅武斗的问题自然解决，夺权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这样毛泽东的计划就成功了。可是湖北的民风极为强悍，胆大妄为的保皇派居然敢抓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这是毛泽东没想到的。

王力回忆说：【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王力的话说得很艺术的。本来周恩来给王力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而王力请示说“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反对，只得同意了。王力所谓的“具体工作”，就是出去接见造反派和煽风点火。

毛泽东7月14日到武汉坐镇解决武汉问题，但他一没有召见湖北省委的人，二没有召见武汉军区的人，只是派谢富治和王力出去煽风点火，试图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直到7月18日，毛泽东才见了陈再道等人，但毛泽东也没有对他们做出强硬和明确的指示，因为毛泽东本来就没有想通过武汉军区来解决问题。

周恩来原本是不想直接参与武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已经表示他要亲自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在毛泽东7月14日晚到达武汉之后，7月15日就准备返回北京，因为北京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处理呢。可是毛泽东却要周恩来留下，“协助”他处理武汉问题。于是周恩来就多留下几天，处理武汉问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15日要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

走。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主席提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吴法宪也回忆说：【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7月15日到17日上午连续开会，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放出来。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33)

王力和吴法宪的回忆，都说毛泽东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要周恩来出面解决武汉军区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周恩来留下来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很可能是毛泽东想给周恩来一个难啃的骨头，让周恩来啃不动束手无策，这时候毛泽东再出来收拾残局。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感到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使周恩来的威信下降。

毛泽东这个想法的最大证据，就是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参加讨论武汉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15日到17日，连续三个上午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讨论武汉问题，可是却没有叫陈再道来参会。按理说，陈再道是武汉问题的当事人，应该叫他来开会，况且陈再道也住在同一个东湖宾馆，很容易叫来的，但毛泽东偏偏不叫。

毛泽东不叫陈再道来开会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不准备通过党组织解决武汉问题；第二个是给周恩来做武汉军区的工作出一个难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

毛泽东在会上已经同意周恩来的部署，但毛泽东却不让陈再道知道他是什么

态度，这样周恩来去处理陈再道等人，势必会遇到强烈的抵制。

从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在东湖宾馆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处理武汉问题。周恩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很严重的错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军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支持造反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陈再道等武汉军区的高官，听到周恩来的讲话，马上炸锅了，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因为陈再道等人不知道周恩来讲的这些话，是事先与毛泽东商量过和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以为这只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于是对周恩来大为不满。

陈再道当面顶撞周恩来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陈再道质疑周恩来的讲话不是毛泽东的意思，而周恩来也不会跟陈再道争辩，不会信誓旦旦地说这些话真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如果周恩来那么做，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会大为损失，因为人们看到，周恩来到了靠打毛泽东的旗号给自己撑腰的地步。

周恩来用下命令式的方式，警告陈再道要遵守纪律。陈再道却也大胆包天，竟然对周恩来拍桌子，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这话是指周恩来犯过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

面对陈再道公然挑衅周恩来的权威，周恩来也放出狠话，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34)

武汉“七二零”事件，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层面。上面是高官的层面，下面

是群众的层面。在群众的层面，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一方是保皇派“百万雄师”，另一方是造反派“三钢三新”，这个很容易理解：在高官的层面，也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但高官层面的对立双方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因此出现许多不同的解释和说法。

关于“七二零”事件中，高官层面的两个对立双方，至今为止主流的说法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立场都一致，他们是一方；而与毛泽东等人对立的一方，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

仔细剖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主流说法非常不合理。陈再道和钟汉华不过掌握一个小小的武汉军区，他们就试图要对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巨头，岂不是愚蠢到痴人说梦的地步？如果陈再道真的蠢勇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可能当上司令员这样的高官，早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局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陈再道和钟汉华真是起兵造反，对抗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为首的中央，这就是典型的反叛，这种反叛罪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在陈再道他们失败之后，按理说应该遭到极为严厉的处分，至少应该判刑入狱。然而事情并非这样，“七二零”事件后，林彪和周恩来都力主严厉处分陈再道，而毛泽东不同意，主张保陈再道。

7月20日的“七二零”事件发生后，7月22日晚，林彪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先撤销陈再道等人的职务，然后展开对陈再道等的大批判。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陈再道的撤职，但在有关陈再道的中央文件上，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的后面亲自加“同志”二字，这就意味着陈再道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要打倒的对象。1967年9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接见参加集训军队的干部。毛泽东朝大声问：“陈再道来了吗？”

陈再道惊喜地高举右臂说：“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安抚陈再道说：“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这是毛泽东公开保陈再道。在毛泽东的保护下，陈再道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处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陈再道又调任中央军委顾问，可见毛泽东一直是保陈再道的。

毛泽东对陈再道这个人是很喜欢的，多次夸奖陈再道打仗勇敢。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毛泽东专门对蒙哥马利提到陈再道，毛泽东说：【陈再道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会打仗，作战勇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陈再道就是土包子打败洋包子，放牛娃打败黄埔生的一员战将。】

相反，林彪和周恩来是不喜欢陈再道的。陈再道仗着有毛泽东的撑腰，对周恩来很不尊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前面我们提到，陈再道居然对周恩来不客气地说“周胡子……”，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撑腰，陈再道这样对待周恩来的话，早被周恩来处置了。

(35)

林彪同样也不喜欢陈再道，因为陈再道对林彪也不尊重。据王力回忆说：【林彪说：“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我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以后在京西宾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吴法宪还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七二零”事件的主流说法是不合理的。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看法：“七二零”事件中，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是一致的，是这场冲突中的一个方面；陈再道和钟汉华，是这场冲突中的另一个方面。而毛泽东的立场有点矛盾，在支持造反派的事情上，毛泽东同意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而在

打倒陈再道的事情上，毛泽东不仅反对打倒陈再道，而且保护陈再道。

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三钢三新”。而毛泽东一方面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另一方面又要保护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的陈再道。这两件事看上去似乎很矛盾，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出了解决的方案。

早在6月24日，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就反映了毛泽东的解决方案。该电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责任主要是陈再道和钟汉华，但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而支持造反派。

通过这份电报，毛泽东给陈再道下达了一个指示：毛泽东一方面批评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的“百万雄师”，但另一方面又声明不追求责任，仅仅要陈再道转变立场，转变为支持造反派的“三钢三新”。

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这个指示，应该是很好执行的。陈再道只要转变一下立场，抛弃“百万雄师”，改为支持“三钢三新”，就可以照样当他的司令员，也没什么损失，应该不难做到。如果陈再道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既支持造反派，又保护陈再道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本身是不错的，但他把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最初，陈再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支持他的保皇派“百万雄师”大力支持。而“百万雄师”在陈再道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到了百万之众，甚至武汉军区的一部分干部和士兵都加入到“百万雄师”之中。这样一来，就像老虎养成了，陈再道自己也控制不住“百万雄师”了。

陈再道知道，如果他宣布“百万雄师”这样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是非法组织，或者说他们是保守的、不革命的，势必会引发一场极大的混乱甚至暴乱。一旦出现暴乱，陈再道就不得不为此负责，他自己也就会跟着完蛋。

因此，在“百万雄师”这只虎已养成的情况下，陈再道已经不能转变立场了。陈再道非常担心，一旦他转变立场，立刻就会引起一场大乱。事实上也正如陈再道担心的那样，王力等人宣布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之后，果然引发了一场大乱，让毛泽东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36)

因此，对毛泽东要求他转变立场的指示，陈再道是无法执行的。陈再道一方面硬着头皮顶住，另一方面设法让毛泽东改变主意。毛泽东刚开始不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以为他故意不执行命令，所以十分生气。但“七二零”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才逐渐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也就不再追究陈再道的错误，反而保陈再道了。

“七二零”事件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认为陈再道搞兵变，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最初毛泽东也以为陈再道搞兵变，但不久后毛泽东就改变了主意，不再认为陈再道搞兵变了。据王力回忆说：【主席后来头脑冷静时，推翻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些气话，做出了新的分析。主席说：“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不过是‘百万雄师’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七二零”事件中陪同毛泽东的杨成武也回忆说：【“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到上海，一天晚上散步时，毛泽东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问我：“你认识陈再道吗？”

我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问：“他会反对我吗？”

我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

不来了。”】

另据张春桥在 1974 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七二零”事件后主席到上海，一夜没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七二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能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指的是林彪和周恩来。给“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兵变”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林彪和周恩来。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周恩来不是保护老干部，支持保皇派，反对造反派的吗？为什么在‘七二零’事件中，周恩来却反过来支持造反派，而反对陈再道这些老干部呢？”周恩来在原则上当然是保护老干部，反对造反派的，可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周恩来都要保，也不是所有的造反派周恩来都要反。

在 1967 年 1 月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周恩来和林彪结成暗中的同盟关系，共同抵制毛泽东的夺权。而毛泽东的力量，除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之外，还有陈再道这样的军队高官，他们既不属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派系，也不听从周恩来和林彪的指示，他们是毛泽东的嫡系，也是毛泽东抗衡周恩来和林彪的重要棋子。

因此，对于周恩来来说，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可以削弱毛泽东的力量，更有利于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因此周恩来是愿意支持造反派对陈再道造反的；林彪的立场也是一样，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林彪也愿意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

下面，我们就在上述新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七二零”事件的形成和经过。根据我们这个观点来理解“七二零”事，很多不解之谜就迎刃而解了。

(37)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周恩来的主要精力放在保住自己的“自留地”，也就是在北京的几个主要中央部委，对地方上的文革，可以说没有多少余暇顾及。很多地方的群众组织派代表到中央上访、告状，周恩来只是接见和安抚一下，大部分都不作具体的处理。周恩来对地方问题的处理，是有选择的，一般选择周恩来派系比较强大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周恩来说话算话。

湖北武汉是当时武斗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湖北的事情基本不过问。因为周恩来清楚，把持武汉的陈再道等人，并不买他的帐，如果周恩来硬要插手武汉事务，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搞得自己尴尬，自讨没趣。

但是当毛泽东提出去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担心毛泽东在武汉会搞什么动作，就留了一个心眼，先去武汉看看。周恩来去武汉，对武汉事务插了一点手，马上得罪了武汉的“地头蛇”陈再道等人。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一件事，是不让武汉军区所属的武汉独立师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来武汉，一直是独立师负责警卫。1966年6月毛泽东来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就是武汉独立师负责警卫，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亲自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去迎接毛泽东，亲自护送毛泽东到宾馆，极为风光。

这次，周恩来突然不让武汉独立师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让独立师大为不满，口出怨言。据中央文革在武汉办事组的张根成回忆说：【总理把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说把东湖宾馆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武汉独立师，就是后来抓王力的那支部队。

周恩来的做法，不只是陈再道和独立师的干部不满，战士们也跟着不满，大

家都有被失去信任的挫伤感。这种不满不是针对毛泽东的，而是针对周恩来的，他们认为周恩来是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特别是周恩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更是让陈再道有一种被降低人格的感觉，心中充满怒气，这是后来陈再道强烈顶撞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二件事，是把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全部撤换，使这些人感到自己不被中央信任，也非常不满。后来就是这些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带领造反派冲进宾馆抓王力。因为东湖宾馆的面积非常大，有几十平方公里，没人带路的话，造反派很难找到王力的住处。

(38)

周恩来插手这两件事，主要当然是着眼毛泽东的安全，未必是有意为之，但这些都得罪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人，后来成为引发“七二零”事件的火药桶之一。

按照原计划，周恩来准备毛泽东一到就离开武汉，不再插手武汉的事务了，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出面处理武汉事务。对于周恩来来说，毛泽东让他处理武汉事务，也不是一件坏事，他一方面可以观察毛泽东在武汉干什么，推测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另一方面可以把武汉事件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从7月15日到18日，周恩来每天上午在毛泽东处开会，每天下午找武汉军区的高层干部谈话。这就给陈再道等人造成一个错觉，他们知道毛泽东明明就住在东湖宾馆，可是周恩来有意不让他们见毛泽东，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他们甚至怀疑周恩来在中间假传圣旨，所以对周恩来的不满和气愤就更大了。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开会时，明确了他的立场。毛泽东说：

【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真正要打

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

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毛泽东保陈再道的思想是一贯的，他虽然不满陈再道镇压造反派的做法，但还需要陈再道这样的人来平衡军队中林彪的势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打倒陈再道是“不策略”的。毛泽东提到的孟夫唐，是湖北省副省长，他公开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算是老干部里面的造反派吧。

当谈到处理武汉事件的具体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被抓的几个头头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

这里说的“工人总部”，是被陈再道强行解散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给周恩来说的这些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方针，都是冠冕堂皇的大话，听上去很公正，但实际上却无法实施。现在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双方死了几百人，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和解和达成协议呢。因此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方针，武汉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其实毛泽东搞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岂不明白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一派打倒另一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说出他真正解决武汉问题的底牌，那就是鼓动“三钢三新”起来打倒“百万雄师”。毛泽东这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是故意给周恩来一个解决不了问题的方针，看周恩来怎么去解决武汉问题。

(39)

当时毛泽东对解决武汉问题还是非常乐观，信心十足的。毛泽东说：【对红

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给他的方针，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大话空话。如果周恩来真的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执行，不但一事无成，反而显得周恩来无能。然而周恩来并非等闲之辈，他对毛泽东的指示，巧妙地做了修改，变成可以具体执行的指示。7月18日，周恩来在对陈再道等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发表了自己对武汉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著名的四点指示。周恩来说：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

第二、“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第四、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周恩来的四点指示，大体上与毛泽东的指示符合，但又把毛泽东的指示发挥了。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周恩来就发挥成“这是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的错误”；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续保持名称”，周恩来就发挥成“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也不能取缔解散”；特别是周恩来说“三钢三新是左派”，这是毛泽东没有说的。周恩来的这个讲话中，给武汉事件明确性：“三钢三新”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犯了路线错误，要立即改正。

周恩来的这个四点指示，显然对陈再道等人不利。因为“三钢三新”明确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让陈再道向“三钢三新”承认错误，转而支持他们，等于就是要让陈再道投降了。陈再道等人对周恩来积压已久的愤怒马上爆发出来，

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现在，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让我们支持“三钢三新”，我想不通。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

陈再道更是一口否认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却说：【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

(40)

陈再道也不示弱，冲着周恩来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据邱会作回忆说：【早在总理来武汉之前，军区内部就统一口径说“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总理叫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帮助他们解脱，他们顶着不干。总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对周总理非礼，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陈再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陈再道的错误就在这里。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犯纪律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也没想到陈再道居然如此强硬地抵制自己的指示，这样一来，周恩来没办法了，只得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就等着周恩来没办法来找到自己，于是他答应让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他亲自跟陈再道谈。7月18日晚，毛泽东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等人。毛泽东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能不能合起来?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

就转过来了。】

毛泽东的话，比周恩来轻了很多，没有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也没有让军队立即转变立场，而是给他们一段时间的“过程”。

在毛泽东的讲话后，陈再道、钟汉华承认自己和武汉军区犯了错误，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回去作军区的工作。毛泽东很高兴，因为周恩来说服不了陈再道这些人，而他一出面，问题就解决了，别人自然会说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毛泽东又对谢富治、王力说：【你们要多做工作，作“三钢三新”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打倒。】

毛泽东同陈再道等的谈话结束后，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等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在毛泽东和陈再道等人谈话结束后，马上返回北京，一来他在北京的确有很多事要办，二来他对武汉的事情根本解决不了，陈再道不听周恩来的，只听毛泽东的，周恩来留在那里也是尴尬。这次，周恩来又输了一场。不过没想到周恩来离开武汉后的第二天就风云突变，周恩来从输家又变成了赢家。

(41)

7月18日晚，周恩来从武汉快快而去，毛泽东心情很好，他认为武汉问题基本解决了。毛泽东看来，武汉的造反派不能取胜的关键，在于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在毛泽东亲自出面后，陈再道承认武汉军区“支左”犯了错误，答应作检讨，给下面做工作，让他们思想转弯过来。

毛泽东认为，现在陈再道已经答应武汉军区放弃保皇派“百万雄师”，转而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了，这样一来，“三钢三新”加上军队的支持，马上可

以打垮“百万雄师”，造反派在武汉一统天下，武斗自然也就没有了。进而造反派彻底夺权和掌权，武汉就可以变成第二个上海。

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却是有失误的。毛泽东在文革中，主要的情报来源是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又专门挑有利于他们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所以使毛泽东出现很多误判。

毛泽东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从陈再道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另外一种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被中央文革小组“蒙蔽”了，被“欺骗”了。特别是这次毛泽东来武汉，周恩来不让陈再道的部队保卫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甚至很久不让陈再道面见毛泽东，这就使陈再道等人产生一种想法：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想把毛泽东与他们这些人隔离开，想独霸毛泽东，进而“蒙蔽”和“欺骗”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终于亲自召见了陈再道。尽管毛泽东的意见比周恩来缓和一些，但口径与周恩来大致上是一致的，也要求陈再道和武汉军区转变立场，改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陈再道在毛泽东面前，当然不敢像在周恩来面前那样坚持己见，只得违心地承认错误。但在心中，他仍然不服气，认为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被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蒙蔽”的结果，所以他想要设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

陈再道不敢像彭德怀那样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也不敢给毛泽东写信，所以陈再道就希望“百万雄师”搞出一个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把事情闹大，从而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被蒙蔽了，重新思考“百万雄师”的问题。虽说陈再道有让“百万雄师”闹事的意思，但他绝不敢想到抓钦差大臣，事情发展到抓王力，这也出乎了陈再道的意外。

陈再道有这样的想法，武汉军区的高官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也认为毛泽东被中央文革“蒙蔽”了，也想闹点什么事出来，促使毛泽东“清醒”过来。而且，谢富治、王力等人对“三钢三新”的偏袒，也使得“百万雄师”认为毛泽东被蒙蔽了，他们也要设法发起一种行动，促使毛泽东的改变想法。这样一来，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想法一致，于是他们就联合行动起来。

(42)

从7月16日开始，武汉街头上出现大量“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这里“百万雄师”用这些大标语，想要提醒毛泽东，谢富治和王力是脱离工农兵的“钦差大臣”，不要相信他们的汇报情况。

与此相反，造反派“三钢三新”也在武汉街头大量刷写大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造反派要制造一种效果，表示他们有来自北京中央的支持，以此来“压”保皇派。保皇派也不甘下风，于是谣言就出来了。一种谣言针对王力的，传说王力的老婆是华中工学院的副教授，王力的儿子是“三钢三新”的造反派头头，所以王力支持“三钢三新”是出于私利。

另一种谣言是针对毛泽东的，有人伪造了两条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第一条是：**【毛主席说，文革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武汉的“百万雄师”。】**第二条是：**【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有了这两条毛主席指示，“百万雄师”在声势上又压倒“三钢三新”，因为“三钢三新”只是有谢富治和王力的支持，而“百万雄师”则有毛主席的支持。“三钢三新”则声称，所谓“毛主席指示”是“百万雄师”编造出来的，而“百万雄

师”坚称，自己的信息来源很可靠，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假的。

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人们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假。有人给北京打电话，问中央有没有派出谢富治和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北京的答复是“谢副总理和王力是去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去处理武汉问题的。”因为北京的中央，的确没有派出过“中央代表团”去武汉。这样一来，人们对王力、谢富治来武汉的正当性，愈发产生了怀疑。

不管怎么样，“百万雄师”的人，宁愿相信毛泽东的这两条批示是真的，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总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的，而“百万雄师”正是武汉最大的人民群众组织。

7月18日晚，周恩来从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前往机场送行，一起去送行的还有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谢富治、王力等人送周恩来回来后，顺路又去了造反派的另一据点：水利电力学院。这天谢富治和王力都发表了讲话。

文革结束以后的流行说法，说王力在这次讲话中向造反派泄露了周恩来的四项指示，激怒了“百万雄师”，从而引发“七二零”事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王力这次虽然讲了不少话，但他并没有按照周恩来的四项指示讲，更没有提到周恩来的指示，相反，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讲的。

(43)

王力回忆说：【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刘丰、肖前都讲了话，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我还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王力所谓“中央指示”，就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在18日的会上对王力

等人说：【你们要多做工作，作“三钢三新”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打倒。】于是，王力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说：

【同志们，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这个旗帜举起来，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检讨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

王力等人 18 日夜去造反派据点水利电力学院访问，这又大大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被激怒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王力的讲话，而是两位军队干部刘丰和肖前的讲话。他们两人的发言虽然很简短，但意义非常重大。在这以前，武汉的军队从来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没有支持过“三钢三新”。可是这次刘丰和肖前的发言，却承认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今后他们将坚决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武汉空军是接受空军司令部和武汉军区的双重领导，过去武汉空军要看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的态度，不敢随便发出与陈再道不一样的声音。刘丰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下属，是林彪派系的人，他们平日就与陈再道不合。这次刘丰看到毛泽东也批评了陈再道，感到反陈再道的时机来了，于是就发出了与陈再道不一样的声音，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

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听到武汉空军的态度，大为振奋，因为一旦有军队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打垮百万雄师了。于是造反派立即高呼：“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万岁！”第二天，造反派们把王力、刘丰等人的讲话录音，用大喇叭和宣传车到处广播。造反派有了武汉空军的支持，声威大震，同时也大大刺激了“百万雄师”，使他们感到危机来临，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7 月 19 日，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

上干部参加，传达周恩来讲话的精神。讲到周恩来的四项指示时，武汉军区的干部大为不满，谢富治说：【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统帅所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王力接着讲话，他用教训的口吻对军队干部说，说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王力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44)

这下军队干部被激怒了，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一怒之下，起身离开会场，牛怀龙也退场抗议。两人回到独立师作战部后，牛怀龙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本来按照规定，周恩来 18 日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别的部队遵守了这个指示，但陈再道的嫡系武汉独立师却没有遵守。当天晚上，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就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又由军代表向“百万雄师”等保皇派群众组织传达。

蔡炳臣传达会议精神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王力说：“三钢三新”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

王力提到的“打解放军”，这是造成武汉独立师憎恶造反派“三钢三新”，支持“百万雄师”的主要原因之一。武汉独立师不是纯粹的野战军，而是一只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的部队，类似于公安部队。在中央发出军队支左的通知后，武汉军区派出武汉独立师作为“支左”的最主要部队，同时维持社会治安。

每当发生武斗时，武汉军区就派出独立师去制止武斗。然而，由于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就不满意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认为他们是在拉偏架，常常把动武的行动转到解放军战士身上。因为军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战士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打解放军战士反而是最安全的。这样一来，一些“三钢三新”的造反派就打解放军泄愤。据统计，在6月就有226名战士受伤，其中38人重伤。

因此，独立师的干部和战士对那些打自己的“三钢三新”极为痛恨，而出来保护和帮助解放军战士的，却是支持军区的“百万雄师”，这样独立师的官兵普遍对“百万雄师”很有好感。现在他们听说王力要把殴打自己的“三钢三新”说成是革命左派，而把帮助自己的“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组织，当然是气愤不过，纷纷说：“想不通。”

牛怀龙也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这样一来，部队里的愤怒情绪就点燃起来。牛怀龙和蔡炳臣最后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要他们注意策略，把矛头引向王力一个人身上。于是干部们向下传达的时候，就不提周恩来，只说王力，于是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到王力一个人身上，众人的愤怒也集中到王力一个人身上。独立师的战士们群情激愤，大骂王力处事不公，纷纷吵着要找王力去说理。

(45)

19日傍晚，数十名独立师的士兵聚集在武汉军区大院门口，要向王力当面质问：【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但王力认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没有接见这些人。

于是愤怒的战士决定去寻求广大群众的支持，几十名战士出去联络“百万雄师”，几小时后，几百辆满载“百万雄师”愤怒群众的大卡车开到军区大院，要找王力论理，可是这时王力已经离开这里，回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找不到王力，怒气冲冲的人群就在军区大院里大闹，于是军区干部立即向王力汇报，说：“百万雄师”听了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现在已经占领了军区大院，希望王力过来见一见这些群众，以免事态失控。但王力认为他要站稳立场，不能去见保守派，于是事情就进一步恶化了。

7月20日凌晨，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又跟踪追到王力住的东湖宾馆，闯入宾馆抓走了王力，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七二零”事件。

关于“七二零”事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在7月19日晚，有人派小车将“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对他说：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他们可以去向毛泽东请愿，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后来俞文斌等人经过商量，认为直接找毛泽东是不策略的，于是他们与独立师人员共同商议，具体的行动是找王力论理。

19日深夜，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部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按这个协调组织进行的。凌晨2时，成百辆卡车冲进军区，在军区食堂开会成立独立师与百万雄师的“临时联合代表团”，共同与王力谈判与辩论。随后，军民双方的联合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某副参谋长与“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

这个后一种说法，主要是来自“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的独家披露，其真实性有待证实。不过也有人透露，据中央文革武汉办事处的张根成回忆说：【20日

那天我和王力一起被抓走，把我关押在独立师的师部。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向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询问说：“那个人怎么了？”

蔡炳臣忙向那个主任眨眼，示意他不要讲。那个主任不明白蔡炳臣的意思，还追问：“那个人呢？”

蔡炳臣只好反问：“哪个人？”

那个主任说：“就是那个游泳的人。”

蔡炳臣不想回答，就说：“那谁知道呀。”】

从张根成的说法来看，似乎独立师的干部们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了。不过总而言之，后一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有较大的疑问。因此，我们认为前一种主流的说法，可信度比较大的，也比较符合事情前后发展的合理性。

(46)

关于王力在东湖宾馆被绑架的事件，有许多个版本，总的內容基本上差不多，但细节上有一定差别。因为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搞得十分清楚。这里，我们分析对比多个版本，把事件的经过整理如下。

先要说一下武汉市内军队布置的情况。当时武汉市内有三支部队，第一支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也称 8201 部队；第二支是武汉军区直辖陆军第 29 师，也称 8199 部队；第三支是武汉空军，也称空 15 军。

独立师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是一支地方部队，以维持当地治安为主要任务。武汉的“支左”任务，主要由独立师担任，所以独立师对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陷入较深。

29 师原属第二野战军，是一支野战部队。本来 29 师并不驻扎在武汉市区，1967 年 2 月解放军“支左”开始后，29 师四千余人也奉命进驻武汉参加“支

左”，驻扎在武昌军区大院东侧。29 师的“支左”任务不多，所以陷入武汉的两派群众斗争也不太多，态度相对中立。武汉空军的作战任务接受空军司令部的领导，但在地方性事务上，也接受武汉军区的领导，即所谓接受双重领导。

东湖宾馆的警卫，本来是由独立师负责的，但这次周恩来调来大批中央警卫团的士兵，接管了毛泽东住的梅岭地区的警卫，但由于东湖宾馆的很大，方圆几十平方公里，所以宾馆的各个大门，以及不太重要的地方，仍由独立师担任警卫。

毛泽东入住东湖宾馆后，东湖宾馆的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派 29 师的一部分人来加强宾馆的警卫，但被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否决，他说：“独立师与 29 师之间有矛盾，还是不调 29 师为好”。钟汉华后来在自己的检查中也承认：【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我说 29 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从事后的情况分析，如果当时调 29 师的一些人来警卫东湖宾馆，绑架王力的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7 月 20 日凌晨 1 时，第一批冲击东湖宾馆的人来了。武昌公安局东湖派出所的两名公安干警，带领“百万雄师”的 12 个人，乘车来到东湖宾馆北门。哨兵拦住他们，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要见公安部长谢富治，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哨兵回答说：“谢部长不在这里住”。

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

这时东湖宾馆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人，立即赶到现场。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听王力说‘工人总部’要翻案。‘工人总部’翻案的话，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因为‘工人总部’的案子是我们办的。我们要问谢部长。”

王振英说：“谢部长不住这里。谢部长、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你们要见首长的话，要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

(47)

武汉公安的人扬言说：“今天晚上我们来了14个人，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谢部长到天亮还不接见我们，就要来几千人！天亮了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

王振英警告说：“你们都是搞公安工作的，有的过去还在宾馆里搞过警卫工作，知道东湖宾馆的重要性。”

武汉公安的人满不在意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吧，谢部长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的话，我们就冲！”

说着武汉公安的人就往宾馆里冲，王振英等人拼命挡住，双方对峙不下。这时情况很紧急，王振英立即打电话向三个方面报告。第一个方面当然是驻扎在梅岭地区的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团的负责人汪东兴听到报告后，传来指示说：“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

汪东兴的这个指示颇为蹊跷，不清楚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不管是谁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情况不是那么严重。既然来人要找王力和谢富治，也就应该由王力和谢富治去解决。他们当时乐观地估计，即使王力和谢富治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至于出现绑架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有太在意。

但是，一旦汪东兴传来指示“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那么王力和谢富治要躲起来或者逃走，就不行了，他们两人必须面对群众了。

王振英打电话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武汉军区领导。王振英给住在东湖宾馆

乙所值班的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报告，可是钟汉华的秘书却说钟汉华睡觉了。这么紧急的事情，钟汉华即使是睡觉，也应该起来。这时钟汉华有意不管，他希望闹点事出来，提醒一下毛泽东。不过钟汉华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绑架事件。

王振英也知道钟汉华不想管这件事，而武汉独立师肯定会站在钟汉华一个立场上，所以王振英不再给独立师打电话，而是给武汉的另一支部队 29 师打电话。29 师政委张昭剑听到报告后，马上带自己身边的一个排的战士赶过来。凌晨 3 点，张昭剑率领 29 师一个派的战士，赶到东湖宾馆北门，他们立即手挽手拦住武汉公安的人。

武汉公安的领头说，“你们不是独立师的，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你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

然后武汉公安的人又向守卫北门的独立师卫兵，煽动说：“你们看，他们不相信你们了，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守北门的几个独立师战士，看到 29 师的人来插手这件事，本来心中就不高兴。被武汉公安的几个人一煽动，果然怒火上升。这几个战士居然带着枪走了，不再守门了。这下子守北门的就剩下 29 师这一个排的人，他们死死挡住武汉公安的人，不让他们冲进东湖宾馆。

(48)

双方从凌晨 3 点僵持到早上 5 点，东方已经发白了。这时突然传来消息：百万雄师的三十多个人，从东湖宾馆的西门冲入了东湖宾馆。原来，这些在东湖宾馆北门冲击的人，是佯攻，是声东击西，把宾馆警卫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北门这边来。他们真正的主攻方向是西门，因为西门距王力等人住的百花二号只有几百米，而从北门到百花二号则有几公里远。

守卫西门的也是独立师的卫兵，开始时他们阻拦这些试图冲入宾馆的人，这些人大骂阻拦战士说：“你们是独立师的叛徒！不躲开，老子用刀捅了你。”

守西门的武汉独立师卫兵，本来就同情百万雄师，听他们这么说，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些百万雄师的人冲了进去。如果当时派 29 师的士兵过来担任东湖宾馆的守卫，这些人是绝不会这么轻易就冲进东湖宾馆的。

冲入东湖宾馆的三十多个“百万雄师”，由原东湖宾馆的百万雄师派系的工作人员带路，径直来到百花二号楼。这些人头戴钢盔或柳条帽，手持长矛、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当他们冲入百花二号楼的时候，住在一楼的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和四个红卫兵(随同谢富治、王力一起来武汉的)，堵住楼道，并指责对方，双方发生了冲突。这五个人当然挡不住几十个“百万雄师”，他们很快冲到二楼，直奔王力和谢富治住的房间。

当这批人冲进来之后，住在百花二号二楼的谢富治，马上给住东湖宾馆乙所的陈再道和钟汉华打电话，要他们赶紧过来。谢富治亲自打来电话，陈再道和钟汉华不敢推说睡觉了，于是就赶紧赶过来。

这些百万雄师的人在王力和谢富治住的房间外面，震耳欲聋地高喊：“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王力滚出来！”

谢富治让王力留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二楼的人群，大声呵斥说：“我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

百万雄师的人被谢富治这句话震住了，静了下来。毕竟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这时一个人身份的威慑力，就显示出来了。谢富治跟百万雄师的这些人一个个握手，并问他们的名字，寒暄一阵，气氛暂时缓和下来。

然后谢富治请他们到会议室说话，人们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这次“百万雄师”已经商议好，他们不惹谢富治，只揪王力一人，所以他们向谢富治提出要求说：“你把王力交出来！”

谢富治说：“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众人却不依不饶地说：“王力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人们见王力出来了，马上把他团团围住，愤怒地指责他说：“你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时陈再道和钟汉华赶了过来，陈再道看到这种场面，就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49)

王力见陈再道出面，有点放心下来，就态度傲慢地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王力的话和说话的态度，又激怒在场的人，众人吼道：“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又有人说：“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

这时，跟王力一起来的四个红卫兵，对百万雄师的人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红卫兵的话更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人，有人挥舞拳头打了过来，红卫兵们挨了不少拳头。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又冲进来三十多个独立师的士兵，他们是来支援“百万雄师”的。士兵们端起枪对准王力，逼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王力倒也沉得住气，他镇静地说：“我希望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众人却不答应，吼道：“你不要耍滑头，今天必须谈，否则我们决不答应！”

看到士兵冲了进来，作为司令的陈再道却一言不发。谢富治气急败坏地指着陈再道大声说：“我叫你过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立即让这些战士撤出去，马上撤，你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着谢富治气得发抖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惹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啦，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陈再道的话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哄堂大笑。这时因为挤进楼里的人太多，闷热难忍，于是谢富治建议大家到外面的草坪上，众人也同意了。于是众人转到楼外的草坪上，继续围攻王力，双方僵持不下。

就在这边僵持的时候，在武汉军区大院那边等着批斗王力的人，却等得不耐烦了。原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商议好，把王力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来批斗。他们大部分人留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派出“小分队”去揪王力。

凌晨 1 点，第一支小分队 14 个人先到东湖宾馆的北门佯攻，吸引宾馆的警备力量；第二支小分队是三十多人的百万雄师的成员，他们在凌晨 5 时冲入东湖宾馆，直奔百花二楼揪王力；第三支小分队是三十多人的独立师士兵，他们去增援前一支小分队，共同揪王力。

在武汉军区大院里等候的大部队，等到早上 6 时，王力还没有揪出来，于是他们等不及了，大部队出动了。几十辆大卡车呼啸着奔向东湖宾馆，打头阵的是独立师五团五连，他们乘坐两辆卡车，车顶上架着轻机枪，步枪上刺刀，后面是武汉公安的一车人，再后面是“百万雄师”的千余人，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杀气腾腾地冲进东湖宾馆，直奔百花二号。

(50)

这批千余人的大部队冲进来，一伙人冲进王力住的房间，把王力的文件之类的东西都抄出来带走，这是准备寻找王力的罪状。另一伙人对准王力挥拳就打。不幸的是，他们误把陈再道当成王力了，几个拳头砸在陈再道头上，边打边骂：“打死你这个小爬虫！”

陈再道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大喊道：“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

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忙喊道：“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打错了！”

独立师的几个人忙扶起陈再道，把他扶到会客室里休息。陈再道也趁机离开现场，撒手不管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见陈再道离开，也借口离开这里，也撒手不管了。

错打了陈再道的人恼羞成怒，一把揪住王力，拳头像雨点一样朝王力打去。这时，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和四个红卫兵，冲过去保护王力，被众人的

一顿拳头打开。就在这个时候，29 师政委张昭剑带着几个人赶来了。

原来在北门的张昭剑政委听说已经有人冲进百花二号，就把 29 师的一个排留下来守北门，自己带着几个人赶往百花二号。因为从北门到百花二号有几里路，张昭剑到现在才赶到。张昭剑不愧是军人，他马上冲进人群，用自己的身体为王力挡拳头，结果被打断了肋骨。

这时，百万雄师的头头喊：“大家别打了，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百万雄师的人把王力强行推上大卡车，准备带走。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中央派的人，要犯大错误的！”

几个人喝问张根成：“你是什么人？”

张根成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一听，把张根成也推上另一辆卡车，准备一起带走。这时，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来到现场，他走到百万雄师的汽车队前时，车上有人高喊：“牛师长来了！”

车上的人立即鼓掌，向牛怀龙伸出大拇指。牛怀龙赶紧摆手说：“不要这样。”

牛怀龙又来到独立师的汽车队前，只是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

说完然后，牛怀龙扬长而去，并没有阻止对王力绑架。

王力被揪上汽车后，众人高呼：“王力被我们揪出来了！我们胜利了！”然后汽车发动，向武汉军区方向呼啸而去。这是上午 7 时 20 分的事。

王力被抓走后，百万雄师的人继续对谢富治围攻，一直到上午 9 时多才散去。

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一伙人居然在他的眼皮下把王力抓走，

这让谢富治赶到羞辱难当。谢富治不顾别人的劝阻，驱车去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

来到军区大院门前，守门的几个军人认出了谢富治，故意喝问：“你是什么人？”

谢富治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

对方却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

又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还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

陪同谢富治来的人见事不好，急忙把谢富治拉上汽车，逃走了。

(51)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抓到王力，马上开始下一个节目：批斗王力和胜利大游行，这里先说胜利大游行。王力被抓到武汉军区大院之后，“百万雄师”群情振奋，立即举行数十万人规模的胜利大游行。就在大游行之前，又传来两个振奋人性的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中央军委的来电(7月20日凌晨4点收到)。来电说：【(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第二条消息是中央文革的来电(7月20日凌晨收到)。来电说：【(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

事后知道，这两条来电是编造出来的谣言。可是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人们根本搞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谣言。最重要的是，这些伪造的“中央来电”符合“百万雄师”的愿望，肯定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于是“百万雄师”拼命传播这些“中央来电”，一时间大家都以为这是真的。

“百万雄师”取得了揪王力的胜利，又得到伪造“中央来电”的鼓舞，这些人热血沸腾，冲上街头举行胜利大游行。当天，“百万雄师”数十万人上街，出动卡车一千多辆，游行的人手持长矛、棍棒等武器，高呼口号：“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滚出武汉”、“欢迎毛主席的真正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来武汉”等。

武汉街头也贴满了伪造的“中央来电”，还有各种大标语和大字报：“揪出中央文革中的一小撮混蛋！”“武汉问题要由武汉人民来解决”、甚至还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狂热的气氛也感染了武汉独立师的许多官兵。自从军队“支左”以来，独立师一直强烈地同情保皇派“百万雄师”。据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回忆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平日上街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常常遭到造反派围攻、殴打，而每次都是“百万雄师”上来保护我们的干部战士。所以，我们的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感情很深，他们听说王力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这可把他们激怒了。】

独立师以前虽然同情“百万雄师”，但还未敢公开与他们站在一起。现在他们撕下这层面纱，公开与“百万雄师”站在一起。为了配合“百万雄师”的胜利大游行，武汉独立师也出动数十辆军车上街游行，车上满载士兵，手中握着上了刺刀的枪，车顶上架着轻重机枪，摆出一副与“百万雄师”并肩战斗的姿态。

(52)

这时，又出现一份以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名义发出的《特急呼吁》。该《呼吁》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死亡，在临死之前拼命挣扎，实行新的反扑。为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8201 部队全体指战员，向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以下特急呼吁。】

【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8201 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

该《呼吁》最后的署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8201 部队全体指战员”。后来查明，这份的《特急呼吁》是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写的，但他们用“8201 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名义，使很多群众误以为真是全体 8201 部队支持百万雄师，大大提高了百万雄师的威望。

针对这份 8201 部队的《特急呼吁》，“百万雄师”马上也发出一份《十万火急声明》，作出以下的誓言：【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 8201 部队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三钢三新”是不是革命左派，只能由我们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7 月 21 日，在军队声势浩大的支援下，“百万雄师”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并开始扫除造反派的据点。“百万雄师”正处于强势之上，他们所到之处，造反派迅速逃走，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挡，就把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拔除。到 7 月

22 日为止，武汉全市只剩下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百万雄师”打垮了造反派，统治了武汉。

武汉的一般居民是基本同情“百万雄师”的。因为“百万雄师”要维护社会秩序，而造反派要搞乱社会秩序，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然盼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他们支持和同情“百万雄师”的基本心理。

“七二零”事件发生后的 7 月 20 日到 24 日，武汉市各界人士也纷纷在《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发表文章，支持“百万雄师”的革命行动。

(53)

当武汉的“百万雄师”欢庆他们的胜利的时候，北京却认为这里发生了一场反革命暴乱。7 月 25 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群众的盛大集会，林彪亲自出席，愤怒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也举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示威游行。在此巨大的压力下，“百万雄师”撑不住了，终于在 7 月 27 日宣布解散。

“百万雄师”解散后，7 月 20 日到 24 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仍登载有大量赞美“百万雄师”的文章，于是上级下令，将 7 月 20 日到 24 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全部销毁。据说现在已无法找到这 5 天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了。

关于这次“百万雄师”胜利大游行，还有一个插曲。周恩来于 7 月 20 日下午紧急飞往武汉，准备在汉口王家墩机场降落，可是周恩来的行踪被泄密了。20 日下午，25 辆满载“百万雄师”的大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众人站在跑道两边，大喊“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据随周恩来到武汉的张佐良医生回忆说：【飞机在王家墩低空盘旋时，看到

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

“百万雄师”的告状人群，使周恩来的飞机无法降落，只好改飞到另一个临时机场降落，使周恩来被困了好几个小时。

这里再交待几句后来的事。“百万雄师”解散后，武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虽然“百万雄师”的彻底垮台，让造反派的“三钢三新”轻易取得了胜利，但造反派内部马上出现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抗“百万雄师”的时候，“三钢三新”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可是当“百万雄师”这个敌人消失后，造反派内部的分歧立即凸显出来，“三钢三新”很快分裂成两派：“钢派”和“新派”。

陈再道倒台后，新成立的武汉军区比较倾向于支持“新派”，于是“新派”成了新的保皇派，“钢派”成了新的造反派，这两派又开始武斗，又开始新一轮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夺权斗争，这种现象就是当时所谓的“翻烧饼”。

文革的夺权，大多数演变成这种翻来翻去的“翻烧饼”闹剧。毛泽东没有预想到造反派的思想觉悟这么低，与他的期待相去太远，这也是文革失败的重要内因之一。到了1969年，毛泽东不得不宣布取缔一切群众组织，不管造反派、保皇派一律取缔，这才停止了这场“翻烧饼”的夺权闹剧。

(54)

我们再说百万雄师批斗王力的情况。百万雄师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连推带拖把王力揪下卡车，然后王力被反剪着的双手，拉到四号楼的楼梯边阳台上示众，在这里开始对王力进行批斗。

百万雄师的人先把王力的军帽夺走，军装上的领章撕了，后来又把王力的军装扒掉，再后来又把王力的衬衣扒掉，最后连外裤和汗衫也扒了，只剩下一条短

裤，鞋子也被弄走。好在当时天气特别热，打赤膊也问题不大。同时，对王力又是一顿拳脚，王力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左眼被打得肿起来，膝盖软骨被打伤，左脚趾被踩成骨折，这算是给王力一个下马威。

然后，百万雄师的人又让王力站在一张椅子上，面对楼下的众人。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有人把扩音器和录音机放在王力面前，让他当众回答问题。一个人拿起话筒说：【王力，我们提几个问题要你回答。第一，你们的‘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

王力说：【我再次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武汉的群众问好！我们到武汉来，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向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

王力在关键时刻，还能沉得住气，问题回答得不卑不亢。那人又问：【王力，你说“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

王力说：【百万雄师的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

这样的回答，“百万雄师”当然不能满意，于是他们立即向王力进行了一阵咒骂。然后“百万雄师”的人又拿出一份传单，内容是中央收回“四点指示”，让王力签字，被王力拒绝。

就在这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副政委叶明赶来了。钟汉华急得语无伦次，捶着自己的身子喊：“你们不能这样干哪！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啊！你们绑我好了。”

众人根本不理钟汉华。钟汉华尊为武汉军区政委，名义上是武汉军区的最高负责人，地位比陈再道还要高一些，但在关键时刻，他说话根本不顶用，没人听

他的。钟汉华见众人不理他，又给众人作揖，甚至磕头劝阻，但还是没人理他，倒是有人嘲笑他说：“你也太不象话了。”后来钟汉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被人背走。

这时，武汉军区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这一派主张把事情继续闹大。另一派是军区政委钟汉华，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他们主张赶紧停止闹事。

(55)

本来钟汉华也是倾向于闹点事情出来的，但他没想这些人居然把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绑架了，这可把钟汉华吓坏了，赶紧来救王力，可是根本没人听他的话，搞得堂堂的政委给部下磕头作揖。到了关键时刻，谁说话算数就显现出来了。武汉军区听陈再道的话，不听钟汉华的话。

在这紧张的时刻，29师政委张昭剑，带着29师警卫营和三个连的战士赶来了。前面提到，张昭剑在东湖宾馆为了给王力挡拳头，被打断了肋骨，他是忍痛赶来的。

按照道理，29师属于武汉军区领导，张昭剑应听从陈再道的命令。不过张昭剑是机灵人，他马上从这场混乱中，嗅到了政治斗争的味道。他给武汉空军司令部打电话，询问情况摸底。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说：“武汉军区的问题大了，武汉军区有鬼！”

张昭剑立即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我听空军的。”

张昭剑摸到这个底，心里也有底了，他知道现在救王力是一个立功的大好机会，于是就带着29师警卫营外加三个连的人赶了过来。张昭剑虽然也是政委，但他这个政委说话是有人听的，不像钟汉华那样的空头政委。

张昭剑赶到后，立即下令，一个连控制大门，另外一个连控制侧门，其余的人控制四号楼。29 师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插入四号楼，控制了所有的楼梯。战士们臂膀紧紧挽起来，结成了一道人墙，把楼梯拦腰截断。

“百万雄师”的大部分人都在院子里看批斗王力，在楼上揪王力的人很少。没想到 29 师的几百名战士突然插进来，截断楼梯，这样就把“百万雄师”的大部分人与王力隔绝了。

“百万雄师”的人开始向四号楼上冲击，骂 29 师的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几百名战士硬是用身体阻挡住“百万雄师”的冲击，有的士兵被打成重伤，但“百万雄师”始终没有冲过去。

在楼上的少量“百万雄师”，敌不过大量冲上来的 29 师士兵。张昭剑提出让王力暂时休息，“百万雄师”的人只好同意，于是张昭剑让人把王力送到二楼的一件小房子里休息，而“百万雄师”的人也跟了过来，继续在小房子里围攻王力。

忽然窗户“哐当”一声砸破了，一个独立师的战士砸开窗户跳了进来，原来他们在下面搭起人梯，爬了上来。这个战士举起冲锋枪，把枪口对准王力。就在这时，警卫营长乐庆祥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枪口，厉声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那战士还要动手，乐庆群说：“你现在要打的不是王力同志，是党中央！要打你就先对我来吧！”看到乐庆祥这种坚决的态度，那个战士把枪收了回去。

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天气又极炎热，双方都累得精疲力竭。张昭剑乘这个时候说：【现在军区食堂预备了饭，现在大家先去吃饭，有问题六点钟再派代表来谈判。】

(56)

大部分“百万雄师”的人也又累又饿，于是他们接受了张昭剑的建议，只留下二、三十个人监视现场，其余人都去吃饭了。这时候，29师的战士三三五五地走过来，与这些留下来的人谈话、辩论，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人包围控制了。

乘这个时机，29师的几个战士扶着王力悄悄下楼，坐上早已隐蔽在楼后面的一辆吉普车。这时军区大院的侧门也已经被29师控制，所以吉普车顺利开出军区大院，一直开到29师师部驻地。

这时留下监视的人发现王力跑了，喊叫：“王力跑了！”可是大部分“百万雄师”的人正在食堂吃饭，留下的这些人根本阻挡不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王力跑了。

29师师部驻地的后面，是一座名叫洪山的小山。山并不高，但长满密密麻麻的灌木林，荆棘夹杂其中，人很难上去。王力被救到29师师部后，张昭剑考虑，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很快就会追到这里来，他要把王力隐藏起来才行。隐藏在师部里肯定是不行的，这次东湖宾馆保卫科科长王振英也来到29师师部，于是张昭剑灵机一动，就带着王力和王振英，爬到后面的小洪山上躲起来。

果然，张昭剑他们三人才走不久，“百万雄师”的三十多辆大卡车冲进了29师部，逼29师交出王力。29师的人说王力不在这里，“百万雄师”不相信，就在把29师师部搜查遍了，也没找到人。不过几万“百万雄师”的人把29师师部团团围住，继续在附近搜查，他们总以为王力躲到某所房子里去了，没想到王力躲到山上去了。

张昭剑、王力和王振英硬着头皮爬上山，浑身被荆棘划了很多血口子，他们

三人在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张昭剑悄悄下山，到 29 师下属七连的驻地，把王力悄悄转移到七连的驻地。在动员七连的战士去救王力以前，张昭剑让战士们每人先写《决心书》：“誓死保卫毛主席司令部！有我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当王力见到来救他的战士们时，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战士们被“钦差大臣”的话感动了，纷纷向王力递上自己的《决心书》，请王力转交给毛主席。王力紧握战士们的手说：【一定到北京转呈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由此可见，王力在群众面前，始终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讲话的。其实毛泽东并没有给王力“钦差大臣”的权力，王力过分行使了他的权力，这也是王力在一个月之后被打倒的重要原因。

张昭剑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在救出王力之后，又宣布 29 师脱离武汉军区。张昭剑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立了大功，很快被提升为陆军 17 军政委。不过粉碎四人帮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铁道兵司令员，当年支持陈再道的牛怀龙和蔡炳臣也都跟着升官了，而反对陈再道的张昭剑就靠边站了。

(57)

前面交待了“百万雄师”绑架和批斗王力的情况，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共高层对这件事的反应，首先当然是毛泽东的反应。关于毛泽东反应的细节材料很少，当时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总参谋长杨成武、中央保卫局局长汪东兴等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细节，只是海军政委李作鹏在回忆录中，概要地提到了几句。李作鹏和杨成武一样，以保护毛泽东为任务，随毛泽东一起到武汉，他们都没有上街和群众见面。

李作鹏回忆说：【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数百人强行突破警戒线，包围谢富治、王力等人住的百花别墅，将谢富治围斗一顿，将王力揪走，不知去向。形势急转直下，谁也说不清，“百万雄师”是不是还要来冲击东湖宾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当时我们在主席身边的人，都高度地紧张。】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群众在宾馆闹事，可把我们紧张坏了。在北京虽然也见过许多群众到中南海门前示威抗议，那些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工人、市民群众，从来没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更为可虑的是，这群荷枪实弹的战士和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在行动上没有指挥，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我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警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关于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则来自陈再道本人的回忆。陈再道说：【毛主席很快就感觉到武汉事件不是我搞的，当时他就在武汉嘛，那些闹事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在武汉。可是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毛主席以为群众和军人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一连地对身边的人员说：“想不到我也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了，历史真是在捉弄人呀，跑来跑去跑到贼窝里来了。”】

【但是，毛主席马上弄清真相后，立刻下令：“不要把陈再道弄死，你们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他，他没有反对我，他只是犯了错误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亲自派人来和我谈话，当场我就给毛主席下跪了，我说：“快请毛主席救救我吧，我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呀！”我这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现在关于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中“连夜转移”的戏说文学作品很多，细节都大都是根据上述这些梗概编纂出来的，不足为信。我们只能根据后来的各种

事实，来推测毛泽东的反应。

首先，7月20日早上王力被绑架的事情，肯定在第一时间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包括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内的一千多人闯进宾馆，把“钦差大臣”抓走。这种事情按照常理来判断，肯定是“造反”了，所以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陈再道造反了，我被劫持了。”

(58)

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冲进东湖宾馆是冲着他本人来的，抓王力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真正的对象是他自己，所以毛泽东说：【想不到我也落到蒋介石在西安的下场。】

毛泽东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向北京方面求援。7月20日一大早，中央保卫局主任汪东兴、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武汉军区独立师警卫不力，20日凌晨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了。”

毛泽东受到兵变的威胁，这是绝密的事情，消息绝不能轻易外传，所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只有林彪、周恩来两人知道。他们两人紧急商议，结论是毛泽东立即转移，离开武汉。同时决定，周恩来紧急飞往武汉，亲自帮助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

有人说：毛泽东本来不愿意离开武汉，是经过林彪和周恩来再三劝说才离开的，这种说法没有说到点子上。其实毛泽东早就想离开武汉了，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他本人继续亲自坐镇武汉，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促使矛盾更加激化，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毛泽东之所以不能立即离开武汉，是因为领袖的面子问题。

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全军最高统帅，如果遇到风吹草动就立刻离开，别

人就会以为毛泽东是胆小逃走。这种胆小怕死的形象，对于领袖来说，是致命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不能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形象。因此，毛泽东必须等到别人来“劝他”之后，才能离开。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就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遇到这样情况，也必须这么做。

林彪和周恩来都明白毛泽东的这个心思，知道毛泽东表示“不愿意离开”，实际上是在等他们去“劝”，给毛泽东铺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可是江青却不明白。江青得知武汉的紧急消息，吓得要命，她打电话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赶紧离开武汉，毛泽东表示不走。

据吴法宪回忆说：【江青非常担心武汉局势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江青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毛泽东不愿意。林彪对江青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你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送去。”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

关于这件事，邱会作的回忆稍有不同，邱会作回忆说：【7月20日中午，吴法宪同我说：“毛主席、杨总长他们都在武汉，武汉形势很紧张。林副主席决定要你去一趟。林总还交代，要你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医疗小组去。”】

(59)

【20日下午4时，我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去见林总。我先见叶群，叶群和我谈了一阵子，她说：“今天上午总理来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

总理已经又去武汉了。”叶群还说：“江青哭哭啼啼地来找林彪，要死要活求林彪和我亲自去武汉保证主席的安全。林总写了一封短信，劝主席速离武汉，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字，林总决定派你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

【过了一会叶群带我去见林总，林总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在武汉固守待援。”临走时，叶群交给我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叮嘱我带好。】

综合上面几个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把事情经过理顺如下。

(一)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商议，劝毛泽东立即离开武汉，这时他们两人并没有叫江青来参与此事，这个决定是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做出的。这点叶群说的很清楚：“今天上午总理和林总商量决定，劝主席马上离开武汉。”

(二)江青得知此事后，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劝他立即离开，毛泽东不同意。

(三)江青着急，马上找林彪，说她准备亲自去武汉。

(四)林彪不同意江青去武汉，请江青去和周恩来商量。

(五)江青找到周恩来，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动身去武汉。周恩来说林彪的意见是对的，江青不能去，周恩来让江青给毛泽东写一封信。

(六)江青写好信后，周恩来已经动身去武汉了，不在北京了。江青此时还是不放心，又哭哭啼啼地去找林彪夫妇，请林彪夫妇也去武汉保卫毛泽东。

(七)林彪不同意去武汉，但答应给毛泽东写一封信，劝毛泽东离开。林彪立即写一封短信，江青也在上面签字，林彪派邱会作去武汉送信。注意这里有两封信：第一封信是江青单独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江青在

信上签名。所以邱会作临走时，叶群交给他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应该放着这两封信。

(八)当晚 6 时，邱会作带一个医疗小组，乘飞机离开北京去武汉。再此之前，周恩来已经在下午 3 时 50 分，乘飞机去武汉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20 日下午 3 点多钟，我们和周恩来就乘车去西郊机场。机场上停着待飞的 3 架飞机，有 1 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恩来经常坐的飞机，另外 2 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恩来去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我们登上飞机，我看到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战士。看到这种场面，我真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行大约 40 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群众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60)

【飞机在山坡机场着陆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说那里的人已离开机场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周恩来怎么由王

家墩机场去东湖宾馆的事情。武汉城里交通很乱，他们为周恩来进城的安全担心，周恩来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我们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叫声震耳欲聋。】

【我们来到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楼，谢富治和几名负责同志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诉说7月20日的事情。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离开武汉。当天深夜2点来钟，毛泽东被秘密护送离开武汉东湖宾馆，第二天上午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了虹桥宾馆。】

根据上面高振普的回忆，以及结合其他材料，我们把周恩来的行踪理顺如下。

(一)周恩来下午20日3时50分从北京起飞，他带了中央警卫团两个中队，3百多人，分成3架飞机飞往武汉。

(二)周恩来去武汉的消息被泄露，王家墩机场被“百万雄师”占领，周恩来一行人改在一个军用机场临时降落。

(三)周恩来本打算从军用机场乘直升飞机直接去东湖宾馆，但大家反对，于是他们等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走后，再次乘飞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四)周恩来把随行的 300 多中央警卫团战士留在机场，自己带几个随从，乘两辆普通的吉普车进城。据其他材料介绍，周恩来换了普通的军装，戴上墨镜，打扮成普通军官的样子。

周恩来这样做，虽说看似危险，但实际上反而安全。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周恩来这样的大人物进城，应该是乘坐高档轿车，前有大量军人开道，后有大量军人殿后，浩浩荡荡地进来。没想到周恩来只乘坐普通军官做的吉普车，悄悄开进了东湖宾馆。

(五)周恩来依然住在他过去住的百花一号楼，这里距离王力被绑架的百花二号楼只有 100 米左右。这里周恩来也要摆出大无畏的领导人气概，这样才能赢得部下的敬佩。

(61)

(六)周恩来入住后，谢富治、杨成武、李作鹏、汪东兴等人立即向他汇报情况，他们开会共同商议好毛泽东撤离武汉的方案。

(七)周恩来与众人商议好撤离的方案后，才去找毛泽东，这也体现了周恩来的智慧。因为这样周恩来就可以说，请毛泽东立即转移，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武汉众高官的全体意见。如果周恩来一个人劝毛泽东走，毛泽东的面子还不够，众高官都劝他走，毛泽东的面子就足了。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处处照顾他的面子，于是毛泽东接纳周恩来的意见，立即转移离开武汉。

关于毛泽东是怎样离开武汉的，李作鹏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住的别墅附近和周总理住的别墅附近，均有“百万雄师”的人员活动，别墅里的工作人员也有“百万雄师”观点的。为了不使别墅内的工作人员和别墅外的“百万雄师”知道毛主席的转移行动，毛主席一行人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21 日凌晨，毛主席

静悄悄地离开别墅，离开武汉。】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回忆说：【7月20日深夜，实际是7月21日凌晨2时许，毛主席的转移开始了。毛泽东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分乘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宾馆出发，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我们的车队顺利到达王家墩机场。】

一些戏说历史的书，说毛泽东从武汉慌张逃走，这是不真实的。毛泽东是井然有序“撤走”的，他采用了与周恩来一样的策略，乘坐一辆不引人注目的普通吉普车。如果毛泽东乘坐他平时坐的大轿车，一出门就会被人们发现。另外，李作鹏说毛泽东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这里所谓的“伪装”，是不是毛泽东也像周恩来那样，穿一身普通军装，戴一副墨镜的“化妆”呢？这些就只能猜测了。

毛泽东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先上了停在机场附近的毛泽东专列。这时，邱会作乘坐的飞机也到达王家墩机场。据邱会作回忆说：【我们乘伊尔18专机夜航，于20日晚11时左右达到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21日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杨成武的话，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们。】

【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这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林总关心他老人家的话，

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

【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

(62)

【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造反派不是一切都好的。”】

【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

【大约早上7点半左右，停机坪上有三架伊尔18同时发动，接着主席坐杨成武的伏尔加来了，到了停机坪，主席下车和我们握手，也和工作人员握手。主席上了飞机，我和杨成武他们说了几句，我才知道主席要去上海。】

本来按照中央的规定，毛泽东是不能乘飞机的，但这次破例了，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邱会作还透露一个信息，毛泽东决定乘飞机离开武汉，但到了机场，还没有决定飞往哪里，直到最后才决定飞往上海。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留在东湖宾馆，继续处理武汉问题。李作鹏回忆说：【毛主席离开后，周总理留下来，继续处理“七二零”事件的善后问题。因他身边没有带助手，就决定把我留下来，协助他做具体工作。】

【我随周恩来住在同一座别墅内。为了总理的安全，我们约定，夜间我秘密搬入总理住的那套比较大的房间内睡觉，并按照总理平时夜间办公的习惯，凌晨3时后才熄灯，上午9时后拉开窗帘。而总理则搬到我住的那套比较小的房间内，

晚上 11 时前就熄灯休息，上午 7 时拉开窗帘。采用这样的办法，我们一直住到离开武汉。】

【7 月 21 日上午，周恩来在百花别墅再次接见陈再道，我在场。总理要陈再道把王力送回来，陈再道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

总理说：“你派人去找回来。”

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

看到陈再道这样，总理生气了，“啪”一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百万雄师’算什么？八亿人民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

陈再道低着头，告退出去了。】

陈再道之所以继续对周恩来这么“硬”，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为毛泽东还在保他。不过当时陈再道说“我找不回来王力”，倒也是实话。因为那时“百万雄师”不听他的话了，29 师不听他的命令了，就是独立师，陈再道也不能完全指挥得动。关于陈再道的态度和处分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周恩来处理武汉事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被绑架的王力找回来。鉴于陈再道的态度，周恩来决定临时停止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周恩来给孔庆德和叶明布置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王力找回来。

(63)

周恩来派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去找王力，孔庆德听说王力被 29 师的人救

走了，派人去 29 师查问。29 师政委张昭剑因为已经不相信武汉军区领导了，就推说王力不在这里，这样孔庆德就找不到人了。周恩来又派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去找，7 月 21 日下午 2 时，刘丰找到 29 师师部，张昭剑信任刘丰，马上说王力藏在他们这里。刘丰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马上把王力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命令武汉空军调两个连的士兵接应，29 师派一个连的士兵护送，共三个连的兵力护送王力，行动时间在天黑之后。当时“百万雄师”还在武汉街上大规模游行，通往机场的长江大桥上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为了不暴露目标，这些人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打出“专揪王力战斗兵团”的旗号，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果然一路畅通无阻，把王力送到了机场。

找到了王力，周恩来还要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首先周恩来把可靠的武汉空军调进城，进驻造反派集中几个学校“支左”，意在保护造反派的据点。然后武汉空军逐步从独立师手中接防城里的战略制高点和军事要地，驻在东湖宾馆的独立师也全部撤走，由武汉空军接管。

另外，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以“武汉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支持“百万雄师”的《特急呼吁》，这个我们在前面提过。有人把这份《特急呼吁》反映到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那里，建议独立师立即发一份声明辟谣，蔡炳臣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此置之不理，任其流传。这份由“百万雄师”铅印的《特急呼吁》，很像那么一回事，使群众认为“百万雄师”有军队的支持，大涨“百万雄师”的士气。

对此，周恩来让留在武汉帮助他的海军政委李作鹏，给停泊在武汉长江上的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下令，发表一份《严正声明》。《严正声明》说：【所谓 8201

部队(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8201 部队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与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论调完全相反。

(64)

但老百姓却又开始怀疑，这份所谓的东海舰队《严正声明》，是不是又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所以老百姓对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和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都是半信半疑的。当时真是谣言满天飞，老百姓根本无法判定真假。

接下来是对“百万雄师”的处理，这是最让周恩来伤脑筋的。刚开始周恩来听毛泽东说“陈再道反了”，他也以为陈再道真的造反了。可是到了武汉实地察看之后，周恩来很快就明白，“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号称有 120 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陈再道造反，周恩来并不难处理;而 120 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就很难处理了。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先看陈再道的回忆，陈再道在 1979 年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三钢三新’，把他们封为‘革命左派’，把‘百万雄师’打成‘右派’，他们这样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7 月 19 日深夜，一场百万群众自发地揪斗王力，进行说理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陈再道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然后“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这也就是说，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义愤”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谢富治和王力的责任，不

过是“私自”透露而已，因为这个方针并不是他们制定的。这里，陈再道用非常隐晦的语言指出，造成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原因在于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换句话说，就是周恩来是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肇事者”。

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他的“四点指示”是引发“百万雄师”闹事的“引爆剂”。当然，周恩来有他的苦衷，他本来是不想插手武汉事件的，是毛泽东让他来处理，结果出现这么一种结局，周恩来本人也始料未及。

中共建国后，一直宣传这样一个概念：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永远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具有 120 万人的武汉“百万雄师”，他们的确包括了武汉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因此“百万雄师”的人们就有一种天然的想法，认为他们既然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那么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此，当王力说“百万雄师”是“右派”时，“百万雄师”的人想不通，他们不相信毛主席党中央会不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受蒙蔽了。

(65)

据一位“百万雄师”的成员后来回忆说：【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如果是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像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百万雄师”的总部决定，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没有宣布他们是“保守组织”，他们就一定要抗争到底。7月20日晚，“百万雄师”

干部们召开会议，成立“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拟出具体的行动纲领：【(一)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派人来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二)揪王力问题要通告全国，争取外援；(三)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天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向北京施加压力。】

因此，“百万雄师”每天在武汉街头举行几十万人规模的游行，从7月21日一直持续到7月25日。当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大会上出现时，终于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于是“百万雄师”骤然瓦解，于7月27日解散。

周恩来是“人民的总理”，可是这次他却站到120万武汉人民的对立面上了，所以周恩来必须处理好“百万雄师”问题，否则他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周恩来不再提及他的“四条指示”，而是发出另外的指示：“建议武汉的‘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双方各派出100名代表去北京参加谈判。”

这次，周恩来表示出中立的态度，他要让中央承担把“百万雄师”打成保皇派的责任，他个人不承担这个责任。周恩来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认为“百万雄师”是保皇派，这个结论不是周恩来个人做出的。

因此，周恩来要淡化自己在“七二零”事件中的作用，他要把王力捧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这样一来，人们对“七二零”事件的焦点，关注到“英雄王力”身上，周恩来的作用就大大淡化了。于是，周恩来亲自率几万人去首都机场迎接受伤的王力，并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型游行，欢迎王力的“胜利归来”。

(66)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先把我们送上飞机先飞，然后他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总理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总理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我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王力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

【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指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

王力不敢提周恩来的名字，推说是林彪、江青干的，在当时的环境下，王力也只能这么说。

周恩来对武汉事件处理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陈再道打成反革命，让陈再道承担“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不能把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否则他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了。当然，陈再道一个人还不够分量，后来又把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放了进去，说“七二零”事件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策划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做法，他也知道不能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毛泽东只是指示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陈再道毛泽东还是要保的，而王任重就不保了。毛泽东为什么要保陈再道，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在刚开始误以为陈再道造反了，因为毛泽东想不通，那些热爱他的人民，怎么会对他派出的“钦差大臣”造反呢？当毛泽东了解到“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让毛泽东感到非常的失落。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毛泽东的化身，享有非常高的威信。可是这次武汉人民不再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了，甚至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绑架起来，

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人民以后也会不信任他了？毛泽东心中不能不有所思虑。

因此，毛泽东更要把自己淡化出“七二零”事件，因为他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所以毛泽东把“七二零”事件全权交给林彪和周恩来处理。像“七二零”这样震惊全国、甚至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且毛泽东本人也被卷了进去，可是事后毛泽东居然对“七二零”事件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指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心态。

(67)

对于“七二零”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有不同的想法，前面说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想法，这里再说林彪的想法。

林彪本人完全没有参与或插手武汉问题，所以“七二零”事件的爆发，林彪是没有责任的。不过“七二零”事件却给林彪带来一个好机会，那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肃清军队内的非林彪派系。

解放军内的派系，可大致分为三大派系：红一方面军派系，红二方面军派系，红四方面军派系。早期的红军有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的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约 12 万人，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主要干将有林彪、彭德怀等人。

红二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南省和湖北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湘鄂西边区。红二方面军约 2 万人，总政委任弼时，司令员贺龙，主要干将有许光达、肖克等人。

红四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鄂豫皖

边区。红四方面军约 8 万人，总政委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主要干将有王树声、徐海东等人。

这三支红军，基本上完全是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成长与发展，都与毛泽东无关。后来，这三支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合成一只队伍，但这支队伍仍保留着明显的三大派系。1966 年文革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红一方面军)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红一方面军)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红一方面军)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

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红二方面军)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红二方面军)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红二方面军)

\*\*\*\*\*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红四方面军)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红四方面军)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红四方面军)

\*\*\*\*\*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三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人数较多，将领也多，红二方面军的人数较少，将领也少。因此，文革前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布局是比较平衡的，它与当年三支红军的势力布局相吻合。

这样的布局，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林彪来说，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林彪进入中央高层较晚，在此之前林彪只管自己的一支军队，其他军队不属于林彪管，所以林彪与这些军队的将领也就无法建立那种“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友情。

(68)

比如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杨成武回答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杨成武在建国后才认识陈再道，那么林彪也应该差不多在建国之后才认识陈再道，这样林彪与陈再道等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关系就十分生疏，就无法建立起在个人感情上的信赖关系，这对于林彪控制整个军队，是很不利的。而陈再道这些人对林彪也不服气，被林彪视为军队中的“钉子”，一直希望拔去而后快。

武汉“七二零”事件，陈再道犯了错误，正好给林彪一个拔钉子的机会。于是林彪借着这个机会，不仅要严惩陈再道，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希望借此一举拔除军队内非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尽管遭

到毛泽东的阻止，但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到 1969 年中共“九大”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红一方面军)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红一方面军)

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红一方面军)

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红一方面军)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红一方面军)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红四方面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红四方面军)

装甲兵司令员：陈宏(红四方面军)

\*\*\*\*\*

在新的势力布局中，红二方面军的势力全军覆没，这也与贺龙的倒台有关。红一方面军的势力增加，红四方面军的势力减弱，要不是毛泽东保护这些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红四方面军的势力也可能会全军覆没。毛泽东为了平衡军队中的势

力，不让林彪的势力过大，所以他不能让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都被打倒，陈再道也就要“保”了。

7月21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7月22日下午，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周恩来回北京的第一件事，是把王力和谢富治塑造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周恩来的飞机比王力的飞机早降落一些，周恩来下飞机后，马上在机场主持欢迎仪式，迎接王力和谢富治，到机场欢迎王力等人的还有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因为王力本身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另外，还有几千人的红卫兵队伍夹道欢迎。

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王力因为脚部受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欢迎的人们高呼口号“欢迎王力同志回到北京毛主席身边!”7月23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又代表周恩来去钓鱼台慰问王力，并向王力赠送毛主席塑像。

在处理陈再道这方面，周恩来与林彪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打倒陈再道这个毛泽东的嫡系，对林彪和周恩来都有好处。7月22日，林彪主持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在内的中央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认为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

(69)

并做出三个决定：第一、以中央的名义立即调陈再道和钟汉华到北京，对两人进行撤职处分;第二、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王力和谢富治回到北京;第三、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一个《公告》，挽回武汉军区“叛军”的形象。

林彪主持的会议为武汉军区起草的《公告》说：【“七二零事件”是明目张胆

地反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上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一切受蒙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一定要迅速猛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和周恩来起草的《公告》，有三个要点：第一，武汉军区在“七二零事件”中的行动是叛变行为;第二、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第三、参加这些事件的干部、战士和群众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

林彪和周恩来把他们的会议结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会议的决定，没有异议，只是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此时毛泽东也很清楚，处理这次“七二零事件”，必须打倒陈再道，不打倒陈再道就无法向群众交代。

这时，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陈再道，他就要亲自做出打倒陈再道的指示，那样陈再道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毛泽东让林彪和周恩来处理“七二零事件”，让林彪和周恩来打倒陈再道，这样毛泽东就可以给陈再道留一条后路，让陈再道被打倒之后，再重新站起来。这样一来，陈再道先被林彪和周恩来打倒，然后毛泽东再把他救出来，这样陈再道就会对毛泽东感激涕零，继续为毛泽东所用。

王任重虽然参加革命也较早，但王任重过去一直是文官，没有在军队中任职过。毛泽东现在处于“非常时期”，他对王任重这样的文官并不珍惜，因为很容易找到取代王任重的文官;而毛泽东对陈再道这样的武将就很珍惜了，所谓“千

金易得，一将难求”，想找到一个陈再道那样会打仗的武将，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要保陈再道，王任重就不保了。

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欢迎谢富治和王力回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首都广大革命群众一百万人，今天下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和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下午五时许，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同谢富治和王力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上红旗挥舞，欢声雷动，百万革命群众有力地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打倒‘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70)

这次大会上，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讲话，两人都表现得比较低调。这是林彪唯一一次在毛泽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群众。有人因此说，这是林彪有野心的表现，他想要享受这种领袖的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对林彪内心想法的推测，根据是不足的。

这次林彪上天安门，主要是因为“工作的需要”。由于武汉的“百万雄师”公开声称，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公开表态，他们就要顽抗到底。所以林彪有必要上天安门，进行公开的表态，这样“百万雄师”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从7月26日开始，在京西宾馆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林彪委托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周恩来没有忘了陈再道多次对他当面顶撞，这次周恩来要借机教训一下陈再道。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

议在京西宾馆，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会堂。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多。】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邱会作回忆说：【那天开会的阵势是很大的，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另一句是“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

【陈再道等人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判。陈再道一听到总理的话，吓得立即瘫倒在地上，身后的两个卫兵又把他拉起来，因为总理讲了“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气愤地给了陈再道一个耳光，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秘书和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喷气式”，总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

这次，林彪和周恩来都想严厉处罚陈再道，可毛泽东出面制止他们进一步对陈再道的批斗。据吴法宪回忆说：【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武汉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这次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毛泽东这封信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泽东特别说“你们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意思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要打倒陈再道的，而是“你们”要打倒陈再道。

此后，“七二零事件”不再被人们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又凸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

(71)

文革中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全称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搞过两次。第一次“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发起的，1967年1月配合“全国全面夺权”运动，在军队内掀起“揪军队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当时的军队内，最大的当权派就是林彪，主要的大权都掌握在林彪手中，因此“揪军内当权派”，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林彪。所以林彪想方设法地抵制毛泽东的“揪军内一小撮”，终于使毛泽东放弃了对林彪派系夺权的计划，暂停“揪军内一小撮”。

毛泽东暂停了“揪军内一小撮”，而林彪却又搞起“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7月发起第二次“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林彪为什么要发起“揪军内一小撮”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个典型事例：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关系。

据陈再道本人回忆说：【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主席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把我叫到他面前，给我交底，说：“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止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

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从陈再道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非常信任他的，很明确地向陈再道交底说：“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分子的话，你听谁的？”，陈再道则说：“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陈再道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指挥，其他谁都不认。陈再道靠着毛泽东撑腰，不仅敢当面顶撞周恩来，林彪的帐他也不买。这样一来，林彪要想完全控制军队，就必须拔掉陈再道这样不听他指挥的人。以前林彪没有机会，现在陈再道自己跳出来，正好让林彪如愿。

前面说过中共的军队，是由三支各自独立的军队组成：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任弼时和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以及张国焘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这三支红军在各自的地盘上独立发展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可是 1936 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三支红军合为一支红军，这样问题就来了：谁来领导呢？

(72)

1936 年 10 月，中共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但张国焘兼任红军总政委。因为红军总政委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张国焘的实权与毛泽东相当，毛泽东根本领导不了张国焘，因此张国焘就成为毛泽东掌控军队的最大困难。特别是张国焘这个人，具备最高领导人的

资质，各方面并不输给毛泽东。当时红军的人都看得出来，将来能够领导中共的，不是毛主席，就是张主席。

张国焘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如果在陕北长期呆下去，非跟毛泽东火并不可。因此张国焘提出在甘肃和宁夏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派出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张国焘的想法是，一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他就可以离开陕北去新的根据地发展，避免双方的火并。后来张国焘的西路军失败，属于运气不佳，苍天不作美。

张国焘的才智，还表现在他具有远见性的审时度势水平。当西路军失败后，张国焘马上知道自己输了，毛泽东赢了，自己再呆在陕北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国焘做出一个让人预想不到的计划：出走。张国焘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出走，引起中共内部的巨大震惊。当时张国焘出走在中共内部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后来林彪出走引起的震惊。张国焘的这个“出走”，使他得以善终，一直活到1979年。林彪后来的“出走”，有很多程度也是模仿张国焘的“出走”。

毛泽东当然清楚张国焘是他所遇到最大的竞争对手，后来美国作家斯诺在北京采访毛泽东时问：“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张国焘对毛泽东也是很了解的。1968年10月，美国政府派官员向住在香港的张国焘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因为美国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总是很难理解。张国焘说：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张国焘还对文革的走向提出预测：【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激进派失势后，

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彪—周恩来”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考虑到张国焘的预测是在 1968 年，他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73)

张国焘这个毛泽东领导不了的人“出走”之后，毛泽东收编了张国焘留下的残部，此后毛泽东就基本上可以完全掌控军队了。尽管红二方面军的掌门人任弼时，并非毛泽东完全领导得了的，不过红二方面军的势力比较弱小，对毛泽东的威胁不大，而且任弼时早在 1950 年病逝，更是客观上帮了毛泽东的忙。因为任弼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很高，1945 年中共“七大”上，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如果任弼时活到文革，那么毛泽东就会有不少的麻烦。

林彪要想完全掌控军队，也要除去他领导不了的人。林彪领导不了的人，主要是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第一个是红二方面军的贺龙元帅，第二个是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对于这两个人，毛泽东一直把他们放在“替补队员”的位置上，虽然现在没有重用，但随时可能重新出山。因此，林彪在军队中地位最大的威胁，来自贺龙和徐向前，林彪要拔掉这两个最大的钉子。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钉子，比如陈再道、许世友等掌握兵权而林彪指挥不动的高级将领。

有人说：“林彪这样做，正好证明他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谁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领导这个单位，而一些不听话的人，是阻碍实现自己意志的障碍，当然是拔去后快的。林彪这种心情和做法，毛泽东一样会有，周恩来也一样会有。周恩来领导国务院，也要设法除去

张春桥等妨碍他的钉子。因此，林彪想要除去军队中不听话的人，不过是一种正常的人之常情，不应该对林彪提出特别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应该上升到“篡党夺权”的高度。

借着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机会，林彪开始启动“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排除军中的异己分子。林彪对武汉问题讲话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一来，本来局限于在武汉军区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后来说：【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零事件’是红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说：【其实“七二零”事件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中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而逐步在中央内部逐步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党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这才是最惨痛的教训。】

王力的说法是中肯的，林彪在军队中的势力，正是借着“七二零”事件膨胀起来的。这次林彪搞“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而是学毛泽东，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夺取非林彪派系将领的权。

(74)

前面我们提到过，在1967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中，军队中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彻底打垮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从此以后，军队中就形成一支在林彪控制之下的群众组织，林彪依靠自己的这支群众组织，对非林彪派系的将领“造反”，进而夺权。

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军内的造反派垮了，“三军革命派(军内

支持林彪的群众组织)”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的学生造反派对抗，中央文革依靠北京“学生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

邱会作也回忆说：【三年以后，也就是1970年5月13日，那天天气很好，叶群建议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从西山坐了一辆面包车去的，我们先到叶群后到。叶群笑着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

这次，林彪利用他控制军内的群众组织，先制造舆论。这些群众组织马上在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声称“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这些大字报说：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而“揪军内一小撮”则是文革的“第三战役”。在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第三战役中，林彪想要揪出的是贺龙和徐向前两个元帅，这两个人倒台的话，林彪在军中就真正站稳了。

先说林彪对徐向前的进攻。因为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领导，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陈再道与徐向前联系起来。吴法宪等人公开散布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黑后台”，军内的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在北京城里游行示威，在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标语的同时，也打出“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并抄了徐向前的家。

林彪把徐向前看成是一个要想拔掉的钉子，毛泽东对徐向前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据徐向前回忆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

我回去想了很久。】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而且让徐向前“大胆地干”，这个问题，让徐向前想了很久。徐向前听得出来，毛泽东让他“大胆地干”，这个“大胆”明显就是针对领导军队的林彪去的。但徐向前又拿不准，毛泽东真的会反对林彪吗？毕竟林彪是他的亲密战友呀。徐向前前思后想，始终没想清楚，所以徐向前始终没敢做出明显的反林彪的动作。

(75)

从事后的情况分析，毛泽东是把徐向前作为遏制林彪在军队中势力的一个有力棋子。针对林彪对徐向前发起的攻势，毛泽东发出了“保”徐向前的声音。196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纪念日，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出席这个招待会的高级将领，就表示“没事”，而没有出席的高级将领，就意味着“有事”，就有可能要被打倒。

这天周恩来给徐向前打来电话，告诉他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也要出席。】徐向前出席这次招待会，意味着毛泽东是“保”他，所以徐向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斗。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将军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67年8月6日，南京的造反派借着“揪军内一小撮”的东风，要揪许世友，许世友躲到大别山里去了，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并筹备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

这时，毛泽东发出了保许世友的信号。8月18日，毛泽东派人把许世友接到上海，亲自召见了，据说许世友当场给毛泽东下跪，表示自己永远忠于毛主席。

席。1967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许世友交谈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是非同一般的，以后就没有人再找许世友的麻烦了。

对于林彪要想拔掉的另一个钉子贺龙，毛泽东就没有“保”了，贺龙没有出席这次“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对贺龙的处理，一直是很犹豫的，因为贺龙曾经和刘少奇走得很近，这点与徐向前完全不同，这是毛泽东不保贺龙的一个原因。但毛泽东最初的本意是“火烧”一下贺龙，并没有想“打倒”贺龙。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始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还是有考虑的。】

可是林彪发起打倒贺龙和徐向前的动作之后，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此时毛泽东的重点进攻目标是周恩来，还需要林彪的配合，所以要给林彪一些“甜头”，让林彪得到某种程度的满意。所以，毛泽东在“保”徐向前的同时，就“不保”贺龙了，让林彪打倒贺龙，使林彪感到一定程度的“如愿以偿”。

“七二零”事件后不久，中央就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开始着手打倒贺龙的准备。同时，林彪利用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对贺龙派系的高级将领进行批斗和夺权。例如，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是贺龙派系红二方面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七二零”事件后不久的8月14日，一群“三军革命派”冲入许光达家中，撕去他的领章帽徽，将他逮捕，关押到装甲兵招待所。从此许光达失去自由，一直被关押批斗，1969年5月去世。1969年6月，贺龙也在关押中去世。

(76)

陈再道、许世友和许光达同是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毛泽东却一再保他，而许光达没有犯什么错误，毛泽东也不保他，这就反映出毛泽

东对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出身将领的不同态度。当然，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让林彪满意。所以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给贺龙平反了，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这次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因为林彪的这个口号，从客观上讲，完全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文革精神，反而可以说是毛泽东文革精神的“积极贯彻者”，所以它在理论上得到文革小组的支持。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大多数对军内的老军头极为不满，因为这些老军头仗着自己的老资格，看不起文革小组的小字辈，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非常高兴，他们也想打倒这些人而后快，所以做出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从1967年7月25日开始，《人民日报》借着“七二零”事件的东风，不断登载各种文章，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8月1日纪念解放军建军4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为此发表了社论，明确指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并没有理会到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还有深一层的意思，被林彪“利用”了。看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急忙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很不策略。”毛泽东发出指示后，报刊上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戛然而止。

据王力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并提“党内、军内一

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后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在“七二零”事件后，徐向前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彻底垮台。这次全军文革小组没有再重组，而是转而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军委办事组”，这是林彪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最大收获。

1967年8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军委办事组”，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以前的中央军委正、副秘书长，直接掌控军队的大权。军委办事组的正组长最初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组员是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基本上是林彪的心腹，这样“军委办事组”就完全在林彪的掌控之下，使林彪在军内的控制力骤然大增。

(77)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有所变化，他认为文革中造反派之所以打不过保皇派，是因为有军队在背后悄悄地支持保皇派，特别是给保皇派提供武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看得很明显，造反派只有简陋的自制武器，而保皇派却是各种武器齐全。对此，毛泽东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给造反派发枪。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大动乱年代》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毛泽东看到一些部队支持所谓的“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就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并不是通过他自己直接说的，而是通过他写给江青的一封信，由江青转述出来的。1967年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尚没有透露出来，但信的大意是“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据王年一先生说：【毛泽东当时认为，军区和人民武装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装左派，要求发枪 100 万支，江青的“文攻武卫”由此而来。“武装左派”现在已不是秘密。当时毛泽东用“润之”的名字给江青写了一信。这个信，我处有一个复印件。】

王年一先生说他有毛泽东这封信的复印件，可惜他没有公开出来。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江青写信呢？这个原因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关于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过程，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

【我向林彪、叶群报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义、蔡炳臣等人到了京西宾馆后，许多穿着军装的人在京西宾馆外边结队示威，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叶群说：“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应当支持。”林彪则默不做声。当夜，叶群拉着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亲自到京西宾馆，坐车绕着宾馆四周的街道转了一圈，给那些高喊“打倒陈再道”的军内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撑腰打气。】

【“八一建军节”前后，北京街头也出现了这样的内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第二战役；现在“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第三战役”的开始。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煽动下，不少地方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部队的枪支、弹药，武斗更加升级。】

【林彪问：“抢枪的情况很多吗？”林彪对别的动向不以为然，对有些部队的枪支被抢似乎很注意。

我回答说：“从文件的反映看，目前已经发生抢枪的情况有五个省，看来还在蔓延。”

林彪说：“那好，给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主席在上海，有关武汉事

件的处理情况也该写信报告一下了。”】

(78)

【接着，林彪口述了给主席的信，我作了记录，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

【林彪口述这封信后，让我誊清，立即送钓鱼台去给戚本禹看看。林彪此时为什么突然器重戚本禹？我也摸不透。照规矩，我去钓鱼台前须先经叶群点头。叶群听说后非常同意，催促说：“这样好，叫你去你就快去。”】

【到了钓鱼台 16 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看完信，对我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稿找江青去了，我被一位工作人员带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过了不长时间，听从走廊里传来的说话声音，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过来了，但走进这个小会议室的，除了戚本禹外，还有陈伯达、关锋和姚文元，唯独没有江青。】

【他们几个人坐在会议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给主席的那封信。对于我这个旁观者，他们装作没看见，不加理睬。他们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语，但只有几个人都同意后，才由陈伯达落笔。他们把文件改完，戚本禹退给了我。我拿回来仔细一看，他们改动之处并不多，而且在我看来，那几处改动也无关紧要，何必这样郑重其事呢？】

【林彪对钓鱼台对他信稿的改动，既无称赞，也无不满，双方都是作作姿态，无需过分挑剔。林彪又让我把信稿重誊一遍，立即派人坐飞机把这封由他签名的

信送往上海。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封信，显然是不满意的，但毛泽东这时还要顾及与林彪的关系，不能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的自尊心很强，受不了这个。所以毛泽东就旧技重演，又给江青写一封信，间接地表达他与林彪的不同看法。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主席写给江青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是在一张纸的正反面都写的。当时江青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

(79)

【林彪在此之前刚刚给主席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主席在给江青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对于林彪提到的实质性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并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主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要建立第二武装。】

【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7月18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这与主席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

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

早在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我不是提倡武斗，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我记得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另据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袖之一戴维堤回忆说：【鉴于“北航红旗”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至于周总理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

8月1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中，首次明文规定要给左派发枪，以建立群众武装，同时严禁给保守派发枪。该决定说：【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今后，军区和人民武

装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枝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

不过这场“给左派发枪”的行动，很快就嘎然而止了。对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80)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左派发枪”呢？这要从毛泽东搞文革的思路去理解。毛泽东搞文革的本质是夺权，但毛泽东所谓的“夺权”，并不是仅仅把权力夺过来，然后一切按照旧的章程办，按照老的一套办，国家机器还是老样子。毛泽东的“夺权”是要创造一套新的国家机构，建立一套与过去传统旧体制截然不同的新体制，建立一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国家。

在毛泽东的新国家机构设想中，军队的改革是重点中的重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学说。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没有职业官吏，没有职业军队，没有职业警察，没有职业法官的，公民自治的社会方式。马克思反对建立国家军队，即所谓的“正规军”，提出用“人民武装”来取代它。

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概念，类似于美国的公民持枪，是谁都可以拥有枪支的“人人有枪”社会。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中，如果有人有枪，有人没有枪，那就像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一样，是非常不平等的。有枪的人在没有枪的人面前，具有极大的优势和特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废除这种“枪”的特权，实施“人人有枪”的“人民武装”体制。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武装”。

中国几千年来传统，一直是禁止老百姓拥有武器的，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固有观念：老百姓不应该拥有枪支武器，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因此，很多中国人

对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国家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想象不出“人人有枪”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天下大乱。

在旧中国，只允许军队有枪，禁止老百姓有枪。这样没有枪的老百姓，在有枪的军队面前，是完全没有平等可言的，也是无法抗衡的。因此在旧中国，掌握“枪”的军人，就有了绝对的特权，就可以控制和掌握政权。而对于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社会来说，掌握“枪”并不是军人的特权，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军人执政的军政府。

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一个给老百姓“发枪”的领导人，肯定是头脑发昏，肯定要天下大乱；而按照美国的思维，给老百姓“发枪”是很正常的，禁止老百姓有枪才是不正常的。所以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这里我们应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给左派发枪”。按照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要人人有钱，同样要人人有枪。

有人总担心“人人有枪”会导致天下大乱，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就一直人人有枪，但美国从没有天下大乱，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内战。而世界上那些天下大乱的国家，都不是人人有枪的国家。如果以为禁止老百姓有枪，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那就大错特错了。

(81)

毛泽东要改造中国的军队，改造的思路就是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思想。新中国建国以后，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军思想，一种是“专业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这是模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一支“国家正规军队”，培养一批职业军人。另一种是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也就是“人民军队”思想，毛泽东一贯反对军队搞

“专业化、正规化”。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说：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四清”运动，又能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显然与“专业化、正规化”的建军思想背道而驰，接近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思想。在毛泽东时代，还有大量民兵，民兵持有大量的枪支。文革武斗时最初的一批枪支，都是从民兵那里来的。毛泽东建立民兵的思想，让人民掌握一部分武装，也是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所以有不少人把毛泽东“给左派发枪”，只能理解为“胡闹”。

上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解释，是要说明毛泽东“给左派发枪”并不是“胡闹”，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性行动。接下去我们要讨论促使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契机和结果。在此之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需要澄清。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中的武斗是毛泽东有意挑动和煽动起来的，不少人撰文引举种种事例，特别是“给左派发枪”等，作为毛泽东主动挑动或煽动武斗的证据。但这些人文章都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煽动武斗？武斗对毛泽东有什么好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武斗对毛泽东并无好处，因此毛泽东主动挑动、或者有意煽动武斗的说法，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不合常理之一的论调，是把文革的“天下大乱”，解释为“毛泽东有意把国

家搞乱”。可是这个国家并不是别人建立的，正是毛泽东自己出生入死、花费几十年的心血才建立起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为什么自己又要有意去搞乱它？这个无法用常理来解释。因此，合理的解释是：文革的“天下大乱”，不是毛泽东有意搞乱，而是被迫乱了的。

不合常理之二的论调，是把文革中的“武斗”，解释为“是因为毛泽东为了夺权”。毛泽东要夺权是不假，但能够用“文斗”夺权的话，武斗就没有必要。孙子兵法第一条，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作为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能够用“文斗”来夺权，就尽可能用“文斗”来夺权，用到“武斗”夺权，那是出于迫不得已，并非毛泽东主动或者有意想要这么做。

(82)

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并不是1966年5月文革一开始时就提出了，而是一年后的1967年7月，文革开始一年多之后才提出来。文革的武斗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武斗”的前身是“暴力批斗”。文革开始时，红卫兵和群众对“黑五类”、“黑帮”等“坏分子”进行批斗的时候，就有使用体罚、打骂等暴力行为。不过最早的“暴力批斗”，还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四清”时就出现了戴高帽子，打人，罚跪等“暴力批斗”行为，据说文革中的“喷气式”，还是王光美在“桃园经验”时搞出来的。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后两个月再次去武汉，与新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人，就“暴力批斗”等问题做了长篇谈话。毛泽东说：【体罚这种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打倒土豪劣绅的那

一套办法都搞来了?那是对敌人的，现在时代背景不同了。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己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红卫兵和造反派对“黑五类”和“黑帮”的“暴力批斗”，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革命老干部身上。对于造反派在揪斗老干部时的“暴力批斗”，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他说：

【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挨打、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那么，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打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是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没人能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继续说：【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就要整你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

【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地对待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文革中的“暴力批斗”继续发展下去，就发展成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了。最初的武斗，只是拳脚，后来发展到棍棒，再后来发展到短刀长矛，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

虽然毛泽东以前就有“人民武装”的概念，但建国以后的军队和民兵，都是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军事组织，还没有一支独立于共产党领导之外的军事组织。而“给左派发枪”，这就意味着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第二武装”，这个尝试太大胆了，弄不好真的要重上井冈山了。因此毛泽东对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之外的“第二武装”，也是非常慎重，不敢轻易动这个念头。不过武汉“七二零”事件，最终让毛泽东下了决定，豁出去给左派发枪，搞真正的“人民武装”。

(83)

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想法，应该是在武汉形成的，促成毛泽东这个想法的关键因素是他对军队的失望。在发起文革之前，毛泽东对军队是寄予厚望的。当时毛泽东认为地方上的干部，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较大，革命意志已经消退，甚至出现腐化堕落，而军队的干部由于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较小，仍有较高的革命热情，所以他希望军队干部成为支持文革的主力军。

毛泽东刚开始对林彪寄予厚望，但不久林彪的表现就让他失望了，林彪并不支持文革。之后，毛泽东又对军队中非林彪派系的将官，比如陈再道这样毛泽东嫡系的人，成为支持文革的主力军，可是陈再道这些人也让毛泽东失望了。在武汉，毛泽东敦促陈再道转变立场，积极支持文革，可是陈再道却勉强应付，甚至纵容“百万雄师”闹事，反过来想要促使毛泽东转变立场，想要敦促毛泽东停止文革。

经过武汉“七二零”事件，毛泽东对军队彻底失望了，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这意味着四分之三以上的军队不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样一来，毛泽东依靠军队搞文革的设想，事实上完全落空了。

如果把当时的党中央也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那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是造反派，而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元老则是保皇派。在势力方面，保皇派占绝对优势，他们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中都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毛泽东代表的造反派，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中只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把文革继续搞下去的支持力量，只剩下群众造反派这一支力量了。因此，武装群众造反派，建立一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可以控制的“第二武装”，成了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最后赌注。如果这支“第二武装”建立不起来的话，毛泽东的文革就要半途而废，这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局。所以，毛泽东最后的冒险，就是给群众造反派发枪，建立一支党内元老们控制不了的新的武装力量。

对于毛泽东给“左派发枪”的决定，周恩来和林彪都是极为担心，也是极为关注的。首先，林彪受到的威胁最大，一旦有了“第二武装”，不可避免地要与他这个“第一武装”的掌门人发生冲突。因此林彪给毛泽东写信，间接地劝毛泽东放弃给群众发枪的决定。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林彪的意见，而是用给江青写信的办法，间接地坚持自己给群众发枪的观点，坚持建立“第二武装”。

而周恩来的对策，和以前一样，不是阻挡这股洪流，而是顺势引导。毛泽东要建立一支自己控制之下的“第二武装”，周恩来就建立一支自己控制之下的“第三武装”，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周恩来给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发枪的由来。

(84)

“北航红旗”是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中，最亲近周恩来的一个组织。在北京1967年5月出现“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后，“北航红旗”是第一个带头公

开声明支持周恩来的。下面引用一段“北航红旗”领袖之一的戴维堤，回忆他们保卫周恩来的一段细节。戴维堤说：

【1967年9月9日，我当“北航红旗”保卫部长，参加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组织的庆祝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韩爱晶(“北航红旗”头头)让我带领着北航600个学生负责保卫工作。周总理在主席台上，还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蒯大富和韩爱晶坐在总理后边，江青没有到场。】

【这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了，说今天是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今天大会的宗旨就是要“砸八一”，废除“八一建军节”，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纪念日9月9日为“建军节”。接下去的人发言说“秋收起义”多么伟大，将“八一南昌起义”说成是国民党军阀的政变行为，所以不能代表共产党，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烈要求将“建军节”改为9月9日。】

【当时我离主席台很近，看到周总理的脸色非常难看。“废八一”根本没有和周总理商量，直接就在大会上提出了。接着大会主持人请周总理讲话。记得总理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刚得到通知，来晚了。大家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参加纪念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但关于改‘八一建军节’的问题，我是不同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不同意的。毛主席肯定‘八一’的伟大意义，他老人家说过：‘八一’不能砸!”】

【下面的话，我实事求是地说，也许是迫于压力，周总理说：“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不是我周恩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只是一个参加者。”

这时候会场里开始骚乱起来，为了平息会场气氛和矛盾，周总理继续接着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周恩来历史上犯了好多错误，但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我就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今天，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都是忠心耿耿的。同学们，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呀！”

这时只见周总理把上衣扯开了，露出胸膛来，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些极左派已经把周总理逼成这个样子了。】

【周总理讲话的时候，下面的极左派就喊：“周恩来下去！周恩来下去！我们要见江青同志！我们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直接要轰周总理下去，他们胆大包天。后来他们许多人直接从会场后边冲过来了，可能要揪斗周总理。

我见事不好，马上指挥北航的六百人，把主席台包围起来。我跳上主席台，护住周总理，大声地喊：“北航红旗誓死保卫周总理！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

我对总理说：“今天有坏人，快点离开会场。”这时候韩爱晶、蒯大富也帮我架着总理向外走，这样我就把总理连抱带拖，带出了会场，周总理的警卫员当时不在主席台上。

(85)

出了会场一看，外边人山人海，足有几万人，北京工人体育馆前面的广场站满了人。我大喊着赶紧把周总理的车调了过来，我也顾不得礼貌了，直接护着周总理进了汽车。我和几个同学倒站在总理的汽车前面开路，想让总理赶紧离开。】

【下面又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了。总理的车没开，总理又打开车门出来了。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五点多了，面对人山人海，总理说：“同志们，今天我不能灰溜溜的走，我这样走了就对不起大家。”

总理又对刚刚赶来的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能不能搞点稀饭来，我和同学们都饿了。”后来才知道，周总理那天接连开了四个会。

这个时候保卫部队陆续赶过来，基本上就安全了。后来卫戍区战士用三轮车拉来了几大桶稀饭，我先给总理盛了一碗，自己也盛了一碗。总理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他太累了，我陪着总理把稀饭喝完。总理喝完粥之后，还用舌头舔干净了碗底，我和在场的人们都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以上这件历史镜头发生在公元1967年9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北边广场上。】

【我说这段历史，不是想表我的功劳，我想说当时总理被逼到那种程度，他们那帮反总理的极左分子，甚至坏人确实是对总理不礼貌的，甚至想批斗总理。只是因为我们的“北航红旗”的红卫兵们的誓死保卫，才避免了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免遭批斗，甚至更严重事件的发生!】

看了上面“北航红旗”保卫周恩来的片段，就不难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武装“北航红旗”了。

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计划，林彪在正面阻拦，周恩来在侧面包围，显然并不顺利，但毛泽东当时还是决心要把“第二武装”建立起来。可是一件大事使毛泽东建立“第二武装”的计划嘎然而中断，这就是发生于1967年8月22日的“火烧英国办事处”。

8月22日，失去控制的造反派群众冲入位于北京光华路的英国办事处，把十几名英国外交官打得头破血流，强迫他们向毛主席像下跪，然后放火烧毁了英国办事处的办公楼。这件事也从反面证明，造反派动武打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挑动，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挑动造反派殴打英国外交官的。这起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

“火烧英国办事处”发生后，毛泽东深深感到他和中央文革，已经失去了对造反派的控制能力。而且，不仅是毛泽东控制不了造反派，就是造反派的头头们

也控制不了造反派的群众，成为一支完全失控的，失去理智的民众，这样的民众才会干出“火烧英国办事处”的荒唐事。

因此，在“火烧英国办事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再提起“给左派发枪”了，因为此时的“左派”已经失去理智，再给他们发枪的话，后果不堪设想。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的命令》，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计划就此终止。

(86)

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的下一个战略，是从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本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武汉，主要目的是预防重点突破夺权发生万一的情况。没想到到了武汉后，发生了“七二零”事件的意外。“七二零”事件是在毛泽东计划外发生的，所以毛泽东在“七二零”事件之后，很快把重点转回到对周恩来的重点进攻上。

这次毛泽东重点进攻的目标，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首先拿掉了刘少奇的左右手彭真；同样，这次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首先也要拿掉周恩来的左右手陈毅。毛泽东7月13日离开北京，7月15日“打倒陈毅”的战役就打响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外交部的文革情况。

外交一直是周恩来的强项，所以中共从一开始，外交都是委托周恩来搞的，比如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谈判等，都是周恩来负责。因此建国后，外交部由周恩来主管，也是理所当然，可以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老巢。从1949年到1958年，周恩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直到1958年才把外交部长让给他最信赖的陈毅担任。

文革开始后，前一段时间的夺权，都是集中在刘少奇控制的文化宣传部门，

外交部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 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这在外交部也引起轩然大波。陈毅听了广播之后非常震惊，因为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事前居然一点也不知道。于是陈毅连夜去询问周恩来，问道：“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事先也不给一个通知？”

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受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外交部也开始出现大字报，但陈毅反对贴大字报。6 月 4 日，陈毅在外事口干部会上讲话，禁止在外交部内贴大字报，陈毅说：【文革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政变’，不能由群众乱搞。做外交工作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跟着闹有什么意思？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

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陈毅不得不在两天后的 6 月 6 日，解除了大字报禁令，但对外交部机关干部的控制加强了。然而外事口的两个外语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却不像机关干部那样容易管住，他们成为外事口造反的带头兵，特别是要造陈毅的反，因为陈毅明显压制外交部的革命运动。

(87)

1966 年 11 月，陈毅和叶剑英等老师在军事院校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后，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打倒陈毅的呼声越来越高。再此情况下，为了保住陈毅，周恩来安排陈毅做一次检讨，来平息一下造反派对他的愤怒，以便造反派的谅解和认可，然后“过关”。

1967 年 1 月 24 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陈毅公开做检查，周恩来

亲自对陈毅的检查稿进行了推敲和修改。陈毅说：【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十多天里，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和压制了外事口各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受打击、伤害的革命同志们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陈毅的检查讲完后，赢得了一阵长久而热烈的掌声，这表明他的检查被接受，他的检查过关了。陈毅成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

但1967年1月全国全面夺权开始之后，外交部又迎来了“夺权”的新危机。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长期经营的地盘，基本上都是周恩来派系的人，所以要想在外交部夺权，绝非易事。当然周恩来不会硬性阻止夺权，而是采用了“顺势引导”的手法，在外交部组织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让自己的群众组织来夺自己的权，这样外交部的权就仍然控制在周恩来手里。

首先，周恩来鼓励外事口各单位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战斗队”，并指示外事口各个单位的“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事口造反联络站，显然是一个周恩来引导下成立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周恩来在“联络站”成立之后，随即开始引导在外事口实施夺权。据当时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回忆说：

【当时外事办还没有“战斗队”，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不革命！应该成立战斗队。”

接着陈毅也给我打电话说：“革命还要下命令啊？你们为什么不夺权？我们自己人不夺，别人可要来夺了。自己的同志夺权，到底清楚些嘛。这是我和总理研究了。”于是我们外事办匆匆成立“战斗队”，宣布夺权。】

【1月18日上午，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开会，讨论研究有关夺权问题。多数意见认为：不夺权，联络站就要落后，别人就要来夺权。这次会议决定，“联络站”夺外交部党委的权，各个“战斗队”夺本单位的权。“联络站”在外交部实施夺权的声明，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去了。

(88)

中午12时，“联络站”负责人张殿清等，到反帝路(原东交民巷)15号，把副部长们集中到会议室，向他们宣布：“由于外交部党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领导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夺取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都在场，他们一致表态，支持“联络站”的革命行动，服从夺权决定。下午4时，联络站向周总理汇报夺权情况。晚上，陈毅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联络站”代表。陈毅说周总理和他本人，都同意和支持联络站的夺权声明，并祝贺这个胜利。

1月19日，外事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了外交部革命造反夺权胜利大会。1月25日晚，周恩来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夺权，外交部就做得好一些。领导运动，监督业务，不算保守。我希望外交部树立成一个夺权的典型。”】

外交部的群众组织一直是保皇派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联络站”夺权后拥有1700多人，那时外交部总共有2300多人。外交部的文革搞得比较文明，没有发生武斗和严重的打砸抢。不过在“二月逆流”之后，社会上发起一阵“打倒三老四帅”的风潮，作为“四帅”的头号人物陈毅，自然成了要打倒的风云人物。这时外交部的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陈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要求召开大会批斗他，而且号召打

倒陈毅。

而另一部分不同意打到陈毅的人，则从“联络站”分裂出来，另行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此时，“联络站”转变成造反派，而“造反总部”成为保皇派。4月13日，“联络站”与北京35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他们的口号是“坚决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但陈毅等人在5月1日五一节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批陈联络站”大受打击，一时间偃旗息鼓。

不过在1967年4月30日，一个政治新星姚登山突然从国外回到北京外交部工作，这一下子改变了外交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促成了外交部的第二次夺权。

1967年4月30日，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姚登山，被印尼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驱逐出境。姚登山回国时，在首都机场受到周恩来、陈毅、江青、陈伯达等人以及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姚登山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

(89)

姚登山回国的第二天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毛泽东接见了她，并与周恩来、林彪、江青、康生一起合影。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大照片：姚登山左手挽着毛泽东，右手挽着江青，他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姚登山一跃而为一步“登天”的政治新星。

这里稍微简介一下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二次大战前，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二战后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者撤退，印尼独立成功。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印尼民众普遍支持共产党，因而导致印尼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印尼共产党于 1924 年成立，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是当时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组织，有登记党员 500 万，共青团员 300 万，支持者近 1000 万。印尼共产党与中共是非常友好的，受到北京的影响很大，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数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艾地曾说：“我是毛泽东的小学生。”

毛泽东在艾地死后，于 1965 年 12 月专门作一首悼念诗《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1965 年 9 月 30 日，苏加诺总统卫队翁东中校发动“九三零事变”，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等 7 位印尼将领的住所，并把他们杀害。然而，陆军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很快率军队回击，这次政变遂告失败。

政变失败后，策划者翁东中校被抓获并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也被处死，苏哈托成为新总统执政。苏哈托上台后，开始对印尼共产党大清洗，死亡人数约五十万人左右，由于印尼共产党中的华人很多，许多华人被杀死。另外，苏哈托认为中共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两国关

系急剧恶化。印尼出现大量迫害华侨的事件，迫使大批华侨出逃，4000多名华侨归国。

1966年4月15日上午，一千多名荷枪实弹的印尼军人和民众，在装甲车的配合下，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士兵和民众冲进院内，抢走文件档案，捣毁家具和陈列品，砸坏汽车，并开枪打伤使馆工作人员一名，殴打工作人员多名。姚登山作为这次抗击印尼“暴行”的领导人，被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姚登山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成为抢眼的政治新星。

(90)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北京突然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打倒陈毅”浪潮，同时对外交部进行夺权。其实“打倒陈毅”的目的，也是旨在外交部的夺权。关于这场“打倒陈毅”和外交部夺权的意图，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清楚，但高官们是清楚的。不过高官们出于种种原因，不愿多谈这个问题，只有吴法宪等少数被打倒的高官，提到了这个话题。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8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要夺外交部的权，红卫兵是不行的，因为红卫兵不懂外交事务，即使夺了权也无法掌权，所以外交部的夺权，必须依靠外交部内部懂业务的造反派，靠他们来夺权和掌权。1967年7月的时候，外交部的群众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联络站”，这个组织是造反派，外交部夺权就靠“联络站”了；另一个组织是“造反总部”，这是支持周恩来和陈毅的保皇派；还有一个组织是后来成立的“攀险峰”，它也是保皇派组织。

姚登山回国后回到外交部工作，他作为被毛泽东接见过的“响当当”造反派，

成了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顾问，实际上是“联络站”的幕后控制者。据外交部英文翻译冀朝铸(后来尼克松访华时的那位著名翻译)回忆说:【淹没在巨大荣誉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间挽着他俩的胳膊照了一张相，相片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登出来。姚登山回到外交部后，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人热烈欢迎他，选他做头领。在姚登山的领导下，“联络站”更加肆无忌惮，企图全面接管外交部的大权。】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所谓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成立了自己的两个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我参加了“攀险峰”。一些“联络站”成员脱离了自己的组织，也参加了“攀险峰”。在外交部，“联络站”和两个新成立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之间，很快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在一次我给总理做翻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参加了“攀险峰”。总理表示同意，并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在一个单位有两派是好事。”】

“联络站”早在“二月逆流”之后就提出“打倒陈毅”，但因为外交部内部有“造反总部”和“攀险峰”两个保皇派组织抵制“打倒陈毅”，所以在外交部内部没有打开突破口。“打倒陈毅”的突破口，是从外交部的外部打开的。

(91)

7月15日，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办公楼对面的广场上安营扎寨，打出大标语“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誓不收兵”。7月16日，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加入进来，他们张贴“陈毅罪行”的大字报，漫画，街头演讲，高音喇叭广播，宣称“舍得一身剐，誓把陈毅拉下马。”

7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发表呼应声明，宣称：“揪陈大军来外

交部安营扎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将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后，大家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七二零”事件上，“揪陈大军”一时间冷却下来。等到“七二零”事件解决后，从8月1日开始，“揪陈大军”又复活起来。北京外语学院的一伙造反派强行冲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的大标语、漫画、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同时，他们还封锁外交部大门，不准任何人员进出，造成一些外事活动的被迫中断。

在此情况，周恩来不得不接见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说：“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造反派：“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造反派：“陈毅应该交给我们批判。”

周恩来：“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造反派：“我们就是要打倒。我们下定了决心。”

周恩来：“你们下定了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

式，你们一个人随便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当时的“三反分子”，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

周恩来听后愤怒地责问说：“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造反派：“我们不强加总理。”

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不到目的。”

造反派：“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怒道：“你这个样子就没法商量了。我本来是与你们来商量，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造反派：“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付总理。”

(92)

周恩来：“我说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批判陈毅同志的大会不能开。”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毛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他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

周恩来知道，这些造反派“揪陈毅”是有背景的，他不能硬顶。于是周恩来最后做出让步，跟造反派达成协议：8月6日，先在外交部内部开一个批判陈毅的小会，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不过周恩来提出来他的条件，就是约法三章：(一)不准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二)不准贴“打

倒陈毅”的标语条幅;(三)开会时“两派”轮流发言(造反派与保皇派),不允许武斗和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

造反派同意了周恩来的条件,于是8月6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开第一次批判陈毅会。这天,周恩来和陈毅两人同乘一辆车来到会场,周恩来还特别嘱咐陈毅:

“在会上只听取批判,不要回答问题,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周恩来来到会场门口时,有人向他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立即质问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昨天已经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这么干?不把标语撤下,会议不能开。”

造反派不愿撤下标语,于是周恩来站在烈日之下,拒绝进入会场,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多小时后,造反派才同意摘下标语,周恩来这才进入会场,亲自陪陈毅挨批。在文革中的批判大会,只有陈毅和谭震林“享受过”周恩来亲自“陪批”的殊荣。

据一位参加这次会议的当事者回忆说:【显然是周恩来做了说服工作,陈毅一反过去的不合作态度,变得非常配合,叫他站起来就站起来,叫他低头就低头。有一次,叫他向某“革命小将”赔罪,他就走过去向这名小将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根据周总理同造反派达成的协议,陈毅当场不回答问题,但发言者有时仍要陈回答问题,这时陈就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向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这时台下便响起一阵掌声。不难想象,从来桀骜不驯的陈毅,在说这些话时,吞下了多少委屈和愤懑。】

在这次批陈会上,两派(造反派与保皇派)轮流发言,各说自己“批陈”的理由。造反派“联络站”认为陈毅是“三反分子”,必需彻底打倒;而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则认为陈毅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但

陈毅的问题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

这次会议由于周恩来亲自主持，再加上陈毅的配合，所以第一次批判陈毅会开得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小动作，会议按时结束。

(93)

外交部的夺权运动，因为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势力相当，处于胶著状态，一直到1967年7月，并无多大的进展。1967年7月中旬开始，北京突然出现一股“打倒陈毅”和外交部夺权的浪潮，这标志着毛泽东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进入了决战阶段。

决战阶段的第一场战役，是北京两个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冲击外交部。这些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闯入外交部大院贴大字报，宣称“不打倒陈毅誓不罢休”。但这样的冲击还是打不倒陈毅的，因为外交部的大部分人认为红卫兵只是胡闹，并不认为红卫兵的行动符合中央精神。所以外交部的保皇派群众组织依然积极支持陈毅，红卫兵的冲击行动并没有大的战果。

决战阶段的第二场战役是中央文革直接插手“打倒陈毅”和外交部的夺权。第一个表态支持“打倒陈毅”的是谢富治，因为谢富治的家就外交部附近的东交民巷，他每天上班路过外交部门前。谢富治对在这里“安营扎寨”的红卫兵说：“揪陈毅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谢富治毕竟不是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他也是路过这里顺便讲话，并不是正式的讲话，所以引起的反响并不大。

第二个表态支持“打倒陈毅”的是戚本禹。8月4日，北京召开“首都新闻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斗争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了大会，姚

登山也出席了。开会前，戚本禹对姚登山说：【革命小将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陈毅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陈毅下去？】

姚登山说：【外交部的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

关锋说：【陈毅不下来，与中央文革无关。】

姚登山问：【那是不是总理一个人不同意？】

关锋未作回答，而是说：【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到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的思想不是毛主席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7月1日，主席对缅甸问题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讲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戚本禹也说：【外交部的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

关锋和戚本禹的讲话，批评了外交部，认为外交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就暗示对外交部夺权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戚本禹明确指出陈毅的问题很严重，挑明可以打倒陈毅。

8月5日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的讲话。戚本禹明确支持“打倒陈毅”，表明“联络站”打倒陈毅的行动是正确的。这是“联络站”首次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使他们大受鼓舞，情绪骤然升温，多次长时间高喊：“打倒刘、邓、陈”，“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等口号。戚本禹的讲话很快又传达给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学生，那里也马上一片欢腾。红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一定要揪出陈毅。

(94)

外交部内支持周恩来和陈毅的保皇派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对戚本禹的讲话大为震惊，因为这个讲话精神与周恩来对陈毅问题的指示完全不符。因此，“造反总部”当晚决定，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戚本禹告状。“造反总部”对戚本禹的告状信如下：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我部姚登山同志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动中，和戚本禹同志作了个人接触，曾谈到批判陈毅问题。】

【姚登山同志不顾八月四日总理关于批陈问题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讲话作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在传达过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组织听了姚登山的传达后，也纷纷贴出“号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为自己冲外交部的错误行动打掩护。】

【我们认为，姚登山这样做的结果，给人造成总理与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在我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上传达后，“联络站”某些战斗队的代表上台表态，只提戚本禹同志八月四日的讲话，而不提总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现寄上姚登山的传达全文和有关传单、号外供参考。此致。敬礼！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戚本禹的讲话与周恩来的讲话调子完全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原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打倒陈毅”的口号，也不是戚本禹就敢这么说的。那是1967年7月1日，康生向毛主席请示缅甸问题，问能不能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毛主席明确指示：“群众提‘打倒奈温’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提。”毛主席又说：“中国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喊就是了。”】

王力说：【毛主席 8 月 12 日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也表示他赞成“打倒陈毅”，还说：“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可见他们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这些事，毛主席是早已知道的。当时翻译叫范承祚，他说：“毛主席对陈毅问题的说法，同王力的讲法是一致的。”我说：“你说反了，不能这么说。只能说王力是根据毛主席的精神讲的，很多是毛主席的原话。”】

王力还说：【“打倒刘、邓、陈”的口号，这句话原来是戚本禹说的，他也是代表中央说的，我是奉命保护戚本禹。戚本禹是怎么理解，中央文革是怎么理解，我不知道。叫我表态，我就得表态。】

【我的讲法有一点地方同总理不大一致，总理是见到“打倒陈毅”的标语就不许进会场，不许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戚本禹说群众可以喊“打倒陈毅”，我也这么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后来江青在王力的“八七讲话”问题上大做文章，那只是作为借口，抛出王力作为替罪羊。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过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没有说什么，因为讲话中的那些话过分的话，就是他的原话。】

(95)

对于中央文革插手“打倒陈毅”的主使问题，王力解释说：【因为陈老总的问题，造成总理很大的被动，整陈老总的是江青。江青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动造反派打倒陈毅。林彪把外交部的局势搞乱了。】

王力出于自身的原因，把“打倒陈毅”和外交部的夺权的主使人，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也是不得已为之。但王力在提到他后来著名的 8 月 7 日讲话时，辩解说：【我的‘八七’讲话，伤害了陈老总，是不对，我承认。当时我的错话不少，但这些错话的发明权不是我，大多是毛主席的原话。在‘八七’讲话中，

我奉命要讲的。】

王力申辩说：他的错话，是来自毛泽东的原话，而且这些话他是“奉命讲的”。奉谁的命呢？王力没有明确说。但是从前后文的关系来看，因为他讲的错话是来自毛泽东，所以这个“奉命”也应该来自同一个人吧。

关于这些事的细节，王力当然是不便透露出来的。不过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讲话来看，毛泽东在1967年8月，在上海做出了一些倾向性很明显的讲话。

1967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说：【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毛泽东这里说的“有些人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是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毛泽东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呢？熟知党内斗争形势的王力等人，应该一下子就能猜到。毛泽东又说“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有人说毛泽东这是针对林彪说的，这并不合理。因为那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不应该针对林彪讲这样的话。

特别是毛泽东说“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就明显地挑明他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打响了。

戚本禹8月4日的讲话，当然受到支持周恩来的外交部保皇派群众组织“造反总部”的抵制，他们表面上写信向中央文革“告状”，实际上是向中央文革“抗

议”。

“造反总部”的告状信送到中央文革那里后，8月7日文革中央办公室打电话到外交部，通知说：王力当晚9时要与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代表谈话。8月7日晚，姚登山和联络站6人，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与王力谈话。他们的谈话从9时起，谈了差不多3个小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王力“八七讲话”。

(96)

毛泽东向刘少奇夺权的时候，陈伯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给毛泽东立了大功。后来毛泽东论功行赏，给陈伯达党内排名第四的高位。可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夺权的时候，就没有再用陈伯达了，这个原因也是明显的。陈伯达对刘少奇的好感不多，他曾说：“刘少奇在外面形象温和，实际上做事武断，不好商量，脾气和毛泽东差不多。”而陈伯达对周恩来很有好感，前面提到过，在陈伯达要“自杀”的时候，周恩来专门和他谈话，打消他自杀的念头。周恩来在各种场合也公开说陈伯达的好话，两人关系不错。

因此，毛泽东这次对周恩来夺权，就不能用陈伯达了，而是用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些小字辈。王力也看出毛泽东不重用陈伯达了，开始重用他，王力看出这是自己走进党的高层的一个绝好机会。陈伯达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得到党内第四位的回报；如果这次王力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么这个回报也不会低吧。此时，这次王力认为机会来了，为毛泽东立功心切，所以在8月7日，发表了一个煽动性非常强的“八七”讲话。

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王力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也没有做过这么煽动性强的讲话。但王力这个极具煽动性的“八七”讲话，并没有成为他立功的阶梯，反而成了他倒台的滑梯。王力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向毛泽东表忠心的讲

话，却被毛泽东批语“大大大毒草”，这是后话了。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王力这个点起外交部夺权大火的“八七”讲话。

8月7日晚，王力把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造反派“联络站”的6名代表，招到钓鱼台来谈话。王力的谈话，不仅是他个人的谈话，也是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表态。王力对两个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表态：第一个是“打倒陈毅”问题，第二个是“外交部夺权”问题。在“打倒陈毅”问题上，王力说：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外交部全部同志传达了戚本禹同志的谈话。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有人竟告状告到我们这里。他们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

【姚登山同志传达后，革命群众的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打倒陈毅”？陈毅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就可以揪。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97)

说到这里，王力激动地挥着手，又把外交部“造反总部”的告状信念了一遍，然后说：【我反对外交部“造反总部”的这种做法，鲜明地反对！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们。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王力“打倒陈毅”问题上，态度鲜明地指出三件事：（一）打倒陈毅是正确

的;(二)红卫兵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是正确的;(三)“造反总部”的告状信是错误的。王力讲话中对“打倒陈毅”的问题，与周恩来的态度完全相反。

王力继续谈“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他说：【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党委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党委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外交部可以夺权！】

【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把它神秘化，别人不能干，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这个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不要听某些人的话，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

【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二十几岁也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为什么不可以呢？挑干部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挑干部，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这个统统打倒。】

王力“外交部夺权”问题上，也态度鲜明地指出三件事：(一)外交部党委班子要“动”，要夺外交部党委的权;(二)红卫兵也可以搞外交，二十几岁可以当部长;(三)外交部的干部要选“革命派”，不能选“保守派”。

王力讲话中对“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也与周恩来的态度完全相反。周恩来强调外交部党委的权不能夺，外交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不懂外交的人不能搞外交。而王力不仅说外交部党委的权应该夺，而且说搞外交根本不要什么专家，红卫兵也可以搞外交。

最后，王力对姚登山说：【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

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旗帜鲜明地支持姚登山，鼓励姚登山“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带头在外交部造反。姚登山喜出望外，把王力对他的支持和鼓励，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来自中央文革，甚至来自毛泽东的意思。这对于姚登山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一步登天机会，姚登山当然不能放过，他立即表示要豁出一切为王力和中央文革效力。

(98)

这样一来，王力就把外交部第二次夺权的大火点起来了。王力觉得单单口头讲话还不够，第二天8月8日上午，王力又专门写信给姚登山，以书面形式确认他8月7日晚上的讲话内容。

王力给姚登山的信如下：【姚登山同志：我们接到外交部群众组织“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我们认为，“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在要求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敬礼!】

王力在这里谎称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一致，也同意打倒陈毅。其实周恩来从来没有同意过打倒陈毅，更不知道王力的“八七”讲话。当周恩来看到王力“八七”讲话的传单后，感到震惊，他请康生和王力过来，提议三人谈一次话，但康生和王力没有理睬周恩来的建议。

武汉“七二零”事件后，王力成为红极一时的文革英雄，他这样英雄人物的讲话，甚至比中央文革的话还要有份量。姚登山和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根据王力的指示精神，马上行动起来。8月8日，“联络站”立即召开会议，传

达王力“八七讲话”。“联络站”头头王中琪宣称：王力讲话是中央的正式指示，中央已经决定要打倒陈毅，并且要对外交部彻底夺权。

“联络站”大量印发王力的“八七讲话”，称它“吹响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进军号”。8月9日，姚登山在外交部全体大会上宣读王力来信和传达王力讲话，并声称王力要求他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领导外交部的文革。之后，会场立即出现狂热的气氛，造反派“联络站”受到极大鼓舞，高喊“打倒保皇派”，并咒骂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是“保皇狗”。

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见造反派“联络站”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受到沉重的打击，无法反击，一下子抬不起头来。造反派凭借“八七讲话”所造成的声势，大造夺权舆论，积极准备夺权，贴出大标语：“彻底改组外交部党委！”、“打倒三反分子陈毅！”

8月11日，按照原来的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规模的“批斗陈毅大会”。根据周恩来与造反派达成的协议，除了主席台前“批斗陈毅大会”的横幅外，会场上不挂任何标语。大会主席台上除了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外，还坐着周恩来和谢富治副总理，被批斗对象陈毅，则坐在主席台右前方的一把椅子上。

(99)

批斗会从下午1时半开始，各个造反派的发言人上台发言，揭发和批判陈毅的“罪行”，并要求“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会议途中，周恩来有事离开会场，周恩来刚刚走开，造反派立即违反不挂任何标语的协议。突然间，“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等大标语一下子从会场二、三层楼上同时垂挂下来，二、三层的护栏上也拉起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的

巨大横幅，坐在一楼的造反派则纷纷举起“打倒陈毅”的小旗帜。

随后，会场上的人群骚动起来，他们站起来高呼“打倒陈毅！”，呼喊声此起彼伏。坐在前排的造反派开始冲向陈毅，周恩来留下的几十名警卫战士，手臂挽着手臂地奋力阻挡，不让造反派冲过来。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台上的谢富治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参加大会的黄镇大使站起来用手指着台上大声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据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回忆说：

【我带着陈老总和他的警卫宫恒征，从舞台的后门撤出，通过夹道进入了保密室，让陈老总坐在沙发上。我立即让部队战士撤到走廊的两头，并告诉他们，只要有人冲保密室，就采取强硬措施。造反派搜到保密室这里，看到有部队没敢冲，但他们又怀疑陈老总在里面。保密室在二楼，他们不甘心，就从院子里搭人梯，踩着肩膀隔着保密室的玻璃窗子往里看，找陈老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让陈老总暂到卫生间避一避。开始陈老总说：“算了，我去见他们。”

我说：“不行，这是总理给我们的任务。”

陈老总答应后，陈老总、我还有他的警卫宫恒征，我们三人躲进了卫生间，留在外面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要他找姚登山，并说：“你告诉姚登山，今天发生的混乱，他要负责。如果今天陈老总发生问题，他要负完全责任。”并指示钱嘉东，要姚登山亲自把陈老总送回家。

造反派在楼内上上下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老总，认为陈老总已经走了，后来大部分造反派就撤走了。他们虽然撤走了，可陈老总的那辆奔驰车却遭了殃，

造反派气急败坏地将汽车的窗帘撕了，车胎放了气，车座套也给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找到姚登山。姚登山来到保密室后，钱嘉东向他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说：“今天发生的事，你要负全部责任。陈老总的安全发生任何问题，你也要负全部责任。总理要你亲自送陈老总回家，现在你就不要走了，跟我们一起走。”

我们让姚登山和我们一起从锅炉房的旁门出了楼，然后坐上卫戍区预先布置的停在那里的吉普车，向东绕道东单，经东长安街驶向中南海东便门。陈老总、姚登山、钱嘉东、我和宫恒征从东便门进入了中南海，陈老总安全地回了家。】

(100)

前面我们提到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兵团”，在王力“八七讲话”之后突然活跃起来，似乎是与王力遥相呼应。“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大量散发和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他们宣扬的理论是：(一)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第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第二司令部，第三个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二)周恩来是“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人物”，是“中国的柯西金”；(三)文化大革命的下一场战役，就是打倒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四)声称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说：“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

在“五一六兵团”的宣传攻势下，不少人对周恩来怀疑起来，认为文革的下一个目标，或许真的就是周恩来了。王力的“八七讲话”传达后，外交部的人明显感觉到，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恩来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的一些看法。因此，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王中琪，心领

神会地说：“看来这是毛主席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抢先，不能落后了。”

他们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就要打响了，所以要抢先立功。

王力讲话在外交部的干部中间也引起很大震动，一些干部以为周恩来不行了，开始另找靠山。外交部的 22 名司处级中层干部，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为王力的“八七讲话”叫好，声称今后要紧跟中央文革，这在当时被称为“22 中将”。不过很快王力就倒台了，“22 中将”在王力倒台后，又因为写这张大字报做检讨，这是后话了。

8 月 11 日的陈毅批斗大会结束之后，外交部的造反派没有揪到陈毅，就立即着手对外交部进行夺权。王力在给姚登山的信中，撒了一个谎，声称“总理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这个谎言的杀伤力极大。

外交部的保皇派“造反总部”在告状信中，就是告状姚登山的讲话与周恩来不一致。“造反总部”敢告状，也是仗着有周恩来的支持。而王力的“八七讲话”，不仅否定了“造反总部”的告状信，还声称“造反总部”是保守组织，特别是强调周恩来与中央文革的意见一致。

当时中央文革的威信如日中天，王力说周恩来与他们一致，谁敢质疑王力的真实性？大家都以为周恩来真的转变立场了，真的不再“保”陈毅了。这样一来，就造成“造反总部”的人人心惶惶，以为周恩来不支持他们了，不少人开始悄悄退出“造反总部”。当时外交部西欧司战斗队的队长周从吾说：“王力的讲话我接受不了，但这是中央文革的讲话，白纸黑字，我不能不相信。现在我辞去队长的职务。”

面对王力的谎言，周恩来也不好出面辟谣，因为周恩来无法公开说：我与中央文革不一致。这样一来，周恩来只好沉默，而周恩来的沉默，又被认为是“默

认”，因此搞得周恩来十分难受。

(101)

8月14日，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数百名红卫兵，在“联络站”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大院，砸毁“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这两个保皇派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毆打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墙上贴满侮辱性的大标语“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并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解散。

在这种强大压力下，“造反总部”的处境极端困难，成员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30多人，基本上彻底垮台了。而“攀险峰”顶不住压力，被迫宣布解散了。

自从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周恩来的外交部能够顶住造反派的夺权浪潮，靠的是保皇派群众组织在外围的保护。现在，外交部的两个主要保皇派群众组织垮台了，那么周恩来在外交部的势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打垮保皇派后，就开始夺权行动，他们成立以姚登山和“联络站”头头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第一个夺权的目标是外交部政治部。在对政治部夺权之前，他们向王力请示：可以不可以对政治部夺权？这次王力没有明确表态，而是通过秘书转告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都请示。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

王力这些话，就等于间接地肯定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于是8月16日，姚登山和王中琪发起“砸政治部”行动，他们包围了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没收所有公章。然后宣布由12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由于外交部政治部的当权者们已经失去保皇派群众组织的保护，抵挡不住造反派来势汹汹的夺权，只好乖乖地交出大权，造反派顺利夺权。周恩来对此也束手无策。

造反派“领导小组”在接管权力后，立即发出通令，通知各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并声称中央的最新口号是“打倒刘、邓、陈”。夺权当天的下午，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院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姚登山讲话说：“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分界线。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接下去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革命不能改良，修修补补是不行的，要彻底砸烂。”

在对政治部夺权胜利的鼓舞下，8月19日，造反派开始向外交部发起总攻，对外交部党委进行夺权。这天还是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红卫兵打头阵，几百名红卫兵闯入外交部，强行赶走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在党委办公室大门上贴上封条，封闭党委办公室。他们还发出通令：【从即日起，外交部党委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陈毅是不折不扣的外事口最大党内走资派，根本不配当外交部长，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小组”，负责外交部的日常业务。】

(102)

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一些头头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以姚登山为主任，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开始掌握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的大权。此时，还有人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姚登山同志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8月20日，红卫兵和造反派进一步强行封闭所有外交部副部长的办公室，乔冠华等副部长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强迫他们在街头叫卖《红卫兵战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据乔冠华的儿子回忆说：【不久，造反派罚爸爸到王府井萃华楼附近卖《造反战报》，哥哥骑着自行车悄悄去看望了他，爸爸还是比较机灵的，造反派不看管他的时候，他干脆就坐在附近店铺的台阶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就把报纸丢弃在小胡同里，然后把自己的钱换成一张张毛

票，如数上交。后来还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结束了爸爸的“卖报经历”。】

21日，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揪斗原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红卫兵和造反派逼张闻天承认，他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陈毅是后台，但被张闻天拒绝。

从1967年8月19日开始，整个外交的大权完全落入造反派手中。陈毅虽说还没有被打倒，但已经是时间问题了。陈毅倒台的话，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半年多之后的1968年6月，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在谈到“打倒陈毅”事件时，毛泽东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周恩来挑明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的时候，林彪在干什么呢？原来林彪看到外交部大乱，猜到这是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夺权。此时，林彪还是持中立态度，为了不惹麻烦，林彪干脆离开北京，到外地“打转”去了。周恩来一个人留在北京，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眼看毛泽东的重点进攻夺权就要胜利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件意外事件拯救了周恩来的命运，这就是8月22日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发起的这场“重点进攻夺权”，整个战略战术都是不错的，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让周恩来反败为胜。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姚登山等人傻眼了，出了这么大的事，造反派们没有人敢负责，更没有人敢处理这件事。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夺到手的外交部大权，又送回到周恩来手中，请周恩来出面处理这件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轻而易举地把外交部的大权又拿了回来。关于“火烧英国代办处”

的详情，将在下面介绍。

(103)

在讲“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前，有必要提一下澳门 1966 年 12 月 3 日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及所谓“一二三”事件。

1949 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干部逃入澳门，中共的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澳门。于是在澳门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上，华人分为两派：一派是亲中共的“左派”，另一派是亲国民党的“右派”。澳门葡萄牙殖民政府对左右两派华人，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当时澳葡殖民政府非常腐败，澳葡公职人员不论葡萄牙人还是华人，都贪污成风，不贿赂办不成事。1966 年 4 月，一家华人学校要扩建校舍，向澳葡当局方面申请施工批准，但久久未得到回音。校方代表前后 24 次找当局交涉，也没有进展，大概是贿赂没有到位吧。于是校方一怒之下，不等当局的批准就先行施工，于 1966 年 11 月开始动工。而澳葡当局出动警察，禁止校方动工，双方发生冲突，造成 24 人受伤。

这下惹怒了当地居民，纷纷抗议，亲大陆的社团更是推波助澜，号召大家“敢于斗争”，澳门总督府门前每天都有抗议的人群。12 月 3 日，总督府门前终于发生了冲突，警察先使用警棍，试图驱散示威人士，但效果相反，前来示威的群众反而愈来愈多。到了下午，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愤怒的群众捣毁警车，捣毁总督府门前的石像和铜像。下午 4 时警察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 8 人死亡，212 人受伤，62 人逮捕。澳门总督在晚 6 时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宵禁。

12 月 10 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奉命对澳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的诉求，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保证今后不

允许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在澳门的亲大陆的社团，也向澳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澳葡当局具签“认罪书”。

澳门左派发动罢市，造成市场一片萧条，有钱人纷纷逃离澳门。中国军方在澳门周围加强军事部署，并宣称准备断绝澳门的饮水供应，更加剧了澳门的紧张气氛。在此压力下，澳葡当局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表示“全部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澳门亲大陆社团所提出的要求，

12月16日，澳葡当局对警察厅长等人撤职，下半旗为事件中的死难者致哀。1967年1月2日，澳葡当局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国民党在澳门的机构和团体全部被查封，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被全面驱逐出去。1月27日，澳葡当局发表“认罪书”，说：【向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各项要求，承担死难者和受害者的抚恤费及其他损失，共计200万澳门币。】

(104)

1967年1月27日澳葡政府发表“认罪书”，不仅标志着澳门中国居民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文革大革命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似乎证明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只要敢于斗争，貌似庞然大物的反动派一捅就破。同时，澳门的胜利似乎也证明文革可以扩大到国境之外，于是境外的文革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比如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的外交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向当地华侨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于是缅甸政府制定一条法令，禁止在缅甸的华侨学校里，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学生们当然不答应。此后缅甸华侨与缅甸政府发生多次冲突，中方一人被打死。6月30日，北京40万市民

到缅甸驻华使馆示威游行，7月3日，北京一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缅甸使馆的一些设施，但好在没有出现伤人的情况。

又比如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蒙古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突然路上的红卫兵发现，蒙古汽车司机的刹车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蒙古司机居然踩着毛主席像开车。愤怒的群众马上把蒙古司机揪出来，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后来人们的愤怒压抑不住，把蒙古大使的专车烧毁了。愤怒的群众又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围墙上刷写“打倒蒙修”的标语。为了安抚愤怒的群众，中国外交部立即召见蒙古大使，对蒙古司机侮辱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将蒙古司机驱逐出境。

1949年大量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逃入香港，中共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于是香港的华人也分为两派：亲中共的“左派”和亲国民党的“右派”。港英当局对香港的左右两派华人，也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资方开除150名工人。此后工人在厂外集会，张贴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抗议资方无理解雇，部分工人强行冲进厂内要求资方谈判。资方招来警察，警察逮捕二十多名工人，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多名示威工人受伤。

此事发生后，亲大陆的港九工联会向港英当局提出“严重抗议”，香港左派报纸也发表社论支持工人，但港英当局对此置之不理。此后工潮演变成暴动，工人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工人用石块和玻璃瓶袭击警方，警方则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打死一人，打伤多人，逮捕多人。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递交一份中国外交部的

抗议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接受当地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香港左派得到北京的公开支持，倍受鼓舞。从5月20日开始，左派连日出动大批群众，在港督府门外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街头贴满反英标语。

(105)

5月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群众，100多人被捕。鉴于事态严重，港英当局宣布香港岛实施宵禁，这是香港二战后首次实施宵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港英当局进行严厉的谴责，并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等于是号召香港群众起来造反，解放香港。6月19日北京举行10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

在北京的支持下，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约6万名工人响应，巴士、电车、煤气、渡轮等行业出现罢工，左派学校宣布罢课。7月8日，香港边境沙头角发生枪战，约300名大陆民兵越境进入香港，包围沙头角警岗，双方爆发枪战，香港警察死5人，大陆民兵死1人。此后香港出现谣传北京准备收回香港，香港左派的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自制炸弹及汽油燃烧瓶袭击警察。

8月4日，港英当局出动英军，从航空母舰出动直升机从天而降，查封左派工会的据点，拘捕左派组织头头，封闭左派学校。8月18日，港英政府查封了发表煽动言论的3家左派报社，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文汇报》等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

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撤消对3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记者和34名工作人员。这是姚登山等人在8月19日接管外交部之后，做出的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最后通牒”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方不接受最后通牒，自己一方又不敢采取报复措施的话，就会大丢面子，在国际上威信扫地，所以世界各国对“最后通牒”都是极为慎重的。

姚登山等人之所以大胆发出最后通牒，是因为有澳门胜利的经验。他们认为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一样，都是“纸老虎”，港英当局之所以还不投降，是我们施加的压力还不够，只要进一步施加压力，港英当局就会像澳葡当局那样全面投降了，因此，他们就用“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港英当局施压。

但姚登山等人并没有想到，如果港英当局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我方的对策是什么？他们自信地以为，只要“最后通牒”发出去，港英当局肯定会软下来。

然而事情出乎姚登山等人的意料之外，这次遇到的港英当局并不是纸老虎，他们完全没有理会中方的最后通牒。8月22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港英当局没有接受“最后通牒”。这时姚登山等主持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才感到事态严重，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106)

如果是周恩来主政外交部，肯定不会干出这样冒险的动作。周恩来多次批判香港左派说：“香港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的外交部被夺权之后，他也就管不了。

因为港英当局无视中国的最后通牒，激起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义愤。8月22

日晚，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冲进英国代办处，打砸各类器物，打伤多名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并放火焚烧英国代办处的楼房。

据英国代办处的霍布森回忆说：【大约晚上 10 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他们先烧着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我们一起躲进了保险库，但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 5000 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打，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

据参加这次行动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们身后的大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代办处的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越过去了。晚上 11 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开始燃烧，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英国人跑进地下室，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姚登山等人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红卫兵会干出如此出格的事情。在这个紧急关头，姚登山等和造反派头头们，没有人敢出头处理这件事，只好把外交大权重新交还给周恩来，任由周恩来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得知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知道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立即行动起来，

展开“反夺权”行动。周恩来于8月23日凌晨，英国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小时，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这次周恩来叫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起接见，陈伯达站在周恩来一边。

(107)

周恩来：“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是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说：“都拿王力同志的讲话捞稻草，你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你们把英国代办处烧了，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外交大权四天中断，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

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造反派：“我们承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你们其中有人要‘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你们能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周恩来：“你们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外交部，你们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了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陈伯达：“你们都要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你们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

最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造反派头头们宣布：

【(一)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二)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三)“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四)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封条完全无效；(五)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马上撤离。】

周恩来借着“英国代办处”的东风，把被夺走的外交大权，又夺了回来。不

过这件事周恩来还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怎样向毛泽东汇报，对周恩来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这是考验周恩来智慧的时候。

(108)

按照常理，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么大的事，周恩来应该亲自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不便亲自去汇报。因为毛泽东肯定会怀疑，“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不是周恩来在背后搞起来的，毕竟周恩来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最大受益人，不可能不被别人怀疑。

如果周恩来亲自去汇报，毛泽东未必相信周恩来讲的是真话，所以周恩来必须找一个第三者去汇报这件事，才能让毛泽东相信他是清白的。这个第三者找谁合适呢？陈伯达是一个人选，但陈伯达在“打倒陶铸”事件之后，毛泽东疏远他了，而陈伯达又靠近了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会太相信陈伯达的话。于是周恩来就想到了杨成武。

当时杨成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且杨成武本人没有卷入“外交部夺权”一事，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相对客观地讲这件事，毛泽东会比较相信杨成武的汇报。因此，周恩来就选定了杨成武，请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据杨成武回忆说：

【周恩来找我单独谈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 8 月 7 日的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周恩来不仅要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火烧英国代办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向毛泽东说明“外交部夺权”引发的一连串严重后果。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马上展开了“反夺权”，把被姚登山等造反派夺走的外交大权，又重新夺了回来。不过，周恩来的这个“反夺权”，还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才能算数。如果毛泽东不认可，再发起一场针对外交部的夺权战役，周恩来这个反夺回来的权，还有可能再次被夺走。因此，怎样说服毛泽东放弃再发起一场外交部的夺权战役，是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问题。

周恩来知道没有毛泽东的首肯，王力是不敢进行如此煽动性讲话的，“外交部夺权”是毛泽东的一步重要的棋。但现在毛泽东的这步棋出了问题，不仅没有起正面的作用，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因此周恩来想劝告毛泽东：你这步棋走错了，外交部夺权错了，再这么搞下去，就要起连锁反应。

周恩来很巧妙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周恩来说的“连锁反应”是一个话外音，毛泽东应该很清楚，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下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火烧苏联大使馆”了。

(109)

当时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反帝反修”的宣传下，对苏联的印象极不好，多次发生过针对苏联的抗议示威事件。就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第二天，一批红卫兵又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情况十分紧急，谁劝他们都没有用，只有周恩来亲自去解围了。据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说：

【红卫兵的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如何围攻以及如何撤退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

火烧英国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

是要反对他们。”】

【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周恩来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又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围攻苏联大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为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

这次包围苏联大使馆，周恩来亲自去解围，劝退了红卫兵。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亲自劝退，红卫兵说不定又要闹出“火烧苏联大使馆”的事件。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如果发生“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了。

因此，周恩来巧妙地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连锁反应，提醒毛泽东，如果任凭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样闹下去，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这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周恩来能劝退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说明周恩来还能控制一定的局势。如果周恩来在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时候，亲自出面劝退红卫兵，很可能就不会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可是周恩来没有管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事，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周恩来心里有气，他被夺权了，当然也就不再管事了。

周恩来不管事了，就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出来管事，就劝退了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因此，周恩来也想用这件事，告诫毛泽东：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如果你夺了我周恩来的权，没人管事，那就要天下大乱，就会从“火烧英国代办处”发展到“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

苏战争。周恩来要让毛泽东知道，夺周恩来的权，其代价将会有多大。

所以，周恩来让杨成武给毛泽东“捎话”说：“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这里，周恩来说“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周恩来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周恩来说“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林彪在军队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只有这两个“不动摇”，就是不触动周恩来和林彪的地位，才能保住不会天下大乱。

(110)

周恩来除了让杨成武给他“捎话”外，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表示他对“八七讲话”的不满，委婉地希望毛泽东对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这些挑动外交部夺权的人，给予一定的处分。

据杨成武回忆说：【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过来。”

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回北京的飞机后，又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会写几篇文章，就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很大。我的看法，王力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力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将我的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周恩来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周恩来又叫我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我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问林彪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没有了。”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111)

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准备搞三年。他在 1966 年底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毛泽东在 1967 年初又说：“第一年开张，第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第三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标有多个，有刷新人们思想觉悟的目标，有改革政治体制的目标，也有改换人事布局的目标。其中改换人事的目标，也就是“夺权”，是最硬的指标，最难啃的骨头。毛泽东对搞文革的思想目标 and 政治目标有很多阐述，但对搞文革的改换人事目标，也就是“夺权”的目标，从来没有明确地讲过。不过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的人事目标，应该是第一年夺刘少奇的权，第二年夺周恩来的权，第三年夺林彪的权，这样文革大革命就胜利结束了。

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他本人的权力问题，而是要为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铺平道路。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这三个人在党内的威信太高，只要他们三人中的一个人掌握实权，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无法顺利接班。所以毛泽东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

第一年对刘少奇的夺权比较顺利，刘少奇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实现了完全彻底的夺权，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接管了这些部门的权力。第二年对周恩来的夺权，就很不顺利了。本来毛泽东想来一个“一锅端”，来一个“全国全面夺权”，结果遇到高官们的强烈抵制，所以毛泽东只好放弃“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

周恩来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是：外交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毛泽东把第一个

“重点突破夺权”的目标，放在了“外交部”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亲自出马插手和煽动外交部的夺权，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仗着中央文革亲自出面支持的威风，一举打垮了外交部的保皇派，终于实现了外交部的夺权，实现了毛泽东“重点突破夺权”第一个的目标。

可是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虽然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但这些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热血沸腾，造反派野心膨胀，使得毛泽东本人也对他们失去了控制，最后干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无法无天之事。1970年12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斯诺问：“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泽东说：“就是那个时期。”

(112)

为什么会失控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群众的革命热情越来越激烈，第二个方面是造反派的野心膨胀，急于立功。关于造反派的野心膨胀，周恩来后来在讲话时说：“王力在8月7日要夺外交部大权，于是‘五一六兵团’就在天安门贴出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

康生插话说：“王力想当总理。”

毛泽东后来也说：“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他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发照会给陈毅本人。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

毛泽东说姚登山“闯了几个祸”，这也是对的。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立功心切，想立一个大功，一举当上外交部长，于是就搞了一个对英国的“最后

通牒”，想把英国一举压垮，夺取一个外交上的大胜利。

然而“最后通牒”绝不是一般的强烈抗议，绝不是可以随便动用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建国后，外交部只有两次对外国发出最后通牒，第一次最后通牒是对印度，那次最后通牒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协商后发出的。当时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印度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就立即发起进攻。后来印度接受了最后通牒，此次是中国赢了一次外交胜利。

姚登山等人在外交部夺权后的第二天，居然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二个“最后通牒”，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周敏，回忆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说：

【总理问：“英国代办处烧了？”

周敏说：“基本上都烧了。”

总理问：“姚登山来了没有？”

周敏说：“没有。”

总理说：“马上叫他来。”

总理开始讲话，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他说：“外事行动，不能步步升级，要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你们怎么这么干呢？我没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汇报，这样大的事情也不请示。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总理气得手发抖。

陈伯达也很生气，说：“外事行动以后都由外交部掌管，别的组织不要插手。”

姚登山家住东单二条，离人民大会堂不远，此时也已到了。总理问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人：“火烧英国代办处，你们参加了没有？”

大家回答：“没有。”

总理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

大家回答：“不知道。”

总理说：“没参加，不知道就好。”】

(113)

虽然目前还没有透露毛泽东得知“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但毛泽东肯定也是非常生气的。对英国发“最后通牒”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也没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这就是“失控”。造反派已经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造反派失去控制了。

更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等造反派在“闯祸”之后，居然表现出“敢做不敢当”的软骨头，缩起头来，不敢出来了。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直接导火索，是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时限到达之前，已经有上万人的红卫兵和群众围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如果到时限之后，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中国反而受辱，因此英国代办处门前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闹事，这是很容易想到的。

姚登山要是有敢于负责的态度，他应该早早赶到英国代办处门前，阻止和劝说红卫兵和群众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这才是“敢做敢当”。可是姚登山在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的时候，居然躲在家里，周恩来问：“你们参加没有？知道不知道？”姚登山等人说“没有参加。不知道。”

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这么大的事情，而且是与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直接相关的事情，姚登山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姚登山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不敢到现场去。如果姚登山去了现场，愤怒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向他提出问题：“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

姚登山就是害怕回答“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软了，群众就会指责他是投降主义，卖国贼，甚至有可能被愤怒的群众痛打一顿；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硬了，就会向群众火上浇油，群众就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干出更离谱的事。所以，姚登山不敢回答群众的问题，也就不敢到群众中去了。

同样，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不敢到现场去，因为他们也害怕回答群众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回答的太软，要被群众骂成卖国贼，挨打不说，还要毁掉他们“响当当”造反派的硬汉形象；回答的太硬，又怕给群众火上浇油，惹出更大的祸来。所以他们三人也采取缩头乌龟，不敢去现场，任凭现场的群众闹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

(114)

8月23日晚9时，一万多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面举行抗议大会；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了，英国不予理睬。这时该怎么办呢？据一位参加这次事件的红卫兵回忆说：【晚上10点，通牒限期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晚10时半，群众冲进英国代办处；晚11时，英国代办处起火。可见这次火烧事件，不是突发的，而是在这之前有两个小时的“潜伏期”。最糟糕的是，在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的时候，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于是愤怒的群众就自发地采取“显示力量”的革命行动，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一种传言，说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周恩

来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广播讲话稿，在英国代办处现场反复播出。这个传言是不真实的。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回忆，他们没有听到过这个广播，而且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在后来谈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时，都没有提到过他们曾经紧急起草过一份广播讲话稿。

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如果有一位有威信的中央首长到现场，就有可能控制和制止群众的过火行动。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去，任凭群众胡闹，闯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

当然，对周恩来不去现场，毛泽东倒也不生气，因为周恩来被夺权了，撒手不管也情有可原。最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他们是最应该出现在现场的，因为这件事就是他们挑起来的。如果他们有一点责任心的话，就应该挺身而出，哪怕是挨打挨骂，毁掉自己“响当当”造反派的名声，也要阻止群众的胡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这些人成了“缩头乌龟”，没有一个人去现场。他们为什么不去呢？答案只有一个：出于私心，为了自保。

毛泽东最不喜欢那种私心重，处处想着自保的人。因此毛泽东后来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与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经得起考验，私心暴露无疑。陈再道这样的军人，在“七二零”事件中闯祸之后，依然敢做敢当，没有当缩头乌龟。与陈再道相比，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人实在是差了一截，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失望太大了。

(115)

毛泽东费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准备，发起“重点突破夺权”，好不容易夺下了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可是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东风，成功地进行

“反夺权”，又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那么毛泽东是不是要再发起一次“重点突破进攻”，再来夺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呢？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定位，权衡利弊，认真地再三思考，是否应该再次发起一场夺周恩来外交大权的战役。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天，第二天才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告诉杨成武，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周恩来掌握外交大权，反而更好。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是因为他对“左派”失望了。

在一个月前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还对“左派”抱有很大信心，甚至提出“给左派发枪”。可是“火烧英国代办处”，无情地粉碎了毛泽东对“左派”的幻想，他开始对左派失望，不仅不再提“给左派发枪”，甚至连支持“左派”夺权的问题，也不得不慎重考虑。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就是所谓的“左派”，都会绝对听他的话，所以才积极扶持造反派，但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造反派夺权之后，自我膨胀，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作主张，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世界上没有权威了，就是毛泽东的权威他们也不尊重。

向外国发出“最后通牒”是极其慎重之事，一定要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同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惯例，没有听说哪国的外交部，不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自作主张发出“最后通牒”的。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夺权后的外交部造反派，居然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就擅自对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这简直是完全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法无天了。外交部造反派无视毛泽东的权威，就使毛泽东对外交部失去控制。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

反而让毛泽东感到安心了。至少周恩来掌管外交部，还是尊重毛泽东权威的，凡是重大的外交事情都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对外交部还能控制。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与苏联发生外交纠纷，进而引发中苏战争，这可是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绝不可大意。在红卫兵包围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只要有洞察力的人都会发现其危险性，这样下去弄不好就是第二个“火烧”，弄不好就会引发战争。可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王力、姚登山这些人又不见踪影了，他们不敢管，也没有能力管这件事。

(116)

中苏关系比中英关系更难处理，那时中国人把苏联认为是头号敌人之一。在制止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软，会被说成是违背毛泽东的“反修”思想；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硬，又可能煽动起严重的中苏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王力、姚登山根本不敢插手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处理苏联外交纠纷的高超艺术。在本文后面附文一篇《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它反映出周恩来处理这种问题的高超技巧。

处理天下大乱中的外交问题，特别是中苏关系，只有周恩来出面才能稳住局面，这时不能没有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决定，承认周恩来的反夺权，外交部暂时还是继续让周恩来掌控比较好，等待以后有时机的时候，再考虑夺周恩来的权。这样一来，毛泽东精心准备的一场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就嘎然而止了。

这次，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暂时停战，毛泽东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打倒中央文革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不过，毛泽东在对周恩来让步的同时，又悄悄给周恩来埋了一个陷阱，他要离间

一下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然后让杨成武转告周恩来，说：“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要总理一个人单独处理，把他们抓起来。”

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转交给毛泽东，就是希望毛泽东对王力的讲话表态。毛泽东对王力讲话批示“大毒草”，让周恩来感到满意。毛泽东又说让周恩来“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让周恩来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如果周恩来是一般人，就会中毛泽东的“计”，马上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但周恩来却没有中毛泽东的“计”。

周恩来想到，如果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自己单独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就会让林彪产生一种看法。这样，林彪会认为周恩来背着他林彪做事，抓人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林彪打个招呼就抓，无视他林彪的存在。这样一来，林彪就会对周恩来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大打折扣。

周恩来不愧是高手，马上来一个“将计就计”，他立刻让杨成武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这时，杨成武却搞不清这里面的玄机，向周恩来解释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117)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杨成武也觉得周恩来的话有理。特别是周恩来说“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这等于是向杨成武下命令，同时又说“你就说是我让去的”，这是鼓励杨成武不要害怕违背毛泽东的指示，你把承担推到我身上

就行。

毛泽东特别交代杨成武说“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毛泽东并没有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可是杨成武在关键时刻，居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反而遵照周恩来的话，去向林彪报告了。杨成武没有想到，他这么做是给毛泽东“惹麻烦”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离间周恩来与林彪关系的计策失败，却反过来离间了毛泽东自己与林彪的关系。

因为杨成武说是周恩来派他来向林彪汇报，林彪就会对毛泽东产生看法。这么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按照常理，毛泽东应该先通知林彪这个党内第二把手，这才是尊重林彪的地位。可是毛泽东居然不告诉林彪，还是周恩来派人来告诉林彪，那么林彪就会觉得毛泽东把他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不尊重他的地位，反而还是周恩来尊重林彪。这样一来，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反而产生裂痕了。

毛泽东的这个计策本来是不坏的，只是没想到他非常信任的杨成武，居然在关键时刻会违背自己的指示，反而听周恩来的话。杨成武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杨成武怕得罪周恩来，杨成武想谁都不得罪，想八面玲珑做好人。而毛泽东非常不喜欢八面玲珑的人，杨成武在关键时刻辜负了毛泽东，给毛泽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使毛泽东感到杨成武“不能信任”，这就为后来毛泽东“打倒杨成武”埋下了伏笔。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毛泽东对文革思考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此时毛泽东才吃惊地发现，造反派已经完全失控了，天下真的大乱了。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刻，连毛泽东自己都控制不住局势，只有周恩来还可以稳住局势，如果周恩来撒手不管，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正应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一句名言：“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革命之火就可能会把一切

烧成灰烬。”

毛泽东后来也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明白，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不能再降低周恩来的威望，相反要提升周恩来的威望，这样才能稳住局势，尽快走出天下大乱的混乱。

(118)

因此，毛泽东不仅停止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反而开始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毛泽东树立周恩来威信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打成反革命集团。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此后，中国开始了一场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反对过周恩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登山等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

\*\*\*\*\*

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

(作者陶铁柱，是参加这次“反修”行动的“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头头之一。)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和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王保尔、陈其健等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反修”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作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119)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红卫兵们又刷大字报，又喊口号，火车比规定时间晚开了 10 分钟。海拉尔车站站长面露难色，因为误车是他失职，但他也不敢流露。

临开车前，红卫兵们突然发现两位战友：彭少珠、商小果不见了，他们估计可能被苏联列车扣住了，急忙让站长发出紧急停车的信号，几个“反修勇士”飞快地跑到列车头前不远卧在铁轨上。

这时不得不停下来。红卫兵们要求上车，但苏联列车员硬是不开门。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站长对几个工人说：“不开门就用铁榔头砸！”几个工人果然抡起榔头砸了几下，列车门终于开了。

红卫兵们一拥而上，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搜寻，终于找到了这两位同学，只见她们的手被反绑着，嘴里还塞上了毛巾。

红卫兵们当然怒不可遏，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地说：“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说：“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9月7日再搞一次行动。

在我们行动前一天的9月6日，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9月7日的这一次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华山拐弯抹角，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9月7日，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

(120)

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

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 10 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 月 9 日，我们小分队一行 20 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121)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 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 月 11 日出去的，对吧？”

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

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附文完】

(122)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对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是怀有愤怒的，所以就给周恩来一个“复仇”的机会。第一，毛泽东在王力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为周恩来解气；第二，毛泽东授予周恩来单独全权处理王力的特权。毛泽东以为周恩来复仇心切，会对王力下重手，立即给他扣个反革命的大帽子，召开批斗大会，狠狠批判一通。

但周恩来没有按照毛泽东想的那样去做。周恩来知道，如果他这样做，就会损害他的声誉。人们对周恩来的印象是宽厚仁慈，如果周恩来出重手处分王力，人们就会认为周恩来是挟私报复，影响人们对周恩来的好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对王力下重手，只是把王力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因为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前面说过，中央文革小组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京派”，指的是北京出身的陈伯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另一派是“海派”，指的是江青以及上海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康生的立场比较中立，但倾向于“海派”。“京派”和“海派”素有矛盾，双方各不服气，争着得到更多毛泽东的“宠”，争着得到毛泽东更大的

重用。

1967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重用“京派”的王、关、戚，让“海派”的江、张、姚不免有些失落感，所以打倒“京派”的王、关、戚，“海派”的江、张、姚是高兴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海派”一家独擅了。陈伯达和康生因为毛泽东亲近王、关、戚，而冷落他们，也对王、关、戚不满，所以周恩来让文革小组的人去批判王、关、戚，他们都很积极。相反，周恩来倒是表现出对王力的友好态度。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从上海回来参加会议，参加的还有杨成武、吴法宪，叶群身体不好请假。当时总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康生坐在总理的位置上，江青宣布开会。陈伯达的发言主要针对关锋，康生的发言主要针对我，说我想当总理。江青说：“王力，你眼里就没有我江青。”

当时我没有发言权，没有说话。凭良心说，我眼里还是有江青的，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又常常代表主席说话，我对她还是尊敬的。

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说：“逼总参谋部向香港派一个营兵力这件事，要王力负责。”

总理说：“这件事王力不知道。”

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

总理说：“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王力不知道。”

他们发言完，总理除了上面讲了两句话，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也得听听王力的意见，叫他说说吧。”

我就哭了，说：“我没有什么说的了。”

这次会议后，就把我和关锋关在钓鱼台二号楼，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后来我出狱后，王光美同志对我说：“你作了替罪羊。搞得这么乱，是要找一个人做替罪羊的。”1967年8月底乱到极点了，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江青正好把我端出来当替罪羊。】

(123)

王力说：因为1967年8月底中国乱到极点，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所以要找一个人当“天下大乱”的替罪羊。虽说王力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王力并不是在什么错误也没有的情况下，被当作“替罪羊”抛出来的。事实上，王力犯了很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他犯了“失职罪”。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可见他在这方面是心虚的。这就像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普通群众不去救火，并无过失；而消防队员不去救火，那就是犯了“失职罪”。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发生险情的时候，王力的身份是消防队员，而不是普通群众，他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排除险情的。王力没有去救火，这就是典型的“失职罪”。

既然王力犯了“罪”，受到处分，也是理所当然的，并非完全冤枉他。如果当时王力去了现场，也不一定能劝住群众。不过如果王力去了的话，毛泽东恐怕就不会那么严厉处分他了。

康生后来在批判会上说：“王力这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外交部夺权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外交部夺权后，他们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对抗总理的指示，反对中央，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

本来，最“恨”王力的人应该是周恩来。王力煽动外交部夺权，把周恩来整

得好苦。可是批判王力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响应康生的话重惩王力，反而表现出非常的宽大，还替王力辩解，让王力都感动得哭了。周恩来的这个表现，又让人们大为称赞。

还有，王力提到批斗他的这次会议，“叶群身体不好请假”，这应该是因为林彪不高兴。毛泽东这件事没有通知林彪，还是周恩来派杨成武告诉林彪，所以林彪对这件事上就不闻不问不参与，叶群也就不来参会了。

关于打倒王力等人的事，吴法宪也有回忆说：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 16 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了。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124)

到了 11 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

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泽东女儿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

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

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

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

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两个孩子没人养怎么办？

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戚本禹的两个孩子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

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

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

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

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

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

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那天晚上，

汪东兴连夜派人把戚本禹两个孩子送到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周恩来没有对王力等人立即进行严厉处分，反而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8月27日，按照原定计划，还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因为外交部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王力等人已经倒台了，他们还是按照王力“八七讲话”的激进强硬态度，对待周恩来。

因为周恩来要亲自参加陈毅批判大会，而造反派却提出周恩来不能参加批陈大会，声称周恩来参加批陈大会，大会就成了“假批真保”。于是从8月26日开始，造反派一群人对周恩来进行围攻，纠缠不休，一直纠缠8月27日凌晨5时。

(125)

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不住愤怒起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场的周恩来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不到身体的极限，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也忍无可忍，警告造反派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完话，保健医生赶紧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

这时造反派仍不甘休，他们对周恩来高喊说：“我们要拦陈毅的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听到这些话，转过身来怒吼道：【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造反派们从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放这样的狠话，他们一时间惊呆了。周恩来回去后心脏病发作，一下子病倒了，36小时不能工作。这时毛泽东传来话说：【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27日的批判陈毅万人大会，按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周恩来表现出坚定和强硬的态度，镇住了造反派们，他们果然没有敢对陈毅动手，批陈大会上也没有出现过火行为。周恩来因为病倒，让陈伯达代替他主持大会。陈毅仍然坐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不时按照群众的要求，站起来低头认罪，态度很老实，比上次批斗会上更老实。陈毅也不愿意自己给周恩来再添麻烦，所以表现得特别老实。

到8月31日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周恩来才召见姚登山及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们开会，周恩来说：“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现在，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的。”

周恩来又批评姚登山说：“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你最近到处讲话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这个大标语。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

姚登山不知道王力已经倒台，还根据王力的讲话来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我有错误我负责，我是点革命之火。”

周恩来生气地说：“你这是推卸责任。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看来非把中央抬出来你们才相信。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一派红

卫兵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夺权撤销了！希望你们就此止步。”

周恩来在外交部“反夺权”后，造反派“联络站”很快倒台，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又死灰复燃，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这次毛泽东对外交部的夺权，周恩来虽说胜利了，但也是靠好运气险胜的。

## 第十九节 造反派降温期

(1)

这次的外交部夺权，周恩来靠好运气险胜毛泽东，让毛泽东不得不感叹“人算不如天算”。1967年9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在外交部工作的毛泽东表侄孙女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外交部夺权的情况。当王海容说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毛泽东感叹一声，吟诗两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后，毛泽东再无心听王海容的汇报，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这两句诗本是唐朝诗人罗隐感慨诸葛亮命运的，诗意是：“运气来的时候，天地都来帮你；运气走了，就是英雄也无能为力。”这两句诗正好反映了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感叹周恩来靠好运气赢了自己。自己虽说是英雄，却也无可奈何。

不少人误以为毛泽东吟这两句诗是说王力的，因为这两句诗是在王海容谈到王力问题时，毛泽东说的。其实不然，这两句诗是毛泽东感叹自己的。第一，在毛泽东眼里，王力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第二，王力倒台，也不是因为天地运气不帮忙。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暴露出造反派已经在“左”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成了“极左派”。如果“极左派”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将很可能爆发内战或外战，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称自己是“左派”，而周恩来等一大批老干部是“右派”。毛泽东原来计划中的文革，本来是一场“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预料。这时毛泽东惊讶地发现，他的文革，又出现一个新的敌人，这就是“极左派”。

“右派”是要把文革之火熄灭下去，而“极左派”是要文革之火把一切都烧光。毛泽东的“左派”，现在处于被“右派”和“极左派”夹攻的尴尬境地。对

“右派”和“极左派”同时出击是不可能的，当前“极左派”成为毛泽东最大的威胁，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与周恩来的“右派”暂时停战，共同对付“极左派”这个新的敌人。

为什么会出现“极左派”呢？毛泽东认为，在群众运动的初期，总会出现因群众的革命热情过于高涨，从而产生过激或过分的行动。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 (2)

毛泽东的斗争思想是：革命应该分三个阶段：发动阶段，攻坚阶段，收尾阶段。在革命的“发动阶段”，不能压制极左的过分行动，否则无法形成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大火也燃烧不起来。

一旦革命过了这个“发动阶段”，革命大火已经点燃起来，进入“攻坚阶段”之后，那些极左的过激行动就变得有害无益了，就要开始对极左的过激行动进行限制和制止。否则，极左过激行动长期蔓延下去，反过来会破坏革命。

革命通过了“攻坚阶段”，取得基本胜利之后，还有“收尾阶段”的考验。

“收尾阶段”主要是革命成果的分配问题，胜利成果分配不均或分配不合理，就会产生内讧，使革命功亏一篑。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是这样，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也为了分配胜利成果大伤脑筋，最后又因此引发林彪事件。这些是后话了。

毛泽东谈到井冈山斗争经验时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有一个政策叫做“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怎么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呢?就是烧掉他们的家财房屋，使他们被迫成为无产阶级。当时，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去井冈山，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位。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我的前委和前委书记。】

毛泽东自己的经验是：革命“发动阶段”产生出来的过激行动，只有靠群众自己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抛弃过激和极左的行动。毛泽东他们在井冈山的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极左的过激行动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极左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 (3)

毛泽东在文革之初，也对造反派的过激行动采取“不压制”的策略，希望造反派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极左过激行动的危害性，自觉改正极左错误。然而，造反派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极左错误，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烧外国使馆的地步。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不得不对群众造反的“极左行动”进行降温了，特别是要打击和取缔那些“极左派”。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一个行动，是打倒“王、关、戚”三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极左”倾向比较严重的人，纵观他们的讲话和行动，明显比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左”得多。张春桥在上海并没有搞极左，这是上海经验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毛泽东用打倒“王、关、戚”三人，作为搞极左的“下场”，用杀一儆百的方式让人们看到，极左是要犯大错误，栽大跟头的。在当时的“极左”气氛下，毛泽东要是从轻处理“王、关、戚”，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二个行动，是取消不久前他发出的“给左派发枪”指示，发出一个相反的禁枪令。这点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三个行动，是巡视各地，给各地的过激造反行动降温。毛泽东于9月16日从上海出发，分别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于9月23日返回北京。这次外巡中，毛泽东每到一处就与当地的领导人谈话，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登在《人民日报》上，细节登在《红卫兵小报》上，作为给极左派敲的警钟。

这一路上毛泽东主要说了以下几点看法：

(一)提醒红卫兵不要犯极左错误。毛泽东说：【现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要防止坏人用“极左”的口号，搞得我们犯错误。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二)不要提过激的口号和要求。毛泽东说：【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发通牒干什么？他们不照办怎么办？你们自己毫

无余地。】

(4)

(三)不要私心太重，争当造反派组织的核心领导。毛泽东说：【有的群众组织头头私心杂念重，争核心、争名位、名次。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四)要团结大多数。毛泽东说：【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古田会议前，教条主义者还整我，以后又排斥我，说：“山上没有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一个洋人)不听意见，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达到四比三。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张国焘两次南下，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好的。许世友是个和尚，但是一员战将，他也要打倒？看一个人，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又要比较的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五)不要搞派性，不要武斗。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我们过去内部也斗，但不搞喷气式。主要是朱德和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上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四个行动，是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周恩来派系也反对极左派，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有两大好处：

(一)毛泽东反“极左”，有悖于他的“造反有理”精神。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反“极左派”，就会使不是极左派的造反派，也对毛泽东产生怀疑甚至失望；而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造反派就不会对毛泽东产生怀疑或失望。

(二)毛泽东派系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擅长搞斗争，而不擅长搞稳定。毛泽东派系的康生、江青等主要干将，都是长于斗争，而短于稳定局势。如果让江青、康生这些人去反“极左派”，就会把斗争激化，不仅使局势得不到稳定，甚至有可能恶化。毛泽东现在不想把斗争激化，所以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周恩来会把局势稳定下来。

于是，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授命，打击极左派，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此后，文革进入一个降温的时期。

(5)

从1967年9月开始，周恩来接手扭转天下大乱的重任，他一方面要给造反派降温，一方面要打击极左派。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收场。在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在英国伦敦的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中国外交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必须尽快善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中央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表态。这是一件颇难的事情，如果调子太软，在当时群众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的时代，会被扣上“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如果调子太硬，就会激化问题进一步升温。周恩来亲自过问《人民日报》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报道，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就是中央态度的晴雨表。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

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人民日报》巧妙地报道了这件事。第一，没有提到“最后通牒”，只是说群众示威，这就暗示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最后通牒”；第二，使用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一词，这样的态度就不至于被骂为“投降主义”；第三，使用“强烈的行动”一词描述火烧英国代办处。“强烈”是中性词，既没有表示赞扬，也没有表示批评。

据说当时周恩来私下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方表示了歉意，但没有公开报道。后来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主动降温，进一步缓和了中英关系。之后，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了房屋，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这件事总算是平息下来。

周恩来要做的第二件事，是香港问题的收场，因为香港问题是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导火索。香港问题不收场，那么就可能重新引发中英之间的外交冲突。周恩来知道，这次在香港问题上不能强硬，只能妥协，因为国内局势不稳，要尽快把可能引爆国内暴乱的香港问题解决掉。

周恩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是全方位撤退和让步，但周恩来要把这个明显“投降主义”的政策贯彻下去，也非常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左派们就不同意。当港英当局拒绝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香港的左派们也非常气愤，他们也要对港英当局采取报复措施，提出将进行更大规模罢工，组织渔船在香港海面大规模示威，最厉害的报复措施就是搞炸弹袭击。左派在香港街头放置各种真假土制炸弹，旁边下纸条“同胞勿近”，专炸英国人。但是这种炸弹袭击，搞得香港一般百姓也人心惶惶，一些平民也被炸弹误炸牺牲，引起香港居民对左派的反感和厌

恶。

于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香港办公室，向香港左派总部的香港工会发出指示说“香港问题要转弯，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罢工，更不要搞炸弹袭击。”但香港工会头头们头脑很热，表示难于接受香港办公室的指示，把这个指示斥责为“投降主义”。于是周恩来把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招到北京，亲自与他谈了五个小时，香港工会的总头头终于认识到自己错了，表示接受“转弯”的指示。

(6)

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思想打通了，可是其他头头的思想还没有通。于是周恩来就把香港工会的头头们请到北京，然后把他们暂时扣在北京两个月，不让他们回香港。周恩来对他们说：【之所以把你们扣在这里两个月，就是要你们把头脑冷静下来。我已经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香港不搞上街游行，不搞罢工，不搞真假炸弹，这些对人民有害，对港英当局无用。】

因为香港左派领导人被扣在北京，香港当地的斗争无人领导，也很快就降温熄火了。据统计，这次香港暴动造成 52 人死亡，802 人受伤，1936 人被捕。暴动期间共发现 8074 个假炸弹，1167 个真炸弹，造成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此次暴动，不少中共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些人被抓捕，有些人被遣返大陆，对中共在香港的势力造成致命的打击。香港左派暴力抗争的手法失去民心，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怀有戒心。左派的声势一直到 1990 年代之后，才慢慢恢复过来。1997 年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董建华颁发勋章授予当时左派负责策划暴动的头号人物杨光，被视为是对当年左派暴动的一种肯定。

不过 1967 年的这次香港暴动，也促使了港英当局进行社会改革。港英当局

通过这次暴乱，察觉到有必要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缓和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港英当局在暴动结束后的 1968 年，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成立民政处，大大加强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方面的福利措施，并修改劳工法，大幅加强对工人的保障。这样看来，香港暴动也算是没有白搞。

周恩来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外交部夺权的收场。周恩来第一个要解决的人，当然就是姚登山了。尽管姚登山也应该是周恩来最“恨”的人之一，但周恩来还是要保持他“宽容宽厚”的风度，在批评姚登山的同时，并没有对姚登山严厉处理，以免别人说周恩来挟私报复，影响周恩来的声誉。

9 月 18 日，周恩来召开外交部干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对姚登山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国时我亲自去机场接你，我又把你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8 月 27 日上午，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那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7)

【姚登山你干扰了外交部，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不过姚登山在国外抗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查，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不能放了，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姚登山还是要保的。】

虽然周恩来说“姚登山还要保”，但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姚登山还是被打成外交部的头号“五一六”分子。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万人大会，会上宣布姚登山等人的十大罪状，当场逮捕姚登山，之后姚登山被关进秦城监狱。

周恩来对外交部夺权的收场，第二个要解决的人是陈毅。因为外交部的很多造反派要打倒陈毅，如果周恩来现在一下子把陈毅说得一点儿错误也没有，就不能让人们心服。所以周恩来用半批评半支持的态度对陈毅表态，让人们觉得周恩来没有偏袒陈毅。

周恩来批评陈毅说：【陈毅是有严重错误的，亚非会议上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陈毅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陈毅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陈毅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然后周恩来的话语一转，说：【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陈毅的大字报、大标语等不能上街，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这是最高指示!】

周恩来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保陈毅，这样就显出他处理陈毅是公正的。之后，陈毅有一个月时间冷处理，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回到外交部。不过到10月以后，陈毅就重新公开露面了。

周恩来除了对火烧英国领事馆、香港问题、外交部夺权问题进行收场之外，最大的任务是批判走极端倾向的极左路线，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为此，以周恩

来为主导发起一场“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即所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对此，毛泽东是大力支持的。毛泽东说：【所谓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有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67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8)

所谓“五一六兵团”，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反对周恩来的群众组织。毛泽东要支持周恩来主持的这次“批极左、抓坏人”运动，而毛泽东特别点名“五一六兵团”，把它作为极左派坏人组织的典型。毛泽东把“五一六兵团”定为极左派坏人组织的典型，可以说有两个寓意。

第一个寓意是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实际上就是宣布：谁反对周恩来，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个寓意却是相反的，在树立周恩来威信的同时，也把周恩来推到火上“烤”。因为人们会认为，这场运动是周恩来为了“保自己”搞起来的。如果运动中出现冤案，或者出现扩大化，这个责任也会被算到周恩来头上。

因此，周恩来也知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搞好了，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搞不好，反而会降低自己的威信，所以周恩来要特别慎重。周恩来在谈到“五一六”问题时说：【现在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这种人就是“五一六”。】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我周恩来。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但“五一六”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反江青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五一六”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这是不会得逞的!】

【“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第一，不扩大化，按主席思想，只抓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如张建旗，以便孤立少数。青年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第二，各单位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我们不要去抓。】

后来外交部在清查“五一六”时，清查出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对此批示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最后外交部定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100多人受到各种处分。姚登山关进秦城监狱，其他人送到干校监督劳动。

总而言之，周恩来对清查“五一六”还是慎重的，对他直属的单位能控制组，对各地方周恩来就控制不住了。比如后来成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江苏大打“五一六”，有人说了几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也有

人说有 30 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江苏成为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

(9)

文革进入降温期之后，周恩来主持具体的收拾摊子工作，遏制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稳定天下大乱的局面。而毛泽东则思考路线方针的大问题，也就是文革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毛泽东从三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思想上、政治上、人事上。

在思想上的思考，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搞出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点我们将在后面着重说明。在政治上的思考，毛泽东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十分不满。建国时，中共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弊病很大，苏联因此而走上了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决定进行大胆和创新的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上出现“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教育体制上出现“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上出现“赤脚医生”，这些都是苏联所没有的。关于这些我们也将后面具体论述，这里先说毛泽东在人事上的思考。

毛泽东本来试图依靠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完全抛弃现有的党员干部，重建一套革命新人的人事体系。可是造反派却让毛泽东非常失望，没有涌现出优秀和杰出的人才，根本无力取代现有的党员干部。于是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调整他最初的人事战略，因为造反派不堪用，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放弃“踢开党委闹革命”，转为“依靠党委闹革命”，作为他下一步文革的主要人事战略。

不过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党”不行，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都是暮气沉沉，不想革命的。所以毛泽东就想到改造党，向党内注入新人新鲜血液，把目前这个暮气沉沉的党，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党，这样才能实现毛泽东的文革计划和心愿。

于是毛泽东就着手开始他“改造党”的计划，也就是“整党”。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67年10月，毛泽东表示要准备召开“九大”。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开会，讲述他召开“九大”的思路。

毛泽东说：【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意见已经反映上来了，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和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要整。】

毛泽东以前说“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毛泽东不踢党委了，但是要整党，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这样的指示以前是没有的，这反映出毛泽东搞文革战略方向的转变。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10)

【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这里阐明他的整党思想：(一)要吸收新血液，吸收工、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二)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思想革命的；不要那种暮气沉沉，思想

保守的。

毛泽东又说：【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过去，一是“听话”，二是生产搞得不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

这里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新人入党难，党支部被老党员把持住了，新人难进来。毛泽东又说：现在入党的条件，一是听话，二是生产搞得不好。不听话的人难入党。毛泽东反对发展“听话”的驯服工具党员，提出要发展“敢想敢干”的党员。

毛泽东继续说：【关于整党，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毛泽东这里转变了他“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想法，重新承认党的重要性，重新承认需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强调不要恢复到过去的老样子。毛泽东又批评一些高官喜欢训人，特别提出陈毅，这是提醒陈毅，不要以为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打倒陈毅”不再提起了，他就可以翘尾巴了。

毛泽东还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八大”决议刚通过，我就反对。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开，把邓小平作为一个备用的棋子，留着备用。

毛泽东准备召开“九大”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一次胜利果实的重新分配，是一次“分蛋糕”的关键时刻，所以不少人就开始动“心思”，希望趁着这次“九大”的机会，分到更多的权力，爬上更高的位置。

经过文革以后，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局常委，已经有多人被打倒，有多人靠边站，空出不少位置。一些有野心，想更上一层楼的人，就盯上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有两个人比较明显，一个是江青，另一个是杨成武。他们两人马上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为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铺路。

(11)

1967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党的最高实权机关；同样，中央军委办事组也成为军队的最高实权机关。江青名义上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她是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而杨成武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因此，江青和杨成武就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和第五号实权人物。这样一来，江青和杨成武自然地认为，他们两人是距离政治局常委距离最近的人。

中共中央成员的政治地位排行如下：(第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四位)中央委员；(第五位)候补中央委员。

杨成武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实权最大的人，但当时杨成武在党内的身份，连普通的中央委员也不是，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杨成武要想从第五位的候补中央委员，一下子飞跃到第一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常

理是不可能的。

可是文革把一切都打乱了，也把一切所谓的“常理”都打破了，使过去不可能的事情，也变成可能了。因此杨成武就想到趁着现在天下大乱的机会，在“九大”上挤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怕难有第二次机会。

当然，杨成武也明白，他要想连跳几级，一下子跳进中央政治局常委，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必须要有人提携才行。于是杨成武就想到了江青，希望江青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多多美言，因此杨成武就在各方面讨好江青，尽力为江青办事，希望以此换来江青在毛泽东面前的美言。杨成武是极少数几个人看过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他意识到毛泽东对江青很重视，认为依靠江青不会有错。

在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其中陈伯达和康生是政治局常委，而实际领导人江青，就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比杨成武的级别还要低。这样，江青要想一下子连跳几级飞进政治局常委，同样有相当难度的。因此江青就想到，需要为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进行一些舆论宣传的铺垫。

虽说江青把持着中央文革小组，但江青要让文革小组宣传自己，不免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所以江青就想找一个文革小组之外的机构来吹捧宣传自己，为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做舆论宣传。于是江青就想到杨成武，让杨成武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替自己搞宣传。江青和杨成武两个人相互帮助，杨成武帮江青搞“宣传”，江青帮杨成武说“美言”，两人建立起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12)

关于杨成武帮江青搞宣传之事，原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吴法宪和组员邱会作，

都有较为详细的回忆，这里摘录如下。吴法宪回忆说：【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当时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组织写《党史纲要》的事。】

【1967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党史纲要》（两条路线斗争史）。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党史纲要》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党史纲要》由军队组织写。】

按照党内分工，军队不应该负责写《党史》这样的东西，而应该由中央文革小组来写。江青却自己不写，让杨成武主持写，可见她是另有居心。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当然也看出江青的居心，但也不好劝阻，任凭江青去胡闹。

吴法宪继续回忆说：【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等抽调30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写这个《党史纲要》。杨成武还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几个月，《党史纲要》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党史纲要》里面总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总理都没有，这能行吗？”

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

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党史纲要》，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党史纲要》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党史纲要》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党史纲要》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江青写这个《党史纲要》，显然是背着毛泽东干的。江青这么做，本来是想抬高自己，为进入政治局制造舆论。但江青的头脑太简单了一点，她没有想到这么做太过分了，反而会引起别人对她的反感，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对毛泽东的反感，江青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等于是在自毁长城。毛泽东看到江青做了这样一件蠢事，只得让江青赶紧把《党史纲要》烧掉，一份也不要留，以免传出去引起人们的反感。

(13)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1967年11月间，杨成武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对编写《党史纲要》的事，杨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现。为什么要办这样大的事？他没有作过任何说明。以我的想法，编写《党史纲要》的工作，军委办事组没有资格和权威担任。我曾将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杨成武表示过，但他避而不答。

为了编写《党史纲要》，军委办事组调集了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几十个笔杆子在京西宾馆专门从事这件事，杨成武的秘书和他的大女儿杨毅，参加了写作班子。对此工作，由杨成武亲自挂帅，别人不能过问。】

邱会作回忆说，在《党史纲要》这件事上，杨成武采取了保密的做法，可以推测这是江青让杨成武保密的。此时杨成武只想讨好江青，他也过分相信江青，

误以为江青的意见，就是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就跟着江青“胡闹”，这也是造成杨成武倒台的重要原因。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大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初稿就出来了。《党史纲要》的初稿，当时我手头有一本，也看过。我记得在《党史纲要》中，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总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没什么历史可写，也被放在“第三号”的位置上了。周恩来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现过，但不占重要地位，更不占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其余人就“榜上无名”了。

大约在 1968 年 2 月间，杨成武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一律销毁，一份也不准留下。谁让他这样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谁监督烧的。】

邱会作的回忆与吴法宪差不多，不过当时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而邱会作只是组员，所以吴法宪知道的情况比邱会作多一些。

江青除了搞《党史纲要》宣传自己外，还搞了一次《红太阳》图片展，这也是杨成武帮江青搞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杨成武主持的军委办事组，还办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红太阳图片展》。这两件事，杨成武放在同样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红太阳展览》这样重大的问题，同样不是军委办事组应当办的事。

《红太阳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大约有图片 300 余张。《红太阳展览》和《党史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历史都反映出来了。毛主席、林总、江青三个人在《红太阳展览》中的地位，同《党史纲要》是一样的，突出了毛主席，肯定了林总，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样，江青没有什么历史性的照片，只有把生活照片当作历史照片了。我记

的有几张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讷在一起照的。李讷趴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边，这种不折不扣的生活照，也作为政治照片展出来了。周恩来只有陪衬别人的集体照片，没有单独照片。

(14)

《红太阳展览》同样是杨成武亲自组织领导的，江青去看过两次，据说都表示满意。《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是“名不正言不顺”，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党的第三位是错误的。对为什么要编《党史纲要》和办《红太阳展览》，杨成武只是个别与我说过一次。杨成武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很多的事。我们现在办的《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这些事，都是为召开‘九大’的重要准备工作。我们的眼光要放大一点，远一点。”】

这里杨成武对邱会作透露了一点内幕，说“今后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很多事”，这里的“中央文革小组”，其实就是江青个人。杨成武又说“《党史纲要》和《红太阳展览》都是为召开‘九大’的重要准备工作”，这就一语道破了江青的用意，为她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做准备工作。

本来，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他与林彪的关系是很好的。吴法宪回忆说：  
【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但后来杨成武感到自己进入政治局，需要江青的帮助，于是就疏远林彪，而和江青靠得很近。邱会作对此回忆说：

【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关系，有一次他故意问我和吴法宪：“江青同志找你们单独谈过话没有？”

我们都说没有。这时杨成武来劲了，他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

话。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流泪，我一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

林总对杨成武有所批评，但杨成武自以为有江青的青睐，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问题上直截了当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对付林总。林总伤心地说：“人一旦失去革命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

邱会作还对杨成武的倒台，分析说：【杨成武的倒台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总对杨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杨成武的确是一个军政双全的人，也能团结同志。但自 1967 年“二月逆流”以后，他自己就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没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关心他，哪些是主席个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实是拉糊涂了。杨成武自己踩在林总、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邱会作对杨成武倒台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杨成武过于依靠江青，为了江青得罪了林彪。毛泽东在上次给周恩来传话的问题上，就已经对杨成武有看法了，现在杨成武再得罪了林彪，那么他被打倒，就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过造成杨成武倒台的直接导火索，却是他的女儿杨毅的个人问题。这件事我们将在下面说明。

(15)

杨成武在红军时代就是林彪的老部下，与林彪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1967 年初，杨成武还专门写了一篇赞捧的林彪长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可是到了 1967 年下半年，杨成武就开始与林彪拉开距离，其中一个原因，是杨成武发现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有所变化。

1967 年 8 月，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在上海，有一天毛泽东与杨成武谈到“四

个伟大”（林彪的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泽东用不满的语气说：“谁封我四个官呀？我不要这四个官，我不要！”

毛泽东又说：“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

毛泽东这句话，指的是文革时开大会以前，首先要说两句固定格式的祝词：“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个祝词也成为当时约定成俗的流行语，提到“万寿无疆”，就是指毛泽东；而提到“永远健康”，就是指林彪。因此，杨成武一听毛泽东说“永远健康”，马上清楚毛泽东这里说林彪，明白毛泽东对林彪有所不满了。

提到林彪的“永远健康”，还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据原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回忆说：【1967年夏，有一天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革命样板戏，前头并排坐着毛泽东和林彪，我正好坐在他们后面。戏开演前，台上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当报幕员准备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时，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未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第二天，林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

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毛泽东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这是随便与林彪开玩笑？还是有意识地提醒林彪什么事呢？这个无法猜测。不过林彪还是慎重的，他马上主动提出不要把他与毛泽东并提，不要喊“永远健康”，一来表示自己的谦虚，二来也是为了消除毛泽东可能有的“想法”。

(16)

但这封信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却表示林彪不必如此谦虚，并没有很认真处理这件事，所以在群众大会的场合，人们还是照样喊这两句祝词。

如果说毛泽东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这还有开玩笑的意思；而毛泽东说“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这显然就是对“永远健康”这句祝词不满。于是杨成武就留了心，在公共场合他就不再喊林彪“永远健康”这句祝词了。杨成武的此举，很快被叶群发现。据杨成武回忆说：

【1967年底，在总参谋部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我不能再那样喊了。”

于是，我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

这时，我才意识到，叶群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杨成武说林彪对“永远健康”看得很重，这没有说到点子上。林彪并不是在意“永远健康”这句话，而是在意杨成武对他的态度。杨成武不喊“永远健康”，

那就意味着他不想再与林彪靠得那么近了，想要疏远林彪了。

杨成武疏远林彪的第二件事，是发表《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196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统对权威》。当时的“军人”发表这种署名文章，并不是出于什么宣传目的，主要是作为“表忠心”的一种态度。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吴法宪”的《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就是意味着吴法宪向林彪的“表忠心”。那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统对权威》，就是意味着杨成武向毛泽东表忠心。

对于林彪来说，杨成武向毛泽东表忠心，本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他表忠心的方式。自从1960年以来，林彪就一直在军队中大捧特捧毛泽东，可以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是林彪的专利。现在杨成武也要来“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那岂不是抢林彪的专利，争林彪的风头。

更重要的是，杨成武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感觉：林彪主持下的军队，对毛泽东的权威树立的不够，所以杨成武才需要提出“大树特树”

(17)

如果军队中早已“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了，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提什么“大树特树”。这样一来，杨成武这篇《大树特树》的文章，就包含有对林彪暗喻批评的意思了，所以林彪对这篇文章非常不满，更进一步对杨成武不满。

杨成武写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向毛泽东表忠心，没想到毛泽东却对这篇文章也不满。杨成武在文章发表前，先把文章送交毛泽东过目，以为毛泽东会很高兴，可是毛泽东看后的表示却很平淡。据杨成武回忆说：【三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

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杨成武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态度，还是照样把这篇文章发了出去。据邱会作回忆说：

【1967年冬，杨成武发表了《大树特树》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原是总参谋部大批判组的稿件，是杨成武硬抢过来的。当时杨成武口气很大，很得意地说：“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杨成武却说《大树特树》是林彪那里搞的文章，硬逼着杨成武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太不够实事求是了。】

【为了文章的发表，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提出要下发文件，通知全军组织学习。文章发表时，军委办事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由《解放军报》召开新闻界的会，通告杨成武的重要文章要发表；军委办事组对全军召开电话会议，讲杨成武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组织收听、阅读等事宜。对发表一篇文章事先做这样的准备工作，我见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发表后，宣传得很厉害，标语刷了很多。】

【文章发表时《人民日报》登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转到第三版，新华社也以重要新闻播发了。杨成武对《人民日报》登的版面位置很不满意，为了此事，当时在中央文革管宣传的戚本禹还专门上门来道歉。杨成武的文章发表后一、两天，我们到了杨成武家，一见到杨成武，他就气愤地说：“戚本禹刚刚走掉。这个戚本禹真是乱弹琴，太可气了，《大树特树》这么重要的文章，他在《人民日报》上登在第二版。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多重要吗？】

对于杨成武的抢风头，林彪也不能等闲视之，否则别人会误以为林彪对宣传

毛泽东不热心。

(18)

11月29日，林彪给海军“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一下子，全国又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林彪的题词，同时让人们感到，林彪还是在“大树特树”毛泽东的，这样林彪就挽回了杨成武暗喻他宣传毛泽东不够的影响。

《大树特树》这篇文章，本来是杨成武想要吹捧讨好毛泽东的。杨成武看到林彪吹捧毛泽东，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就误以为毛泽东喜欢别人吹捧，林彪就是靠吹捧毛泽东爬上去的。于是杨成武把林彪当作榜样，也来大捧特捧毛泽东，以为这样就能讨得毛泽东的欢心，以为这样可以使他更上一层楼，在“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但杨成武犯了东施效颦的错误，他没有看到林彪吹捧毛泽东的时代背景不同。林彪在1960年之后毛泽东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吹捧毛泽东，是给毛泽东雪中送炭，毛泽东当然要感谢林彪了。而现在杨成武吹捧毛泽东，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毛泽东不但不会感谢他，反而看出他有野心。于是，毛泽东很快就对杨成武这篇文章做出了批评。

据吴法宪回忆说：【谁知道，杨成武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是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12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毛泽东对杨成武的公开批评，已经显示出毛泽东准备要拿掉杨成武了。但毛泽东本来并没有想要“打倒”杨成武，只是准备给杨成武一个冷处理，降职处分就算完了。没想到杨成武在他女儿杨毅的问题上，与空军司令吴法宪闹翻了，进而又与林彪严重冲突，引发林彪对杨成武的巨大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所以就决定“打倒”杨成武了。

(19)

杨成武让自己的女儿杨毅到《空军报》工作后，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了讨好一下杨成武，就派自己的秘书单世充专门去“帮助”杨毅，为杨毅的工作创造方便。余立金这么做也是出于“好心”，但没想到却惹出一场男女关系问题，牵连到他自己也被打倒了。

据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事情是这样的：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1968年3月初的一天，单世充的老婆纵素梅(空军司令部门诊部护士)来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纵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因为这是牵扯到杨成武女儿的问题，吴法宪找余立金一起商量，决定先把单士充关押隔离起来，等问题搞清楚后再作处理，并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声誉。

单士充被关押隔离后，他躲过了别人的注意，偷偷与杨毅通了电话，把他们事情的暴露及他被隔离的情况告诉了杨毅，杨毅又告诉了她父亲。

杨成武一听这件事，就感到不对。如果吴法宪真的想维护他杨成武的声誉，那就应该把纵素梅关押起来，而不是把单世充关押起来。因为关押单世充，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是承认单世充有罪。如果单世充有罪，那么杨毅也就肯定不干净，这样杨成武的威信也就受到损害。

因此，杨成武感到非常恼火，认为吴法宪这样做，是要故意损害他的威信。谁都知道吴法宪是林彪的铁杆，而杨成武从1967年下半年以后就对林彪有所疏远，已经得罪了林彪。因此杨成武认为，这是林彪在背后指使吴法宪这么做的。

这样一来，杨成武就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忍下这口气，对吴法宪对他的冒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第二个选择是对吴法宪进行反击。如果这样，就必然要触碰到吴法宪背后的林彪。也就是说，杨成武对吴法宪的反击，就会上升为一场杨成武与林彪的斗争。

杨成武个人当然是敌不过林彪的，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当时杨成武认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肯定要超过对林彪的信任，否则毛泽东怎么可能当着自己的面，说林彪的“坏话”呢？这么一想，杨成武就认为，一旦他与林彪发生冲突，毛泽东肯定会站在自己的一边，那么这场斗争的胜利肯定就属于杨成武了。

(20)

此时杨成武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处理“王、关、戚”事件的时候，没有遵守毛泽东的“只对总理一个人说”的指示，反而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去向林彪汇报。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不信任杨成武了，但杨成武本人却一点没有察觉。

杨成武认定毛泽东会支持他，自然也就大胆地对吴法宪进行反击了。杨成武行动的第一步，是把空军政委余立金“拉”到自己的一边。正好这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紧急给中央送来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杨成武和吴法宪几个人知道，对余立金是保密的。于是杨成武就把余立金找来，悄悄向他透露这份揭发他的材料，并表示自己一定“保”余立金。这样一来，余立金马上对杨成武感激涕零，表示愿为杨成武效力。

杨成武要余立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关押的单士充释放出来。于是余立金在不告诉吴法宪的情况下，把单士充放了出来。单士充本来就是余立金的秘书，余立金就让单士充回到他家中的秘书办公室。杨成武还传来话说：没有杨成武的命令，单士充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吴法宪得知单士充被放出来，当然也是大为恼怒，于是派人招单士充到空军司令部来谈话。来人对单士充说：“吴司令要你去谈话。”

单士充自恃有杨成武和余立金撑腰，拒绝去见吴法宪，说：“杨代总长有指示，没有他的命令，我不能离开办公室一步。”

这下子吴法宪没办法了，输了一步。然后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她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又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据吴法宪回忆说：【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志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

单世充抓起来?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

我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

接着,我要求面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

杨成武招来吴法宪,又不见他,完全不给他面子,狠狠回击了一下吴法宪。另外,杨成武又派妻子赵志珍去林彪那里告吴法宪的状。杨成武知道吴法宪的后台就是林彪,他向林彪状告吴法宪,也就是向林彪开战了,等于是向林彪说:你不处分吴法宪的话,咱们就没完。

(21)

据杨成武回忆说:【我在病中得到消息,气愤至极。我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我的妻子赵志珍也到空军去找吴法宪,没有找到,就与余立金一起去毛家湾。

叶群说:“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叶群听完他们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后再向 101 报告,你们先回去吧。”

随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吴法宪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谈话,要吴法宪“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这里插一点题外话,关于林彪代号“101”的由来,据说是来自电话号码。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专用电话号码,林彪是 101、罗荣桓是 102、刘亚楼是 103、谭政是 104。部下给林彪打电话,就拨打 101,于是也就称呼林彪为“101”了。

同样，华东野战军中，陈毅代号是 501，粟裕是 502，谭震林是 503，陈士榘是 504，这也是来自电话号码。

关于赵志珍到林彪那里告状，吴法宪的回忆说：【第二天上午，赵志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

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余立金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

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纵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赵志珍和余立金走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林彪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志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

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志珍把我们带到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

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志珍向陈绥圻说：

“成武要和法宪同志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22)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

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这次，杨成武对吴法宪下达了两项指示：第一个是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第二个是不要“整”单世充。但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敢于同杨成武斗争，要顶住”，把杨成武的这两项指示全部顶回去了。这样杨成武又输了一步。当然杨成武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开始公然向吴法宪夺权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3月中旬，吴法宪又到军委办事组来了，吴说：“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杨代总长和我之间发生的一点问题，同你们三个人(李作鹏也来了)说一下。我说的内容，现在绝不能外传，所说的内容也由我自己负责。将来上面怎么说，就以上面的为准。】

【吴法宪说：“杨成武以前的问题，你们都知道，搞《红太阳展览》，搞《党史纲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总算过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对他的《大树特树》不满意。”

接着吴法宪又说：“杨成武对我说：今后我的主要精力应当协助他，这样我对空军的工作就照顾不过来了。杨成武考虑，空军的工作主要由余立金负责，余立金也是老空军，工作能力又不错。”这是杨成武要免去我空军司令员的职务嘛。】

杨成武让余立金主要负责空军的工作，等于就是用自己的权力强行夺吴法宪的权。因为吴法宪是杨成武的部下，对杨成武的命令无法直接抵制，他只得去向林彪报告。据邱会作回忆说：

【吴法宪说他很快就把杨成武的话报告了林总。林总听了之后，有些吃惊，但林总不知道杨成武这一考虑的来头，因为杨成武与毛主席那里是通着的。究竟是毛主席的打算，让杨成武先对吴法宪吹风，还是杨成武自己的考虑？林总一时摸不清，因此林总说话很谨慎。林总只对吴法宪说了一句：“杨的考虑不妥，一切要由主席来定。”其余就没有多说了。】

(23)

林彪不知道杨成武的底，于是就要摸杨成武的底。据杨成武回忆说：【那是1968年3月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说有要紧的事。我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座、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

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

林彪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可是，他们的职

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请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一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

我想：我建国前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嘛？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

林彪当然知道杨成武解放前根本不认识叶群，让杨成武写证明，虽然有“强人所难”的味道，但却是一个很小的要求，杨成武并不难做到，写这样的证明也不会伤害到什么人。相反，杨成武拒绝写这个证明，拒绝林彪这个小小的要求，那反而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

林彪就是要用这个难题，来摸杨成武的底，看杨成武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杨成武痛快地答应林彪的要求。这样的话，就说明杨成武与毛泽东是“通气”的。林彪明白毛泽东对自己有不满，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没有上升到摊牌的地步，毛泽东还要团结林彪。对于写一个“叶群不是假党员”的证明，毛泽东绝对不会在这样的小事上为难林彪的。如果杨成武与毛泽东“通气”，杨成武应该知道毛泽东不会在这件小事上为难林彪，就会很痛快地答应。

杨成武的第二种反应，是说“我回去考虑一下”。这说明杨成武回去后要向

毛泽东汇报，这也说明杨成武是“通”毛泽东的。

杨成武的第三种反应，是一口回绝林彪的这个“小要求”，完全不给林彪面子。如果杨成武是“通”毛泽东的，事后杨成武就会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肯定会让杨成武马上来向林彪道歉，因为毛泽东不希望杨成武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跟林彪把关系搞僵了。

几天之后，杨成武也没有来向林彪道歉。因此，林彪认定杨成武没有“通”毛泽东，这件事是杨成武的个人所为，所以林彪决定向杨成武发起进攻了。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的时候，就把这场斗争就炽热化了，林彪的反击就是拿掉杨成武。

(24)

林彪在肯定了杨成武没有“通”毛泽东之后，就把他对杨成武的不满告到毛泽东那里。据邱会作回忆说：【林总在不可能说服杨成武的情况下，才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对杨成武的事，格外地重视，主席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这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据吴法宪回忆说：【3月23日凌晨1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

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毛泽东这一问我

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了。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从打倒杨成武这件事的前后来看，杨成武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也主动发起与林彪的斗争，要处分吴法宪。当然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也是出于气愤，毕竟吴法宪处理他女儿的事情，不但没有维护杨成武的面子，反而给了杨成武难堪。

杨成武要处分吴法宪，公然要夺吴法宪的权，这就引发了与林彪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白炽化的斗争。毛泽东已经不信任杨成武了，但还不准备用“打倒”的方式来处理他。然而，在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爆发了白炽化的斗争之后，如果毛泽东护着杨成武，势必影响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最后决定满足林彪的要求，打倒杨成武。这就像邱会作说的那样：“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这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

(25)

杨成武倒台了，而江青有一段时间跟他走得很近，所以江青要赶快撇清她与杨成武的关系。于是江青就表现出最为积极的态度，坚决要求打倒杨成武。据吴法宪说，打倒傅崇碧也是江青促成的。吴法宪回忆说：【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傅崇碧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是不是真的听了江青的话，打倒傅崇碧，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不过傅崇碧并无犯什么大错，他被打倒，应该是因为与杨成武的关系过于密切，受到杨成武的牵连。不过对傅崇碧的处理，要比杨成武和余立金轻很多。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突然发出《通知》，说：【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人们不禁对中央的这个《通知》感到惊讶，不知道这三位在军内担任要职的将军所犯的“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对此，毛泽东提出召开一次大会，由林彪主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毛泽东说：“杨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了台的人，现在下台了，要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级以上干部大会，由林彪同志去作报告，把问题讲清楚。”】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北京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出场，接见了参会人员，引起一阵轰动。因为毛泽东在1967年全面夺权开始之后，就很少出席这种大规模的大会了。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这是林彪在文革中少有的长篇讲话之一。林彪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刘、邓、陶、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比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近发生的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林彪的讲话，首先提到毛泽东对“杨、余、傅”问题的定性，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定性呢？因为“杨、余、傅”三个人，并没有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只是他们对毛泽东的文革造成了障碍，毛泽东说：“杨成武这个‘障碍兵’可以搬开。”

(26)

为什么说“杨、余、傅”给毛泽东造成障碍呢？这是因为他们隔阂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尽管对林彪有所不满，但现在还离不开林彪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需要与林彪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杨成武的错误，就是公然向林彪的心腹吴法宪夺权，这等于是给毛泽东制造麻烦，搞坏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这样一来，毛泽东从保持与林彪的关系出发，所以要拿掉杨成武。因此毛泽东说：“杨、余、傅”是一个“不大也不很小”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众人热烈鼓掌。林彪接着说：【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

众人更热烈的鼓掌。姚文元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众人跟着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林彪接着说：【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众人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坚决拥护伟大统帅的英明决定!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众人的气氛安静下来后，林彪继续说：【同志们!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个人主义。凡是搞这种思想的、这种行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张国焘垮了，王明的教条宗派垮了，刘少奇的叛徒集团垮了，彭真水泼不进的北京市这一摊子也垮了，贺龙在去年八月展开全军的大夺权，结果他也垮了。所以搞山头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姚文元带头喊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野心家和两面派!”这里姚文元说的“打倒野心家和两面派”，就是不点名地喊“打倒杨成武”。

林彪对杨成武的调子，与毛泽东显然不同。毛泽东只是说杨成武的问题“不大不很小”，而林彪要给杨成武的问题升级，升级到与王明、刘少奇这些人一样。林彪还特别点名批贺龙，把贺龙的问题也提升到与王明、刘少奇这些人一样。这也反映出林彪对贺龙的一种态度。

林彪继续说：【杨成武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他就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

那个东西。杨成武的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杨成武就是这种人。】

江青带头高喊口号：“打倒野心家!打倒两面派!打倒阴谋家!”

林彪接着说：【杨成武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一套、阴一套。表面上他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对毛主席是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并且用特务的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

(27)

叶群带头高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喊口号：“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谢富治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众人也跟着热烈喊口号。

林彪这样一煽动，杨成武的问题就升级了，林彪的内心是希望把杨成武彻底打倒。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对杨成武这样有“野心”的人，总是很担忧的。因为杨成武想要继续往上爬，林彪就成了他的障碍，杨成武必须要设法“搬掉”林彪这个障碍，他才能更上一层楼。因此，林彪遇到杨成武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不免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危机感。

1967年下半年，杨成武陪毛泽东外游三个月之后，对林彪的态度明显冷淡下来，林彪不满地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杨成武本人也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时，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问我：“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

在上海讲到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我怎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杨成武说林彪对他的态度冷淡，其实更应该说他对林彪的变冷淡了。杨成武开始对林彪“封锁消息”，不再告诉林彪毛泽东说过些什么话了。这次杨成武敢于公然挑战林彪，林彪也觉察出，杨成武应该是从毛泽东那里，听到某些对自己不利的话，所以他才敢这么大胆。这样一来，林彪就不得不思考：“毛泽东到底说了些什么不利于我的话呢？”

毛泽东也看出林彪这个疑虑的心思，他要打消林彪的疑虑，于是就拿掉杨成武，让林彪放心。而且毛泽东这次“人情做到底”，干脆让林彪派系的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让林彪彻底放心。

毛泽东让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已经看出来，总参谋长这个军队第二把手的人物，大概是比较难与林彪合得来的。如果毛泽东换一个非林彪派系的人当总参谋长，这个总参谋长过不了多久，因为与林彪合不来，不免又要遭到被打倒的命运。所以，毛泽东干脆让林彪派系的黄永胜任总参谋长，这样才能避免总参谋长再次被打倒。关于毛泽东对军队人事安排的考虑，我们后面还要专门谈到。

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到这次大会上。林彪继续讲话说：【杨成武表面上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组来迫害江青同志。】

周恩来带头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众人喊口号：“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28)

林彪接着说：【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来她的伟大作用。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她有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

叶群带头喊口号：“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众人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江青喊口号：“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在林彪讲话完之后，周恩来接着讲话。周恩来说：【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30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学习和锻炼。在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八台样板戏，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出来的。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周恩来和林彪在会上大捧特捧江青，应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帮江青撇清她与杨成武的关系，搞好与江青本人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周恩来和林彪都希望江青能够进入政治局常委。因为周恩来和林彪都看出，江青这个人好对付，成不了大的气候，所以希望她进入政治局常委，占一个位置。因为政治局常委就那么几个位置，江青占掉一个位置，就能阻止一个其他能干的人上来。

周恩来接着说：【同志们，根据刚才林副主席的具体指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

级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杨成武的这种卑鄙的活动，我们最近才知道，听到后极其愤慨！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了，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的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

周恩来也支持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上纲上线。因为这次打倒的“杨、余、傅”三人，并非周恩来派系的人，而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所以周恩来没有必要为了“保”他们，而得罪林彪，或搞坏与林彪的关系。毛泽东要团结林彪，周恩来也要团结林彪，所以周恩来表现出积极支持林彪的态度。

打倒“杨、余、傅”事件，也是一个偶然的插曲，并不在毛泽东的战略计划中。毛泽东解决了“杨、余、傅”问题之后，就把主要精力转回到他的战略计划上。

(29)

自从群众运动走上“极左”，毛泽东自己也控制不住之后，毛泽东感到现在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众组织，不能成为依靠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次改变他的文革战略，“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依靠党委闹革命”，把重建党组织，作为搞文革的“新重点”。

毛泽东之所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是照搬苏联的东西。毛泽东本来并不喜欢，也不迷信苏联式的体制，但1949年建国时中共对苏联“一边倒”，在苏联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照搬苏联的体制。

自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体制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认为，苏联这种体制长期下去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毛泽东第一次改革政治体制的尝试，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当时毛泽东觉得党委的权力太大，如果没有人监督，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一些人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毛泽东认为应该发动群众，利用《大字报》的形式来监督党委和党员。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使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毛泽东发动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搞“大鸣大放”，只是想让他们大胆地监督党委和党员。没想到在“大鸣大放”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轮流坐庄”，要向共产党“夺权”，这就使运动的性质变了，变成了“反右”运动。

文革开始以后，各级党委机构基本上被打倒了，毛泽东不喜欢的苏联式政治体制在中国瓦解了，这可以算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个胜利。但旧的党一元化领导体制打破之后，新的体制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认为，新的体制应该不再是党一元化领导体制，而要加入群众的监督，这就是全新的政治体制“革命委员会”，也叫“革命三结合委员会”。

(30)

“革命委员会”由三部分组成：(一)革命群众代表：这些人来自造反派头头，不一定是党员，即使是党员，也是资格很浅的党员；(二)革命干部代表：这些人来

自老资格的党员干部，也就是老干部；(三)革命军人代表，这些人来自军队。

本来毛泽东设想中的“革命委员会”是没有军人的，毛泽东并不愿意军人出来参政，搞成军政府。可是在文革过程中，军人出力很大，特别是林彪出力很大，所以新的政治体制中，不给军人分配一定的权力是不行的，所以要搞一个“三结合”的新体制。

毛泽东认为这种“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新体制，因为有三种力量相互牵制，可以相互监督，不会出现过去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官僚主义现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7年2月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8年9月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到此，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尽管在表面上，毛泽东心目中的新型政治体制，已经在全中国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群众”的实力很弱，基本上成为一个摆设的“花瓶”，根本无法形成牵制力量，也起不到监督的作用。除了上海等几个极少数地方的革委会大权掌握在造反派的革命群众手里，绝大部分地方的革委会的大权，都是掌握“革命干部”或者“革命军人”手里。这种新的“革委会”，在实质上与以前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大同小异，可谓“换汤不换药”。这样一来，毛泽东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仅仅流于形式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转回来谈目前的形势。

在1968年初，毛泽东的主要力量还是用于“反极左思潮”，给过热的群众运动适当降温。但毛泽东也不想过分降温，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总理努马扎莱，努马扎莱提问说：

【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乱了一阵子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要让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就解决了。】

(31)

10月12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他又说：【现在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这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群众。从今年9月下旬起，全国群众组织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够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认为，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打够”，没有“闹够”，要等到他们自己打累了，闹累了，自然而然也就不想再打了，这时候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也就自然熄灭了。根据这个想法，毛泽东解决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方法，就是放手“让他们闹够”，只有等到他们闹够了，运动才能回头。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对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采取观望态度，等到他们“闹够”。可是这次毛泽东的经验没有灵验，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不但没有“闹够”的趋势，反而是越闹越大。到1968年，不仅是工厂武斗，连文质彬彬的大学里也出现严重的武斗现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文革的典范学校，又成为武斗的典范。

北京大学从1968年3月开始，多次出现几千人规模的大武斗。据北京大学

造反派头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回忆说：【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据的那座楼的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学生用匕首扎伤。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呢？】

最著名的武斗是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从1968年3月下旬开始，双方使用了步枪、手榴弹、燃烧瓶等热武器进行武斗。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原本是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领导“清华井冈山兵团”，但这个组织又在1967年中旬分裂成为“团派”和“四派”，蒯大富成为“团派”的头头，与“四派”发生长达百日的大规模武斗。

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派出一支三万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但遭到“团派”的武装对抗，当场打死工人5名，打伤7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七事件”。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7月27日下午四点多，“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下午五点多，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

(32)

下午五点半，在10号楼的楼道内，工人王松林被“团派”扔出的手榴弹炸死。下午六点，撤至12号楼的工人潘志洪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工人张旭涛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晚上 10 点，9003 楼里的工人韩忠现被“团派”用长矛刺死，晚上 11 点，9003 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工人李文元。

1968 年 7 月 27 日这一天，工宣队有 5 人牺牲，特重伤 20 多人，较重伤有一百多人，轻伤有几百人。】

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居然敢打死中央派去的工宣队，毛泽东感到不能不采取强硬措施了。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两点多，尚未入睡的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当毛泽东得知清华大学发生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

毛泽东马上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开会。毛泽东在听取情况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他们是北京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也是全部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这天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五个半小时。据“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回忆说：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过去哪次都不同。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过去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可是这次我们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治总理后面向里走，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谢富治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33)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江青、林彪夫人叶群、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

毛主席说：“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就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

……

毛主席说：“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武斗工事统统去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

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34)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毛主席说：“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了我们这些人，天就会掉下来了。”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

……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的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

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35)

蒯大富对毛泽东这次接见回忆说：【我进门一看，一屋子的人，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

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主席接见我，也就是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握握手，就没有其它的了。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

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那真正是告御状。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把我们的人抓走了好多。”

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不抓人，不打人。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就抓人，就打人。”

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

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

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

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什么大伤。

我以后知道，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武斗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上，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毛泽东这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上宣告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

(36)

蒯大富回忆说毛泽东哭了，哗哗直流眼泪，这次毛泽东真的是伤心至极了。蒯大富是毛泽东期待最大的革命小将，恰好是两年前的 1966 年 7 月 29 日，毛泽东亲自点名被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来参加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次大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席群众大会并讲话，刘少奇对众人说：【至于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晓得。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说：【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毛泽东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捡拾，毛泽东已到了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两年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神采轩昂；可是两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却在人民大会堂伤心地眼泪直流。这似乎是应了当时刘少奇的话“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我也不晓得，中央其他同志也不晓得。”现在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晓得了。

毛泽东从 1927 年上井冈山开始，历经各种艰难曲折，遭受各种失败挫折，但每次毛泽东在遇到挫折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都能化险为夷。可是这次，毛泽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因为他无法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敢于跟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敢于发动全国全面夺权的踢开党委闹革

命，毛泽东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寄托在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身上，毛泽东相信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可是这次，毛泽东寄予无限期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了一点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双方就大打出手。虽说武斗的规模越搞越大，但武斗的性质却越来越低级，越来越不是为了主义和信仰去斗争，而单纯是为了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和利益去斗争。造反派的这种出于派性恩怨利益的武斗，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群众对他们越来越反感。

造反派的失去人心，就是毛泽东的失去人心；造反派的失败，也就是毛泽东的失败。对此，毛泽东怎能不伤心呢？在1968年5月，毛泽东发起了最后一次挽救造反派的运动，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

(37)

毛泽东对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原因，总想不通。196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时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呢？我就想不通。这一定是有人操纵。第一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总是好的，群众组织之所以出现的大规模武斗，一定是受到了坏人的操纵和挑拨。那么坏人是谁呢？第一个嫌疑人是走资派；第二个嫌疑人是旧社会残余的地、富、反、坏、右；第三个嫌疑人是群众头脑中的小集团主义思潮。

到1967年12月，毛泽东逐渐把煽动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嫌疑人，集中在“地、富、反、坏、右”身上。在12月18日会见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毛泽东谈话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

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他们这些人就是武斗的幕后指挥。】

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民日报》在1968年4月10日的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看法。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认为文革之所以陷入武斗的泥潭，是因为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地主、富农等被剥夺财产，仇视社会主义的坏人，在背后煽动捣鬼，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1968年5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几个问题的通知》，此后，就在全中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的对象，主要是清查解放前有历史问题的人，特别是清查国民党特务。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38)

这次“清队”运动的高潮，是康生指控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国民党特务，并指控云南有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声称云南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就是赵健民一伙“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煽动起来的。为此，赵健民被逮捕，数万人被牵连。

毛泽东本想通过“清队”运动，把在背后煽动挑拨群众武斗的坏人揪出来，这样一来，群众组织的武斗就会结束。可是事实又打破了毛泽东的期待，搞“清队”运动对停止武斗毫无帮助。相反，“清队”运动却走上了扩大化的老路，据说全国一下子揪出来几十万名国民党特务。

揪出这么多国民党特务，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了，他不得不对这场运动泼冷水和刹车了。毛泽东说：【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搞逼供信，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于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

毛泽东又说：【投降过国民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打 AB 团，福建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抓改组派，说明当时我们是不成熟的。后来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在毛泽东的刹车下，“清队”在几个月之后就停了下来，但已经制造出不少冤案，不少人受到迫害。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挽救造反派的最后努力，“清队”运动无效后，毛泽东不得不把红卫兵和造反派，彻底推下历史的舞台。1966年，毛泽东亲自接见1100万红卫兵，是毛泽东把这些红卫兵小将亲手推上历史的舞台，在中国掀起

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可是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又要亲手把红卫兵小将们推下历史舞台,这个悲剧性已经超出了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又怎能不让毛泽东落泪呢。

要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可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呀。现在毛泽东亲手拿掉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那他的文革又靠谁来搞呢?又怎么搞下去呢?

(39)

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对文革小组成员发誓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了吗?显然没有搞到底。是什么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呢?

毛泽东在1966年的天安门城楼上,之所以说这样悲壮的话,是因为他当时把党内的反对势力想象得十分强大。可是事实上,党内的反对势力并没有毛泽东想象的那么强大,他们的抵抗都是有限的。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党内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而是毛泽东自己搞文革的主力军: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越来越不得人心。

1968年8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10天之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也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这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

前面提到,聂元梓回忆说:她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去北京大学制止武斗,过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动手就打,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头上打出一个包,聂元梓被匕

首扎伤。

什么样的人会对两个赤手空拳的人见面就打?按照常识考虑，肯定是流氓团伙，黑社会组织才会这样不讲起码的文明，专靠使用暴力。现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文明程度，居然堕落到与流氓团伙一样，他们又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更厉害了，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扔手榴弹，这简直就是土匪团伙干的事情。

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毛泽东想尽各种方法，试图把红卫兵和造反派从堕落的道路上挽救回来。可是现在红卫兵造反派堕落到了土匪的地步，无法再挽救了，毛泽东只得挥泪斩马谕，亲手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

毛泽东曾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无限的期望，说：【你们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之所以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这么大的希望，第一个原因是年轻人敢想敢干，敢于造反;第二原因更重要，就是毛泽东认为年轻的一代，比他们老的一代人思想觉悟更高。

(40)

毛泽东等老干部这一代人，学生时代根本没有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受的都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毛泽东谈到他年轻的时候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包括在中学读了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而解放后的年轻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雷锋，培养共产主义觉悟。毛泽东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受到过剥削阶级思想的污染，比较单纯，共产主义觉悟更高。这一代新人，正是毛泽东亲手培养出来

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给予无比的希望，认为由这些共产主义新人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要大大高于他们当年上井冈山的水平，一定会很好地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任务。可是事与愿违，毛泽东培养出来的这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思想觉悟居然还不如井冈山的老一代。

有人说：“文革把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搞坏了。”严格地讲，这句话并不正确。中国人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发生在文革之前，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说：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与旧思想和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就开始引进苏联式的教育体制，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纯粹的舶来品，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孝礼义”那一套思想道德，就不得不抛弃了。

“道德”这个东西的核心，就是对“自私自利”私心的克制。不管古今中外，所谓道德高尚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私心比较少的人，这是全世界通用和公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歌颂“自私自利”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是反对“自私自利”的。比如说儒家的核心思想“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翻译成现在汉语，就是：只有克服和遏制自己的私心杂念，才能恢复到周朝时代的良好社会道德风气。

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更是号召人们“大公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从体制到方法都有较大的问题，使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是流于形式，而并没有真正培养起“大公无私”

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邯郸学步”，说古代有一个人，看到赵国都城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很美，于是就学邯郸人的走路方式，结果邯郸人的走路方式没有学会，反而把自己过去的走路方法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用“邯郸学步”的寓言来形容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41)

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新的共产主义道德没有培养起来，而旧的传统儒家道德也忘掉了，结果就造成道德的严重缺失。因此，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出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自私自利”心态，甚至比旧中国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还要严重。

毛泽东曾说：【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我父亲不得人心，我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可见在旧中国，还是有一些像毛泽东母亲那样私心比较少的人，而到了新中国，私心重的人反而更多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武斗不止，就是私心太重的表现。大家出于私心，都要争当“核心”，结果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派性武斗，其实与北洋军阀时代的军阀混战，性质是一样的。北洋军阀就是因为私心太重，大家都想争当国家领导人，结果就成了混战一场的“春秋无义战”。

在中共内部，也一直存在着斗争。在红军时代，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发生过斗争，但大家一边斗争，一边还是以大局为重，相互克制忍让，个人服从大局，不让斗争发展成“武斗”。如果中共在井冈山时代就出现内部武

斗，那么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去围剿，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

毛泽东这一批在剥削阶级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人，还能做到顾全大局，克己复礼。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一批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思想觉悟居然比他们在井冈山时期的觉悟还要低。简直可以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清华大学武斗之后，毛泽东也觉得红卫兵不行了，他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现在这批红卫兵大闹之后，已经闹得心“野”了，再让他们安心下来读书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这批心“野”了的红卫兵，继续留在大城市里，就等于留下一批闹事的火种，所以必须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才能把局势彻底稳定下来。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也得有一个方法，于是毛泽东就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然，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也就是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也有思想上的考虑。因为毛泽东从文革中发现这批知识青年的私心太重，有必要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一下再教育。于是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第二十二节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

(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1969年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所谓“知识青年”指的是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学生,按现在的标准看起来,中学文化水平算不上“有知识”。不过在1969年的时候,农村的文化水平还较低,有初中文化就算是“有知识”了,所以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红卫兵的主体,也就是1966、1967、1968年这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所谓“插队落户”,也就是这些城市青年的户口,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安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农民。

在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队落户之后,以后每年又陆续有一些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前后共有约1600万知青到农村插队,直到1977年才停止。考虑到当时城市人口一亿多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知青”下乡。

毛泽东本来的文革战略部署中,本来并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是在特殊情况下,临时出台的应急之策,最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考虑。在“造反有理”气氛中熏陶出来的红卫兵,已经变得非常不安分,把这些人留在城市中,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要把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从而就消除了红卫兵不听指挥,继续造反的隐患。

很显然，当时如果不把红卫兵们送到农村中去化整为零，他们在城市中闹事起来，而且谁的话也不听，那就只能动用军队开枪镇压了。毛泽东让红卫兵“上山下乡”，避免了最坏的情况，这就是军队向群众开枪。当然“上山下乡”运动也有经济上的意义：文革后很多工厂处于停工停顿状态，很难接受这么一大批人就业，所以就把他们安排去农村就业，也就是务农。

由于当时城乡生活差别很大，特别是大城市的知青，到农村去以后，发现那里的物质生活远不如城市，于是产生一种被“欺骗利用”的感觉。他们对毛泽东搞的文革，以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毛泽东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自己被毛泽东当成工具利用了，用完后就廉价处理了。这些知青成为中国第一批反毛泽东的人，对毛泽东怨言极大，认为他们的青春被毛泽东耽误了。

## (2)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也无可奈何。所谓“点火容易灭火难”，文革这把“造反有理”的大火点起来了，不把这批红卫兵送到农村去，造反之火就熄灭不下来。为了安抚下乡的红卫兵，后来毛泽东又放松了插队落户的条文，从1971年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顶职、病退、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其实知青真正在农村务农，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之后，这些人多半成为学校教师、赤脚医生、公社文书、农机修理工等，脱离了直接的农业劳动。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不那么艰苦了。中小城镇的招工，也都优先安排知青当工人。

然而，这批知青的人数极大，再加上知青的家长，几乎半数以上城市居民，都对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政策非常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次被人民所不满。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无形中大大降低了，因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伤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夺权的文革”已经结束，“整党的文革”开始了。我们可以把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前的文革，称为第一场文革，也就是“夺权的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的文革，称为第二场文革，也就是“整党的文革”。

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它是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取党政军各领域“当权派”的权力。但“夺权的文革”只是把刘少奇的权夺过来了，周恩来和林彪的权都没有夺过来，因此这场“夺权的文革”失败了。毛泽东最后遣散红卫兵，就意味着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彻底结束。

虽说毛泽东全面夺权的“夺权的文革”失败了，但它也大大削弱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有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搞文革的话，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整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因此，毛泽东趁着这个机会，又发起了第二场“整党的文革”，这可以说是对第一场文革失败的补救。

关于“整党的文革”，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它的目的是改组和改造中共。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共已经变成“暮气沉沉”的保守党，不想再革命了，不想再进取了。因此毛泽东要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并且认为只有“朝气蓬勃”的革命党，才能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

(3)

中共的“九大”，就是毛泽东搞“整党的文革”的开始。很多人说，中共“九大”是一次非常“不正常”的大会，这个说法是很中肯的。什么是“正常”呢？

“正常”就是跟过去差不多，变化不大。如果中共“九大”是“正常”的大会，那就说明“九大”跟过去差不多，还是老一套，那么毛泽东的大刀阔斧整党又体现在哪里呢？因此，“九大”的“不正常”，正是体现了毛泽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以及进行大力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后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是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当然也就没必要召开党中央全会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非常“不正常”的，它的不正常，首先表现在人事上。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95人，按照规则，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全体中央委员，应全部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可是这次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9人。在没有到会的136人中，除10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扩大”，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等74人都扩大了进来，使参会人数达到133人。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九大”的预备会议，在开幕式上，周恩来率先讲话说：  
【今天开的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周恩来接着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九大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修改党章草案的讨论；(三)专案审查报告，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周恩来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大概开七天

到十天，大家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对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

毛泽东先把最关键的致命话题端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些是：（一）这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正确？（二）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不该搞？（三）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四）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毛泽东先把最关键的致命话题端出来，显示了毛泽东的一种策略，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4）

与两年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比，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十一中全会两年多之后开的。但以我的感受来说，两次全会的政治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紧张、恐惧；八届十二中全会是：轻松，踏实。这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是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有。】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把文革看成是 1930 年中央苏区的“肃反”一样，我当时已经准备随时被关起来，后来我考虑到的问题都成了现实。但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我的疑虑基本上都消除了。】

邱会作说出参加这次大会绝大部分老干部的心里话。在 1966 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老干部们人人自危，不知道这场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牵连进去。可是 1968 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搞文革的武器

“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被遣散了，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的噩梦，已经不再可能出现，老干部们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于是大家的心情就轻松愉快下来。

大家的心情轻松下来，就可能会出现“畅所欲言”的情况，而这种“畅所欲言”往往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的上半阶段，大家心情很好，会上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心情很好，畅所欲言，结果就出现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毛泽东要吸取以往的教训，警惕这次会议上大家“心情很好”状况，所以他要在这开幕式上提醒大家：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什么是不该说的话呢？这就是毛泽东端出来的关于文革的四个致命话题：（一）文革正确不正确？（二）文革该不该搞？（三）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四）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按照中共的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都要总结上一次全会到这次全会之间的工作情况。从上一次1966年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到这次1968年10月召开的十二中全会之间，党中央的主要工作和任务就是搞文革。因此按照惯例，应该在这次全会上，对这两年搞文革的情况做出一个总结和评价。

可是要对这两年的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就很难不涉及到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这四个话题中的任何一个话题，一旦讨论起来，都很有可能引发否定文革的论调。现在毛泽东的文革是处于受挫折的低谷阶段，不过毛泽东是不认输的，他要进行各种努力，把文革继续搞下去。而在低估和挫折阶段，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内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说什么“文革不该搞”、“文革缺点很多”、“文革搞不下去了”。如果党内这种否定文革的论调泛滥起来，毛泽东的文革就真的搞不下去了。因此，毛泽东必须事先制止否定的文革议论。

(5)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就巧妙地先发制人，先把这四个致命话题讲出来，主动提出大家来“议论一下”。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反话”，他口头上让大家来“议论一下”，其实上是在提醒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因为毛泽东又不可能用“大白话”告诉大家：“这四个话题你们最好不要议论。”

果然，一些悟性好的高官，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是不要议论这四个致命的话题；而那些悟性不太好的高官，不明白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就去向那些悟性好的高官请教，于是很快大家都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不要议论毛泽东说的四个话题，不要与毛泽东“过不去”。果然，这次大会上，谁也没有议论上述四个致命的话题，避免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

不过，大家都不对文革进行评价，这次大会上不对文革做出一个总结，也是说不过去的。然而，毛泽东本人来对文革进行评价，不免让人感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所以，这次对文革进行评价的重任，又落到林彪身上。这就像1962年刘少奇挑战毛泽东，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后，林彪出面讲话，帮毛泽东回答刘少奇的问题。这次，林彪再次出来，帮毛泽东对文革做出总结。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表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专门对文革进行总结和评价。林彪说：【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我就只能讲个大概。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第三个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林彪这里代替毛泽东，回答上述四个话题：(一)文革正确不正确？(二)文革该

不该搞?(三)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四)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关于“文革该不该搞”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必要性，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然的话，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要知道，革命当然不是那么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价，遭受一些牺牲，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我们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这种牺牲，比复辟以后我们所遭受的牺牲，这两者对比起来，那复辟以后我们要遭受更大、更残酷、更大规模的牺牲，那个痛苦就大大地超过了现在我们主动地革命所付出的这种代价。】

(6)

【这次文化大革命，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流血的国内战争。他们复辟，那人民一定还要反复辟，就要发生内战。这种内战的损失，一定会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看到的那些损失。所以，现在这些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林彪阐述搞文革的必要性，他的论点是：如果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一旦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要“反复辟”，中国就会发生内战。而一旦发生内战，那么付出的牺牲就会更大。搞文革就等于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内战，与大规模内战相比，文革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文革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意义，林彪说：【在我看，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文化革命是希腊、罗马的古

典文化，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世界第二次文化革命是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

【这三次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如果同中国这一次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它们的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最广泛的，最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林彪用世界历史来举例说明，把文革说成是超过人类历史任何一次的文化革命。这也就是说，文革的是无比正确的，对人类历史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文革的成绩主要，还是缺点主要”的问题，也就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林彪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老干部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们学会了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这一点是重大的胜利。】

【除老干部以外，整个七亿人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也是对群众最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群众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才能识别什么叫修正主义，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才不会被冒牌的社会主义所欺骗，可以说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获之一。】

【军队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学了阶级斗争、学了群众路线，把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地提高。】

【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苏联这些国家，他们一心一意地只搞物质的建设，而不过问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宣传马列主义，一味地搞物质刺激。我们的做法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第二点。】

(7)

【我过去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这种损失，与它所得到的胜利来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局部的暂时的损失，迷失方向，就怀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个“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由于这种错误，所以他们才有许许多多的糊涂的想法，错误的想法。】

林彪总结文革的胜利成果：(一)老干部受到了教育，学会了继续革命；(二)群众普及了毛泽东思想；(三)军队也受到了教育；(四)文化上的革命，必然带动经济上的革命，也就是后来说的“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五)文革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二月逆流”的错误，就是只看到暂时局部的损失，没有看到长远整体的胜利。

关于“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的问题，林彪说：【毛主席是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在1924年就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四岁；斯大林在前一阶段是有功绩的，但他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全面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林彪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这个新理论指导的有力武器，文革就一定能搞到底。

林彪的这次讲话，是代表参加这次全会的全体人员，对这两年来文革工作进行的总结。林彪从各方面全面地肯定了文革，而且把文革说得近似于完美。林

彪以党内第二把手的身份说这样的话，就压住了否定文革论调的出现。如果林彪也像当年刘少奇一样，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一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讲话，对文革表示怀疑，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法再搞下去了。

虽然林彪的这次讲话是空话大话连篇，但他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能把文革总结到这个地步，也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怎么说，这次林彪又帮了毛泽东一个大忙。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林彪对文革进行了总结之后，其他参会的人们，就不必再对文革的问题进行讨论了，但这次全会上不讨论文革，大家难免陷入无话题可说的尴尬地步。为此，毛泽东给大家带来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把刘少奇开除出党的问题，第二个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

(8)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在人事方面。两年前的十一届全会上，中共高层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人事变动，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在这次十二中全会之前，很多高官已经被打倒了，或者靠边站了，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全会将进行非常重大的人事变动。可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却再次出人意外，这次全会没有提及人事的变动，甚至没有提出人们最为期待的“党内地位排名顺序”。

中国的体制是仿照苏联的“人民政府”体制，与传统的封建君王体制或资本主义民主体制，都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高低次序。外国的政府高官：总统、总理、国务卿等的行政地位，都由法律明文规定。但中国的体制却不一样，比如中国最高的四个职位：党

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他们在法律上都是平级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

为了弥补政府高官的地位模糊问题，中共另外制定一套“党内地位排名顺序”，来明确政府高官的地位顺序。在每次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都要公表一个最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排名顺序，来明确每个官员的高低地位。按照中共的纪律，政治局排名低的人，要接受政治局排名高的人的领导，这与他们担任的行政职务和级别的高低无关。

比如林彪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周恩来的行政职务是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朱德的行政职务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尽管周恩来和朱德的行政职务都高于林彪，但在党内的排名，林彪排第二位，周恩来排第三位，朱德排第九位，所以周恩来和朱德都要反过来接受林彪的领导。因此，看中国的政治，仅仅看官员的行政级别是不行的，更要看他在党内的地位排名。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非常明确的，十一位常委排名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明确打倒了的，剩下的八名常委，他们的排名顺序是什么呢？这次大会上完全没有提到和说明。

到了1969年的中共“九大”，选出政治局常委五人，可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其他三人没有排名。当时的公报是这样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这样一来，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人就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了。

(9)

这种取消“党内地位排名”的新体制，也是毛泽东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

方面。毛泽东的本意是，取消党内地位的排名，可以让大家减少为了争排名的内讧。但事与愿违，这种不分排名的体制，反而造成权力和责任分不清。因为没有排名，高官们相互不服气，更加不团结了，特别是引起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严重内讧，继而引发林彪出逃的政治灾难。因此，在 1973 年的中共“十大”上，毛泽东又重新恢复了“党内地位排名”的体制。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回过头来说 1968 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人们对八届十二中全会期待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对犯了错误官员的处分。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被明确打倒了，应该给予明确的处分。在 1959 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等人做出明确的处分，该会议公报说：  
【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 4 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然而，这次全会对邓小平和陶铸的处分，又让人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还出现了意见分歧。林彪的意见是不仅要严厉处分刘少奇，还要处分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和贺龙，但毛泽东却不同意。林彪在这次全会上讲话的最后说：【我的讲话到这里为止，最后有几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打倒彭德怀、贺龙!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的口号，也是代表林彪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这五个人，但毛泽东却表示另外的意见。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毛泽东这里说的“大家要开除他”，这个“大家”中带头的就是林彪。不过这次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并没有造成大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这次大会没有对邓小平问题的作出结论，只是对邓小平继续进行“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是伸缩性非常大的，等于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当成是犯罪嫌疑人，最后审查的结果，既可能是有罪，也可能是无罪。同样，毛泽东对陶铸和贺龙也没有做出“有罪”的结论，也只是继续“隔离审查”。至于彭德怀，虽说早在1959年已经给予了撤职的行政处分，但并没有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10)

毛泽东为什么不对邓小平等人开除党籍呢？因为毛泽东在经历了“夺权的文革”失败之后，他已经预感到下一场“整党的文革”将是一场硬仗，绝非那么容易取胜。因此毛泽东要保留一些预备力量，以备应急时用。如果开除了邓小平等人的党籍，那么今后就无法再启用邓小平了。这时，毛泽东已经把邓小平、陶铸和贺龙等人，留下来当作应急的预备队。陶铸和贺龙如果不是因病死于文革期间，后来也很可能重新复出的。看来，一个人政治生命，也取决于由“天命”这个东西规定的寿命。

文革开始后，那些被“打倒”的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党内受到的都是“隔

离审查”的处分。为了搞清这些被“隔离审查”的干部，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中央成立了“专案调查组”，全方位地彻底审查这些被“隔离审查”高官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中央先后成立了 10 多个专案组，比如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邓小平专案组，陶铸专案组，陆定一专案组，张闻天专案组，彭真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

这些专案组，除了刘少奇专案组得出结论之外，大部分专案组都没有得出结论，有的专案组虽然得出了结论，但没有被中央通过。比如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

但中央没有批准彭德怀专案组的这个结论，所以彭德怀一直到 1974 年病逝，也还是处于“隔离审查”状态，没有对他的问题做出结论。彭德怀始终没有被开除党籍，更没有被判刑。

刘少奇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后来林彪等人死后被开除党籍，性质是追溯，与刘少奇不同。1968 年 10 月 18 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刘少奇专案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决定：【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这里对刘少奇的处分，只是开除党籍，并没有对刘少奇判刑，也没有剥夺刘少奇的政治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只有被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才是罪犯。而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仍然算人民内部矛盾，不算敌我矛盾。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虽然是铺天盖地大批判了一通，但最后的处分，还算是手下留情的，

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没有对刘少奇判处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力。后来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人，都受到了判刑处分。

(11)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刘少奇的叛徒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参会的人每人发一袋《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其中一份长达74页的材料名字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主要是揭发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被捕的“叛变”情况。

现在主流的说法是：刘少奇的这份“罪证”材料完全是诬陷。不过事实也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历史都不会是绝对清白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光彩的和不愿意公开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大人物，当他们在位的时候，人们不敢讲他的坏话，可是一旦倒台，墙倒众人推，各种各样的不光彩事情就被人们揭发出来曝光了。这种揭发材料，里面固然有诬陷的东西，但也有真实的东西。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蒋介石时代的国策第一条就是“反共”，当时加入共产党本身就是极大的罪过，有关共产党的案子都是重案。据说蒋介石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因此共产党员一旦被捕，要想出狱，绝对没那么容易。

一般来说，被捕的共产党员要想出狱，只有三条路：(一)叛变，(二)写悔过书宣布脱党，(三)被党组织营救出来。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敌人不知道该人是共产党员，被当成错抓的人释放。

刘少奇三次被捕，而又轻而易举地出狱了，这就难免不让人产生怀疑，刘少奇是怎么出狱的呢？刘少奇在自己的履历书中，关于他出狱的说法是：因为敌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把他关了一阵就放了。但刘少奇的说法，疑点也很多，特

别是关于 1929 年的那次被捕。

刘少奇自己写的《简历》说：【1929 年，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后来，刘少奇自己又改了这  
个《简历》，改为：【1929 年，在罢工中逮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  
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

刘少奇自己修改的自己简历，是一个疑点。按照刘少奇修改前的说法，他是  
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如果是叛徒出卖，那么敌人就已经知道刘少奇的共产党员  
身份了，又怎么会轻易把他放出来呢？所以刘少奇后来自己也感到不妥，就把“被  
叛徒出卖”，改为“在罢工中”，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了。但刘少奇对自己《简历》  
的修改，反而让人感到有欲盖弥彰的嫌疑。

鉴于这些疑点，毛泽东早就对刘少奇被捕产生过怀疑，1953 年，毛泽东  
秘密让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查一下伪满政府的档案资料中，关于刘少  
奇被捕的情况。

(12)

据“高岗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张秀山回忆说：【1953 年初，高岗对我说，  
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 1929 年在沈阳被捕的情况，要我去  
组织落实。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  
对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材料的印象。这件  
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  
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有些人因此说，毛泽东在 1953 年就开始“整”刘少奇的黑材料了，这个说  
法并不合理。因为在 1953 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毛泽东之

所以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应该是出于一种想知道真相的好奇心。另外对于一个政党的领袖，也有必要了解清楚自己部下的真实情况。虽说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是非常信任的，但他也想搞清一个长时间隐藏在心中的疑问：刘少奇到底叛变过没有？

以前毛泽东没有机会知道这个秘密，现在缴获了伪满政府的档案，就可以查出刘少奇被捕时的真相了。然而，高岗却误解了毛泽东的动机，以为毛泽东秘密查刘少奇的档案，是想“整”刘少奇。于是高岗开始大肆进行搬倒刘少奇的活动，结果没有搬到刘少奇，高岗自己却倒台了。不过，如果高岗没有自杀，到文革时，他是第一个反对刘少奇的人，应该可以作为“反刘英雄”复出了。

高岗当年查出了刘少奇什么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文革中，公布出刘少奇的很多“叛变”罪证。刘少奇专案组还找了一些当时跟刘少奇一起工作的原中共党员，揭发刘少奇叛变的情况。特别是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孟用潜的揭发，特别具有杀伤力。

孟用潜的揭发供词说：【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沈阳)纱厂开支部会，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以及满洲省委委员丁基实等人。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

【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刘少奇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他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

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是当作煽动工潮案审讯，当作是一个工潮案，而不是共产党案。最后刘少奇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

(13)

除了孟用潜的揭发材料，还有与刘少奇一同被捕的原中共党员丁基实、成柱周，以及当时参与过审讯刘少奇的伪满警察刘多荃等人的供词。按照当时中央专案组提供的材料来看，刘少奇的叛徒案，似乎是“铁证如山”。据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

【给刘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为“叛徒、内奸、工贼”。关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的问题，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岗去调查，结果给高岗惹下致命的麻烦。现在，叛徒的帽子给刘少奇直接扣上了。全会对刘少奇进行了认真揭发批判，印发了大量审查材料。那些材料，极大多数有时间、地点、事实真相、并有旁证材料和实物照片。当时，对这些材料本身是没有不信的理由的。】

【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对当时的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对当时的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者全部推翻。但不管怎样，决不能说刘少奇的材料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捏造的。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使别人对我们党的公信程度有质疑。】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是“靠边站阶段”，从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在这个阶段，刘少奇虽然失去了权力，但仍然享受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仍可以自由行动。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与刘少奇见面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二个“批判阶段”，这个阶段从1967

年1月到1967年6月。

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大约1967年1月16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在刘少奇与毛泽东1月13日见面的三天后，刘少奇的电话就被拆除了。前文分析过，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次见面的态度很不满，最后下决心彻底打倒刘少奇。1967年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掀起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据王光美回忆说：【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14)

在这个对刘少奇的“批判阶段”中，还对王光美进行公开批斗。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三个孩子作了遗

嘱。

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在这个“批判阶段”中，虽然报刊上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对王光美进行批斗，但还没有发生对刘少奇本人的直接批斗，刘少奇也还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到1967年7月，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三个“批斗阶段”，就开始对刘少奇本人直接批斗了，这个阶段是从1967年7月到9月。

王光美回忆说：【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

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

也站起身，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15)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百、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9月13日凌晨，我住的福祿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

1967年9月王光美被逮捕后，对刘少奇的处分进入第四个“隔离审查阶段”。此后不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了，只是把刘少奇隔离软禁在家里，由刘少奇专案组来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刘少奇被“隔离审查”半年后，到1968年4月，刘少

奇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站立不稳等症状;7月出现严重病情,经抢救后脱险。

1968年10月,刘少奇的审查结果出来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这个审查结果,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此后,对刘少奇的处理进入第五个“削官为民阶段”。此时刘少奇被撤销一切职务,被开除出党,变成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了,但也不算是罪人。按照中国古代的标准,对刘少奇的处分就是“削官为民,永不录用”。这在中国古代,也算比较轻的处分,重的处分是杀头,处刑,流放。

刘少奇“削官为民”之后,按道理他应该离开中央,到民间去自力生活。但从1968年10月以后,刘少奇已经完全不能自行进食了,全靠鼻饲维持生命,因此他也无法自力生活,只能继续住院。刘少奇就这样靠鼻饲生活了一年,到1969年10月17日,作为中央战备疏散计划,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疏散到河南开封。到开封后刘少奇的病情加重,11月12日在开封去世,终年71岁。

有一些传闻说:刘少奇生病后无人照看,去世时白发一尺长等等,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刘少奇从1968年10月就已经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了,如果无人照看,是不可能再活1年多的。应该说,刘少奇并不是被故意“害死”的。

(16)

除了揭批刘少奇之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第二个重点讨论话题,是批判“二月逆流”。本来“二月逆流”是发生在1967年2月的事,已经过去1年半多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来批判呢?这里反映出毛泽东对参加“二月逆流”闹事的“三老四帅”的不放心。

毛泽东知道陈毅这些人都是胆子大的，敢说话的，在 1967 年 2 月红卫兵造反派兵临城下，对他们磨刀霍霍的时候，他们都敢跳出来“放炮”。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遣散，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他们讲起话来就更无所顾忌了。这次参会的老干部们，绝大多数对文革都有很大不满，如果陈毅等人带头挑起批评或者质疑文革的话题，众人跟着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么情况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在“二月逆流”闹过事的“三老四帅”，是这次会议的最大危险分子。对此，毛泽东的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方法是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第二个方法是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但把他们的嘴堵住，不让他们放肆地讲话。

第一个方法显然是下策，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三老四帅”参加会议，硬不让他们来开会，反而会损害毛泽东自己在党内的威信。所以，毛泽东只能采取第二个方法，先发制人，用批判“二月逆流”的作为理由，使“三老四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样他们就无法放肆地说话了。用批判“二月逆流”来堵住陈毅等人对文革的批评，可谓毛泽东的一个高招。

从事后来看，毛泽东对陈毅等人的防范，还是有必要的。在两年后 1970 年 8 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与林彪发生正面冲突的关键时刻，陈毅果然跳出来“放炮”，声称：“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后来，又把陈毅和陈伯达一起批判，称为“二陈合流”。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话题。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准备“九大”而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帅”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江青等人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三老四帅”们过关，出席“九

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17)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做出认真的检讨。”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这次批判“二月逆流”不是毛泽东直接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中央文革的建议，这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如果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成为毛泽东的指示，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毛泽东就要与“三老四帅”的关系紧张起来。而批判“二月逆流”由中央文革提出来，毛泽东只是附和一下，那么批判“二月逆流”就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了，这样毛泽东就可以避开与“三老四帅”关系紧张，可以作为第三者来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件事。

毛泽东唯独不让“三老四帅”中的谭震林来开会，是毛泽东对谭震林公开扬言“我不跟毛主席了”的惩罚。另外，这次除了批“三老四帅”之外，还要批朱德，也是因为毛泽东怕朱德在会上挑起否定文革的话题，批一下朱德，就可以把朱德的嘴堵住，保证这次会上不会出现否定文革的论调。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这次全会批判“二月逆流”是一个重点，大家发言都很积极，被批判的人也都承认，自己骂自己，骂得狗血

喷头。尤其几个元帅，他们批判自己，甚至比批判他们的人调子还高。总理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头戏，他挨个批判这些老同志，尤其是几个元帅，总理批的很厉害，也很具体。】

周恩来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心情也是轻松的，现在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老干部们都保住了，至少是他们的肉体生命不再有危险了。保住老干部是周恩来的胜利，这些现存的老干部，都在心里感谢周恩来，这使得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比在文革前飞跃了一大步。

在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上，周恩来并没有反对。因为这次批判“二月逆流”，是在党内“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红卫兵的揪斗相比，那根本不算是什么事情。

(18)

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上的哲学是避免斗争，折衷主义，他知道“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的时候得罪过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已经停止夺权了，大家已经都安全了。所以此时让毛泽东批判一下“三老四帅”，出一出气，大家又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因此，周恩来不仅没有反对批“二月逆流”，而且还动员“三老四帅”认真检讨一下，让毛泽东高兴，把这件事情淡忘过去。周恩来自己也发言批判“三老四帅”，甚至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这也是为了让毛泽东高兴。大家忘掉过去的愉快，重新团结起来。

林彪在这次会上也对“二月逆流”狠狠批判了一下，因为这是毛泽东的部署，林彪当然要跟着执行了。不过林彪的批判，就像古代衙门里打人的差役，把打人的棍子举得很高，但打下去并不重，这是打给别人看的。林彪在讲话中说：

【主席原定在1967年3、4月份文革“见眉目”的打算，由于“二月逆流”

的出现，使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二月逆流”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全国革命群众都声讨这个“二月逆流”。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又严肃地清算和批判“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会要流产的。】

林彪说：“二月逆流”破坏了毛泽东原定在1967年3、4月文革“见眉目”的打算，这点林彪是看得很准的。林彪又说：这次全会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就会流产，这点林彪看得也很准。这次会议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陈毅等人来一个否定文革的“放炮”，引发高官们的共鸣，那么文革就要流产了。

林彪尽管给“二月逆流”帽子戴得很高，但打下去的手并不重。林彪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以外，他们同彭德怀、贺龙那还有点区别。他们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宽大为怀，是允许他们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是，对他们一方面要严肃地批，但是还要“保”，并且希望选他们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保”，就轻松起来，就把尾巴翘起来，而坚持错误不改。】

林彪明确把谭震林以外“二月逆流”几个人称为“老同志”，明确把他们与彭德怀和贺龙区别开。在林彪看来，彭德怀和贺龙是一定要打倒的。林彪还明确肯定，要把“二月逆流”的几个人选为“九大”代表。

(19)

至于参加“二月逆流”几个老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林彪也进行了分析，他说：【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革命的时候，他们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不积极了，就消极了，以至于转到反对了。因为过去的民主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说来，在某些方面是没有民主革命

那么的舒服，对于他们的利益，他觉得是受了损失。因此，他们就从革命的老战士、老战友，而变成反对革命继续前进的角色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好地作为教训的。】

林彪对“二月逆流”原因的分析，应该说还是很深刻的，抓住了问题的要点。

周恩来以为这次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只是狠狠批评一下，出一口气，就完事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在这里还留了一个后手，让周恩来在后来的“九大”上栽了一个跟头。

据吴法宪回忆说：【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并且登在了《简报》上。】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账”。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出来了。彻底算这些同志的历史老账，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彻底揭发陈毅等人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而且陈毅等人

自己也都承认了，周恩来也承认对陈毅等人的批判是正确的。而且，这些揭发批判材料，都白纸黑字地印在会议的《简报》上。陈毅等人“认罪过关”后，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九大”。但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陈毅、李富春等人的历史问题严重，而且这些历史问题陈毅等人自己也承认了，周恩来也同意了，所以陈毅等人不能当选政治局委员。

(20)

这下让周恩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周恩来本人也批评过陈毅的历史问题，陈毅本人也承认，这些都白纸黑字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上。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把当时随便批判一下的材料“当真”了。对于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当政治局委员，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周恩来找不出理由反驳。结果在“九大”上，陈毅等人只当选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使周恩来的势力大损，这些是后话了。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发言说：【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林彪同志讲了那么多，同志们也都讲了很多。这一次会呀，我看是开得还可以，开得好嘛。】

【“二月逆流”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公开讲的，大闹就是公开讲嘛。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对“二月逆流”表态。他对“二月逆流”参与者的批判是很轻的，甚至说“大闹”是“党的生活允许的”，这样就与江青等人对

“二月逆流”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拉开了距离，显出毛泽东的宽厚。

毛泽东又说：【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没有好人？在座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嘛。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贺龙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等人的揭发材料看来，贺龙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的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对于军队方面的老干部，毛泽东一方面肯定红四方面的干部，另一方面又否定了贺龙，公开说对贺龙“不保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应该主要是对林彪的让步，打倒贺龙让林彪满意。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康生等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准备在“九大”上继续批判。毛泽东对此表示说：【不要再批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样，“二月逆流”的问题终于结束了。

(21)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准备开始他的第二场文革：整党的文革。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力量，第一个当然是在文革中崛起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江青集团。可是单单靠江青集团的力量显然还不够，还需要林彪集团来配合，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可是毛泽东的整党还没有开始，后院就起火了。毛泽东搞整党依靠的两股力量：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出现了严重的内讧。

为什么会内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江青这个人，在于江青有野心，

想接毛泽东的班。人一旦有了野心，就不会安分守己，就忍不住要跳出来争夺权力，天下就不太平了。至于江青的野心，我们先看几个人的回忆片段。林彪“死党”之一的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头衔之外，什么都不是，但她已经以党内第三号人物自居了，把周总理根本不放在眼里。这个问题，在江青公开场合出现时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与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场合，江青与林彪并肩出场；凡是周总理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总理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小组单独出场，江青当然就是霸主的位置，总是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的人，要同她保持一段距离。

由于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在文革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可以与周恩来平起平坐了。江青也特别需要别人看到她与毛主席的亲密关系。在文艺晚会上，江青总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她想尽办法要走的与毛主席近一些。不能如愿，她有时就用毛巾去给毛主席擦擦鼻涕，整整衣服。】

林彪“死党”之一的李作鹏回忆说：【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 16 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上，江青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有好日子过。”江青又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后来毛泽东也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她是想叫王洪

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想接毛泽东的班，做党主席，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当然，江青也明白，自己要想做党主席，没有军权是不行的，所以她就想方设法伸手向林彪控制的军队抓权，结果引发了与林彪集团的严重冲突。

(22)

从事后的情况分析，江青伸手向军队抓权，应该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那时毛泽东急需林彪的帮助，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向林彪夺权，和林彪把关系搞糟。

江青向军队抓权，等于是夺林彪的权，当然引起林彪的强烈反弹。据李作鹏回忆说：【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随着她的地位的提高，她试图控制军队的野心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了，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

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我们防止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真的如同防止盗贼一样严格。】

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林彪集团在反江青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哪些是江青代表毛泽东，哪些是江青自己的私货。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就成为提供这种情报的重要人物。汪东兴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方便，向林彪提供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情报。据邱会作回忆说：【军委办事处与江青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和黄永胜时期。在杨成武时期，与江青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抵制江青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群又转手传到黄永胜那里。】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汪东兴似乎有点像林彪安插在毛泽东身边的间谍了，把毛泽东与江青之间的情报，在第一时间向林彪汇报。汪东兴为什么这么做呢？据吴法宪回忆说：

【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讷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

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汪东兴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23)

关于江青对汪东兴的态度，邱会作也回忆了一些细节，他说：【江青出席中央碰头会，从她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江青凡是进场见人先笑后说话，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里很高兴的表现；凡是进场后不说话，也不同大家握手，气冲冲地坐在那里，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的表现，对她必须提防，否则谁都可能遭灾；凡是坐下之后嘬着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毛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

骂人了。

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中央碰头会在钓鱼台16楼开会，我到会不久，江青来了。她入场的时候，全体人员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要起立以示迎接。护士给江青端来一杯开水和一包药，江青端起开水喝了一口，随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并大声说：“哎呀，不得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死我。你汪东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你心里有没有毛主席呀？”

我坐的比较远，也被扔茶杯的响声吓了一跳。在此情况下，汪东兴只好走到外面，叫护士给江青重端了一杯开水。开水送来之后，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江青这才息怒。】

邱会作还特别提到汪东兴对他们说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汪东兴家里长谈过两次，每次谈话都在5个小时以上，所谈的内容是天南地北，但中心是谈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据汪东兴说：“江青与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从汪东兴的谈话中，他让我们确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当时我们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无所顾忌了。现在看来，我们上了汪东兴的当，也可能是汪东兴出于对江青的不满，借助我们反对江青。】

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大胆地抵制江青，除了听信汪东兴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林彪态度的转变。据邱会作回忆说：【从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

林彪之所以对江青态度的变化，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以前江青是通过红

卫兵和造反派，间接地向林彪夺权，所以林彪也没有必要撕破脸直接跟江青斗。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没有了，江青直接伸手向林彪夺权，林彪就不能对江青再客气了。林彪怕自己手下的人，鉴于江青的特殊身份，不敢跟江青斗，就给他们壮胆说：毛泽东对江青也是公事公办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迁就江青了。

在林彪的支持下，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果然与江青勇敢斗争起来。这里摘录其中一件事。据吴法宪回忆说：【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

(24)

【待续】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1968年5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像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江青就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她心中极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

江青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

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江青就不让我俩参加

中央文革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江青这样赤裸裸地向军队插手，引发与林彪的关系紧张，毛泽东当然也不满意。毛泽东为此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江青出于个人野心，并不听毛泽东的话，还是背着毛泽东继续向林彪和军队伸手插手，造成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关系紧张。后来毛泽东与林彪彻底闹翻，江青不能说没有责任，这也是后来引发“九一三”事件的远因吧。

毛泽东对江青也是没有办法，他晚年提到江青，曾十分痛心地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我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来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25)

应该说毛泽东对江青并不满意，但江青在文革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如果毛泽东不用江青的话，那么谁能替代江青这个先锋呢？

陈伯达是个迂腐的书生，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根本不堪用。张春桥倒还是比较足智多谋，可是张春桥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老干部们。江青的资历虽说也浅，但她可以借助“毛夫人”的招牌，压住相当一部分人。

康生的资格虽然老，也相当足智多谋，但康生熟知党内斗争的深浅，在关键时刻不肯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打冲锋。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中，康生看到周恩来派的奋起，赶紧缩到一边不出头了。康生这样的人，毛泽东当然不能指望他出来当先锋的。

本来毛泽东曾想培养陶铸当先锋，没想到陶铸连几个月的考验都没有通过。陶铸想八面玲珑保住自己的地位，到处当好人，谁也不得罪，根本没有江青那种不怕得罪人的战斗精神。于是，毛泽东就陷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困境。尽管江青不理想，但毛泽东也还不得不用江青。

随着“九大”的临近，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第二次面临分配胜利成果的难题。第一次是1949年建国时的分配胜利成果，那次分配得很成功，没有引发大的不满和内讧。在这次召开“九大”时，一大批当权派的老干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出现许多权力的真空和职位的空缺，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权力重新分配，第二次分配胜利果实。这次毛泽东的分配胜利果实不太成功，留下很大的隐患，这是导致后来林彪事件的起始点。

按照常规，党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是一种党内地位的象征，历

来都是由第一把手或者第二把手来做。1945年“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亲自做的，1956年“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1969年“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1974年“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做的，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华国锋做的，1982年“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胡耀邦做的，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做的，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和2002年“十六大”的《政治报告》是江泽民做的，2007年“十七大”和2012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做的。

(26)

“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做，这是早就定好的。但是由党的第二把手做《政治报告》，有些内容不一定反应第一把手的意思，这在“八大”时就出过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后来听说主席说过，他在“八大”基本是一个闲人。像《政治报告》这样的文件，我们看见毛主席是在主席台上修改的。文件上原来写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毛主席不同意这种提法，修改之后，先给坐在右边的周总理看了，再给坐在左边的刘少奇看，周总理还在那个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时，印发了周总理的这个批注。】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给毛泽东看的《政治报告》草稿中，原先并没有这句话，是后来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这样的提法，所以在主席台上提出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阶级斗争”。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再次提到此事

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按照常理，既然让林彪做“九大”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应该由林彪来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由刘少奇起草的。所以，林彪得到毛泽东指定他来做《政治报告》的指示后，就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完全由林彪自己来起草文件，万一有什么提法，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是很麻烦的，上次刘少奇就是教训；可是如果完全由毛泽东那边准备好一份《报告》，林彪只是照本宣科地宣读一遍，那么林彪就成了傀儡人物，做给别人念稿子的傀儡事情，林彪的面子和自尊心都是不允许的。

因此，林彪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准备两份《报告》：第一份由毛泽东那边指定人写好，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发下去；第二份是林彪的口头讲稿。林彪并不宣读毛泽东那边起草的正式《政治报告》，而是讲自己的口头讲稿，这样就不会有傀儡人物的形象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27)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搞两份《报告》的建议，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正式的《政治报告》，另一份林彪的口头讲稿，则由林彪自己起草。张云生

回忆说：

【林彪又说：“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

林彪授意后，我和李春生向叶群请示如何具体搞。根据叶群的布置，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

1969年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林彪会客，向来不让工作人员在场，但负责迎送的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岗位。我在林彪门外等着他们谈话的结束，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等三个人从里边出来了。在他们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以前，我听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从他们谈话的和谐气氛来看，这次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过程是顺利的，但结果并不顺利。陈伯达准备写十个题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三个题目的初稿。但这尚未成形的初稿，在钓鱼台开会讨论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云生这里说的轩然大波，就是陈伯达起草的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后来被毛泽东否决。这引发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陈伯达这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授意写的。这是目前的主流说法；第二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自己写的，与林彪无关。这种说法来自陈伯达本人。

第一种说法，最初来自1973年中共“十大”报告，它说：“九大以前，林

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政治报告》。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

(28)

关于“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这件事，吴法宪回忆说：【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报告》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陈伯达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的愤怒，是生气陈伯达背叛自己，投靠到林彪一边去了。关于陈伯达的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关于陈伯达《政治报告》的第二种说法。陈伯达出狱后，多次否认他曾经得到林彪的授意，声称那份《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不过陈伯达的说法，疑点很多。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回忆说：

【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毛家湾那里谈了一下，林彪表示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

容由陈伯达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

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圈阅退回，就这样，陈伯达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据陈伯达的秘书说，陈伯达是在见了林彪之后，定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而且，陈伯达写好提纲后，又去与林彪商量，最后定下总题目和小题目。因此，陈伯达这份《报告》的总纲精神，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授意，至少是陈伯达与林彪商量决定的。因此，陈伯达说《政治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是不真实的，这主要是陈伯达想撇清他与林彪的关系。因为那时林彪是第一号“坏人”，陈伯达说他不是听从林彪的指示，而是自己写的，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罪过”。

(29)

另外，毛泽东的本意是不同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但陈伯达把提纲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圈阅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毛泽东是想拖一拖，让林彪自己主动改正。如果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同意或批评，就会引起林彪的不愉快，影响他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指望林彪自己主动改正过来，这样就不会伤及两人的感情。

陈伯达本来是毛泽东的人，历史上与林彪并无什么交情，怎么会加入到林彪集团里去呢？这主要问题是江青。江青对陈伯达丝毫不给面子，动辄训斥，让陈伯达的自尊心难于忍受，终于选择离开毛泽东，投奔林彪了。

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座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其实江青也不是单单对陈伯达，对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是动辄训斥，可是他们两人为什么不生气呢？因为他们两人对江青“服气”，认定自己应该接受江青的领导，所以对江青的训斥没有反感。而陈伯达仗着自己是毛泽东多年政治秘书的老资格，对江青根本不服气，对江青的训斥耿耿于怀，这样他与江青就无法和平相处下去了。

关于陈伯达向林彪靠拢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

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人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陈伯达加入林彪集团之后，也就开始为林彪效力，开始站在林彪一边，与江青集团进行斗争。

(30)

本来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与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合写《政治报告》。可是陈伯达却来了一个反常的举动，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单独写。这样一来，就出现两份《政治报告》，一份是陈伯达单独起草的，另一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出现两份《政治报告》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前，原来中央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我不愿同张、姚合作。在起草人的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了另外一个稿子。】

陈伯达说的他自己的行为，显然是反常的。因为既然是中央决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那陈伯达就应该遵照中央的指示办事。陈伯达甩开张、姚，自己干，显然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为什么陈伯达这么大胆，敢违背中央指示呢？这是因为陈伯达得到了另外一个“中央”的支持，这个另外的“中央”就是林彪。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也回忆说：【写《政治报告》的工作开始了，我们感到最不好办的是，中央决定由陈、张、姚三人起草报告，而陈伯达却甩开张、姚，自己干。我们向陈伯达提出：“张、姚他们来问怎么办？”

陈伯达固执地说：“不管他们，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们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果然，这时姚文元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自己不接电话，让我们答复姚文元，说：“告诉张、姚他们，

他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

后来张春桥又来电话，问陈伯达怎么办？是否谈一谈？陈伯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让我们答复：“让他俩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着吧。”

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我们对陈伯达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是不会闲着的，他们是会向上报告的。”

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31)

陈伯达以前对江青是唯唯诺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江青身边的红人，陈伯达本来应该不敢得罪这两个人的。可是陈伯达这次有了林彪在背后撑腰，居然大起胆子来，敢挺起腰杆跟江青集团斗争了。陈伯达不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参与写作，主要是要贯彻林彪的想法和主张，防止张、姚“塞进他们那些东西”，把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搅混了。

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是什么呢？据邱会作回忆说：【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就开始自己拉条子，并告诉办公室的同志，他已有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了下来，标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的“克己复礼”思想就很重了，他认为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应该满意了。文革这几年确实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搞派性，搞武斗，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林彪的认为，毛泽东既然已经把刘少奇等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革也应

该到此为止了。在“九大”以后，文革就应该停止了，政治运动不应该再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中共应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题，应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是熟知毛泽东的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题目，只谈建设，不谈革命，肯定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这点，林彪在动手写之前，就应该很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题目不会高兴。那么为什么林彪还要偏偏惹毛泽东的不高兴，偏要提出这种题目的《政治报告》呢？这是因为林彪试图通过这份《政治报告》，给毛泽东提意见，或者说是向毛泽东“进谏”。

林彪希望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轨道重新转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林彪的这个意见和看法，应该说早就想向毛泽东提了，可是他又不敢直接给毛泽东提意见。自从彭德怀之后，党内敢向毛泽东直接提意见的人就没有了。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更不是一个好办法，彭德怀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的信，出了大问题。

(32)

那么林彪怎么才能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呢？于是林彪就想出一个妙招：借着这次起草《政治报告》的机会，写一份反应自己看法的《政治报告》草稿，把自己的意见通过《政治报告》草稿间接地表达出来。毛泽东看到这份《政治报告》草稿，也就是看到了林彪的意见。林彪希望通过这份强调经济建设重要性的《政治报告》草稿，让毛泽东看了以后，开始重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

林彪用这种对毛泽东的劝说，是十分巧妙的。如果毛泽东能够接受林彪的看法，采纳林彪的意见，那是最好不过；如果毛泽东不理解林彪的看法，不采纳林

彪的意见，顶多是否决林彪的这个《政治报告》草稿。这样，林彪和毛泽东就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相反，如果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试图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的话，那必定会引发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林彪写这个《政治报告》草稿，其实只是旨在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并不是真的想把它作为正式的大会文件。当然，林彪也不便直接向陈伯达交代自己的用意，因为这种极为敏感的话，是不好直接说出口的。林彪应该是通过叶群，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了陈伯达。叶群和陈伯达都是福建老乡，两人的私交相当密切。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刚到林办不久，就常听叶群说，她到陈伯达那里毫无拘束。叶群向秘书们透露说：“我去老夫子那里，他正在午睡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边同他谈话，很随便。陈伯达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师，我们过去就很熟，我见他，从来都不感到拘束。”】

陈伯达本人也十分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也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根据林彪的意图，陈伯达很快就写好了《政治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是核心关键，它的本意，并不是用于在大会上发表，而是用于表达林彪、也是表达陈伯达给毛泽东的进谏和意见。陈伯达的秘书回忆说：【陈伯达亲笔写了一封简信，附上第一部分稿子，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呈送主席。可是送出的稿子没有回音，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但又不能对陈伯达说，怕干扰陈伯达的写作思路。】

陈伯达期盼毛泽东能够好好看一下他写的第一部分，这其实是他和林彪劝说毛泽东停止文革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能认真思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33)

可是陈伯达的稿子送出去后，毛泽东那边一直没有回音。原来毛泽东一看《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心中就冒起火来，根本没有看陈伯达的稿子。

在“九大”开完之后，陈伯达终于收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稿子。陈伯达惊讶地发现，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牛皮纸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竟然连牛皮纸口袋都不愿意打开，当然不会看到陈伯达呕尽苦心写的他和林彪的“意见书”了。陈伯达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陈伯达写这个稿子，意图并不是要“反”毛泽东，只是想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可是毛泽东误解陈伯达的这番苦心，当然让陈伯达难过伤心了。毛泽东退陈伯达的稿子，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说陈伯达写稿子的事。

陈伯达把第一部分草稿写好送呈毛泽东后，一直不见回音。这时，他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单独写的事情，当然得罪了江青，于是江青就要开会批判陈伯达。

批陈伯达的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会前，江青通知首都党政军各方面的人来参加，会场里坐得满满的。江青声称陈伯达一个人单独写稿子，是试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责令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刚刚解释了一句话，立即被江青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接着江青又说：“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

陈伯达这时有林彪在后面撑腰，倒也不怕江青，他不允许别人来摘他的领章、帽徽，并且针锋相对地对江青“反威胁”说：“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

结果，陈伯达顶住了江青的批斗，没有检讨，江青也拿陈伯达没办法。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话。”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江青的批判会没有吓住陈伯达，之后陈伯达还是继续单独写《政治报告》，不跟张春桥和姚文元合作。

(34)

中共“九大”原定在1969年3月15日开幕，在此之前的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时说：“《政治报告》让伯达、春桥、文元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这是毛泽东正式让林彪挂帅，陈伯达牵头写《政治报告》。尽管此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快笔头来说，有一个月时间，本来应该是足够的了。

前面提到，陈伯达把关键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写好后，送呈毛泽东批阅，但迟迟得不到毛泽东的回音。因为第一部分代表了林彪和陈伯达的意见，看不到毛泽东的回音，陈伯达猜测毛泽东可能是在考虑他们的意见，于是就慢慢地写后文，等待毛泽东的指示和意见。这样一来，陈伯达的稿子就迟迟没有写出来。

前面也提到，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看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到1969年3月7日，陈伯达仍然没有写完，毛泽东不满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问陈伯达：“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回答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陈伯达虽说是书生，但起码的政治头脑还是有的。陈伯达知道这时不能说出林彪，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扛下来这个责任，反而不会出大事，所以陈伯达就说“我自己一个人写”。

毛泽东早就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汇报，知道陈伯达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抛开，自己一个人写。毛泽东本来给陈伯达的指示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一起写。陈伯达之所以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抛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写，肯定是得到林彪的支持。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更超过对陈伯达的不满。不过毛泽东这时也不好把林彪端出来，只是把不满发泄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说：“现在又想重复‘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你这个人每次都说过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毛泽东本想干脆另起炉灶，让康生牵头，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写，但这样又太不给林彪面子。于是毛泽东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的。”

毛泽东又说对康、张、姚说：“《政治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这样就因为《政治报告》的原因，把“九大”开幕的日期从3月15日推迟到4月1日。当时各地代表已经按照原来的通知，在3月15日之前都来到了北京。现在开会的日期后推，只好组织代表们先在北京参观。

(35)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陈伯达的稿子，因为完全否定陈伯达，也就是完全否

定林彪了。所以毛泽东给陈伯达一个面子，让他继续“一个人”写下去，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同时写另外一个稿子。这样一来，张、姚写了一份反映毛泽东想法的稿子，陈伯达写了一份反映林彪想法的稿子，这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稿子，就变成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之争了。

周恩来也明白，陈伯达和张、姚的两份稿子，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周恩来这时又不得不在两人之间摆平衡了。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说：

【九大《政治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

周恩来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是说大家来讨论陈伯达的稿子，并且周恩来亲自主持对陈伯达稿子的讨论。于是陈伯达就把他写好的前三部分《报告》稿，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周恩来对此没有发表意见，而江青等人对陈伯达和他的稿子进行了攻击。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骂陈伯达说：“中央文革向来都是集体领导，为什么你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毛泽东虽说指示双方“各搞各的”，但毛泽东亲自指点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稿子。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把张春桥他们几个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毛泽东本来指示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但康生深知

这场《政治报告》之争，实际上牵扯到毛泽东与林彪之争，康生如果替毛泽东写稿，那就会得罪林彪了。康生不想得罪林彪，因为他也得罪不起。得罪林彪的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一个一个地倒台，这让康生不得不考虑得罪林彪的后果。于是康生就“及时”地生病了，没有参加起草《政治报告》。

据汪东兴回忆说：【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36)

康生给林彪的电话是很有政治艺术的。第一，康生向林彪表明，这份《政治报告》他没有参加，这就是说，他没有做不利于林彪的事；第二，康生评价这份稿子是“份量不够”，这表明他并不完全赞成这份稿子，也就是表示对林彪的同情；第三，康生又说这份稿子的“基本思路”站得住，并建议林彪在这份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康生这样做，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得罪林彪。

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稿子，当然也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次轮到陈伯达“进攻”和提意见了。陈伯达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就像伯因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

从内心来讲,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陈伯达的,但他也不能支持林彪与毛泽东闹翻,他要调和毛、林之间的矛盾。鉴于毛泽东的态度,周恩来必须否决陈伯达的稿子,但周恩来并没有说陈伯达稿子的内容不行,而是以陈伯达没有按时交稿为理由,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周恩来这样做,既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也不会得罪林彪。

关于这点,邱会作回忆说:【对陈伯达初稿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总理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次,陈伯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他明知道毛泽东不会高兴强调“发展生产”的意见,但还是在毛泽东面前提了出来,后来陈伯达又大胆地抵制在《政治报告》中加入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据吴法宪回忆说:【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他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

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37)

林彪并不意外毛泽东否定他指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但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跟他“交心”。以前毛泽东对林彪有不同意见时，总要通过各种方法，向林彪“交心”，说明为什么不同意林彪的意见。比如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的《滴水洞家信》，就是向林彪“交心”，婉言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意见。

可是这次毛泽东什么理由也没有说，就否定了林彪的意见，这样林彪大为不快。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对张、姚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主席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主席也作了具体的批示。

我去向林彪报告主席的批示，林彪问：“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它的大意。”

林彪说：“现在不用讲。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

林彪问：“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它们哪一个好一些呢？”

我说：“很难说。”我确实感到很难说。因为主席已决定在张、姚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不能妄加评论。我宁愿当个旁观者，而不愿把自己牵连进去。

林彪微微露出一丝笑容，说：“不要紧，你说说看。”在他那一贯严肃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一点笑容的。

我不得已，从口中挤出这么一句：“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

林彪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想听听秘书的意见，但秘书也看出这里水很深，不敢发表意见。

林彪对毛泽东不做任何解释，就否定了他的稿子，感到十分不快。于是林彪也就采用消极的态度，对毛泽东的稿子不发表任何看法，送到他那里审改的稿子，他连看也不看，更不要说提出修改意见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在《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政治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

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了林彪的消极态度，说：

【过了几天，主席又对张、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别是在文字结构上作了很大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其中，主席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话。

在这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之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林彪原来布置“拉条子”，说他在大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

(38)

3月底，总理把最后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就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林彪某月某日”。

这天中午，总理给林办打来电话：“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彪同志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接电话的张益民回答说：“收到了。”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过目后，如果同意，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央办公厅，他们在等着付印。”

张益民说：“林彪同志已经把稿子批呈主席了。”

总理很着急地说：“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请林彪同志最后定稿，他不再看了。现在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张益民请示总理：“我是否打个电话，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来？”

周恩来问：“送出多长时间了？”

张益民说：“半个多小时了。”

总理失望地说：“不用再追了，已来不及了。”】

这次，林彪居然把毛泽东送给他最后审定的稿子，又送回给毛泽东。尽管林彪不是故意的，但这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很大不快。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的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总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

林总原来打算提出建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就不宣读《报告》了。林总与我们提及此事时，黄、吴、李和我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总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下决心承担宣读《报告》的任务。

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

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总说：“我就是故意要念得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

据另一个林彪“死党”李作鹏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苦苦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肯定是重大转折之一。可惜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李作鹏说的话是很中肯的。既然毛泽东已经与林彪发生了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在新《党章》中明确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39)

前面提到，在中共“九大”开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政治报告》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同时，在《修改党章报告》方面，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

《新党章》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起草，全是毛泽东的嫡系在做这件事。本来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嫡系，毛泽东没想到陈伯达居然在关键时刻投奔林彪，改换门庭，这让毛泽东大为震怒。《新党章》中的一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过去的《党章》中，还从来没有写过具体的“接班人”。

在《新党章》中规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来自江青的提议。据原中央警卫

团长张耀祠回忆说：【1968年10月17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应该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江青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同志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毛泽东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但林彪并不高兴这样做。据邱会作回忆说：【1968年9月间，《新党章》在提交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之前，林总主持了一次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林总在会上提出：《新党章》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

《新党章》经过中央文革建议、中央碰头会讨论之后，毛主席同意了，这样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认林总是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但林总自己还没有接受。在“九大”开幕之前，即《新党章》将要提交大会审议通过之前，林总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从《新党章》上删去。对此，毛主席没有从正面回答问题，但他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

这很显然，主席就是要林总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总就再不提意见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林彪写入《党章》呢？这是出自“论功行赏”的必要。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人，不管是企业领导人，还是政党领导人，都必须对有功的功臣进行奖赏，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保持集团的战斗力。对毛泽东的文革来说，

林彪立的“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打倒刘少奇的阶段，没有林彪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在“九大”上，毛泽东不对林彪“论功行赏”，不对林彪有点“表示”，那是说不过去的。

(40)

“论功行赏”无非是三种方式：金钱、地位、名誉。企业一般采用“金钱”的方式，在年底以“奖金”的形式，奖励干得好的，为企业立功的功臣。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不发奖金，所以不能用“金钱”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给林彪发奖金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剩下的对林彪“行赏”的手段，只有“地位”和“名誉”。林彪现在的地位，在党内是副主席，在政府内是副总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是不可能再上升了，只有提升在政府内的地位。总理的地位已经有周恩来占据了，所以林彪的地位要想再上升，只有“国家主席”这个位置。

毛泽东不想让林彪的地位再上升了，如果林彪上升到国家主席，那就要像以前的刘少奇那样，《人民日报》上并排登载毛主席和林主席一样大的头像，在很多场合林彪就要跟毛泽东平起平坐了。刘少奇那样不掌握兵权的人，当国家主席还问题不大；如果林彪这样掌握重兵的人，再当上国家主席，那就是尾大不掉了。

当然，毛泽东如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无妨；但毛泽东并不想让林彪接班，因为林彪并不信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林彪主导写的《政治报告》，提倡的都是“唯生产力论”那一套，这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现在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暂时过渡的角色。

因此，毛泽东不想真的让林彪接班，所以就不能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一旦林彪当上国家主席，那就养虎贻患，到时候就非让林彪接班不可了。

这样一来，毛泽东对林彪“行赏”，提升“地位”的手段也不行，剩下的就是“名誉”了。因此，毛泽东把林彪写入《党章》，就是给林彪一个名誉，作为对林彪的奖赏。

毛泽东本人直接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显然不太合适。于是毛泽东就让江青出面，让江青提出把林彪写入《党章》，然后毛泽东再来“同意”一下，这样一切就非常自然了。

可是林彪也是高手，他看破了毛泽东的意思，看破毛泽东并不想真的让他接班。林彪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他接班，就应该对林彪许愿，在“九大”之后让他当国家主席。可是，毛泽东对“国家主席”的许愿只字不提，只是给林彪一个空头的“写入党章接班人”的名誉。

这样一来，林彪感到毛泽东并无诚意让他当“接班人”，所以不满意毛泽东对他空头名誉的“行赏”。因此，林彪多次提出删掉《党章》中接班人的一段。最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才勉强接受了毛泽东给他的这个“接班人”名誉。

(41)

因为写《新党章》的权力把持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所以江青就想掺入一些私货，在《党章》中把江青也写进去，提升江青的名誉。江青这样做，显然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把江青写入《党章》。据邱会作回忆说：

【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

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张春桥对江青是马首是瞻，江青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敢反对江青的话。而康生还是有眼光的，及时把江青删掉，避免了到毛泽东那里挨批评。不过江青这个人的野心还是按捺不住，越膨胀越大，她甚至想要取代林彪，由她来当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九大”期间，江青进行过一次露骨的“争当接班人”的表演。据邱会作回忆说：

【大会将要进入选举之前，江青向林彪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很高的战斗。一天，江青在京西宾馆举行一次座谈会，姚文元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因为我承担军委办事组的会务工作，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会场，听到了一些讲话和发言。

座谈会开始时，姚文元首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现在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

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会场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在掌声中，江青开始讲话了。江青说：“我是一个不宣传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别人宣传我。大家很清楚，对我的宣传，就使人把我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随便说。”

“我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个考虑过程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谁来接替刘少奇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一时不敢回话。在毛主席再三问起之后，我才敢大胆回答毛主席的问题，说：‘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二是一贯同毛主席亲密

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人。’

我说了之后，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了。’

我有意让主席散散心，即说：‘那好，现在我们把考虑的人，各自写在条子上面。’

我们都各写了一张条子，互相看了条子之后都笑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当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来的。”】

江青这里讲的关于她和毛泽东谈论林彪接班人的事情，或许是真的。但江青这么说，目的在于强调她的重要性。人们听上去，林彪似乎还是依靠江青，才当上接班人的。这样的话，江青在毛泽东眼里，应该比林彪更有地位了。

(42)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接着说：“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十二中全会上，担任主要讲话的人(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对文艺复兴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我把所采取的态度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对我是很赞扬的。对这样的问题，我是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崇高威信。”】

前面说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做了长篇讲话，把毛泽东的文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后来江青提出：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喻为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是不正确的，并多次不点名地批评过林彪。这里江青再次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并声称毛泽东同意她的观点。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继续说：“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什么人可以到这个司令部里呢？我看最关键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把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去，选到中央政治局和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

江青又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过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

江青讲话之后，姚文元接着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江青的《讲话记录》留下来，再没有转手，但《记录》以后怎样处理就不知道了。】

江青私自召开会议，并声称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止林彪一个人，江青也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露骨地向林彪争权，争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江青这样毫不掩饰的讲话，当然让康生看得冒汗，赶紧把江青的讲话压下来，没有扩大传出去。江青本想通过这么做，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但其实是适得其反。江青这样赤裸裸的争权，赤裸裸地争出风头，反而买来人们对她的反感。

这里也看出，姚文元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的，江青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江青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的话盲目执行，对江青的非理智行为，不但不设法阻止，反而帮着火上浇油。表面上看，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百依百顺，讨得江青的欢心，实际上这样反而是“害”了江青。倒是康生在关键时刻帮了江青，使江青没有犯大错误。

江青集团中，没有一个本着对江青负责的“军师”来辅助她，这也是江青失败的因素之一吧。康生并不是江青集团的人，不过他还是及时阻止了一些江青的愚行。只是在“九大”以后，康生也不太管江青的事了。

(43)

在“九大”召开之前半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面积约 0.7 平方公里，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心部分。1860 年清朝政府和沙俄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划界，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就成为两国的国界。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所以中国和苏联都声称拥有该岛的主权。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珍宝岛这个归属不明的小岛，就成为一个引发冲突的导火索。中苏双方的巡逻队，都登上珍宝岛巡逻，表示该岛是自己的领土。这样一来，中苏双方的巡逻队就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刚开始是“文斗”，双方进行对骂；后来发展到“武斗”，双方用棍棒打斗；最后发展为“战斗”，双方动用轻重火器交战，苏联方面还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中方参战的只是步兵。

第一场战斗发生于 1969 年 3 月 2 日，双方死伤数十人；第二场战斗发生于 3 月 15 日，第三场战斗发生于 3 月 17 日，苏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中方只是用反坦克炮、火箭筒等轻武器还击。当时的解放军战士非常勇敢，在几十米的近距离上，用轻武器对苏军展开反坦克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经过上述三次战斗之后，中方实际控制了珍宝岛，但直到 1991 年，俄罗斯才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1969 年 3 月 15 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珍宝岛问题。当汇报人说珍宝岛地区敌人炮火打到我方纵深七公里，毛泽东说：【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苏修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

【我们抗议他们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把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此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与苏联发生核大战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认为，一旦苏联打进来，那就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就拔不出去了，哪怕中国死一半的人，最终还是会取胜的。

(44)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是小规模的，双方死伤数百人。可是这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却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珍宝岛事件的第一个后果，是证明了毛泽东“反苏联”路线是正确的，此后中国反苏的调子愈发升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最终导致中国与美国的接近，导致中美建交。

珍宝岛事件的第二个后果，是在中国掀起一场“备战热”。此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向备战军事一边倒，一切为“打仗”做准备。这样一来，民用产业就大大压缩，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导致人民对文革的很大不满；

珍宝岛事件的第三个后果，是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下，林彪等军人的角色愈发重要。林彪以战备的理由发出“第一号令”，造成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局面，最终导致林彪的“叛逃”。

当然珍宝岛事件也使苏联受到很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格列奇科，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日本侵华那样的泥潭战，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糕。因此，苏联最终没有发起对中国的战争。

虽说毛泽东做好了与苏联核大战的准备，但他也没有想挑起战争，还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周恩来则一直设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在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进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等临时的协议，暂时缓和了中苏双方的紧张对峙。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九大”的话题。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开幕式。当毛泽东出场的时候，全场沸腾，全体人员起立，一边鼓掌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第一个出场，毛泽东之后，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11人。在主席台的前排，毛泽东坐在中央，坐在毛泽东右边的是老干部，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是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这个座位排列是周恩来安排的。4月1日上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说：  
【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

(45)

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上主席台。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个人，在“八大”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认为，江、张、姚三人一下子坐到“九大”的主席台上，未免太唐突了一些，但周恩来也不好直接反对，于是委婉地说“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不

过，毛泽东还是批准江、张、姚三人上主席台。另外，刘伯承的座位排在朱德前面，也是毛泽东提出的。

历史有时候像是开玩笑，坐在毛泽东右边的五个人，下场都不错，没有一个被打倒的；坐在毛泽东左边的六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林彪客死他乡，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入狱，康生死后也遭到开除党籍，骨灰被迁出八宝山。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上主席台，引起众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很多老将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奋斗一辈子，还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只不过摇摇笔杆子，居然就扶摇直上坐上了主席台，让老将军们从心底里感到不服，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的此举，又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

毛泽东等人在主席台上坐下后，待掌声平息下来，毛泽东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会场上马上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由于掌声停不下来，毛泽东只好打断掌声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人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听到此话吓了一跳，周恩来赶紧打圆场说：“毛主席当合适。”

这时林彪也反应过来，马上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但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这次反应很快，马上向台下的众人“求救”，说：“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赞成的举手。”

台下的众人全体一齐举手。林彪松了一口气，说：“好！全体通过。”

毛泽东不好再推辞，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台下的众人又全体一齐举手。毛泽东接着说：“大家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全场众人鼓掌通过。

毛泽东为什么要当众提议林彪当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分析。

(46)

毛泽东对“九大”的期待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第二场“整党的文革”的开始。“九大”是毛泽东整党的起点，所以毛泽东试图在“九大”中，引入他的整党概念，把“九大”开成一个与以往的党代会完全不同的崭新大会。

首先毛泽东想在“九大”上引入更多“民主”的元素。以往的党代会，参会代表分为“大代表”和“小代表”两种。“大代表”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等高官，而“小代表”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普通党员。在过去，这些“小代表”只是按照上级指示，投某个人的票，完全没有个人的自主性。

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因此毛泽东希望在“九大”上也引入这样的民主，至少要有一种民主的气氛。

毛泽东说：【没有自由权就不叫选举，而是奉命行事，我们不能搞那一套。拉选票，这是古来有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靠金钱。我们共产党不搞这套，也搞不起呀，谁能用钱买选票？我主张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要多讨论几次，让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机会。但我们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的特点。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一定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各级领导班子也要实行这个原则。老、中、青三种人，在中央委员中大体上要各占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们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党员中占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把这些人好好培养出来，就是未来的希望。】

在毛泽东的这个主导思想下，“九大”的气氛与过去的党代会会有很大不同。

“大代表”们受到了压制，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地盛气凌人讲话了，而“小代表”的意见得到空前的尊重。虽说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服从上级的角色，但他们受到的尊重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要搞的整党，主力军就寄托在这些“小代表”身上，所以他要在这次大会上，鼓舞“小代表”积极参与党内的大事。

毛泽东提出的“老、中、青三结合中央委员会”，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在文革之前，“中央委员会”都是清一色的老干部，因为没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是进不了中央委员会的。这种级别又是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年一年地熬，非要熬到老年，才能熬到这个级别上。

(47)

年轻人要想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毛泽东的文革，就让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有机会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过去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王洪文的表现欠佳，但王洪文那样的年轻人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反映出毛泽东要彻底整党和改造党的决心。

出于整党和改造党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打破过去的老规矩。大会主席团主席，过去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但这次毛泽东决定事先不规定，而是当场选举。

早在1969年3月25日，负责筹备大会的周恩来，就“九大”主席团常委

的问题，致信毛泽东和林彪，提出：“老同志是否也需要一、二人参加主席团常委？”

毛泽东批示说：“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指出，正、副主席和秘书长由谁来担任。到大会前一天的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提到大会主席团的问题，但毛泽东仍没有回答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问题。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再问了，毕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因此，在大会开始后，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都还没有明确下来。周恩来和林彪，都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大会的一开始，直接征询代表们的意见，请代表们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主席团的正、副主席和秘书长人选。

首先，毛泽东向大会代表们提出主席团主席的候选人。当然，这时毛泽东肯定是不便提名自己当主席的，他必须提名别人，而这个别人也只能是林彪。如果毛泽东提名周恩来当主席，那林彪的面子就没处摆了。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一开始，就说：“现在，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要临时搞这么一个“民主选举”，所以吓了一跳。林彪当然不敢接受主席的位子，马上请台下的众人选毛泽东，众人立刻一致举手同意毛泽东当主席。毛泽东然后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众人马上一致举手同意林彪当副主席后，毛泽东又说：“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众人鼓掌通过。

(48)

毛泽东搞这个民主选举，虽说有做秀的成分，但毕竟是党代会上第一次向代表们进行“民主选举”，让代表们，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小代表”，有受宠若惊的主人翁感觉。

有人说毛泽东这次提议林彪当主席，是对林彪的野心进行“试探”，这种说法不合理。如果毛泽东真的搞这种所谓的“试探”，那就未免也太幼稚了。因为林彪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当主席的建议，这并不能证明林彪没有野心。

因为这次毛泽东营造会议的民主气氛，代表们在选举时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那些有希望当选的人，对自己能不能当权，能以多少票当选，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各方面都在悄悄地拉选票。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一伙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们是毛主席的亲信，未来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拉选票。他们的做法，对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首先是出场、退场的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主席台的时候，都俨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领导的神态，他们跟随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一起出入场，江青有几次是跟周总理并排入会场的。元老派则是跟在中央文革成员之后出入会场。不仅如此，在江青一伙控制的新闻报道上，还特别发表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入会场的大幅照片。

江青他们看到候选名单上，还是老同志占优势，大为不满。江青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革命造反派当权是根本问题。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问题，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是朝气蓬勃的。”

对这个问题，还是康生比他们高明，康生说：“关键是权力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争中央委员的名额，是只图虚名。”

康生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伙最后还提出了别人说不出口的问题。江青说：“在选举中保证中央文革成员有足够的票数，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威望问题。”

江青把中央文革成员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看成是反映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问题。林彪集团则有意安排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结果江青等人不仅没有得全票，比林彪集团的人的票数还要低，这就等于是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威望不够。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提到。

(49)

另外，江青还利用《人民来信摘报》来宣传自己。毛泽东在《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民”来信，提议江青应成为九届中央常委，并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还建议李讷、毛远新二人成为“九大”代表。毛泽东对此批示说：“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周恩来这边的人，当然也担心选票的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根据毛主席既要保证朱德、陈云、徐向前、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这些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批归批，选归选。

但总理还是不放心。24日下午正式选举，上午总理专门召集了主席团扩大会议，特地讲老同志要当选的问题。总理说：“老同志有错误，不论是文革中的还是历史上的，都应批判，但是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也要把握好，特别是这次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首先要在党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老同志，我们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帮吧。”

散会后，总理把我们几个留下，心事还是很重。总理轻轻拍着自己的脑门，沉思很久才说：“下午就要正式选举了，有把握吗(指老同志当选)?”

我们说：“预选通过了呀。”

总理说：“不见得稳固。青年人不懂得党的历史，不懂得大局观念，吹一股小风就垮了。你们都是老同志，军队的同志原则性强，办事组的同志威信高，你们马上给部队和你们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几个人的票，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吃午饭时，黄、吴、李和我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我们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

由于“民主选举”造成的不确定因素，在候选人的提名上争论激烈，使预选时间拖长，原定3月21日进行选举和闭幕，已经不可能了，不得不推迟到3月24日。此外，因为对中央委员名额的争夺激烈，毛泽东在选举前一天的3月23日，不得不把中央委员的名额再增加5人至279人，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毛泽东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

林彪则说：“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50)

在说到“九大”选举结果之前，先说一下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1日的“九大”开幕式之后，会议转入小组讨论，一直讨论到4月14日，才又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对这次大会很用心，讲话次数很多。据邱会作回忆说：【这期间，毛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召集人、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毛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

毛泽东的讲话，大概分为四个大题目。第一个大题目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与四清运动不同，四清运动主要是搞基层，搞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是两次革命，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搞工人阶级。

我们把制度和办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来，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了。】

这里毛泽东提到文革，主要指出三点：（一）文革是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这样的革命，若干年可能需要再来一次；（二）文革不搞不行的理由，是领导权不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手里，而是在资产阶级手里；（三）我们现在的制度，对老百姓管得太死，毛泽东希望权力下放。

文革事实上也是一个权力下放的运动。文革前每个单位的领导权，都完全掌握在当权派手里；文革后，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按道理说，这种“三结合”的革委会，群众有一定的监督权，但事实上，群众的监督并没有实现，这是一个遗憾。

在毛泽东谈文革的时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一个粗人说直话。许

世友说：“好的要说够，坏的也不要隐瞒。我们党内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干部对造反派不满，有苦难言！所有老干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头。老干部对这个问题没有闹起来，就是所有老干部都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老干部并不反对文化革命，但都反对造反派！”

许世友这样直白的话，当然没有人敢应和。毛泽东对许世友这样的粗人，似乎也不太计较，没有批评他。

(51)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二个大题目，是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革命根据地那个时代，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现在进了城，是好事，因为不进城，蒋介石就霸住这些地方了；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延安那个时代，就是说我们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不是军人的，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的专政”。

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党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

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个别实在不行的党员，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当然还要经过上级批准，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里毛泽东说的“整党建党”，就是他下一步要搞的文革。毛泽东认为，中共在农村根据地时代，在没有进城以前是好的，可是进城之后，就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党员干部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所以要整党，更准确地说，是要“重建”，毛泽东特别引用外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党在重建”。

毛泽东的整党思想是：党支部的整党，不能只在党员之间评议，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对党员的评议。评议出来的不合格党员，要劝退出，严重的还要纪律处分。

毛泽东本想在“九大”之后就整党，但由于“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激烈，攘外必先安内，毛泽东“九大”后的主要精力放在“安内”上了，结果整党的计划就推迟了下去。

(52)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三个大题目，是准备打仗。毛泽东说：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对准备打仗一点也不能放松。我们总的战略还是积极防御，这条不能变。人家打进来，我们不打出去。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出去，我也不出去。但是你打进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进来了，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我看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有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总之我们不怕打仗，要有准备就是了。人家就问了：准备好了，仗打不起来怎么办？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准备好了没有仗打，这是经常的。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苏美搞那么多的原子弹，花的钱不计其数。他们的原子弹并非为了展览的，将来打不起核战争怎么办？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

几年来，林彪同志抓战备抓出成绩来了。准备打仗，思想准备是主要的，物质准备是重要的。我们不能没有思想准备，也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存起来。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准备打仗，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不久前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军公然冲动坦克等重型武器，使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要准备打仗。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担心，就是苏联会出兵干涉中国，现在这个担心似乎越来越有变成现实的趋势，因此毛泽东开始号召人们“准备打仗”。

毛泽东对苏联的战略是“积极防御”。这是中国绝对不侵犯苏联的领土，而是等待苏联打进中国来。一旦苏联打进了，中国就有理、有利，可以利用人民战争来击败侵略者。

为了准备战争，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准备。物质准备就是大搞“三线建设”，在各地大建分散型的小工厂，少建大工厂。大量的小工厂固然有利于战争，使生产能力不会一下子全部破坏，但小工厂的经济效益不高，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利。特别是大量的军事项目建设，军工厂，深挖洞等，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九大”期间毛泽东讲的第四个大题目，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

在这个问题上，讲得非常多，这里只摘要一些。毛泽东说：

【我看党内最危险的路线斗争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二次是王明的左倾主义，三次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发生在党的创建时期，这时期党员不多，我们也没有军队，但造成了思想混乱，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界限模糊了，妨碍了党的发展。

‘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错误，以后主要是左倾错误了。王明的左倾主义损失就大了，当时我们有大小不同的好多块根据地，有几支相当大的军队，这些都让王明断送掉了，红军被迫长征。王明他们用‘左’的面目去纠正别人的右倾，所以越纠越‘左’。

(53)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存在着一个全党变修的问题，其前途就是亡党亡国。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们早有察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些路线斗争的时候，谈到了很多细节，这里就略去了。毛泽东除了说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些公认的“坏人”之外，还“口无遮拦”地提到朱德和陈毅。毛泽东说

【朱德、陈毅是经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朱、陈他们有时也不反我。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陈毅向上海中央请示，受到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毛泽东在会上讲到这些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老干部们清楚，但大部分年轻人不清楚，他们听了很新鲜，也很激愤，特别是对参加这次大会的朱德和陈毅，

更是抵制情绪很重，这就造成朱德和陈毅两个人非常被动。后来朱德未能当选政治局常委，陈毅未能当选政治局委员。在“九大”会议期间，甚至还开了一次批陈毅的小会。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3日晚，上海代表小组在京西宾馆开小组会，会议从晚上九时开到凌晨五时，批判陈毅。我先后进去了两次，都向他们提出说：“陈老总是个病号。”

王洪文还同我开玩笑说：“我们也会照顾病号。”

上海小组的会已经开到凌晨4时多了，我只好向总理报告。总理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惊奇，并说：“真有那样的事吗？你去给王洪文同志打个招呼，做点工作，我马上去。”

这样我立即进去对王洪文说：“我受总理的委托，对陈老总的健康是负有责任的。你们的会已经开了快八个小时了，一个病号能受得了吗？会出事的。”

我向王洪文说这番话时，陈老总看着我，几乎要流出泪来。

王洪文把我拉到会议室外面，说：“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指示，陈毅这个人很顽固，对自己的错误基本上不承认。更使人气愤的是，他的发言名为自我批评，实为教训人。明天就要选举了，他选上中央委员，又会尾巴翘起来的。这点事，我们就不要干扰总理了。”王洪文说完回会议室继续开会。

不久，周总理来到会议楼休息室，我向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总理对我说：“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只设法把陈老总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复杂，一句话说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总理与我说了几句话之后，就把王洪文、陈老总都叫来了。总理当着王洪文、陈老总的面，若无其事地对我说：“邱副总长呀，我肚子饿了，想吃东西，

还有他们两个(指陈、王)也一起吃一点，搞点东西吃。”

陈老总一只手捂着肚子，向总理说：“我不必吃什么东西了，我这就回医院，好吗？”

总理只是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把陈老总送上电梯去了。

陈老总走后，王洪文要向总理说明为什么开这个会，总理都用别的话堵住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

(54)

1969年4月14日，“九大”再次召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前一天，周恩来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周恩来就明天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请示毛泽东说：“老同志是否还是坐在前头？”

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要选这些人。”

这时王洪文大胆插话说：“我们不大愿意选他们。”

王洪文的大胆插话，让毛泽东感到他是一个敢捅阎王殿的名副其实造反派。毛泽东本人就是大胆妄为之人，所以他也欣赏大胆敢干的人，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提拔王洪文当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4月14日下午5时，当毛泽东出现的人民大会堂会场时，台下掌声雷动，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见众人的口号声不息，只好对着话筒说：“不要喊口号了。”这才把众人的口号声平息下去。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二是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是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这里说明一下“九大”的议程。在4月1日的开幕式上，林彪作了《政治

报告》，康生作了《修改党章报告》，之后的4月2日到4月13日，分小组讨论《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在4月14日的全体大会上，对《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进行表决通过。所以毛泽东说：今天有三项议程，除了表决通过《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外，还有几个人要在大会上发言讲话。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插话说：“先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通过了再发言。”

毛泽东说：“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的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

毛泽东说完后，周恩来开始发言。周恩来这次的发言，主要是赞扬和吹捧林彪，因为周恩来发言的内容中，有三分之二是关于林彪的。周恩来说：

【同志们：我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历史。只有懂得了这些路线斗争的历史，才能懂得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55)

周恩来吹捧毛泽东之后，开始吹捧林彪。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公开讲话之中，对林彪最大力度的高度吹捧。周恩来借着《党章》中写入林彪接班人地位的机会，对林彪大力吹捧，也显得很自然。这里稍微多引用一些周恩来吹捧林彪的

话。周恩来说：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在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这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了，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反革命阴谋，并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同志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1966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2月的工业会议，1967年3月的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年10月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

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全国解放后，在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提倡把我军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56)

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林彪同志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如此高强度、大力度地吹捧林彪，主要目的还是保持和加强与林彪的

合作关系，这对于周恩来本人的命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周恩来要借着这个机会，大大吹捧林彪一番，让林彪高兴。

周恩来的吹捧是很有艺术的，不是空洞地说大话，而是用很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周恩来说林彪是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这个用词真可谓恰到好处；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还为有了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这句话吹得很高，却又不太肉麻。

周恩来表扬别人技术是超一流的，这种表扬技术，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几句表扬吹捧的话，把别人说得很高兴，那么接下去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周恩来在各方面的朋友极多，这与他高超的表扬别人的技巧有直接的关系。

在今天的会上，林彪本来没有准备发言，可是他听到周恩来在讲话中如此大力度地吹捧他，感到有必要说几句谦虚的话，否则就是默认周恩来对他的吹捧了。林彪在周恩来讲完之后，插话说：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

总理对毛主席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诸种因素中最重要，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57)

林彪继续说【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事情，只知道跟毛主席就是了。在那时候的一切领导人中间，我前前后后比来比去，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

主席很高明。

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像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有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二方面军的贺龙底下，在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早就没有了。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了。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他能够允许我存在吗？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的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

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是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林彪讲的插话，既是中肯的，也是必须的。林彪说他事先不知道周恩来讲活的内容，这应该是真的。林彪听到周恩来这么捧他，心中应该是感谢和感激的。林彪临场发挥，说了一番表示谦虚的讲话，也讲得恰到好处，这表明林彪的应变能力和临场发挥能力，都是很强的。周恩来把林彪捧一下，林彪自己再谦虚一下，这个一唱一和，更加完美了林彪的形象。

林彪讲话完之后，众人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鼓掌，同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见众人给林彪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就对着话筒说：“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

听到毛泽东的话，众人的鼓掌声平息下来。接下来是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等人发言，他们分别代表军队、工人、农民、战斗英雄、革命干部发言，每个人的发言都比较短。其中来自珍宝岛前线的战斗英雄孙玉国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孙玉国一上台，就立正朝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则站起来向孙玉国招手致意。孙玉国把珍宝岛的战斗经过，在大会上简要讲了一遍。孙玉国发言中，毛泽东数次带头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都鼓掌，台下的众人更是掌声雷动，大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58)

孙玉国发言完之后，毛泽东问他说：“你多大年纪？你是哪里人？”

孙玉国回答说：“二十九岁。东北人。”

毛泽东然后向众人说：【他叫孙玉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我们什么也没有。苏修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苏修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用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它们。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

孙玉国在退场前，走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孙玉国又准备和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用手向左边一指，孙玉国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赶紧到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林彪面前，与他握手。孙玉国和林彪握手之后，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孙玉国又赶紧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

孙玉国和周恩来握手后，周恩来又用手向左一指，孙玉国又返回毛泽东左边，

和坐在毛泽东左边的陈伯达等人握手。孙玉国握手完后，正准备退下去，周恩来又对他向右一指，孙玉国赶紧又转身回来，和坐在毛泽东右边同董必武等人握手。孙玉国是来自基层的小干部，根本不知道中央在人事上等级森严的规矩，但他还计算机灵，被周恩来一点就通。

毛泽东的本意，并不喜欢这种等级森严的人事规矩。毛泽东搞的文革，也是想打破这套规矩，但并没有能够实现。

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于是“九大”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4月15日起，先由四十五个小组提名，提出进入预选的候选人名单。列入预选名单的候选人，再在大组进行预选。通过大组预选的候选人，就成为正式的候选人，提交大会进行最后的决选。

这场选举，成为前所未有的“激战”，原因就像林彪说的那样：“这次大会比以前都难，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这次大会打破了过去论资排辈的条条框框，使得许多过去不可能当选的人，也有机会当选了。这样一来，竞争当然也就激烈了。

这次选举中竞争最为激烈的，自然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前面说过，江青野心勃勃，要跟林彪争当“接班人”，这当然引起林彪的高度关注。因此，林彪就设法在这次大会上，打压一下江青的威风 and 锐气。

据吴法宪回忆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跟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上，他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59)

1969年4月24日，“九大”举行全体正式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共279人。在选举时，参会代表对通过预选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凡是过半数的候选人就当选。“九大”代表共1512人，正式选举时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1510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1510票的全票，林彪得了1508票，周恩来得了1509票。

据说林彪少两票的原因，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要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林彪自己与叶群一起投了林彪的反对票。周恩来少一票的原因，也是为了显示他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自己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江青少了8票，只得了1502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少了十余票，他们的得票比林彪集团的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要少。据邱会作回忆说：

【4月24日下午“九大”举行正式选举。全场设有五个票箱，主席台上一个，主席台下四个。投票开始后，毛主席第一个在主席台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个应当是林总，第三个应当是周总理。但江青在投票时，又借机出一个小小的风头。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时，她也站起来了，江青待林总走到自己跟前时，她迈出一步就跟在林总后面了。周总理完全知道江青的习性，让她在林副主席的后面，自己的前面投了票。

投票结束之后，大会休息了约二十分钟，接着在大会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宣布选举结果。公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江青一直比较注意听，当宣布到她自己的票数时，她停了一小会，即退席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出场。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得票情况并不佳，江青少了八票，张春桥，姚文元各少十余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江青知道后大为震怒，说谁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当“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公布完之后，林彪站起来宣布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样“九大”就在国际歌声中闭幕了。散会时，不少“小代表”走到会场的主席台前，要仔细再看看毛泽东的“龙颜”。毛泽东也站起来，多次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才离开。

在参加“九大”的高官中，江青集团是抱着最大的喜悦来的；可是在散会时，江青集团却高兴不起来了。据邱会作回忆说：

【散会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是低着头向外走，他们不像往常那样，昂首到处张望。在“九大”选举时，江青一伙全部当选为中央委员了，但没有一个得全票的，特别是江青没有得到全票，他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60)

在“九大”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进行。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捣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同志的人，决不是‘小代表’，而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

姚文元说：“同意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也可以来个大鸣、大放、大字报。”

周总理向坐在他旁边的江青说了一句话：“你说几句吗？”

江青说：“我是受害者，不说话！”

康生接着说了话，他说：“要查选票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毛主席的指示是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

陈伯达说：“康老说得好。”

周总理说：“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见。少几票没有什么关系嘛，不要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个‘×’，那又算什么？此事，由汪东兴先报告毛主席。在必要时，我还会向毛主席汇报。”】

党代会上的选票少几张，并不影响选举结果，但却被认为是一个人“威信”的反映。林彪故意比毛泽东少两票，就是意味着他不想冒犯到毛泽东的威信。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如果只少一、两票，面子上还无伤大雅，可是他们少了许多票，票数比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还要少，这就让他们感到当众出丑，大伤面子。

江青对军委办事组的人愤怒地说：“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

江青集团没想到林彪集团会在选票上做文章，事先完全没有防备，吃了一个亏。这样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之间，又结了一次仇。据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一伙对选举问题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使黄永胜略有不安，他对着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可能惹祸了，你们看出来没有？”

吴法宪补上一句说：“本来就不应当去搞那些事。”

李作鹏一下生气了，用很粗鲁的语言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帮帮硬，现在又屁股稀松松！”

我也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我的话是有意给黄永胜壮胆。

黄永胜说：“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讽刺人，好汉做事好汉当！”

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犯党章的大合唱。”

(61)

4月25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机会同周总理见面，总理对我说：“你回去同黄、吴说一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辫子，要吃大亏的。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的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我将总理上面说的情况，同黄、吴说了，并建议他们两人在顺便的时候，向总理说一下在选举中的问题，他们同意我的建议。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

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本来以为江青他们看不出来，因为是无记名投票。可是没想到江青他们看破了，并扬言要查票，使黄永胜等人略有不安。不过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帮了他们的忙。周恩来没有牵扯到此事，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跟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也猜到江青他们少了选票，应该是林彪集团干的。毛泽东对江青有野心，想跟林彪争接班人的事，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林彪对江青有很大的不满，毛泽东心中知道。但林彪用这种当众让江青出丑的方式，来报复江青，也让毛泽东感到非常不快，这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结了一个疙瘩。

对于江青等人提出查选票的要求，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回答也很艺术，他说：“要查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毛泽东这句话，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

说反对，毛泽东只是说自己不参加查选票的事。这样一来，是不是查选票，就由周恩来最后决定了。此时周恩来当然做出对林彪集团有利的决定，不查选票。

周恩来还特别告诉邱会作说：“军队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这次关于选举问题，就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但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这是周恩来向邱会作暗示：你们内部的人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这次选举的事，已经有人写信给我揭发你们了。不过这封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不会传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还向他们建议：在一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辫子，要吃大亏的。

“九大”闭幕之后，下一个节目就是由“九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要进一步由中央委员们选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这时，选举争夺战进入白热化了。因为成为中央委员，还算不上中央决策人，只有进入中央政治局，那才是进入了决策人集团。

(62)

按照惯例，“九届一中全会”应该在“九大”闭幕后的第二天召开，可是这次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在“九大”闭幕四天之后的4月28日才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这主要是因为决定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很费心思。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来策划中央政治局“组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因为陈伯达本来是八届政治局常委，排名还在康生之前，可是毛泽东却没有让他参加“组阁”小组。而黄永胜不是八届

政治局常委，反而参加了“组阁”小组。很显然，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信任陈伯达了。江青对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也不满，她认为自己虽比不上周恩来和康生，比起黄永胜还是很绰绰有余的。毛泽东让黄永胜而不让江青参加组阁，江青当然不高兴了。

毛泽东破格提拔黄永胜参加组阁，而且还准备提拔黄永胜当政治局常委，这其实是针对林彪的考虑和布局。因为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在军队中第二位的实权人物。如果毛泽东把黄永胜从林彪集团中“拉”出来，“拉”到自己这一边，就可以大大改变军队中的实力对比，局势就会向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可是黄永胜却“死不开窍”，毛泽东多次“拉”他，都没有拉过来，这些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据邱会作回忆说：【4月25日晚，军委办事组正在京西宾馆开会，汪东兴来电话通知：主席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主席召集周、康、黄开会，并不新奇，但“九大”刚闭幕，一中全会还没有开，新的政治局尚未产生，这样的会就不是一般的会了。

黄永胜不知道去开什么会，这时叶群来了。叶群一进门就笑笑地告诉黄永胜说：“你要去参加组阁了。”

叶群又说：“今天你们要开的会，江青根本不知道，主席怕她干扰组阁工作。今天的会议主要谈准备一中全会的问题，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单初步定下来。”

黄永胜刚要出门，林彪办公室来电话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要到京西宾馆去。”

叶群为了回避江青，她从后门走了。黄永胜说：“我也走。”

江青来了之后，一看黄永胜和叶群都不在，就谈了几句。她说：“一中全会

就要开了，要产生中央政治局。关于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具体情况，现在就不谈了。”】

(63)

毛泽东要“拉”黄永胜，林彪当然也要“拉”黄永胜。林彪让叶群提前把让黄永胜参加组阁的消息透露给他，表示对黄永胜的信任。另外，江青此时还不知道她被排除在组阁小组之外，因此江青对别人吹牛说：“关于组织政治局的原则问题，毛主席已同我商量过。”

邱会作接着回忆说：【黄永胜开会回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花时间；二是先搞一个名单出来，为了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提名单的工作，我们两人是幕后。”

林总说：“对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

毛主席说：“那只好独裁了，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

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的三人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同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毛泽东的最初想法是，让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人商量名单，毛泽东和林彪不参加提名。毛泽东虽说不参加提名，但最后的批准权在他那里，实际上他还是可以提名的。但林彪如果不参与提名，那林彪真的就被架空了。因此，毛泽东刚刚说他和林彪在幕后，不参加提名工作，林彪马上提出相反意见：“请主席指示人选方针原则”，这其实就是林彪要求毛泽东参与提名工作。

毛泽东看出林彪的不满，就退一步说“那还是我们五人独裁吧”。这样一来，提名工作还是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五个人参加，这样林彪就有了提名权，不是在“幕后”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九届一中全会之后，我同黄永胜有过一次闲谈。我问黄永胜：“你这个军委办事组长参加了组阁，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参加呢？”

黄永胜说：“康生事实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我说：“你参加了组阁工作后，我们曾经议论过，你将是中央常委之一。”

黄永胜说：“这是有根据的。在主席那里，曾经定了七个人的中央常委名单：毛、林、周、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还有江青或张春桥的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点生气，忙问：“为什么呀？”

黄永胜爽快地说：“那么多的老资格，人家会戳你后背。另外，我当了常委，江青也会闹着当。因此，我不当也不能让江青当。”】

(64)

关于黄永胜推掉常委之事，吴法宪也回忆说：【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出面提名她当常委。江青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去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当政治局委员，要拉拢周恩来，想让周恩来出面提她当常委。江青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碰了个软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想让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江青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四处活动，都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江青不能当常委。”

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会议后，黄永胜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从吴法宪和邱会作透露的情况来看，政治局常委的最初方案是七个人。毛泽东向黄永胜伸出橄榄枝，想用“常委”这个高位把黄永胜拉过来，但黄永胜坚决不干。如果黄永胜接受了毛泽东的橄榄枝，那么文革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而黄永胜不上常委，江青或者张春桥也就不好上了。据说江青曾放出话来：如果黄永胜上常委，她就也要上，因为黄永胜的资历和江青差不多。而黄永胜不上常

委，江青就没话说了。

另外，毛泽东对陈伯达有看法，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可是林彪和周恩来等人都替陈伯达说好话，毛泽东最后只好同意陈伯达当常委。

从这次组阁结果来看，毛泽东本想让黄永胜当常委，但黄永胜没有当；毛泽东不想让陈伯达当常委，但陈伯达却当了。可见毛泽东在人事安排方面，并不能完全让他满意。这也反映出，毛泽东达不到“一句顶一万句”的完全独裁地步。

(65)

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次选出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中，都是上一届的常委；21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0人是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这10人是毛泽东(76岁)、林彪(62岁)、周恩来(71岁)、康生(71岁)、刘伯承(77岁)、叶剑英(72岁)、朱德(83岁)、陈伯达(65岁)、李先念(60岁)、董必武(83岁)。而新当选的11位新人中，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出身：

(一)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三人：江青(55岁)、张春桥(52岁)、姚文元(38岁)；

(二)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五人：叶群(52岁)、黄永胜(上将，59岁)、吴法宪(中将，54岁)、李作鹏(中将，55岁)、邱会作(中将，55岁)；

(三)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三人：谢富治(上将，60岁)、许世友(上将，64

岁)、陈锡联(上将 54 岁)。

留任的 10 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大，都在 60 岁以上，新当选的 11 位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都较小，普遍在 50 岁左右，平均年龄年轻 10 岁以上。这个新旧政治局委员的年龄差别，体现了毛泽东启用新人，搞体制改革的思路。下面概要介绍一下这些新政治局委员。

新政治局委员中最重要人物是江青。本来江青按照她在文革中的表现和贡献，应该可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江青没有进入。当然这些原因中，毛泽东的原因是最为重要的。

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常委，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江青的性格，第二个考虑是形势的需要。从江青的性格来看，她是善于搞破坏，而不善于搞建设的人。让江青去打倒某个人，她可以干得很好；而让江青去团结一批人，干一件建设性的工作，江青就无法胜任了。

从形势的需要来看，在第一场“夺权的文革”中，主要任务是打倒、造反、夺权，这些事江青干起来都得心应手。而在今后的第二场“整党的文革”中，主要是党内斗争，这与造反和夺权不一样，需要相当高的政治手腕和技巧，这时江青就不能胜任了。硬让江青出来干的话，她只能是帮倒忙。所以，综合各种考虑，毛泽东没有让江青当政治局常委。

(66)

至于江青当政治局委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江青没有道理不当政治局委员。不过在江青入选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还出现一段戏剧性的情节。据邱会作回忆说：

【4 月 26 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主席对上报名

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林总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划了一个大叉，但林总没有加上“江青”。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要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呢？这应该是毛泽东给林彪出了一个“考题”。毛泽东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内讧感到痛心，他希望林彪和江青能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为此，毛泽东先向林彪示好：这个表示就是让叶群进入政治局，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加上叶群的名字。

同时，毛泽东又划掉江青的名字，这里毛泽东希望林彪重新加上江青的名字。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那就是林彪推荐江青，准备与江青重归于好的表示。

当然，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心中也不一定真的想与江青重归于好，也可能只是迫于面子。因为毛泽东加上了叶群，林彪也加上江青，这算是礼尚往来。林彪不加江青的话，面子上似乎说不过去。不管林彪是不是心甘情愿，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就有相当的好处。

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就等于是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就等于是林彪向江青示好。“林彪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的这个消息传出去，会对军队中反江青的势力，起很大的遏制作用。因为军队中的反江青势力的总后台就是林彪，如果这些反江青的人看到林彪都向江青示好了，那么他们也要考虑转变态度，赶紧跟上新形势，向江青示好。

特别是黄永胜等坚定的反江青分子，他们本以为林彪是坚决反江青的，所以才这么大胆地反江青。如果林彪做出向江青示好的举动，黄永胜等人就会怀疑林彪反江青的坚定程度，更进一步怀疑林彪这个人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更有甚者，周恩来等人也会怀疑林彪的反江青，到底是真是假。

因此，不管林彪的用意何在，只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对毛泽东来说，就是一场小胜利。然而，林彪却看破了毛泽东的用意，林彪把叶群的名字划掉，却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第一，林彪以此表示他不想与江青重归于好；第二，林彪不想为了面子，让自己吃一个哑巴亏。当然，这样一来，林彪就要再次得罪毛泽东了。不过林彪心里也有气，他不喜欢毛泽东给他出这样的考题。

(67)

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划掉江青，加上叶群，是因为毛泽东“不好意思”让江青一个人进政治局，所以要拉叶群进去“陪衬”江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毛泽东这个人的做事风格，从来没有“不好意思”，从来是不怕别人议论的。如果毛泽东让江青进政治局都“不好意思”，那他还怎么“好意思”打倒自己多年的老战友刘少奇呢？况且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政治局委员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本不需要“不好意思”。

林彪审阅后的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看到名单上毛泽东划掉了江青，林彪划掉了叶群，如果按照这个名单公布下去，江青和叶群都进不了政治局。周恩来马上明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和林彪又闹矛盾了，现在只有他周恩来出面，才能调解得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这场矛盾。于是周恩来马上开始行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说：【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了江青、叶群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

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

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总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第一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原本只有江青，没有叶群，而毛泽东加上了叶群；第二轮政治局委员名单上，周恩来把江青和叶群的名字都加上去了。这次毛泽东再次划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再次划掉叶群的名字，林彪还是没有加上江青的名字。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4月26日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谈论江青、叶群两人的问题。

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江青同志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同志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68)

毛主席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总家里去，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

周总理对林总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

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总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毛泽东既然划掉了江青的名字，就不能再出尔反尔，轻易把江青留下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难处，于是专门带人去毛泽东那里登门拜访，坚决要求让江青进入政治局。这样众人的恳请，就让毛泽东可以下台阶了，于是毛泽东顺势同意江青进入政治局了。林彪也一样，顺势同意叶群进入政治局了。

这里林彪说“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这话是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亲自决定加上“叶群”的名字，林彪却划掉“叶群”，这分明就是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决定。当然周恩来等人也装糊涂，没有人会为难林彪的。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最后，27日下午，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毛主席住处开会，九届中央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定下来了。毛主席说：“今天下午谈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单。”主席接着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个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主席、林总、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五人，在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

临走时，主席对黄永胜没头没脑说了一句：“黄永胜，你也能统管三军。”】

毛泽东和林彪的这次矛盾，在周恩来手中圆满解决了。如果换一个人，未必能像周恩来处理得这么恰如其分。最后毛泽东对黄永胜说“你也能统管三军”，这是毛泽东对黄永胜还抱有希望，还要试图“拉”黄永胜。此时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了，所以他对黄永胜说这句话的画外音是：“你黄永胜要跟我毛泽东走的话，我就让你统管三军”。

尽管周恩来圆满地解决了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但在周恩来心中，对这次“九大”政治局的人选，是非常不满意的。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问题。

(69)

前面说了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和叶群的当选情况，下面再说其他新代表的当选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当选政治局委员，这已经成为公认的定局，没有人吃惊。因为从1967年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被认为是理应如此。如果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没有被打倒的话，他们也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谢富治(上将)、许世友(上将)、陈锡联(上将)这三个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当选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历史上与林彪没有关系，不买林彪的帐，林彪也指挥不动他们。所以，红四方面军出身的三个人进入政治局，明显是毛泽东作为平衡林彪势力的棋子。对于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大家还不吃惊，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早就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他进政治局，似乎没什么悬念。不过许世友和陈锡联这两个纯粹的军人，也进入了政治局，这就让人有些吃惊了。当时的一些外电据此报道，中国新成立的政府是“军人政府”。

更让人吃惊的是，中央军委办事组出身的四个将领黄永胜(上将)、吴法宪(中将)、李作鹏(中将)、邱会作(中将)，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吴法宪、李作

鹏、邱会作三个人，军衔不过是中将，居然也能进入政治局。据邱会作本人说，他对自己能够进入政治局，都感到很意外。为什么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可以一下子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呢？这需要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说明一下当时军队的领导体制。在文革之前，军队的最高领导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由一名军委主席，一名常务副主席，和几名普通副主席组成。除了军委主席毛泽东之外，具体领导军队的是常务副主席林彪，他可以召集其他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开会，研究和决定军队的主要工作，林彪是军队中实权最大的人。

军队中实权第二大的人是总参谋长罗瑞卿，罗瑞卿被打倒后，杨成武接任；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具有很大的实权。在林彪和总参谋长之间，还有几位普通军委副主席(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他们的地位比总参谋长高，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军队的一些事务。

文革之后，中央军委的几个副主席都被“炮轰火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基本上瘫痪了，于是就成立一个“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机构，代替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军队的日常工作。中央军委办事组是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其他的军委副主席无法干预军委办事组，这样一来，林彪在军队中的实权，就比文革前大了许多，因为他不必再受到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的肘掣了，可以一个人“独裁”军队的事情。

(70)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林彪是文革的受益者，文革之后林彪的权力更大了。但任何事情都是辩证的，权力大了，同时也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树大招风”。后来林彪仗着他在军队中的“独裁”地位，擅自决定发出“一号

命令”，这又给林彪带来致命的灾难。这是后话了。

中共过去一直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人在中央的地位都不高。虽说总参谋长是军队中实权非常大的人，但建国后的历届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罗瑞卿、杨成武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永胜是第一个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总参谋长。这样一来，军队在中央的发言权显然大了很多。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毛泽东本人，而是军队和林彪，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

毛泽东让林彪的主要亲信进入中央政治局，表面上是对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立功奖赏，但在表面之下，这个安排还有另外一层作用，这就是堵死了林彪激励部下的手段。

对于领导人来说，用某种手段激励部下努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激励手段，第一个是钱，第二是地位。比如一个公司的老总，他要激励一个重要的员工好好工作，那么就可以用每年涨工资的手段：第一年 1 万，第二年 2 万，第三年 3 万……，第 10 年 10 万；这样使员工感到只要努力工作，就不停会得到涨工资的回报，员工也就一直努力工作。

相反，如果公司老总第一年就把这个重要员工的工资提到 10 万，以后每年的工资不变，一直是 10 万。这样的话，第 1 年员工当然非常高兴，可是在此之后，员工不管怎么干，工资也不变，那么员工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到头了”，再怎么努力结果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尽管员工一直拿着高工资，而他的工作积极性反而越来越低。

在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不能用钱来激励，那就只能用提高地位来激励了。一个人工作干得好，几年后提升科长，再干几年提升处长，再几年提升局长，再几年提升部长，再几年提升副总理……，这种逐渐升官，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部

下的积极性，激励部下为你卖命。相反，如果一下子把这个人提升为副总理，以后他再怎么干，也都是副总理，不会再升了。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对部下用“封官”进行激励的手段。因为部下感到从你那里已经不会再得到好处了，为你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

对于林彪来说，如果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第一步先提升为中央委员，第二步再提升为候补政治局委员，第三步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那么林彪就可以用“封官”来激励部下替他卖命，干得好就可以继续升官。相反，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一步到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是在那时的权力格局下，黄永胜他们可以达到的最高职位了，他们已经“到头了”。

(71)

既然黄永胜等人感到自己已经“到头了”，那么林彪想用“升官”来激励他们替自己卖命，也就不再可能了，他们替林彪卖命的积极性也就越来越低了。这点正是毛泽东想要看到的东西，所以毛泽东愿意把林彪的四个主要亲信，“一步到位”地都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据说黄永胜当时已经被内定为第一副总理，他已经是位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下的第四号人物。如果黄永胜有野心，他还想继续升官，还想往上爬，那他只有离开林彪，改投到毛泽东门下。黄永胜帮毛泽东一起扳倒周恩来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升为总理；帮毛泽东一起扳倒林彪的话，黄永胜就可以取代林彪，升为军队的第一把手，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黄永胜也可以统帅三军”。

毛泽东曾想用“统帅三军”这个诱饵，把黄永胜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让黄永胜反戈一击向林彪进攻。然而黄永胜这个人野心却不强，没有想继续往上爬，没有想取代林彪或周恩来。如果黄永胜是江青那样野心勃勃的人，那中国的历史可

能就要改写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是很看重和看好军委办事组的，他想把军委办事组拉在他的手上，为此主席多次拉黄永胜，可是黄永胜不为所动。这不是说黄永胜不愿意离开林彪，而是黄永胜没认识到主席的用意，毫无“悟性”。试想，如果毛主席拉动了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并和江青一伙结合起来，那党和国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林彪、总理在主席那里就是蚂蚁一样了，轻易就可以捏死。】

上面谈了这次新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里还要谈谈几个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人。这次未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上一届委员，最突出的就是陈毅。在“九大”上，朱德和陈毅两个人，一直是毛泽东重点要摆平的对象。陈毅是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因此他是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来参加“九大”的。然而上海是中央文革直接控制的地盘，因为陈毅作为上海的代表，受了不少批，挨了不少整。

据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在上海讨论陈毅的代表资格问题时，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二月逆流”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中心的“裴多菲俱乐部”，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为中心的黑据点，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陈毅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72)

徐景贤回忆说：【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后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前面说过，陈毅等人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很多自我批判，当时他们以为自我批判之后，“二月逆流”的问题就可以过关，以后就没事了。没想到在半年后的“九大”上，陈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批判材料，却成为揪他“小辫子”的重要材料。据徐景贤回忆说：

【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文稿，“啪”地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说：“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你却反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原则，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文稿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我接着说：“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代表们刚刚才晓得陈毅原来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

我清了清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说：“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过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名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脑后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那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声呼叫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陈毅这时是哑巴吃黄连，因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为了“过关”，随便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错误。陈毅原以为承认了错误，检讨一下，就没事了。而在现在，他想要推翻自己过去承认过的错误，也是很难的。

(73)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026人，选举出中央委员97人；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出席大会的党员代表1512人，选举出中央委员170人。可见参加“九大”的代表人数，以及选出中央委员人数，都大大增加了。

参加“九大”的1512位代表中，大部分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他们对中共早年的党史并不清楚。“九大”上江青等人把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朱德、陈毅等人的检讨材料抛出来，大部分代表头一次听说朱德、陈毅在红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泽东，都感到义愤填膺。因此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大部分人主张不

选朱德、陈毅等人。这时毛泽东又表态说，还是要把朱德、陈云等人选进去。

毛泽东说：“几位老师，李先念、李富春要选，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

许世友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把他们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

毛泽东说：“那些反过我的人，要选他是困难的，要你许世友投他们的票也是困难的。那些人，资格很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有的还犯过大错。他们的检讨也有，但群众不通过。我看以后就不要检讨了，主要看行动。我们看他们的行动，他们也看我们的行动。”

许世友说：“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他们。”

毛泽东说：“那不就成了命令主义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要选进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既要保证朱德等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最后的选举结果是：朱德(809票)，陈云(815票)，陈毅(867票)，叶剑英(821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李富春(886票)，李先念(922票)。

大会总票数是1510票，要过得到半数以上(755票)才能当选。除了李先念之外，其他人都是800多票，勉强过半数当选。这样低的得票率，使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这次选举还有一件趣事，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党员居然也以全票当选中央委员。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广州军区代表迟泽厚回忆说：【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

人代表王白且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74)

对于上一届“八大”的21位政治局委员来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开除党籍，这只有刘少奇1人；

第二种情况是犯了严重错误，被排除于中央委员之外，降为普通党员。第二种情况的有5人：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谭震林。

第三种情况是犯了错误，受到降级处分。第三种情况的有6人：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朱德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也降一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委员；陈云和李富春降两级，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为中央委员。

第四种情况是犯了错误，但经过检讨后，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第四种情况的有3人：陈伯达、李先念、叶剑英。

剩下没有犯错误的“干净”的人，只有6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刘伯承。

周恩来派系最重要的人物陈毅，没有获得政治局委员的提名，没有进入政治局，这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在1955年评元帅的时候，原方案中就没有陈毅，是周恩来力争之后，陈毅才进入十大元帅的第六名。十大元帅的前六名是：朱德(总司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司令)、林彪(第四野战军司

令)、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贺龙(红二方面军创始人)、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

这次陈毅等人没有进政治局，许多老干部深感意外。江青都进了政治局，陈毅反而进不了，许多人纷纷为陈毅打抱不平，也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看法。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伤害了广大老干部。但大多数受伤害的老干部仍顾全大局，对毛主席还是诚心拥护的，这是我们党团结的象征。但把一些应当进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陈毅、李富春、陈云、聂帅、徐帅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进政治局，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纳新了”。】

当然毛泽东也意识到对陈毅等人过分苛刻了一些，所以又给他们一些安慰，让陈毅等人保留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

为陈毅的事，周恩来本想跟毛泽东再次“争一争”。这时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一张纸条，说：【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

(75)

邓颖超一方面是关心周恩来的身体，另一方也是劝周恩来不要争，“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周恩来后来终于没有争，这或许是听了邓颖超的意见。

到了周恩来这样地位的人，已经没有人敢给他提意见了。“对事对人要放眼量”这样告诫的话，别人是不敢对周恩来说的。邓颖超以夫人的身份，常常在关键时刻给予周恩来劝告和提醒，这对于帮助周恩来少犯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江青有邓颖超这样的情操，以夫人的身份在关键时刻给予毛泽东劝告和提醒，中国的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周恩来这次“没有争”，周恩来派系大为受损，却

反而是“塞翁失马”。因为周恩来派系力量的下降，凸显林彪派系力量的骤强，不仅使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矛盾激化了，也使毛泽东把防范的重点，从周恩来派系转移到林彪集团上，最终引发了双方的激烈斗争，使周恩来派系反而得了“渔翁之利”。这些是后话了。

“九大”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汪东兴。本来人们都普遍认为汪东兴一定会进入政治局，因为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联系人，也是最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之一。因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除了汪东兴和温玉成之外，都进入了政治局，而汪东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对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的原因，邱会作回忆说：

【九大开幕之前，汪东兴病了。叶群带我们去看过汪东兴，之后叶群还叮嘱我们再去看汪东兴。记得我们去看汪东兴时，他不但很感谢，而且很激动，说着说着又哭又骂，什么“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不要我了”……

江青没去看他，也没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没派人去看他。汪东兴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那个时候一切都敏感得很。汪东兴在我们面前敢对主席不敬，我们是很吃惊的，看来主席和汪东兴也有很深的私密关系。汪东兴在杨、余、傅事件以后就和我们走近了，“九大”以后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

(76)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没有当选政治局委员，似乎是来自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不信任。而且汪东兴敢当着邱会作他们的面，说“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了”之类对毛泽东不敬的话，的确让人吃惊。汪东兴这个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后面我们再专门分析。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会议的

议程就是选举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毛泽东坐下后，不见周恩来，问道：“总理呢？”

原来周恩来按照姓氏笔划排列，坐在台下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到台上来坐，这时大家对周恩来报以热烈鼓掌，周恩来这才走上台去。

这次选举政治局委员，仍然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过半数的候选人当选。277人中央委员的投票结果，选出政治局委员25人，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会议投票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之后，马上举行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据邱会作回忆说：【选举结束后，就在主席台前召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和康生也坐到台上去了，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坐台下前排。江青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后一个到达台前的。

毛主席说：“下面是什么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

总理说：“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还任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总理刚说完，林总就说：“赞成。”】

这里需要指出，朱德从一开始就只是中央军委委员，从来没有当过军委副主席。最早的军委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后来又增加了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不同，政治局委员具有决策权的实职，而军委副主席是没有决策权的虚职，在党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安排陈毅等五人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方面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对林彪的一个制约。不过林彪对这个方案立即表示“赞成”，

因为这个方案实际上对林彪还是很有利的。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无实权，实权在中央军委办事组手里，周恩来也明确说：“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77)

在“九大”的闭幕式上，毛泽东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对这次大会应该说是并不满意的。据邱会作回忆说：

【毛主席究竟对“九大”满意不满意？对林彪接班满意不满意？从“九大”当时的情况来看，主席好像是满意的，但从“九大”以后主席的一系列做法来看，主席是不满意的。主席可能还是信了苏修“军事官僚专政”的说法，认为军队上了台，掌了权，外电也是这样评价和攻击的。毛主席嘴上在调侃，其实心有疑虑，以后的事是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九大”的结果来看，毛主席革刘少奇的命成功了，权力却给了解放军(林彪)很大一块，无形中形成了“军政府”。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九大”写进党章，形成这种局面，毛主席应该是高兴的。所以毛主席的不高兴，说明他内心并没有想把班交给林彪。】

邱会作在这里说毛泽东对林彪有“疑虑”，这个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已经上升为路线矛盾。从两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如果林彪接班的话，林彪上台后肯定要把文革停下来，肯定不会继续革命。毛泽东集聚他毕生最后的精力搞的这场文革，如果交到林彪手里，那就是前功尽弃，毛泽东的一切心血就付之东流了。

所以，毛泽东的内心中，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林彪接班。那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在《党章》中写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是毛泽东的权宜之计，这个原因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其实林彪早在 1966 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已经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事实上的接班人。在 1969 年的“九大”上，只不过是把林彪事实上的接班人地位，正式化和公开化而已。林彪的实际地位并没有提升，职权还是跟以前一样，仅仅是得到一些名声上的荣誉而已。

高明的政治家，和高明的棋手一样，可以提前看到好几步棋，而蹩脚的棋手，只能看到眼前的一步棋。毛泽东在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将来怎么把林彪的接班人拿下来。因为将来要拿下林彪，现在就不能让林彪的羽毛太丰满了，所以毛泽东就在“九大”上，暗暗布置下将来拿掉林彪的政治布局。

毛泽东的第一个布局，是把林彪的势力局限在军队之内，不让林彪插手党和政府的事情。“九大”后，林彪还是只管军队，党政的职务没有给林彪一个。不仅如此，就是林彪的亲信“四大金刚”，也没有让他们在党和政府部门兼职。

(78)

毛泽东真正中意的接班人，比如张春桥，毛泽东就让他党、政、军各方面都兼职。张春桥在党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这是一个实权很大的职位；张春桥在政府内任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都是实权的职位；张春桥在军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这也都是有实权的职位。

毛泽东知道，一个接班人要想真正接班，必须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势力。毛泽东给张春桥在党、政、军各方面安排这么多有实权的职位，就是想

让张春桥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日后接班。

对比之下，毛泽东没有给林彪安排一个党或政府的有实权职位，也就是不想让林彪在党和政府内发展自己的势力。试想，如果林彪真的要接班，他只在军队中有势力，在党和政府内一点势力没有，这样能接好班吗？这样一看，就知道毛泽东最初就没有打算让林彪接班。后来林彪为了“争”国家主席这个政界的职务，终于跟毛泽东闹翻了。

毛泽东的第二个布局，是让刘伯承等5人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那么只安排林彪一个军委副主席就可以，没必要再安排其他人当军委副主席。刘伯承等5个军委副主席，虽说没有实权，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林彪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可以形成对林彪的牵制。

毛泽东的第三个布局，是让黄永胜等林彪的四个亲信“一步到位”进入政治局，堵死林彪搞“封官许愿”的空间，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林彪也是政治高手，他从毛泽东的各种布局，应该很清楚地看出来，毛泽东并没有真心让他接班。林彪也知道毛泽东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过是安慰他一下，不能当真的。刘少奇的国家主席地位还是《宪法》规定的，不是也照样打倒。试图靠一纸空文来保住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实力和智慧。

林彪既然看出来，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不是自己，那么毛泽东的真正接班人是谁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林彪认为：毛泽东真正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集团，将来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既然是这样，江青集团就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了。一旦江青集团壮大起来，可以独当一面了，那么林彪就没用了，也就是林彪倒台的时候到了。

(79)

毛泽东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把江青集团扶持起来。而林彪却发现，真正对他构成威胁的，正是江青集团。林彪的生存之道在于，不但不能扶持江青集团，而是要尽可能地打压江青集团，否则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只要江青集团壮大不起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没有人可以取代，林彪就是安全的。基于林彪的这种想法，在“九大”之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和白炽化了。

在“九大”上，林彪集团在选票上做文章，搞得江青集团大丢面子。“九大”后，江青集团当然要对林彪进行报复。据吴法宪回忆说：

【“九大”以前，江青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

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的，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

(80)

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给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跟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

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提到了政治局里。江青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

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

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81)

《吴法宪回忆录》出版较早，作者说话顾忌较多。吴法宪对江青拉拢他们批判林彪的事，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吴法宪不敢点破江青后面的人。《邱会作回忆录》出版较晚，作者说话顾忌就少了不少，比较大胆了。邱会作也回忆了江青拉拢他们的事情，因为邱会作说的比较具体，这里用比较大的篇幅引用。邱会作说：

【“九大”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什么是“中

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但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这些人从心眼里认为林总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为毛主席和林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亲密的。林总为毛主席打江山，战功显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毛主席向林总“发难”时，我们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么用意，也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我们没有往毛主席和林总之间有隙处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关于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厌”等事情，在后面介绍）。

毛主席的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说出来的话，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说完也在等着看，对他有利则前进，否则就当成说了点幽默。所以毛主席在“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如梦初醒(或半醒)。

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

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全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发

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82)

邱会作这些话，说的是比较诚恳的。邱会作他们认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 1927 年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了，而江青 1937 年才到延安，交情是不能和林彪相比的。如果林彪和江青之间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是要林彪？还是要江青？邱会作他们相信毛泽东肯定是要林彪，所以就大胆地反江青了。邱会作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周恩来教育他们，他们也不懂。等他们最后“懂”的时候，为时已晚了。

邱会作又回忆说：【从 1969 年底以来，江青找黄、吴、李和我谈了几次话，前几次谈话都是骂陈伯达的，而且把陈伯达骂得一无是处。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说：“江青她这个人，叫你去你就去，如果不去，麻烦更大。你们去只带着耳朵就是了。”

1970 年 5 月 17 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十一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这次去，除了黄、吴、李和我之外，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

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

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当时，黄永胜越听越激动，他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这样说他？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

黄永胜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

作鹏坐得靠后一点，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胜的，我们也附和黄永胜的话，也就站起来走了。吴法宪坐得靠前一点，他也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黄永胜走到门口，江青就向黄永胜大声说：“哎，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事！”

有关《解放军报》的事是这样的。郭沫若给江青写了一首颂扬《样板戏》的诗，准备明天在《解放军报》发表，李德生把校样都拿来了。

这时李德生也急了，他说：“黄总长，不行呀，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问题。”

黄永胜说：“你是总政主任，这个问题你决定，你自己处理吧。”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这时吴法宪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并简单向汪东兴说了一下。汪东兴一听是对着江青的，立即去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并叫马上来。

(83)

本来是黄、吴、李、邱一起去，叶群说都去不好，不要兴师动众，最后林总说：“黄、吴一起去。”

黄永胜和吴法宪走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国防部所在地)去等。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

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

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如果总理先知道了，咱们还没说，总理会伤心的。”

黄永胜认为我说得对，但他考虑了一下说：“老邱还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们想想，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

大家都认为黄永胜说得对，黄永胜有点懂“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

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

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

康生等人在中央时间久了，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的关系，就看得比较“透”了。而邱会作等四人刚刚进中央，当然不懂什么是“中央政治”，十分幼稚。不过他们的幼稚，却让周恩来感到“感动”。世故狡猾的人从来不会让人感动，忠厚老实的人才会让人感动。

林彪也看出邱会作等人幼稚，不懂“中央政治”，所以“五七一”计划等，都不能让这些人知道。直到林彪走后，黄永胜还大声疾呼：“你(林彪)跑什么跑，害死人呀！”黄永胜到那时还没有真正明白“中央政治”，没有明白林彪为什么要跑。

(84)

上面邱会作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情况是这样的。1969年5月，已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再次外巡，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到了梅岭一号，毛泽东看到从走廊到客厅、书房、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最先提出“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成了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毛泽东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

厌了。”

还有，据参加修宪工作的杨福云回忆说：【1970年7月17日，修宪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看来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辽宁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四个副词，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主席一进北大厅，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布置工作人员将大会堂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

(85)

周总理又说：“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干，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

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这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

周总理最后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

总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参会者听了总理的话，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当时最具政治性、最尖锐、最敏感、最不能议论的问题。而今天，总理以如此明确的态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几年里风靡全国的说法、做法，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自然震惊不小。】

根据杨福云的回忆，周恩来亲口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亲口说“四个伟大”讨厌，当着林彪的面，让周恩来把毛主席语录摘下来，这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这件事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发生的，可见此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到了当众不给林彪面子的地步。

林彪是旧思想较重的人，也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认为“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这样当众不给林彪面子，虽不能说是当众羞辱他，但至少是当众让他难堪，这或许是导致林彪走上不归路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九大”之后的事。

关于“九大”之后，还有一个人应该提到，他就是陈伯达。尽管毛泽东不喜欢他，陈伯达最后还是进入了九届政治局常委，但已经是坐冷板凳的人了。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江青放言，黄永胜如果当常委，她也要当。许世友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的这个观点。”

“九大”后，陈伯达就基本上没有见过毛泽东了。陈伯达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也就不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跟毛泽东疏远了，跟林彪就走得近了。陈伯达渐渐成为林彪住所毛家湾的常客，经常去毛家湾“看电影”，逐渐成为林彪的笔杆子。据说陈伯达的轿车总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看来陈伯达还是不想让毛泽东知道他去林彪家。

(86)

“九大”后，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第二场文革计划，这个计划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整党建党；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第一个干扰是“备战”。

“九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多次发展到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备战”上，不能像1966年到1968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文革。第二个干扰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进行下一场文革的部署。

尽管有各种干扰，毛泽东还是开展了他的“整党建党”部署。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论，提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次整党建党的目标是“吐故纳新”，即“吸收新鲜血液”和“排除废料”。毛泽东试图通过这次“整党建党”，把那些暮气沉沉、没有革命精神的党员排除出去，把充满革命热情的新党员吸纳进来。

这次整党建党，在“纳新”的吸收新鲜血液方面，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当时发展新党员的标准是“首先吸收产业工人中优秀的造反派入党”，降低了过去

苛刻的党员入党标准，简化入党程序，使一些以前不够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大约发展了 18% 的新党员进来，使过去以革命干部为主体的党组织，在成分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然而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的“排除废料”方面，则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次整党中，要对过去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而且整党的方式与以往不同，称“开门整党”。在评审党员是否合格时，不搞秘密主义，要吸收非党员的群众代表参与评审。通过审查的党员重新登记，未通过审查的党员，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开除，劝退等不同方式，把这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

在进行“反右”、“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倾向往往是扩大化；可是这次整党的倾向正好相反，是缩小化，因为整党是整到自己头上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到林彪事件发生前，在整党中有约 0.6% 的党员被开除，约 0.4% 的党员被劝退，约 0.5% 的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合计有 1.5% 的党员被“吐故”。

毛泽东指望在这次整党中，至少把 20% 以上的党员清除出去，这样整党才有意义。可是结果只有 1.5% 的党员被清除出去，这样的比例，显示出这次整党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到林彪事件之后，整党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毛泽东在这次整党中遇到的阻力极大，官官相护，使“吐故”难以搞下去。虽说发展了 18% 的新党员进来，但各级党委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老党员手里，新党员起不到改变局势的作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整党建党，又算是白搞了。

(87)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毛泽东进行了几项非常大胆的改革。第一项中央委员的改革。以前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一旦成为中央委员，就有

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而“九大”新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不但没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工资待遇也不变。毛泽东认为：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

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中央副主席，工资仍是每月 68 元；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工资仍是每月 67 元 2 角；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没有变成城市户口，依旧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在大寨大队挣工分。大寨大队每天劳动工值 1.5 元，按一个月出满勤算，陈永贵一个月也就是 45 元。

据说当时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 1 角茶叶费，吴桂贤知道这个规矩后，就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了。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时从他办公室里搜出不少瓶茅台酒，这些茅台酒是从哪里来的？据揭发材料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卖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不看不起他。】按照当时的标准，王洪文这样做算是“走后门”，以权谋私；然而按照现在的标准，用自己的钱买宴会上的剩酒，就算不了什么以权谋私。

“九大”上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是不脱产的，平时在自己以前的单位工作，召开会议时才到北京来开会，开会之后又回当地去工作。这样的中央委员，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毛泽东说：【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长期脱产，到我们中央来坐机关，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

毛泽东本来想把中央的专职领导干部，换成工农兵的兼职领导干部。他认为

这样就可以使干部不脱离群众，不会出现干部的腐败。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陈永贵等工农干部担任中央领导，由于水平有限，工作搞得并不好，所以也没有能够推广起来。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二项改革，是拉平干部与群众的物质待遇。给群众提高工资的代价太大，国家负担不起，所以就给干部降低工资，这是成本最低的。毛泽东说：【干部要减薪，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不过给干部减薪的阻力太大，终究没有实施起来。

(88)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三项改革，是精简国家机构。毛泽东认为现在国家机关的干部太多，人浮于事，要把一大批干部下放下去，精简政府机构。

1970年6月，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各部门设立报告》，把国务院的各部委，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只保留原来18%的干部。除了中央机关之外，各省、市、自治区机关以及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等，也进行了干部人员的机构精简。

为了安置精简出来的大批干部，就开始了一场“干部下放”运动。第一种是把干部直接下放到农村落户，第二种是把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让城市机关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干部，无论官阶高低，年龄大小，一律称“五七学员”。“五七学员”按照军队编制，过军事化的生活，集体整队出工、收工；“五七学员”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打井、修渠等。前后大约有数十万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

劳动学习。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干部下放工作就停顿下来。197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此后一大批下放干部返回城市，基本上还是回到原单位工作。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精简国家机构，又算是白搞了。

此后“五七干校”并没有立即撤销，大多数地方把“五七干校”变成干部去轮流劳动锻炼一下的地方，已经失去精简国家机构的意义。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正式撤销

毛泽东搞“整党建党”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收到他想得到的效果。究其原因，第一个是阻力很大，第二个是遇到干扰。第一个干扰就是上面提到的，中苏关系全面紧张。

1969年8月13日，也就是“九大”结束后的三个月，位于新疆的中苏边界铁列克提争议地区，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对中方一支38人只携带轻武器的边防巡逻队发动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全部阵亡。这既是苏联对珍宝岛事件的报复，也是新的挑衅。如果说珍宝岛冲突是中方取胜的话，铁列克提冲突则是中方失利，此后中方停止了在铁列克提争议地区的巡逻。

铁列克提冲突之后，中苏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毛泽东不得不把工作的第一重心放在备战上。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以军事为中心，国家预算的50%以上用于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项目，使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生产战斗机4千多架，坦克1万多辆。现在中国军队保有的战斗机数量为1500架，坦克7400辆，都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数量。

(89)

战斗机和坦克都是极为昂贵的兵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几年之中，倾国家之力，建造了那么多的战机和坦克，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我们在提到文革对人民生活影响的时候，不应当忽视因为“备战”的军事生产，造成民用商品的物质短缺。如果没有倾国家之力搞备战，文革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应该会小一些。

1969年9月3日，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国由周恩来赴越吊唁，苏联由总理柯西金前往吊唁，中苏双方的总理，本来可以在越南进行一次总理级会谈，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可是周恩来害怕在越南与苏联人谈，弄不好会被栽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说也说不清。所以周恩来有意避开柯西金，匆匆回国，由李先念副总理留下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说。柯西金也知道中方因为政治原因，不便在公开场合与他讲话，所以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转告中国，柯西金希望在返国的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见面时，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握手，以同志相称。接着，双方在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3小时40分。在机场会谈，中方就避免了欢迎仪式和招待活动的外交礼仪麻烦。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们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中

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周恩来又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周恩来最后说：【吵架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周恩来提议：双方达成谅解，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柯西金同意了周恩来意见，双方达成临时协议，使中苏关系暂时得到缓解。

从周恩来的发言来看，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他的讲话即表示了中方希望和平的诚意，也没有降低中国的身份。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可以成为后代外交官的学习教材。

(90)

有人说毛泽东反苏联仅仅是“意气用事”，不过只要从毛泽东在“九大”后进行的大刀阔斧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反修”是出自真心的，动真格的。建国时，中共照搬了苏联一套政治体制，毛泽东对苏联式的政治体制是不满的，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所以“九大”后，毛泽东有了可以“独裁”的权力之后，毛泽东就自创了一

套毛氏体制。毛氏体制，除了我们前面介绍过政治体制，还有教育体制(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赤脚医生)等，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一个被称为“毛主义(英文 Maoist)”的新分支。

毛主义在 1970 年前期，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世界各国出现过一些信奉“毛主义”的左派政党和组织，比如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毛主义共产党”，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美国的“革命共产党”等，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就不提起，只稍微提一下目前上台执政的尼泊尔“毛主义共产党”。

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模仿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于 1994 年开始进行游击战形式的武装斗争，尼共的力量迅速扩大后，在 2008 年宣布停止武装斗争，通过大选的上台执政，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并于 2011 年再次当选。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外援，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点与毛泽东当年的夺权政权十分类似。

毛泽东生前曾大力支持过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的武器、经济援助，并在中国境内设置“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帮助他们开展宣传战。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府宣布停止输出革命，断绝一切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从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相继放下武器向当地政府投降。但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至今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和进行游击战。

毛泽东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世界上也不会出现“毛主义”这个词。在文革之前，世界各国认为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认为中国只是在模仿苏联那一套，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新东西。毛泽东的文革，不仅在思想上，也在体制上，搞出自己一套新东西，让世界上一部分左派感到眼睛一亮。因为他们与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苏联那一套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焕然一新的东西，使他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毛主义”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分支。

(91)

尽管毛泽东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有一个地方却复古了，这就是撤销“中央文革小组”，恢复“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的这个“复古”是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造反夺权的机构，现在造反夺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个组织了；第二个考虑是：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建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整党建党”工作至上而下地推行下去。“政治局”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就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当然，新的政治局和以前还是不同的，这点我们后面继续说明。

毛泽东并没有宣布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不再提起它了，让它不了了之。早在“九大”之前的1969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份中央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署名不要加文革小组了，文革小组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署名用常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央文革小组”只是管文化革命的，现在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也就不需要保留了。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原来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说“设立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

小组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机构”，这就在《党章》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最不高兴当然是江青，江青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康生也不太满意，因为在政府和军队中，毛泽东都没有给他实职，也成了一个闲人。关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从“九大”选举到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心里都很不痛快，整天吊着一张脸，好像别人挖了她的祖坟一样。为什么？主要有三件伤心事：一是毛泽东没有委托她参加中央的“组阁”工作；二是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没有明确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存在。

1969年4月30日晚，江青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开，新选的政治局委员也通知参加，我们也如往常一样，规规矩矩都去开会了。今天的碰头会，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会最早，并且坐在总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

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重要问题。你们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子里，有种的，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

江青放了两段狂言之后，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东兴就得到报告：“来人了！”这是江青进中南海毛主席那里的代号，汪东兴立即回到主席那里去了。

(92)

5月4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人大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林总的指示说：“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主席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就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

前面提到，九届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 21 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政治局委员 4 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而毛泽东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只有 13 人，其他 10 人被排除出决策圈子。这 10 人是：张春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董必武、谢富治、李雪峰、汪东兴。

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个人是早就坐冷板凳的，被排除出去毫不奇怪；叶剑英、李雪峰是新坐冷板凳的，排除出去也不奇怪；许世友、陈锡联是纯粹的军人，排除出去也可以理解；可是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被排除出去，就有些让人意外。这三个人在文革中都为毛泽东立了很大功劳，为什么毛泽东不让他们进入决策圈子？这些我们后面再分析。

“九大”之后，江青、康生等人成了“闲人”，林彪和林彪亲信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虽说依然掌握军队的实权，但权力并没有扩大到党和政府。不过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林彪集团使用“掺沙子”的计策，这次毛泽东掺的沙子就是李德生。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五个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林彪的亲信，而毛泽东又让李德生进入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李德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少将军衔，历史上与林彪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是毛泽东可以信任的人。据李德生回忆说：【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

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

毛泽东不仅让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给李德生实权，让他当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回忆说：【任命我为总政治部主任，听说在我到北京来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当时谢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说：“李德生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主席当面批评了他。】

(93)

谢富治不明白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掺沙子”的意图，因为当时的高官们，大部分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无间的，没想到毛泽东在暗中要提防林彪。谢富治提出李德生不适合当总政治部主任，本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德生文化程度低。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呢？

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最主要三个部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号称“三总部”。当时，总参谋长是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是邱会作，这两个人都是林彪的亲信，这两个人毛泽东暂时还不能动，所以毛泽东可以“掺沙子”的职位，只剩下总政治部主任了。因此，尽管李德生的文化水平低，毛泽东还是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重用李德生，后面还要说到。

“九大”后具体主管党和政府事务的是周恩来，这样周恩来的实权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文革前周恩来只管政府，党是刘少奇管的，现在周恩来把党也兼管起来。然而，周恩来的实权虽然扩大了，但他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而毛泽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一班人的‘班长’。虽然政治

局常委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在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

但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从那时起，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有些事还当面请示。

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太过“纵容”，促成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九大”后主持日常工作的13名政治局委员，其中5人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是毛泽东的人，另外5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人，陈伯达的派别不明朗，真正属于周恩来的只有李先念1人，加上周恩来自己也才2个人。周恩来在这种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只能把毛泽东放在政治局之上，因为周恩来根本控制不了这个政治局。

**【本节完】**

***CHAIRMAN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